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三十·三十书系

高默波 著
章少泉
喻锋平 等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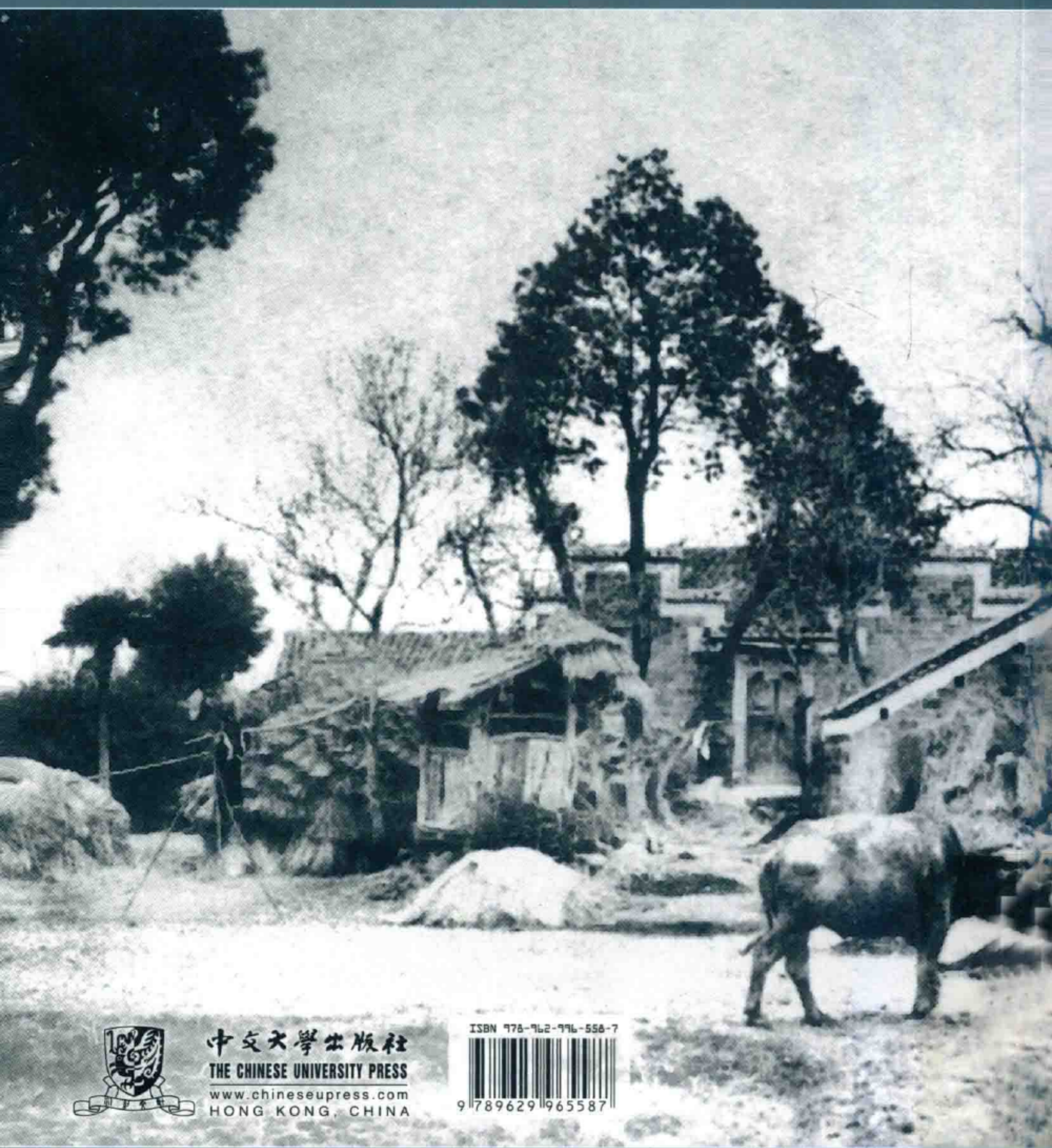
高家村

共和国农村生活素描

学术专著：社会学 / 历史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迄今六十余年，已历两世，人们开始谈论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这一谈论以至争论当然不是清谈，背后指向的乃是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至更长远的道路选择。

《三十·三十书系》编者按



中文大學出版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www.chineseupress.com
HONG KONG, CHINA

ISBN 978-962-996-558-7
9 789629 965587

三十 · 三十书系

高家村

共和国农村生活素描

高默波 著
章少泉、喻锋平 等译

中文大學出版社

■ 三十 · 三十书系

《高家村：共和国农村生活素描》

高默波　著

章少泉、喻锋平　等译

© 香港中文大学 2013

本书版权为香港中文大学所有。除获香港中文大学书面允许外，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制或转载本书文字或图表。

国际统一书号（ISBN）：978-962-996-558-7

出版：中文大学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 · 香港中文大学

传真：+852 2603 7355

电邮：cup@cuhk.edu.hk

网址：www.chineseupress.com

■ 30/30 SERIES

Gao Village: A Portrait of Rural Life in Modern China (in Chinese)

By Gao Mobo

Translated by Zhang Shaoquan, Yu Fengping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62-996-558-7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群峰并峙　峰峰相映

《三十·三十书系》编者按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迄今六十余年，已历两世，人们开始谈论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或强调其间的断裂性及变革意旨，或着眼其整体性和连续性。这一谈论以至争论当然不是清谈，背后指向的乃是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至更长远的道路选择。

《三十·三十书系》，旨在利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独立开放的学术出版平台，使不同学术背景、不同立场、不同方法的有关共和国六十年的研究，皆可在各自的知识场域充分完整地展开。期待群峰并峙，自然形成充满张力的对话和问辩，而峰峰相映，带来更为辽阔和超越的认识景观。

首批推出五种：

郭于华《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高王凌《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高默波《高家村：共和国农村生活素描》、郭益耀《中国农业的不稳定性（1931–1991）：气候、技术、制度》与林春《中国的社会主义转型》。

郭于华、高王凌、高默波的研究对象都是农村和农民，但他们的研究令人看到的却是不一样的农村和农民。

郭于华作品中的农民是作为“受苦人”的农民，他们一代代“受苦”劳作，试图积累财富，拥有土地，但从土改开始的历次运动持续颠覆了

他们持守千年的观念。集体化造成的长期饥饿和强制粉碎了他们勤劳致富的期望。分田单干的改革虽重新回应了他们的长期祈盼，但新的冲击又相继而来。这部“倾听底层”的新作透过普通村民的生活史及其演变，重现20世纪下半期村落社会的历史过程，解释农民与国家、民间社会与国家权力的复杂动态关系，进而理解共产主义文明的过程和逻辑。

高王凌同样批判集体化，而他看到的农民既不是被动的，也不是反抗的，而是不反之反，是表面顺从下的规避、抵制与变通，这就是他所提出的“农民反行为”。借此“反行为”，农民不但补充了自己微薄的生活需要，也有力推动了包产到户改革的实现，从而参与了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历史的进程。

两位作者都有知青背景，高王凌的研究基于他早年在山西太谷插队的经验，以及九十年代与杜润生老人在全国天南海北所作的大规模调研，书中大量使用了当年“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搜集的珍贵档案资料。郭于华的口述史研究基于对陕北骥村村民1940年代以来生活回忆的深入访谈，她把这部作品“献给骥村的父老乡亲和那些历史中的无声者”。

出身底层的学者高默波的研究，完全立足于自己的家乡、江西省境内的小村庄高家村。他强调，“我写《高家村》的时候是站在贫困农民的立场上来写的。这就不同于地主和富农出身的人所写的历史，也不同于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人的立场和观点。同样的道理，这也不同于过去的或现在的，受过打击的或没受过打击的中国共产党当权派的立场和观点”。在高默波的历史叙述中，文革期间集体化进程中的高家村在水利、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都曾获得巨大进步，八十年代“非集体化”后却出现停滞或倒退。他认为前三十年农村物质生活贫乏的原因不是集体化，而集体化时期是当地乡村文化的最好时期。

以上三位学者对集体化的不同立论，恰好勾勒出一段完整的光谱。

出生于马来亚西的香港学者郭益耀，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农业集体化效率低下一说提出质疑。郭著《中国农业的不稳定性》历史跨度长

达六十年，从1931年开始，分段回顾了中国农业的动荡史。作者正面挑战棘手的气候变量问题，编制了涵盖全国的“气象指数”，借以分解影响农业的气候、技术和制度三大因素，并以此框架分析了诸多重大而有争议的现象，如大跃进后的大饥荒、去集体化时期的农业繁荣。书中指出，从毛泽东时代的农业集体化到邓小平时代的“去集体化”，是由“外延式”转入“内涵式”发展，邓时代受惠于毛时代的遗产。作者认为，农业集体化是毛时代追求工业化的历史必然，而农业现代化是“中国模式”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因此，本书也是一部中国模式的农业现代化历史。

学者林春曾在2006年出版的《中国的社会主义转型》英文原著中讨论“中国模式”。她认为“中国模式”的历史轨迹依序为以民族解放和社会革命对抗殖民现代，以群众路线参与动员对抗苏式官僚国家主义，再以对社会主义市场的探索对抗资本主义全球整合。“中国模式”的潜在普遍性在于它的社会主义取向，志在最终取代一个危机重重的全球资本主义整合模式。因此追溯“中国模式”的历史准备与形成路径，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实践，包括失败和成功的经验，都至关重要。改革则任重道远，既带来深刻的社会危机，亦开启制度创新的机会。面对严酷的国内外形势，“中国模式”还有待磨砺成形，而不能沦为对现状的规范化肯定。它的批判锋芒源自人民至上的理想和前赴后继的事业。

以上五种，都不是籍籍无名的作者或作品，《高家村》甚至一度成为引发中国知识界激烈争议的导火索，但尴尬的是，时至今日，还不曾有任何一位中文读者见识过这根导火索的全貌。事实上，其他四部作品，无论处在光谱的哪一段，其出版处境都大同小异，正是这种状况催生了本社的《三十·三十书系》。

《三十·三十书系》无意倡导什么，也无意弥合什么，它注重的是呈现，让群山坦然地呈现各自的高度。它甚至倾向于认为，一种高度往往是由其对手的高度限定乃至造就的，而一个时代的高度一定是丛山竞起、激荡生发的结果。《三十·三十书系》不相信孤峰独立，它偏爱群峰并峙，峰峰相映。

本书系首批五种后，第二批将陆续推出尚在翻译中的苏阳对文革时期集体屠杀现象的研究，以及高默波的高家村研究续集，即高家村从九十年代到今天所发生的变化。由于高默波即将完成的作品以英文写作，本社将先行出版其英文原著，继而出版中译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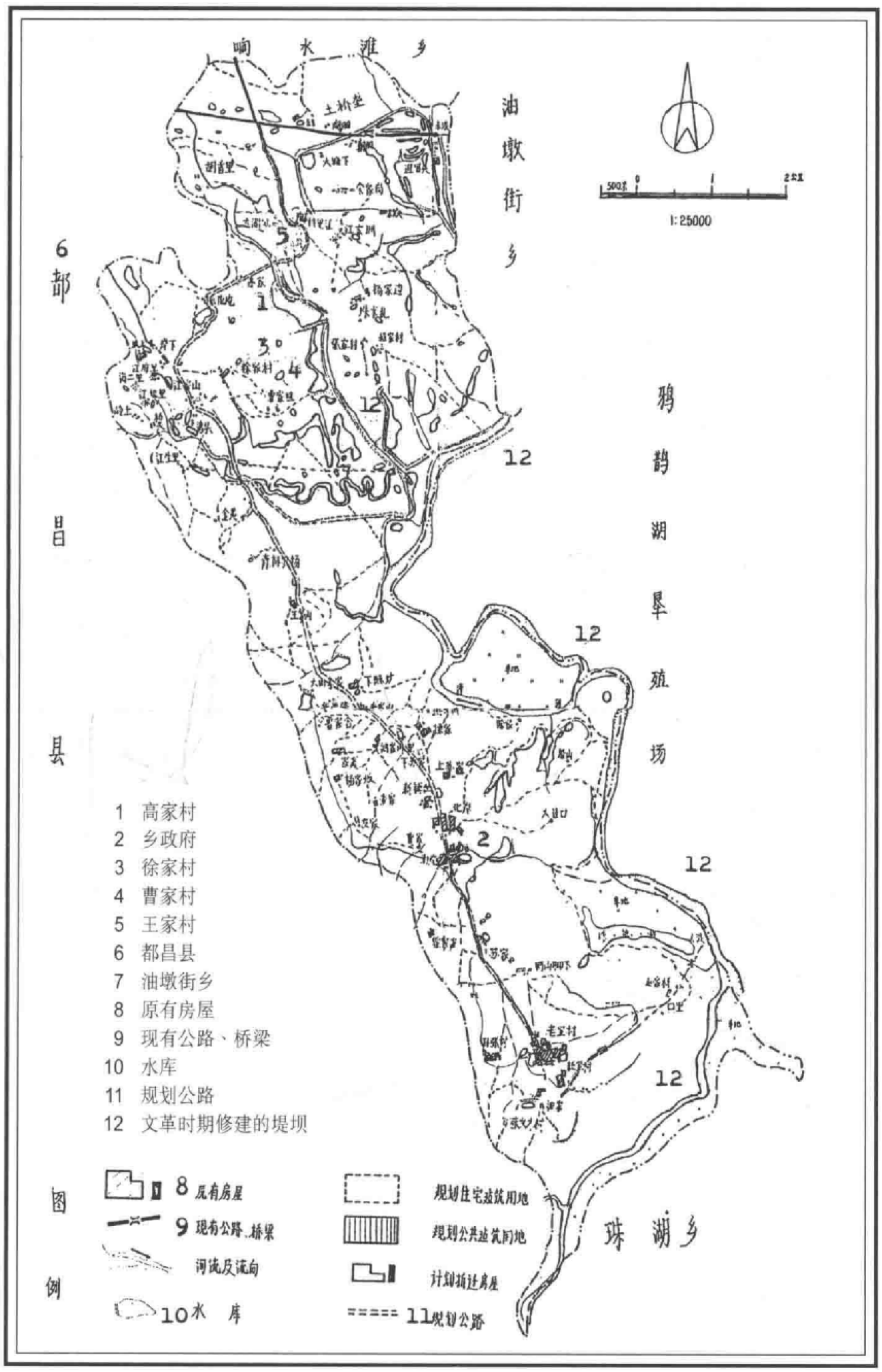
目前五种均为中文出版品，第二批开始兼收中、英文著作及译著。因读者对象不同，中文出版品将以《三十·三十书系》标识出版，英文专著则以单行本面世。本社一贯注重学术翻译，对译著的翻译品质要求与对原著的学术要求共同构成学术评审的指标。

“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大学精神所在，以此精神为感召，本书系将继续向着不同的学术立场开放，向未来三十年开放，欢迎学界同仁赐稿、荐稿、批评、襄助。

有关《三十·三十书系》，电邮请致：cup-edit@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辑部

2013年5月


响水滩乡
油墩街乡
鸦鹊湖垦殖场
珠湖乡
6都昌县
1:25000
1 高家村
2 乡政府
3 徐家村
4 曹家村
5 王家村
6 都昌县
7 油墩街乡
8 原有房屋
9 现有公路、桥梁
10 水库
11 规划公路
12 文革时期修建的堤坝
图例
8 原有房屋
9 现有公路、桥梁
河流及流向
10 水库
规划住宅及筑用地
规划公共建筑用地
计划搬迁房屋
11 规划公路

序言

汪晖

大概是在2000年，我偶然地读到高默波的一篇英文论文，对至今仍然流行的关于“文革”的十种观点一一加以辨析。作者集中于一些根本问题和基本事实的辨析，探索被装扮成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所遮蔽的真相，却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得出了天经地义的结论。他的勇气、坦诚和明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托朋友找到他的电邮地址，冒昧地给他写信，建议他将这篇文章翻译为中文。默波很快回信，并将翻译好的论文寄给我，但当我拿到这篇文章后，才发觉在出版了各种有关“文革”的思痛录的中国，默波的思考是无处发表的。我心有不甘，转请他写一篇关于他的英文著作《高家村》的文字，他爽快地答应了。2001年初，《读书》杂志第一期发表了默波的《书写历史：〈高家村〉》一文。在此前后，《读书》杂志正在展开有关“三农”问题的讨论，默波的文章从历史叙述的脉络讲述了当代中国乡村问题的来龙去脉，引起许多读者的关注。2001年3月29日，《南方周末》以“质疑《高家村》”为题，发表了徐友渔、党国英和焦国标的三篇文章，将高默波从他的切身经验中提炼出的有关历史叙述的反思，提升为“文革究竟好不好？”的问题。这场在南方媒体产生的轩然大波，终于将远居海外的默波卷入了中国知识界和媒体的混战之中。

十多年过后，有关《高家村》的那场风波只是与此后《读书》的遭遇一起偶尔被人提起，但读者们对于《高家村》的兴趣却没有像围绕它的风波那样黯然消失。这不是偶然的。在当代中国研究中，《高家村》一书是一部独特的、对于历史叙述抱有高度自觉的著作，一部带有鲜明的论战性却以亲切的、直接的描写展开叙述的著作。默波选择了鄱阳湖畔的高家村作为历史描述的中心点，分两个时期，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1978年的毛泽东时代和1978年至1990年代初期的改革时期，详细探讨当代中国的农村变迁。作者综合了人类学的“深描”、历史叙述、个人故事和宏观历史的方法，从一个村庄的历史出发，从许多不同的方面挑战了在当代中国和世界流行的关于中国的诸多主流叙述。高家村是作者的家乡，这为作者对这个村庄的奥秘进行反复的、多层次的描述提供了方便，而作者早年负笈海外，谙熟西方的中国研究和中国的各种主流叙述，他对这个村庄的描述也因此被置于一种特殊的辩论之中。这种辩论没有采用抽象的理论讨论的方式，而是以对具体经验的“深描”呈现的。全书共十四章，除了第一章有关中国农村研究的一般概述外和第十四章结论之外，作者对高家村的历史背景、水土资源和农村政治、人口和政治、农村生活状况、农村医疗卫生、农村教育、文化风俗等等给出了极为生动、具体、丰富的描述。正是在这样丰富具体的描述之上，作者从中国农村及其变迁的角度，对于当代中国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尤其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经济改革——的动因、过程和影响，进行了诚实的、独辟蹊径的分析和描述。概括地说，《高家村》对大跃进的描述澄清了许多流行但并不可靠的说法；在为数众多但视角单一的“文革”著作中，这是一部立足于农民命运和农村经验的作品。作者珍视农民的经验、感觉和判断，但也并不缺乏宏观的判断。在某种意义上，他熟悉论辩对手的套路和角度，而针对他的批判者却缺乏理解他的讨论和视野的能力和愿望。从《书写历史：〈高家村〉》一文发表，有关中国乡村转变的争论就没有停息，这部著作对于当代中国乡村两个时期的变迁

的描述、比较和判断，直接地回应了有关乡村改革的主导论述，至今仍然能够提供有益的启发。无论是读默波的书，还是听他谈话，那种对于历史和历史叙述的敏感，最让人印象深刻——默波无疑致力于提供一种立足于经验和思索的“人民的历史”，但也因此，他对于各种以客观性、反意识形态相标榜的叙事保持着难得的、始终一贯的警觉。

总之，这是一部文字流畅、生动、亲切而不失学术严格性和客观性的著作，一部提供了理解共和国历史的独特视角和洞见的不可多得的著作。

2013年4月20日于清华大学10公寓

中文版自序

这本1999年出版的英文《高家村》终于在十四年后有中文版了。

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承担出版本书中文版的项目，因为内地和台湾的出版社都拒绝了。

根据我模糊的回忆，那个台湾出版社拒绝的理由是，一个小小村庄的个案研究对整个中国的理解意义不大。那怎么样才会意义大呢？把整个中国农村作为研究对象很难避免宏观和抽象化。很难想象出一本可以用实证材料全方位地描述或分析整个中国农村的书，因为中国太大，区域差别太繁杂。宏观和抽象的整个中国描述和分析似乎限定在某一学科范围内更可行，比如宏观经济学，或是宏观政治学。

本书试图做的是：以丰富的实证资料和跨学科的方法来全方位地描述和分析一个村庄。《高家村》既是高家村的历史，也是高家村的政治，是高家村的社会学，也是高家村的人类学，同时也是高家村的经济学。除了用跨学科的方法解剖一个村庄，为读者提供洞见，使读者有一叶知秋的理解这一特点外，这本书还用每一章围绕一个主题的方法把高家村放在中国的大背景里来描写和分析。本书的主题包括人口、土地、教育、健康、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生活水准、改革、文化和风俗的传统

与变迁、高家村与外部世界等等。这样读者可以得到以点到面，从特殊到一般的理解。

内地的三联书店曾考虑出中文简体版，结果放弃了。估计是因为其中有一章是专门讲文化大革命的。网上有传闻并登载高默波为《高家村》中文版写的序，说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那所谓《高家村》中文版的序言实际上是我2001年为《读书》杂志写的小文，被人误传了。《读书》那篇介绍《高家村》的文章一出来就引起了《南方周末》的注意，并发出一个版面的文章，登了几个公知的批评。我猜测，他们几个人那时候没有一个看过原著。公平地说，他们不需要看原著就有理由和原因批判《高家村》，因为从《读书》的那篇文章里就可以看出，本书不是为批判而批判毛泽东时代的集体制而写的。更使他们不能接受的是，本书没有采取否定的态度去讨论文化大革命中的农村教育和卫生健康情况。

大陆官方自从毛泽东去世后一直全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在这个官方定调的话语框框里，我们不少的政治和知识精英把1966到1976这段时间定义为“十年浩劫”。按照官方定的话语来构建历史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发明。但是我们不允许不同意见人说话的态度很彻底。说是“不争论”，实际上是不让不同意见的人争论。我们这些写官方历史的政治和知识精英认为，他们把握着真理的钥匙；他们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只有他们的经历才是历史的实质和原形；只有他们的意见才是历史最正确的解释。而且他们还毫不迟疑地宣称，他们说的故事代表中国，是全中国人民的故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躬身自省，使自己明白：相对于大多数的中国工人和农村人来说，我们确实有写历史的特权和资源；但这不等于历史仅仅就是我们写的那样或这样。

中国寻求“真理”的“先知”们，包括共产党人，从五四运动以来总体上是强调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传统；后毛泽东时代的一些“后知”们因为掌握“真理”而否定毛泽东，且进一步批判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这种为中国现代化而作的知识努力当然是有其原因和道理的。但是如果这么一刀切地否定过去，中国人还剩下什么呢？

有国人抱怨说，中国在世界上到处受抨击，天天在挨骂。中国在世界上没有话语权。中国没有个说法。明显的是，在既否定自己的过去传统又否定自己的现代实践、抱着怨天尤人的文化和价值虚无主义态度的土壤里，是很难发展自己的话语的。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者，我们的研究目的不应该是媚权媚党，不管是过去的还是当下的权威和党派；但也不必因此就为反对而反对做研究。不管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如何，他或是她很难反驳的是，中国革命是几代人奋斗而选择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过许多错误和悲剧，甚至有过后看来是犯罪的行为。但同时也有宝贵的奉献，积极的建造和由此带来的人类条件的改善。人均寿命大幅度上升，教育和健康水平的全面改善，妇女地位的急剧提高就是例子。这是中国人为现代化而努力的结果。这些努力和成果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一点也不逊色。怎么能就因为一时达不到历史上西方殖民国家在现时的人权和物质生活标准就全盘否定自己几代人的努力呢？

《高家村》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写的：不为反对而反对，也不为辩护而辩护。不为哪家主义做脚注，也不为哪门理论找证据；更不服从谁的政治需要。是问题就写问题，有成绩就说成绩，并尽量找出事件背后的根源。我不否认我写本书时有我的立场。没有立场和观点是不可能的。我争取做到的立场是底层的，观点是草根的。也就是说，我想站在高家村人的立场上，以高家人的观点来讲高家村的故事。我不想也没有资格做他们的代言人，但我想而且希望能做到从高家村的农村人立场和观点来看待和理解身边发生的事。我希望这么做的第一个原因是，我是在高家村出生和长大的。第二个原因是，我认为这立场和观点与城市人，与中国精英文人的观点和立场是不一样的。

《高家村》所写的时间跨度是从1949年到1996年。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出现很多新的矛盾和问题。比如，农村的教育和健康条件每况愈下，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沉重地压在农民的肩背上使他们喘不过气来。这些在《高家村》里反映出来了。但是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情况大有好转。其中最有象征意义的是取消了农业税。这可是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上的第一次。这也同时堵塞了地方政府以任何名义征税的路子。更可喜的是，对农业生产开始了有系统的补贴和资助。同时，中国政府对农村的教育、卫生和社保的改善采取了措施，进行了投资。《高家村》英文版1999年出版，所以中国农村情况后来的改善没反映出来。2007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再版简便本的时候还是保留了英文版原来的时间跨度。没能反映后来的变化是不理想的。再者，很多《高家村》的读者都想知道高家近期的情况。为此，《高家村续》正在写作之中。

最后让我借中文版出版的机会鸣谢。首先要感谢的是高家村的乡亲们。没有他们就没有这本书。他们一辈子过着沉重悲辛的生活，但是却态度坦然，乐观向上。书中提到的他们虽然大多是文盲，但他们的智力和聪明一点也不比我所认识的中国精英差。他们过去有，甚至现在还有很多我并不以为然的习惯和行为，但他们的“素质”丝毫不比我所知道的“先进”西方国家里所谓文明公民的低。我还要特别感谢我弟弟高常献，因为他实际上做了我研究高家村的助手。我也得感谢将原本英文翻成中文的章少泉教授。读者一看就会同意章教授的译文无懈可击。不但行文流畅，而且保留了原来英文的风格。我也要感谢同时兼职于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的何吉贤博士。何吉贤博士不但在2011年组织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社科院的一些年轻学者和研究生的读书班通读了《高家村》，还帮我做了中文版的译校工作。刚刚在阿德莱得获得博士学位并得到研究生院院长优秀论文奖的谢葆辉也抽出时间为本书的最后定稿做了细致的工作。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谢茂松和林骁的敬业精神为这本

书的出版出了大力。当然还有中文大学出版社的其他同仁们，在此我一一衷心感谢。最后，感谢出版社邀请的两位评审学者对本书的肯定和推荐出版。书中有根据他们宝贵意见作出的修改，但是如果书中有错的话，当然是我而不是他/她们的责任。

2013年4月24日

英文版序言和致谢

本书写的高家村，是我的家乡，生我养我的小村庄。我在那里出生、长大，直到1973年21岁时才离开这里到厦门大学学习英语。在厦门大学的四年里，我每年回家乡一次。1977年我离开中国远赴英国求学。1980年，我又回国到厦门大学教英语，这样与家乡接触的机会才频繁起来。但1985年我再次离开中国，又在英国生活了五年，之后移民澳大利亚。1992年，格利菲斯大学的一个科研项目使我能够再次踏上回家的路，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小村。后来我又分别在1994、1995、1996、1997年回家看过多次。我有一位弟弟目前还生活在高家村。在离开高家村的这些日子里，我一直保持着与村子里的联系，关心着村里点点滴滴的进展。

交代这些背景的目的，是希望能告诉大家，我写作本书的个人兴趣和情感。确实，在努力思考如何写作这本书前，我还没有想到自己与高家村的联系有多深。是像标准的学术著作那样，采取旁观者的、不融入丝毫个人的情感的客观叙述，还是将自己的个人经历也包含在文本中？是把书写成一本半自传，还是完全非个人性的著作？在什么程度上，个人经历的涉入会不利于客观的分析？个人的经历会不会给批判性分析增添更多的真知灼见呢？

既然有意避免个人经历的涉入显得刻意且最终难以做到，那么，我决定干脆采取一种个人化的叙述视角。然而，正如读者在阅读中将会觉察到的那样，这一选择也常常会带来许多的冲突和困难。作为一位大学教师，我希望本书不仅与我的学术领域有关，我还希望它能表达一些重大的理论和政治问题。因而，在章节安排上，每一章都围绕一个主题来写，如教育、医疗卫生、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书中的统计材料，在使用和分析时，我尽力做到与本领域的现状相关。作为一位曾经亲眼目睹、亲身经历农村生活的高家村村民，我的这一经历是本书研究的重要部分，因而在叙述的过程中也包含了不少与主题相关的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和经历。

自我来到“西方”，[1]成为一名华裔外国人后，我阅读了大量讲述、研究中国的书籍和资料。“西方”任何有关中国的评论，无论是谁说的，都会引起我的兴趣。这是一个自我觉醒、自我认同的过程。我欣赏并努力学习英语学术界所用的分析方法和技巧，但也意识到，个人的经历不可避免会影响到自己对人、对事或对现状的感知、阐释和分析。

在高家村的那些年，甚至自我懂事和对选择有朦胧的意识开始，我总是感到孤独、无望，与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我想去工厂做工，去部队当兵，只要能离开村子，做什么都行。我憎恨这里夜晚的一片漆黑、冬日的严寒、夏日的酷热，还有那无休止的繁重劳作。这里是那么脏乱，道路泥泞不堪，还有很多的“迷信”事。这一切，那时在我看来是那么的落后、那么令人憎恶。然而，现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却感到有种奇怪的依恋，牵挂着这一切。每次在伦敦或纽约的街头，我遇到乞丐讨钱，脑子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想省下钱来给高家村的这些村民。每次想到女儿可以把这样那样的文具和各种食品当成无所谓的必需品时，我禁不住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高家村的其他小孩。

我已在西方国家生活了多年，然而，我每次梦中出现的情景都或者是以高家村作为背景，或是有西方背景的高家村的乡亲。对中国主

流知识分子与西方一些学者和主流媒体就中国过去和现在发生的许多事的态度和多种解释，我感到不以为然。我开始觉得，由于个人的经历不同，这是不能避免的，也无法避免。本书或含蓄或明晰地反映出我的这些忧虑。

本书的写作是在我的个人调研、回忆和经历的基础上完成的。写作期间，我找出以前的日记和信件，多次拜访高家村的众多村民，和他们聊天、讨论。我尽力找到每一份有关高家村和村民的文字资料，甚至包括当年生产队的帐本。过去五年来，我经常与我的弟弟高常献写信，问他一些过去和现在村里的事、村里的人。这些问题都有好几百个了，都是以前自己在那生活时从未想到的。高常献又转而问其他一些相关村民，尽可能地回答我的这些问题。本书中高家村的故事就是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

致谢

离开别人的帮助，实质上任何人都无法独自完成一本书，这本书所写的人在现实中与我密切相关，因此我需要感谢的人尤其多。高家村村民，他们超人的适应能力、毫无保留的善良和热情，时不时表现出的惊人的被动性，他们的谦恭意识，他们远未被认识被开发的聪明才智，是本书得以呈现的最终灵感的源泉。这本书能行世，应归功于高家村的乡亲。

我的很多朋友也对本书的成形提供了帮助，戴维·劳埃德（David Lloyd）自身事务繁重，但还是阅读了两遍本书的初稿。戴维在三大洲学习和工作过，他兴趣广泛，从政治学到文学，从日语到亚洲文化和宗教，都在他关注的范围内，他的意见和建议总是让我受益匪浅。

其他提供了帮助的朋友和同事还包括彼得·利索沃斯基（Peter Lisowski），他是一位中国和中国事务的敏锐观察者，总是能给我提供洞见和鼓励；还有琼·安格尔（Jon Unger），他在中国研究和学术书籍编辑

两方面都造诣颇深，犹如深山宝藏，值得每一位作者前去一探；还有麦卡林（Colin Mackerras），他不仅对中国有深切的了解，而且对那里的人民也有理解之同情，他总是能给你提供专业上宝贵的建议和评论；还有威姆·沃瑟姆（Wim Wertheim）和玛利亚·弗鲁彻（Maria Flutsch）也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并校正了书中出现的一些错误，提供了宝贵的评论意见。当然，书中所有的错误或不当之处都应由作者承担责任。最后，我想感谢一下鲁宾·特鲁（Robin Trew）和阿德里恩内·佩蒂（Adrienne Petty）为校读本书付出的劳动。

我对克里斯托弗·赫斯特（Christopher Hurst）的感谢超越了一般对出版者的谢意，因为他在与我——当时还是一位籍籍无名的讲师——见了一面之后，就决定与我签订一份出版合同。从那以后，他和迈克尔·德维尔（Michael Dwyer）就成了为我提供持续不断的鼓励的源泉。

1998年9月于塔斯马尼亚，霍巴特

注释

1 “西方”这里指的是说英语的国家。我得承认，我对非英语国家知之甚少，因此本书中的“西方”这个词仅限于英语国家这个意义。

目录

地图.....xi

序言.....汪　晖 xiii

中文版自序.....xvii

英文版序言和致谢.....xxiii

第 1 章　中国农村研究和高家村作为一个个案..... 1

第 2 章　背景..... 5

第 3 章　水土资源和地方政治..... 11

第 4 章　人口和政治..... 23

第 5 章　农村生活水平..... 37

第 6 章　农村医疗卫生..... 63

第 7 章　农村教育..... 83

第 8 章　大跃进..... 117

第 9 章　文化大革命..... 135

第 10 章　70 年代末以来的改革 161
第 11 章　外出打工 185
第 12 章　变化和延续：文化及风俗 205
第 13 章　高家村和外部世界 227
第 14 章　结论 235

附录一　有关农村研究的部分英文文献 245
附录二　统计图表 249

译者后记 ..... 章少泉 259

第1章

中国农村研究和高家村作为一个个案

我们可以举出许多理由，来说明为什么需要更好地观察和理解中国农村生活。这些理由有些是与历史叙述或学术有关。比如，中国共产党1949年胜利建国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就被认为是获得了农村的支持；另外，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社会工程——我们所说的创建人民公社，也发生在中国农村。还有其它一些原因，它们虽然现在已经不存在，但影响却是长远性的。第一就是，在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工业化后，仍然有70%多人口在农村；第二，许多人认为后毛泽东时代人民公社的解散大大促进了80年代来的经济改革的成功；第三，80年代以来，农村地区越来越多的乡镇企业逐渐成为重要的工业生产力；最后一点，中国仅仅只有占整个世界7%至12%的可耕地却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

当然，以上这些说法并不都能得到大家的认同。比如，至少有部分学者就认为，还远不能确定中国共产党1949年打败国民党是因为有了农村的支持。[1]同样，一些人也会辩解说，80年代后乡镇企业的兴起并不仅仅是因为后毛泽东时代改革的成功，而是奠基于毛泽东时代。然而，不管怎么说，中国农村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持续不断的争论就更能说明研究农村的重要性。

更重要的还有那些我们没有争论过的问题，那些关涉到我们未来的问题。中国的城市化真的可以接纳七亿农村人口吗？如果能，怎样接纳？以什么速度接纳？中国可以养活这么多人吗？中国早就是粮食进口大国。如果这城市化趋势加快，那么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感受到它对世界粮食市场的影响。未来50年内，中国农村发生的任何变化都会对整个世界的经济和环境造成巨大的难以想象的冲击和影响。

因此，中国问题专家写的有关中国农村生活研究的文献早已多得难以计数，就一点都不足为怪了。其中大部分研究都是从宏观方面来叙述的。[2]有些是属于社会学或人类学的，有些则主要关注农村政治经济和发展状况。当然也有些比较好的微观方面的研究文献，这些微观研究以单个村庄作为研究个案，其研究方法跨越了区域研究的方法。

这样看来，我们已经有了许多有关中国农村的数据、信息和讨论，那又为什么还需要另一本研究中国农村的书？而且是以高家村为例呢？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第一，高家村所在的地区以前从未有过系统研究。大部分的农村生活研究往往只关注华北或东北地区，如山东、河南、陕西，或者是研究中国沿海地区，如长三角、珠三角，或者是研究四川、云南等西南地区。没有一个地区能够代表全中国，但高家村所在的江西省是既没有南部沿海地区那么发达，又不象西北地区那么落后，因此在代表中国中部地区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第二，正如前文所说，本书研究是结合了个人亲身经历的一种学术探讨。安戈（Jonathan Unger）和陈佩华（Anita Chan）等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调查访问，其他如弗里曼、毕克伟、塞尔登以及杰克·波特和苏拉米斯·波特的研究方法是将文献查阅与调查访问结合。这两类研究中，研究者既不是历史的亲身参与者，也不是事件直接的观察者。仅有少部分的研究，如韩丁（Hinton）和 格林（Greene）的研究，他们既是直接的观察者，又在一定程度上是参与者。而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作者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庄，这样，观察和参与的起点自然就不一样了。在我沾染西方主

流文化和理论假设之前，我就是这村庄的一位观察者和参与者。我是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了农村生活之后才去了解和研究它的，而韩丁、安戈、格林和陈佩华等人却是先有完整的理论观点，然后再去进行这一研究的。

第三，虽然我目前研究的对象是个很小的区域，一个仅仅几百人的小村庄，但其时间跨度却非常大，前后跨越四十多年，包括四个重要的阶段：土改时期(包括土改前和土改后)、人民公社、人民公社解散到80年代中期、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新的发展阶段。

总之，本研究包括两个完全不同的时期，即从1949年到1978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的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时期。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是继续着犹豫不定地走向全面资本主义的道路，还是通过建立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市场经济中保留某些社会主义的特性？回到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现在是不可能了，然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却又是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在实践上也很难操作。考虑到国际大气候和中国在通往全面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已经走过的路程，就不难理解全面走向资本主义是现在中国最容易走的路，因而也是最有可能的路。因为中国已处在这样的一个十字路口，对于过去社会主义时期和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阶段所取得的成绩和犯下的错误，人们有太多的争论。本研究的目的就是提供一些与这些争论有关的证据和解释。

第四，对共产党的官方宣传和中国国内主流知识界的观点，本书持批判的立场。正如书中所讲，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法律制度和文化价值一直歧视农村人口，歧视这些通常被叫作“农民”的人。本书试图说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等时期的一些农村激进政策其实给这些村民在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带来了许多明显的改善。然而，当今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却往往选择无视这一点。他们总是众口一词、不分青红皂白地谴责文化大革命，而对70年代末开始的后毛泽东

时代的改革则不假思索地齐声赞颂。出于内心对农民的同情，也因为自己对农民的认同，我对这些人的说法持保留、批评的态度。

注 释

1 关于这点最新的讨论可以参看《现代中国》，第21卷，第1期（1995年1月），黄宗智（Philip Huang）、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和周锡瑞（Joseph Esherik）的观点。

2 本书并不对这一领域的所有研究文献进行综合考察。书后附录一列举了部分英文相关研究作品。

第2章

背景

高家村位于江西省波阳县中西边界，西北向300米远的邻村叫雷家村，该村属都昌县管辖。东北300米处是汪家村，西南大约一公里外是江家村，南边大约600米远坐落的是徐家村，再往南400米是曹家村。解放前对外国人士开放的港口城市——九江市就在高家村西北大约150公里远，该市临近著名的庐山风景区。[1]高家村东面不到60公里远就是过去称之为中国瓷都的景德镇。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就在高家村西南大约50公里远。[2]从高家村到波阳县的中心——波阳县城，大约要60多公里的路程。在90年代，波阳县总人口大约100万，县城人口约6万5千人左右。

目前，毗邻的三个小村庄——高家村、徐家村和曹家村，组成一个行政单位，叫“官田村”，这在中国农村是最小的行政单位，从规模来看，大致相当于毛泽东时期的人民公社中的一个生产大队。一直到90年代中，村委会所有成员都是当地的村民，并不拿国家一分钱的薪水，他们的工资主要来自村民上缴的村提留。官田村有1,500人口，属银宝湖乡管辖。“乡”在中国是由政府任命官员并付给工资的最低一级的农村行政机构。一个乡就相当于毛泽东时期的一个人民公社。目前，银宝湖乡人口在2万左右。

官田村下属的三个小村中，高家村是最小的。1997年，高家村人口是351人，还包括2位已经出外打工的村民。[3]除了嫁进来的妇女还保留娘家的姓外，村子里的人都姓高，没有一户外姓。甚至从外招赘进来的男子，[4]也要求改姓高。在高村出生长大的孩子那必定得随高姓。

以中国的标准，高家村的历史并不很长。族谱记载，高家村的历史可追溯约两百多年。尽管中国近代史上战乱频繁，动荡不安，但高家村却没有遭受到战火的侵扰，也没有一个人死在战火之中。村里的老人常常听到过“长毛”的故事（“长毛”指的是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叛军，可能是因为他们头发很长，就这样叫开了），但却从未听说有人见到过。抗日时期，日本侵略军也没有打到这里来，甚至30年代红军和国民党的内战以及40年代末的解放战争也没有影响到高家村。[5]村民了解到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在1949年初夏遇到过两百多名解放军士兵。那年夏天这里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水。一天晚上，一队解放军士兵从村旁经过，一位战士掉进附近的河里淹死了。当晚，部队不得不在村子里驻扎下来，第二天就离开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高家村属于那种在传统中国风情画中被理想化的地方之一：这里的人们自给自足，过着田园诗般的生活。虽然离村最近的两个城市九江和景德镇一度是那么的繁华和重要，但它们对像高家村这样的村庄却没有半点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高家村比较封闭，没有任何现代交通设施与外界相连。直到80年代末期，才有一条砂石路从村中穿过，但晴天路上尘土飞扬，雨天则泥泞不堪。现在，有一辆班车经过高家村，通往县城和更远的景德镇。

甚至在70年代末期，高家村村民还很少到过离家几公里外的地方。虽然如此，50年代末大跃进时期，九江和景德镇的工业和经济发展对高家村还是产生了一些可见的影响。当时，有六名高家村男子招工进城，在城里生活、安家。

直到70年代末，高家村村民还一直过着几乎完全自给自足的生

活。自己种粮自给，自己织布做衣。1977年我离开中国去英国留学时，村里除一名医生外，没有人买得起一块手表或一辆自行车。除了装在生产队的喇叭每天播报着有线广播和收音机里的政府新闻外，整个村子在1988年前都没有任何其它电器产品。村民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波阳县属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气温21℃，有史记载的最低温度是零下8℃，最高40℃。年平均降水量1,600毫米。这里四季气候分明：春暖秋凉，夏热冬寒。春潮秋燥，夏天多暴雨，冬天偶有雪。这里雨水充足、土地肥沃，最适宜种植水稻。鄱阳湖边还有众多的小河和湖泊。除鄱阳湖外，波阳县内还有120余处湖泊和225条河流。这些河流湖泊的周围处处都是肥沃的稻田，春天插着绿绿的秧苗，秋天载满金色的稻穗。

这里主要的农作物有：水稻、小麦、大麦、红薯、大豆、蚕豆、豌豆、棉花、茶叶、烟叶、花生、芝麻、油菜、甘蔗、苎麻、荞麦、小米和各类蔬菜瓜果。因为有较多的河流和湖泊，水产养殖业一直是波阳县的重要经济产业。如在1985年，从事水产捕捞的从业人口就达到两万左右，捕捞的各种鱼有一万多吨。

高家村就位于这物华天宝之地。村前有两座小山，一座属于高家村，另一座则归邻近的雷家村，后者属都昌县管辖。高家村东面以一条小河为界，河水向南流入与一条较大的河相连的湖泊，最后流向鄱阳湖。高家村周围有许多池塘和小溪。门前的小山给村民带来取暖的柴火，众多的小溪、池塘、江流湖泊成为人们捕鱼、水产养殖和灌溉农作物的取之不尽的源泉。村周围肥沃的梯田可以种植水稻，而那些山地可用来种植如棉花、芝麻、苎麻、花生和红薯等经济作物。

水里的水草是养猪的好饲料，而猪肉又是村民获得蛋白质的主要来源。这些小溪、池塘、江河、湖泊还给村民带来许多的水产，有小虾、对虾、乌龟、螃蟹、鲤鱼、鲑鱼、草鱼、银鱼、河豚、田螺、乌鱼，鲶鱼、泥鳅、桂鱼、鳊鱼和各种河蚌。这些不同种类的鱼，大部分都产自

鄱阳湖。每年春季，这些鱼逆着水流向上游迁徙，游入鄱阳湖的各条支流以及成千上万的小河和小溪去产卵，接着还会往上，游到一些小溪谷、小池塘中寻找食物。有些鱼最后甚至会游到稻田里，村民们每年都能很轻易地抓到不少鱼。这里的池塘和稻田中还有各种青蛙，虽然青蛙是害虫的天敌，可以消灭害虫，但对村民而言，青蛙也是他们口中的一道好菜。

总之，高家村作为一个独立的村落，即使与外界没有直接联系，也能够在经济和社会上继续延续着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事实上直到70年代末，高家村人也确实是过着这种相对独立的生活的。然而，高家村并不是偏僻山岭间荒芜人烟的小山村，它周围有很多村落，许多村子比高家村还要大，有的甚至有上千户人家。通常村与村之间距离不到一里路，但村与村之间很少有商贸上的往来，一个村也不用依赖别的村生活。村与村之间经济交往不多，文化和社会互动也很少。密集的人口、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并没有给这一地区的人们带来重大的商业化趋势，也没有给这里人们生活方式的质量带来根本的变化。即使在今天，离高家村最近的集市都有几公里远。如果借用徐慧文（Viviene Shue）富有洞见性的概念来说，[6]这些村庄仍然保持一种蜂窝状的状态，也就是说，每个村子都是彼此分离的个体，与国家的关系极为有限，除了时时仍能感到地方官吏的粗暴存在之外。

“自然村”这个概念指的就是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的一群人。他们同宗共姓，房屋都置在一起，彼此之间保持着紧密的家族纽带，与外村人交往较少。除了来自政府的管理和干预之外，每个村子都是独立的整体，有自己的内部治理体系，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领土观念。

这些独立的村庄普遍都是以地理为基础分布，但也有一种例外，那就是两个同姓不同地的村子，也会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高家村10公里外有一个3,000多户的大村，也是个高姓的村子。这一大一小两个高姓村庄都是同一个祖先传下来的。高家的祖先从北方迁到江西后，一支

就定居在现在这个高家村，另一支则落脚在那个大的高家村。从那时起，两村就一直保存着比较亲密的家族血统关系。正如后面几章所讲的那样，两个高家村的交往关系说明，在农村生活中，传统的宗族关系和地方政治间是多么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

农村生活的这种彼此独立分离的“蜂窝状”特性也体现在人们的语言上。江西人说的话称为“赣”方言，是中国十大方言之一。[7]而赣方言本身又并不是毫无分别的。波阳县的人说赣话是一种口音，都昌县的人说的则又是一种口音。而波阳县城的人说的话，高家村的人都听不懂。高家村的人到县城去，往往被人看作是没有教养的乡下人，这可能仅仅是因为他们不会说县城话而已。事实上，江西的许多大城市如南昌、九江、景德镇都有各自不同的赣方言。无论你来自何方，只要一开口说话，你的口音就会告诉别人你是“外地人”。

注释

1 庐山在1949年解放前是富人和外国人十分喜欢光顾的旅游度假胜地。解放后，这里成为专供中共高层领导人使用的地方，包括解放前建成的各种西式风格的别墅。1959年，敢于直言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就是在庐山会议上反对过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由此引发了中共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2 鄱阳湖南北长170公里，东西宽74公里，面积为3,841平方公里，最深处达23.7米。湖中有118种鱼类生物。沿湖有八个县，其中只有波阳县人口在100万以上。参看刘汉艳主编：《波阳县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第90页。本章中的统计数字都摘自该书。

3 这些外出打工的人虽然没有在村子里生活和劳作，但依然被看作是高家村人，因为他们的户口还在这里。既然他们的户口登记上写的是高家村，那么他们在打工的城市里就没有永久居住的权利，只能是暂住。这点在后面的章节中将再详细讨论。

4 入赘一般是在女方家里没有儿子延续香火时才有的。入赘在社会上的名声并不太好，通常一个男人同意入赘往往是由于自己生活十分窘迫，要么穷

得结不起婚，要么在社会上无法立足。如果女方十分漂亮或者家境非常好，也有些男子，特别是来自同村的，也会同意入赘到女方家里。

5 1853年7月，太平军占领波阳县，杀死地方长官。1942年6月，日军攻占波阳县城，19天后就撤离。1949年4月，陈赓大将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第二方面军某部和平接管波阳县。

6 Vivienne Shue,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7 其余九种方言分别是：北方方言、吴方言、闽方言、湘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徽州话(安徽)、晋方言、平话(广西)。参看李荣、温棣帆(S.A. Wurm)等编：《中国语言地图集》(香港：朗文[远东]有限公司，1987)。

第3章

水土资源和地方政治

高家村的先祖来到现在高家村这个地方时，这里还是一片荒野，村民可随意开垦。没有任何记载说明高家村和邻村间的村界是在什么时候和怎样确立的。最可能的情况是第一代高家村人是自愿迁居到这里的，他们从迁居高家村伊始，便开始开荒种稻。所有的人一到这里，便一方面尽量把这些荒地占为己有，一方面又尽力劳作，开垦出更多的田地。随着村子越来越大，周边开垦出的耕地也越来越多，一直延伸到邻村已经开垦占有的地方，再也不能扩大，村与村之间的界限便自然就形成了。

高家村所在的这个地区，尽管村与村之间的界限没有任何书面记载，但每个村的村民对这些村界都很熟悉。早在1949年前，高家村与毗邻的徐、江、汪、雷四村的地界，包括水田、山坡、荒地和水域都划分得非常清楚。如果某条河或某个湖泊为两个或几个村子共有，那么每村都能分享其水资源。通常的做法是各村都有权在河里捕鱼和取水灌溉。

高家村至今没有一张标示村庄范围的地图或规划图，但男女成年村民都知道本村和邻村间的地界，每个细节都由村民口耳相传，靠记忆一代一代传下来。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村界的不明确和官方记录的缺失并

没有引起政府部门的关注。不管过去还是现在，政府所要掌握的，都只限于每个村耕地面积的统计数字，以此来征收相应的农业税。村与村之间一般能做到代代和睦相处，但对于地界的异议往往成为村与村之间冲突的原因。这种情况不管是在1949年共产党的革命胜利前还是之后都一直存在。

土地纠纷、宗族团结和存留的传统

在这个地区，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多方面都非常顽固地存在着，这可以从地界纠纷的解决方式和宗族的团结上得到反映。一旦村与村之间爆发冲突，每个村都想保护自己的利益和领地。另外，正如下文将要说明的，因为同属于一个宗族，大高家村和小高家村在各自与其它村子发生冲突时，一般会相互照应。这些传统继承还体现在土地纠纷的结局上，一般是哪个村的拳头多，可以召集到更多的成年男丁，哪个村就会在这场纠纷中占据上风。

与雷家村的争端

高家村和徐、雷、汪三村共享一些水利资源，因此，村与村间时不时就会发生争端。高家村与雷家村有一处地界是一条小水沟。这条水沟把附近山上高处的雨水导引到高家村的水田，世世代代都是如此。然而，在1970年，雷家村试图封堵沟渠使水改道流到他们的田里。发生这种事情，高家村人就去清除堵塞，而雷家村人又前来阻止，最后两村之间的纠纷只能通过武力解决。双方村民动用了拳头、扁担，甚至铁锨，造成双方许多村民受伤。由于两村在行政上分属不同的县管辖，政府仲裁的结果很久才生效。此次争端的结果是双方各自承担医药费，争执中的水沟维持原状，水依然流向高家村农田。

在这次争端中，高家村获胜了，主要原因在于雷家村人认同了水渠流向的既定事实。雷家村人接受这一仲裁结果也很可能是考虑到高家村比他们村更大，即使再发生械斗，他们还是赢不了。同样的道理，当争端的对方是徐家村或汪家村时，高家村就不得不作出让步，因为徐家村的人口是高家村的两倍，而汪家村更是高家村的四倍大。通常，大的村子不会接受对它不利的处理办法，就会发起更多争斗，而小村子只能认输。

与徐家村的争端

高家村与徐家村的争端也发生在毛泽东时代，但解决的方式非常传统。大跃进时期的1958年，两村相交的山坳里上建起了一个水库，高家村人参与了水库的建设工作。当时的设想是两村都可以利用水库的水来灌溉农田。过了几年，徐家村的人认为，水是从徐家村的山上流到水库的，因此高家村没有权利用水库的水。只有在水库水位低的时候，高家村才被允许使用水库里的水。但水位低时，水库通向高家村农田的涵洞要比水库的水位高出很多。所以，实际上就是高家村不能用水库的水。高家村没有办法，只能在水位高时，偶尔在夜里打开涵洞放点水，黎明之前再关上以免被徐家村人发现。如果一旦被发现了（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徐家村人会毫不客气地毁坏涵洞，堵塞水沟。而高家村又没有和徐家村抗争的实力。

当地政府出于各种考虑，一般对这种纠纷睁只眼闭只眼。首先，作出的决定如有利于小村，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麻烦，因为大村不满意就不会善罢甘休。其二，由于当地政府的权力基础更多地是在大村子，处理纠纷时倾向大村子也符合当局的利益。从1960年以来，当地政府的掌权者越来越多地来自那些大的村庄。这一问题在以后的章节中还会进一步论及。

与汪家村的争端

高家村和汪家村之间有一条小河，这也是两村的地界之一，为两村共有。两村争夺河水资源的历史由来已久。冲突一般发生在春、冬两季，春天，河两岸的村民会在堤岸上割草料喂牛或用作有机肥。汪家村的人非常霸道，甚至不让高家村村民在自己这边的河岸上割草。冬天河水水位低时，村民们会排干河水捕鱼，汪家村人又专横地赶走高家村人，想独占这一便利可观的收入来源。

高家村与汪家村积怨甚深且由来已久。1947年，两个村都准备好了枪和自制的土炮，准备大干一场，但就在一场流血冲突一触即发之际，汪家村却临阵退却，原因是比汪家村还大一倍的离高家村十公里远的大高家村搬来了一挺机枪前来支援，一下子就把汪家村的人给镇住了。但是在毛泽东时代，两村的争执又再次发生。70年代初，汪家村人在两村交界原本属于高家村的地界上建了一个水坝，在水坝的外面重新挖掘了一条河，让河水改道，把原先的河床改成了他们的农田。并且汪家村还声称这条河的大部分河段的所有权归属于他们。毛泽东时代对农村宗族势力的压制使得大、小高家村不能联合对抗汪家村，结果，高家村只能接受丧失土地这一事实。

宗族团结

尽管如此，大、小高家村之间仍保持着紧密的联系。1981年，我从英国回到高家村，村里为了欢迎我宰了两头猪，宴请了一百多人。客人中最尊贵的，除了当地政府的官员外，就是来自大高家村的二十几位长者和村干部。宗族的长辈认为我是全县唯一到英国留洋的人，这是高氏宗族的荣耀，大摆宴席就是为了向外人展示高家宗族的团结和力量。

但是，时代毕竟变了。要是在以前，村里如果有年轻人通过了省级的科举考试——乡试，那高家村的地位将会有很大的提高。通过乡试

的举人很可能被委任为一个县的县官。即使没有担任官职，闲职在家，在处理地方纠纷中，他（参加科举的都是男性）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影响到纠纷处理的结果。而到1949年后，一个学者对当地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村民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变化。

土地与政治经济

共产党1949年掌权时，高家村20户村民平分了村里的280亩耕地。[1]土改开始时，高天翔被划分为地主，高尽享为富农，村里还有12户是中农，6户贫农。[2]贫农每户大约平均有6亩地，中农13.8亩。地主有45亩，富农33亩。高天翔被划分为地主显而易见是因为他自己不种地。他把地租给一些贫农种，自己在村里的私塾教书。[3]高尽享被划为富农，首先是因为他家的土地比一般的人多，还有就是因为他也把地租给贫农做，而他自己做裁缝。假如他没有土地出租，那就只是一个手艺人，也算是半个无产阶级。

在1951年的土改中，[4]高天翔和高尽享的土地被没收充公。高家村所有的土地都按人头重新平均分配。中农多出来的土地也被充公，而贫农则分得土地。高天翔的砖瓦房被没收了，分了一间土屋给他。对富农高尽享只没收了他的地。

土改对农村的影响还没来得及显现，共产党政府就紧锣密鼓地想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田地均有”就变成“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高家村继土改之后，紧接着在1953年成立了互助组，1955年成立合作社，最后是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在1958年实行公社制。中国共产党是如此迫不及待地把农民从一个变革推向另一个变革，一直到大跃进之后对公社制度进行部分调整后才确定下来。

1959年的公社制在波阳县一直实行到1981年。在公社体制下，高家村被分成两个生产队，每队的人口和耕地差不多一样多。每队设一个

队长，负责各自的生产、收入和分配。村里那些无法分割的资源，如河流、湖泊以及小溪等，就由两队一起管理，收入均分。除了一些像锄头、镰刀、扁担、手推车这样的劳动工具外，社员个人不拥有其它的生产资料。

每个社员的劳动报酬每年按工分来计算，比如，壮男劳力一天可挣十个工分，壮女劳力可挣八个工分，而小孩劳动一天算四个工分。在生产队每年一次的个人劳动价值决算会上，村里人各方面的实际情况都会被考虑到，最后决定每个村民劳动一整天的工分值。每天收工，队里的会计都要当着大家的面记录每个人参加劳动所得的工分。

队里的重要农产品，像稻谷，一般是考虑到村民的年龄（分大人和小孩），按人头分配，而一些农副产品，通常量都不大，可能是只分配给壮劳力。农副产品的分配一般由队长说了算，他也可能会和队里会计或其他有一定权威的人商量后决定。每到年终，生产队对每家的工分进行决算，视工分多少来评定每家对生产队的贡献。每家的总工分值是多少，每年都不一样，就像生产队每年的总产值也会有变动。扣除平时生产队分配的农产品的价值，有些家庭年终还有钱进，而有些就成了超支户。通常，超支户是那些家里小孩多、劳力少的家庭，而那些小孩少，壮劳力又多的家庭都是进钱户。

理论上说，超支户必须用现金或实物的形式偿还欠生产队的债务，而队里则必须支付给那些进钱户应得的报酬。但实际上，出于各种原因，这种做法很少实施。首先，超支户都是村里最穷的，对他们来说，生存都不容易，除了能从队里分到一些基本生活物品，他们真的是一无所有。而且，队里分配的生活物品从来都不够吃用。比如，先后担任生产队队长的高常尧和高常亮，他们自己的家庭也经常超支。高常尧能当生产队长多年，就因为他是村里仅有的两个共产党员之一，而且还是贫雇农，因为在1949年以前，他没有任何土地。在这种自己都经常超支的情况下，这些队长也不好强行要求其他超支户清偿债务，除非他们把

自己欠队里的债务先还清了。最后，更基本的一个原因是大家同属一个宗族，相互逼急了也不合适。

结果，队里每年的帐目几乎都是不了了之。年成好的时候，队里会有些盈余，过春节时，生产队就会给进钱户发一些现金。一般各家各户的债务债权都是上一年拖到下一年，一直拖到哪一家家运变了。原来的进钱户可能家里有人病倒了，或者原来的超支户家里的小孩都长大了成了壮劳力，情况就会有所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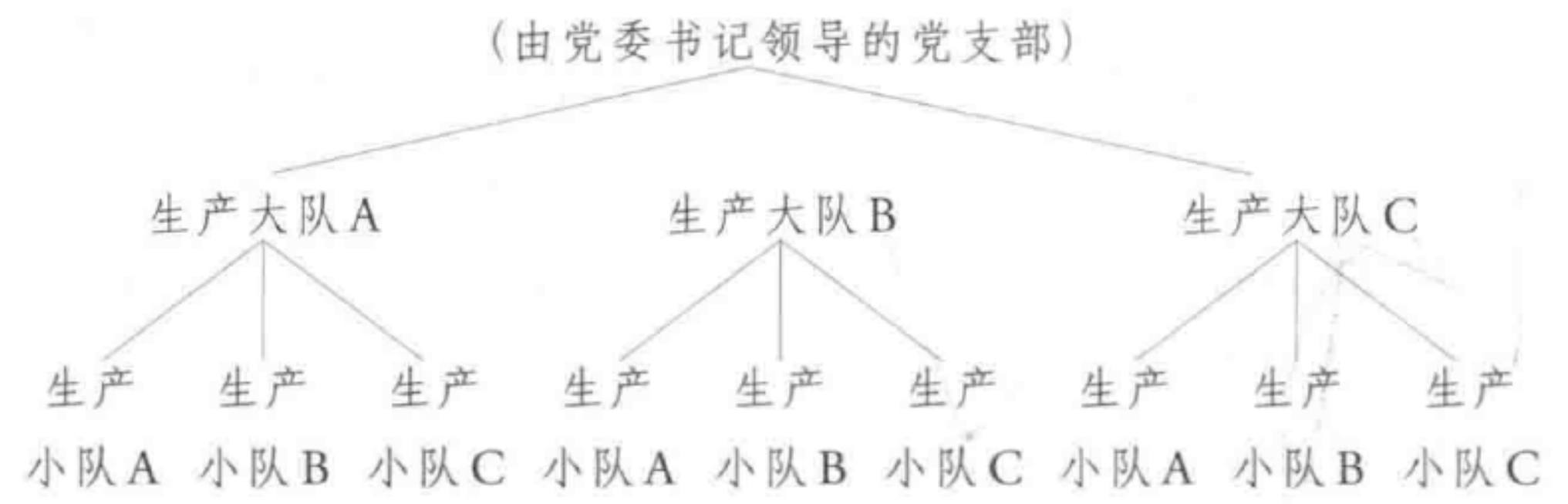
生产队长尽管能为家里谋取点私利，在村里还可动用点权力，但总的说来，担任这个职务是吃力不讨好的。他一方面要平衡村民之间的利益，另一方面还必须处理好村子与上级政府的关系。另外，队里大事小事和村民的生活密切相关，也受到了大家的严密监督。能否当任队长还要和他的能力挂钩，队长的领导能力直接影响到每个村民的切身利益。村里两个生产队的相互比较是免不了的，哪个队长能干，只要一比就知道。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生产队好，但没人会想给超支户太多的刁难。

生产队直属生产大队。一个生产大队一般有10到13个生产队，具体多少要看当时的政治气候。共产党实行激进的农村政策时，例如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个大队就下辖更多的生产队。在生产大队规模小的时候，高家村和徐家村，曹家村同属官田大队；规模大时，包括高家村在内一共有10个自然村都归青林大队管辖。大队干部有权任命下属生产队的队长和会计，还可以到各队集资，用于教育卫生事业和修路。大队还要负责征收农业税，宣传贯彻政府的方针政策，推广农业新技术以及发放政府拨款（假如有的话）。如果要建碾米厂、榨油铺或信用社，也是由大队来集资建设。每个生产队可能有共产党员，但只有大队才有一个党支部，安排一个支书。

大队的直属上级是公社。一个公社通常包括10个大队，大约1到2万人口。但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个公社可能管辖着60多个大队。1968年，高家村隶属于油墩街公社，整个公社有将近6万人口。大多数时

候，高家村属于银宝湖公社，公社人口2万左右。各大队的干部，大队支书由公社任命。公社是上一级政府和大队之间的一个行政机构。公社的党委会设有一个书记和几个副书记。公社干部直接由上级政府任命，只对上级政府负责。公社干部有稳定的工资收入，从国家财政中支出，而生产大队和小队干部则不一样，他们的收入年年不同，收入的多少取决于他们共同劳作和生活的村民的收成。

中国农村基层行政组织结构图



大队和下面各生产队的干部全是本地本村人，而公社的主要领导都是外地的。公社领导负责管理所在公社的公共医疗、教育等事务，如医院、学校，还要维修公路，维持地方治安。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一些大型的水利项目，像修水库，沼泽地改良，特别是建大坝和防洪堤等，也由公社负责组织修建。公社还集资建农机站，农具店，砖瓦窑，食品站等公社企业。

1981年公社解体，银宝湖公社变成了银宝湖乡。名字改了，但原有的行政划分没变，管理职能也和以前一样。然而，公社改成乡，名称中体现的含义还是有实质性的不同。“公社”、“大队”包含集体化和生产一体化的意味，而乡、“村委会”就没有这样的政治含义。原来的大队成了现在的村委会，由五个人组成，分别是村支书、两位副书记（其中一个是女的，因为政策规定村委会必须至少有一个女委员）、一个会计、

一个民兵队长。此外，官田村委会下属的三个自然村也各有一个村长和一个会计。他们和村委会五位成员的工资由各村自己负责，从征收农民的税款中提留。和以前的公社干部一样，乡干部的工资还是由政府发放。

至于土地方面，1981年废除公社制，把农民重新带回到了1951年，也就是说，重新按人均把土地分配到了各家各户。高家村的308亩地按照每户人口的多少平均分配，理论上，这些土地仍归村集体所有。目前，分得土地最多的家庭大约有15亩地，最少的有3亩左右。

相对而言，现在的土地分配比1949年前更加平均。但每户人家分得的土地绝对值比以前却少多了。现在，平均每户有6.2亩地，人均是0.96亩，而在1949年以前，村里最穷的家庭也有6亩地，平均每人1.7亩。这是因为1949年全村仅有20户人家，160人；而90年代初，村里的人口是318人，有51户人家。1949年前，60%的家庭是中农，平均每户13.8亩地，这个数字只比现在村里地最多的“地主”家的15亩少一点点。道理很简单，人口增长了，但土地不可能也随之增长。为了便于大家理解高家村土地与人口之间的压力，值得一提的是高家村的人均耕地面积不到0.066公顷。就全国来说，1979年人均是0.1公顷，同时期日本是0.04公顷，印度0.26公顷，美国0.86公顷，苏联0.89公顷。[5]

水、发展、农村政治

人口的急剧增长使土地和水资源日益匮乏。水是水稻等农作物的生命线，也是猪、鸭等家畜的重要食物来源处。高家村的水源地不可能扩大，相反，正如前文提到的，汪家村的建坝圩田其实使高家村的水域面积减少了。除了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水源地的面积萎缩给水资源造成的压力以外，频繁爆发的洪涝灾害和人们对水域的不合理开发使情况也变得更加糟糕了。

多少世纪以来，波阳县一直洪水不断。从公元381年到1989年，有记载的水旱灾害就达252起，其中水灾158起，平均每隔10.11年就发生一起。[6]高家村像其它地处鄱阳湖边的村庄一样，更易遭受水灾。原因很清楚，湖边的地势低，又肥沃，非常适合水稻种植。波阳县春季和初夏时节，雨水丰富。一下雨，山上、田地里的水都会流到小河小溪，再汇入鄱阳湖，接着流到长江。鄱阳湖通往长江的入江口非常狭窄，犹如一个瓶颈。雨水一旦过多，鄱阳湖的水因为不能迅速排到长江，水位就会不断上升，周边的田就会被湖水淹没。如果长江沿岸的华南地区的一些地方下大雨，鄱阳湖的水位上涨得还要快，因为鄱阳湖水不仅流不出去，长江的水还要倒流进来。由于鄱阳湖湖区面积非常大，周边有些地方可能还是晴天，另一些地方很可能下着大雨。因此，高家村有时会遇上特别奇怪的事情，几个月没下雨，地势较高的地方干旱，而同时，低洼处的田却淹在水里。

鄱阳湖周边地区水灾灾情都比较严重，而高家村遭灾尤多。官方记录表明：1912年至1948年的三十六年间，这里每三年发生一次洪灾；从1949年到1989年，每两年发生一次。[7]原因不难发现：不断增长的人口需要更多的粮食来满足需要。一方面，大家要想方设法去开荒种地；另一方面，原有的一些小灌木丛被砍伐作为木柴焚烧，林地也被改造成了农田，这么做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恶果就是更大面积的水土流失。

水土流失引发两个严重的生态问题。其一，没有了绿化带，鄱阳湖周边地区的土地涵水能力下降。其二，导致长江河床越来越高，鄱阳湖流入长江的水量日益减少。还有，为了满足增长的人口对粮食的需要，鄱阳湖周边的老百姓在湖边建水坝围湖造田。鄱阳湖的蓄水能力不断下降，湖滨地区发生严重水灾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多了。

现在，高家村几乎年年都遇到水灾。造成今天这种情况不能说和当地的政治没有关联。在60年代、70年代公社时期，每年的农闲时节，高家村人就被组织起来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往往是建一些有利其它生

产队和大队的防洪堤、大坝，而没有哪个工程是为高家村的利益着想的。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高家村希望把村子南面的一部分湖面围起来修建一个水坝，开垦一些农田，同时也可以起到防洪的作用。虽然村民一再要求，而且多年来高家村无偿地帮助其它村建设水利项目，公社和大队干部就是不肯从其它村调集人手参与建设。他们的理由是这个水坝的工程量跟可以围垦的田地面积相比太不值当，所以不值得修建。他们还再三强调，如果高家村想建的话，就靠自己的力量建。但那样一来就需要20来年的时间才能建成。所以，这个项目始终没能开工建设，高家村是整个银宝湖公社唯一未能在共产党执政前40年的基础设施建设热潮中受益的村子。

在高家村看来，政府未批准修建水坝的提议，并不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是因为高家村太小了，在当地政治中没有任何发言权。更主要的原因是大队和公社干部中没有一个是高家村人。这些干部都来自于大村庄。农村的政治局面其实就是各宗族间势力大小的反映。中央下放的权力越大，宗族人口较多的大村子就越有可能获得更大的权力，农村政治就会更加有失公平公正。

50年代到60年末，政策由上级政府直接强制执行。那时，不仅公社干部，甚至一些大队干部也是从外地派来的。宗族势力在一定程度上被抑制了，大村不能随意欺凌小村。但是，从60年代末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农村权力下放，大队领导和部分公社干部在当地社员中产生。大村子的人口多，地方干部主要来自这些地方。如果村子之间发生了冲突，大村子在维护自身利益时总能占据上风。小村子的人是不可能被任命为大队或公社干部的，原因是他们的权力基础太薄弱。文化大革命以来，甚至连外派的干部也不敢得罪大村子，否则大村子就会制造麻烦。由此可见农村政治和宗族势力紧密相连，当大小不同的村子之间发生冲突时，常常是大村子获胜。高家村的两个邻村都比高家村大，所以凡是有冲突发生，结局都不利于高家村。

总结起来主要有两点需要特别强调。其一，从1949年共产党革命成功以来，这个地区的人口剧增，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水资源开发过度。其二，在村民争夺水土资源时，农村宗族势力在农村政治中起着支配的作用。1949年以后，高家村的人口翻了一倍，而土地和水资源由于村子之间的争端和环境的恶化却减少了。

注释

1 一亩相当于0.0667公顷。亩是中国土地丈量的基本单位，也是度量生产力的单位。

2 事实上，中农还可以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贫农也可以继续分为雇农和贫农。雇农包括完全没有土地的农民在内。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治认为，从下中农到贫雇农都是最基本的革命力量，值得依靠；那些被划为中、上中农的农民是可以团结到革命队伍中的，而地主和富农是阶级敌人，是斗争的对象。在高家村，有一位雇农，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农村激进化政策最激烈的时候，被提升为生产小队的队长。

3 私塾先生常常是在自家给村里的孩子授课，收取些学生自家产的农产品，作为学费。教学的内容自然是些儒家的传统教材，如四书五经。老师从不去解释书上的内容，而是教学生去认字，然后要求他们大声诵读，背诵课文。私塾据说是从孔子那时开始的，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高天翔没有种过庄稼，因此被看作是剥削分子。

4 波阳县的土改直到1950年6月才开始，先进行小范围的实验，到1951年3月全县土改工作完成。1951年4月到1952年3月，在全县范围进行土地分配重新核查工作，以增强土改工作的成效。

5 转引自Peter Nolan and Robert F. Ash, "China's Economy on the Eve of Reform," *The China Quarterly* 144 (December 1995): 980–998.

6 郑朝京编：《波阳县水利志》（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2），第45–51页。

7 同上，第51页。

第4章

人口和政治

毛泽东曾经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毛泽东自认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这里所说的"创造历史的动力"是指，人民是推动历史从原始社会进步到当今世界的力量。然而，中国过多的人口却似乎是几百年来拖住中国历史后腿的主要因素之一。

至少在中世纪之前，中国在技术、经济、商业以及社会领域都遥遥领先于欧洲。那么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为什么没能在中国兴起呢？几十年来很多学者和历史学家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1]其中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人口太多。比方说，人口过多就意味着有剩余的廉价劳动力，反过来又成为无须技术革新的理由。黄宗智写过一篇思维严谨、极富影响力的论文，讨论过去中国历史发展上的重复、内卷问题，认为这内卷化发展问题之根本就在中国的人口上。[2]在他看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历史一直到80年代晚期都是这种内卷式的发展。任何经济和技术的发展都被人口的增长吸收吞噬了，因此在效率和生产率上没有重大的突破。

就工业化和资本主义未能在中国发展起来这个争议性的问题而言，高家村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对高家村人口问题的研究，能为我们提供一定的背景信息，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发展。1949年高家村的人口为

160人，到1997年翻了一番，达到350人。而同期高家村的土地和水资源不可能再增长。因此，1949年以来的40年间，这里要么必须进行技术革新提高生产来满足增长的人口需要，要么高家村的村民必须摆脱对土地的完全依赖。

城乡差距

当我们谈论中国时，我们必须明确指出我们谈论的是中国的城市还是农村。1949的共产主义革命被认为是因为获得了农民的支持而取得成功的，而获益最多的其实是城市的工人阶级。在毛泽东时代，城市居民享受各种福利，包括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和实质上的免费住房（房租都是名义上的），以及终生就业保障和定期的食品补贴。[3]而农村人口除了极少数例外，[4]都不能享受这些福利，只在一段时间里享受了免费教育。大多数农民都得不到政府的医疗服务，就算有，也不是免费的。此外，农民还不得不向政府缴纳农业税，按照政府规定的低价把粮食卖给国家。国家以此来积累资本，实行工业化。据估计，在1952年至1979年期间，政府通过收取农业税和获取农产品与工业品的差价，从农民那索取的资本总额达6,000亿元之多。扣除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国家从农民手上净得4,340亿，这个数字占同期农业国民生产总值的24%。[5]据两位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专家指出，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差价从农民手中获取的财政收入占国家总财政收入的比率，在1957、1965、1971和1979年分别是71%、75.5%、51.6%和39.4%。[6]

建立这些歧视性政策的基础是中国的户口制度。在户口制度下，中国居民被登记为城镇居民或农村居民。户口制基本上使农民不可能从农村迁居到城市。在餐馆吃饭，你必须要有粮票，而农民一般是没有粮票的。城里的每个工厂或部门等都是一个个封闭独立的单位。城镇居民每个人都有单位，从一个单位调到另一个单位需要经过一整套官僚审批。

因此，即使到今天，城镇生活仍为农村人所羡慕。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一些县政府为了增加收入，出售城镇户口给赚了点钱的农村人。有些地方，一个城镇户口可以卖到10,000元，这可是相当于90年代早期一个普通工薪阶层两年的毛收入。

在毛泽东时代，农村人要走出农村成为城里人通常有三条路。一是参军。在部队服完役后，退伍士兵或军官通常会被分配在城里工作。即使他们回到农村，也往往会担任基层干部。过去40年来，高家村有6人（都是男性）参军。退伍后，一个被分配到国营农场，每月拿固定工资，另一个去了矿厂，两个在景德镇工作，另外两个至今还在部队担任军官。

50年代，高家村人出于传统和现实的考虑都不热衷于参军。在1949年共产党革命获胜以前，中国老百姓习惯上看不起当兵的。有一句俗话说得好：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那时，高家村人不知道共产党的政权是否会稳定，能否持久，而且他们也不愿上战场打仗。所以，当政府在50年代初号召村民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时，村里只有高常安一人应征入伍。高常安5岁时父母双亡，成了村里的孤儿。他总觉得自己在村里是个外人，有点叛逆。这是他参军的原因。

但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高家村人对参军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参军成了农村年青人的梦想。高家村的村民都意识到了共产党的政权是牢靠的，时局也没有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况且，农村年青人到了部队还能接受到教育，退伍后还能分配到“体面的”工作。高常钦有兄弟五个，他是最小的。他后来说起来，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参军上朝鲜战场。

但是农村人想参军也并不容易。首先，你必须要有好的家庭背景。地主、富农的子女是被排除在外的。只有到了80年代后，地主和富农的帽子才被摘掉了，村里的地主高天翔的三个孙子才可以参军。其次，你必须通过极其严格的体检。农村人是很少能达到要求的。高常善，这位当过小队会计的人，就试了好几年，但每次都因为扁平足而未能通

过。我自己同样也试了几年，也没能成功。原因是我耳朵从小有过感染而致部分耳聋。

高家村人摆脱农村生活的第二条路是当工人，但这条路也不好走。在毛泽东时代，农村人不能自由到城里找工作，只有在国营厂到农村招工时才有机会，但是有指标限制。指标从县里下发到公社，公社分到大队，大队再分到高家村。国营厂家一般难得到农村招工，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城市居民。只有在50年代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有一年，政府权力大下放，高家村人才有了被招工进城的机会。1958年，四个高家村人被招工，三个去了景德镇做了陶瓷工人，一个去了九江做了漆匠。1970年，两个男青年去了省城南昌。这些人后来都在城里成家定居了。虽然他们只是普通的工人，却也是村民羡慕的对象。每隔几年，他们会带上一些小礼品，回老家来看望父母、亲戚。他们城里人入时的衣着打扮会吸引全村人的注目。他们身上衣服的面料，农村人甚至都没见过，农村人还纳闷城里人怎么能保养得那么好。

农村人跳出农门的最后一条路，也是最难的一条路是参加高等教育入学考试。一旦考上了大学，他就可以永远脱离农村的艰苦生活了。一直到20世纪末，这条路就像村民常说的那样，比无梯登天还难。首先，竞争的人太多，入学的名额太少。即使到80年代以后大学扩招，大学和学院的数量从几百所增加到了千位数，也仅仅是100个人当中有不到3人有机会上大学。截止1995年，中国大学生的数量是2,500万，同期英国是280万，法国220万。[7]而且，在教育方面，农村人基本上是不可能与城里人竞争的，因为城里学生配备了更好的老师，享受更好的教育资源，有钱买书和其它学习用品，他们所在的家庭，教育程度也往往更高。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末，高家村只出了一个大学生，就是我。我1973年能上大学倒不是因为我学习更用功或我特别聪明，而是因为那年没有高考。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动荡时期后，1973

年中国又开始大规模招收大学生。[8]我是个幸运儿，因为那时没有统一的全国考试，强调的是从基层选送工人、农民和士兵上大学。[9]

1949年以后的40多年间，总共有12个高家村的男性村民离开高家村成了城镇居民。至于出生在高家村的女孩，她们一般是嫁到附近的村子去，仍旧是农村户口。只有三个嫁到了城里，其中一个是我的姐姐，她嫁给了城里的一个机械工。有一个嫁给了邻村的一个部队军官，后来他转业回到县城。还有一个嫁给了一个后来在景德镇做陶瓷工的邻村人。

人口、资源、技术

其他高家村人只能固守在农村，向这里的土地和水讨生活。村民们通过开山造地使耕地面积从1949年的280亩增加到90年代的308亩，但这已经是极限了。要使全村人都有饭吃，唯一的办法就是精耕细作，通过改进技术来提高粮食产量。

生产资源减少，人口又足足翻了一倍，村民为养活自己，有时会引进新技术，同时更加辛苦地劳作。不过，这里说的新技术并不是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这些高家村村民是绝对买不起的。再说，梯田和农村过剩的劳动力使得机械化耕作在经济上也不划算。所以，村民们至今还是用最传统的方式，用耕牛犁地，粮食搬运仍然是靠扁担挑、用手推车拉，靠手一根一根插秧，用原始的禾簟一把一把打谷脱粒。几百年来一直未变。

引进的新技术体现在农作物品种上。1963年引进的一个新稻种，叫矮秆稻。这种水稻有两个优点：一是不会倒塌，不像以往长茎的品种，快到收割季节时，风一吹就容易倒伏，谷子就会烂在泥田里，甚至还会发芽；二是它的生长周期较短，这对高家村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周期短，他们就可以一年种两季稻，早春一次，夏季一次。水稻的产量就可以从原来的亩产250–300公斤提高到500–800公斤。[10]这当然也就意味

着村民要付出双倍的劳动，比以前更辛苦了，但只有通过这样的精耕细作才能吸收农村日益过剩的劳动力，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充足的粮食。

60年代初引进种植的一种黄薯对高家村人来说，可谓意义非凡。薯本来是这个地区的一种传统作物，但以往只有一个皮红瓤白的品种。这种红薯吃起来很甜，生吃尤其如此，就像水果一样。新品种的外皮呈浅黄色，瓤为蛋黄色所以叫黄薯。虽然这种黄薯没有以前红囊的那么甜，但淀粉含量高，产量也更高，而且几乎到处适宜种植。因此，每当水稻收成不好或被水淹了时，这种薯就成了人们的主食。

化肥和杀虫剂也属于引进的新技术。以往，村民使用有机肥，如人畜粪便、用来养猪养牛的水草和稻杆，还有烧饭后剩下的草灰等。过去没有杀虫剂，只能依靠鸟和青蛙除害。现在，化肥和农药早已成为农作物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有机肥虽然还在使用，但种植两季稻，仅靠有机肥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使用化肥和农药，见效快。60年代化肥和农药刚开始使用时，供应量少，只能按定量从公社取得一点点；渐渐地，到了70年代、80年代，化肥和农药的供应才不成问题。现在农民种田对化肥和农药的依赖就像染上毒瘾一样，必不可少。

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宝贵的水产资源在慢慢变少。60年代以及70年代初，池塘里，农田中还有大量的青蛙。在7、8月天气最热的时候，夜晚村民们睡在竹床上在屋外乘凉，听着四周悦耳的蛙声，感觉特别舒畅。到了80年代，田里的青蛙几乎绝迹了。在池塘里游泳、捕鱼也曾是小孩子的一大乐趣。有时，村民甚至在田里干活时都能捉到鱼。然而，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了。那些小河、池塘里现如今已经没有鱼了，那些蟹啊、虾啊还有贝壳等也很难在河里、湖中找到了。村民如果想吃鱼，就只有到养渔场去买。

概括来说，过去的40年间，高家村人和土地的关系受制于三大因素。其一，土地和水资源有限。其二，人口的稳步增长。其三，为了解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吃饭问题，村民不得不引进新技术，增加劳动量。

但提高生产又会导致破坏宝贵的水产资源，并且增加的产品都已被增多的人口消耗掉了。这样的话，业已有限的自然资源会随着环境恶化而进一步减少。结果就是尽管高家村人努力希望摆脱贫困，但仍是陷在贫困的旋涡中。

高家村村民不想再受穷，但又苦于没有脱贫的办法。村子面积限定了，不可能扩张，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实。引进技术，大幅度提高产量，但按目前的技术水平来说，作物的产量已经到了极限。政府采取的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农村居民要脱贫，那就只有把过剩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工业生产中。80年代后期以来，已经有不少村民开始到城里务工。

人口增长及其促成因素

如前所述，高家村的人口1949年以来增长了一倍。根据增长的方式，可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1949年到1963年，1963年到1978年，1978年到90年代。这样分期的理由与不同时期的儿童死亡率、医疗卫生和人口控制政策有关。

儿童死亡率

1949年到1963年期间，60个新生儿中有24个夭折，死亡率是40%；1963年到1978年，60个新生儿中有4个夭折，死亡率为6%；1978到1991年，76个新生儿中有6个夭折，死亡率是7%。

1949年到1963年期间，儿童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现代的医疗服务。虽然1958年大跃进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但持续的时间毕竟不长。1959年高家村就不再执行大跃进的政策了。因此，很难说大跃进和儿童死亡率之间有直接的关联。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截止到1962年，高家村周围方圆50公里内没有一个具备现代医疗资格的医生，并

且与1949年前一样，一些简单的疾病，如百日咳、疟疾、腹泻都得不到适当的治疗，更不消说肺炎、肝炎了。小孩子如果患病，父母只有两种选择：求菩萨保佑或看中医。中医医生的医术一般是自学的，只会开几帖中药而已。小孩子只能听命于自身的免疫力，要么只有等死。

我的母亲16岁结婚，生了13个孩子。全部是1963年以前出生的，到今天只剩下了4个。那些去世的兄弟姐妹当中，只有一个是成年后死亡的，其他都是在孩童时期就夭折了。母亲常说，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去世，她的眼泪早已流干了。每次孩子病了，她就去庙里求菩萨保佑她的孩子。当她发现高家村附近的那座庙里的菩萨不灵验时，母亲就会靠她的小脚走上几十公里，到一个据说很灵验的庙里去祈祷，但她每次都失望，她的孩子还是陆续死去，于是母亲再也不信佛了。

1963年以后，情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那一年，两位中西医都很精通的医生临时驻在高家村。当时一般的疾病如霍乱、麻疹、天花、腮腺炎、脑炎都可以通过接种疫苗进行预防。两位医生还给村里培训医生。村里的高时华的医术就是在那时向两位医生学来的。1970他们走后，高时华就在村里行医，成了赤脚医生，一直到1981年公社解体。

传统价值观

新生儿死亡率的下降并不是导致高家村人口快速增长的唯一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村民主观上想生更多的小孩，特别是男孩。这样做是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是出于经济和实际生活上的考虑。儒家传统思想认为一个家庭必须有一个男性延续香火。一个人可能犯下的最大罪过莫过于“断子绝孙”。[11]村民之间吵架或争斗时，最恶毒的骂人的话是诅咒对方“绝后”。没有儿子的村民觉得自己总是低人一等。如果哪个妇女没有生育儿子，她在人们眼中就不是个好女人。高家村因而有四户人家过继了儿子。这种思想还体现在农村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一句俗语“多子多福”中。

经济和社会原因

根植于习俗深处的传统价值观并非没有理性和实用的基础。首先，对比1949年前与后的高家村经济状况和社会结构，我们就会发现，孩子是村民在年老时唯一的生活保障，特别是儿子，因为女儿早晚要嫁人。在当时，医疗设施的缺乏，生活水平的低下无法保证一个小孩顺利长大，因此，多生一个孩子便多一重保障。

多生儿子这种行为还和村子之间的宗族构成有关。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村有更多男性以免在和邻村的争斗中落于下风。大村子的人往往有一种优越感，说话声音都更大，行事也更蛮横。如果在集市上来自两个村的人争吵了起来，小村子的人心知斗不过人家，通常只有忍气吞声。

即使是在同一个村，一个家庭在村里的权势大小也往往和这个家庭的男壮丁多少成正比，取决于“拳头”的数量，于是兄弟多的家庭会让人敬畏有加。村子里男壮丁最多的家庭在村务中最有发言权，村长都得敬他们三分。但也有例外，在毛泽东时代，阶级成分使地主或富农的家庭受到极端的压制，即使他们家的男壮丁多，他们也绝不敢涉入当地政治。到了80年代，他们的成分帽子被摘掉后，这一例外也就不存在了。

每个宗族都有几个谱系分支，高家村有5个。不同分支的高家村人之间经常发生矛盾，甚至冲突。这个时候，男壮丁多的分支就能取得绝对的优势，他们可以威逼欺负其它分支的村民。

我祖父有两个孩子。父亲是他唯一的儿子。我记得在我十岁左右，我的两个弟弟那时还小，父亲因为身体差而不是个很好的劳力，因而被认为是对村里没有贡献。所以我家当时是村里势力最弱小的家庭之一。实力强的人家的小孩可以欺负我。有次我跟邻居小孩吵架逃回家，那小孩追着我扔石头砸我们家的屋顶。家里没钱替换被砸坏的瓦片，下雨的时候，屋里便到处漏水。他砸屋顶不仅是侮辱我们家，也给我们家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后果。我的父母从来不敢向他们家讨说法。他们也根本不

理会我父母，甚至还会变本加厉羞辱我的双亲。有一次，我和一个男孩打架，他家在村里很有势力，他的父亲兄弟多而且侄子一大堆，冲到我家来一句话不说，打我耳光，父母只能对我说，“忍着吧，快点长大”。

毛泽东时代以来，高家村人想多生小孩还有其它的原因。公社时期，社会主义的平均思想体现在按人头平均分配稻谷和其它主食上，食物的分配并不总是和一户人家对生产的贡献挂钩。劳动力多，小孩少的家庭其实是在补贴劳动力少、小孩多的家庭。所以，抚养小孩不需要额外的费用，因为“大锅饭”的体制，抚养小孩的额外负担都由全村人平摊了。

毛泽东逝世后，公社制废除，“大锅饭”成为历史。但是在土地分配方面，小孩多的家庭在经济上仍然是有利的。1981年高家村原先的两个生产小队进行拆并，土地按人口分配给各户。每个人，不管性别、年龄都可以分到等量的田地。每户人家和政府签订合同，根据这份合同，分得的土地不得出售和出租。除此规定，每户人家只要缴纳了一定的税费后，便可以自由使用分得的土地。

这种分配制度还规定，每隔五年所有的土地要进行重新分配，以适应人口的变化。因而，一户人家的孩子越多，分得的土地也越多。但从全村的角度出发，人口越多，人均土地就越少。但仅从单独一户来看，家里人口多，分得的土地也就多。按人头平均分配，隔五年再分配一次，以及禁止出售、出租土地，这些规定本意是为了维持公平性，但事与愿违，政府多年后意识到这些政策和计划生育政策是相互抵消的。因此，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一个文件，规定从那时起，不论人口的增长或减少，土地都不再进行重新分配。[12]但是高家村并没有严格执行这个文件的指示。

政府的人口控制政策

毋庸置疑，传统观念、文化价值观、农村的宗族结构、经济结构和政府的社会政策一起影响着高家村的人口变化。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发

挥着怎样的作用呢？这些今天依然有争议的、有时比较粗暴的政策是怎样影响高家村的人口发展的？总的来说，一直到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对高家村的影响微乎其微。尽管这一政策从70年代初就出台了，但在高家村一直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9年江西省政府下发具体的指导方针后才开始改变。

根据这个方针，一个母亲生育了两个男孩或一男一女之后，就必须进行输卵管结扎。如果一个母亲生育的是两个女孩而没有男孩，可以允许她再怀孕。谁违反了这些规定，就得被罚款。罚多少没有明文规定，由当地政府根据当地的情况自行决定。

但是这些政策方针执行起来也是相当的困难。基层干部要么假装不知，要么明目张胆地抵制。上级政府又不可能对这些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有效的监督。鉴于此，波阳县政府制定了一个方案：给下属各级政府下指标，规定一个公社要完成多少妇女结扎的指标，公社进而把指标分到各个大队，再由大队决定某一个村妇女结扎的人数，最后由村里决定具体哪一个妇女需要结扎。如果谁拒不结扎，就会被罚款。高家村的情况是，每次罚100到200元。1980年全村有五户人家违反了政策，每户被罚了100元。那时候的100元钱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村民为了再生一个孩子都会不惜出这笔钱。

通过实行指标制，上级政府只需查阅医院的结扎记录就能很容易监督到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情况。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村民很快就想到了一个蒙骗的方法。指标制只关注结扎人数，这样，一些已经不能生育了的妇女被安排去医院结扎来凑足指标数，而年轻的妇女仍继续怀孕。村干部也配合村民欺骗上级，毕竟，村干部自己也想要多生几个小孩，再说，这样的政策有那么多人抵制，实施起来也的确不容易。

到了1983年，县政府不得不明确规定45岁以下的已经生育了两胎的妇女必须去结扎。从1990年开始，省政府政策又规定，生育了一胎

的妇女必须上环，生育了两胎的必须结扎，如果头一胎是男孩，就不能再生育。任何妇女违反了政策，就要被拘押和强行结扎；如果已经怀孕了，不管胎儿发育到了什么程度，必须马上进行流产手术。

贯彻这样的政策需要有效的监督机制，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很难找到相关的监督机制。县政府所能做的只有控制每个乡的目标人口增长率。1994年，人口增长率定在0.8%，最高可达1.5%。当地干部是否完成这个任务被作为他们的政绩考核的指数。在年度干部评审中，未达到要求的相关责任人根据程度的不同，被降职、罚款或是免职。

这些做法对高家村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截止到1995年，村里有35位妇女结扎，12位上了环，还有5户人家被罚款。罚款的原因不是他们多生了小孩，而是没有按规定去结扎或上环。这是90年代人口控制政策对高家村最为明显的影响。

高家村的一些村民和全国其它地方的人一样，还找到一个和政府周旋的办法。那就是在怀孕迹象还不太明显时，有了身孕的妇女就躲藏到娘家或好友家，等孩子生下来之后再回村。木已成舟，村干部只能对其罚款了事。如果罚款金额不太大，村民一般会交这笔钱，如果罚得太多，村民交不起，结果是适得其反，收不到罚款。就算这些当地的领导多么想取悦上级，他们也总不能把村民简陋的房子和仅够糊口的粮食给罚没掉。对于很多的村民而言，那些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了。

1991年以后，计划生育抓得特别紧。高家村有四位妇女怀孕时躲藏在外，分娩后才回村。其中一个是高常善的儿媳。高常善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都已成人，他家现在是村里最有势力的一户人家。其它三个敢于将怀孕妇女躲藏起来的家庭也都在村里有相当的权势。一个是高朝银家，高朝银是村长；一个是高东升家，他家是大家族，有三个兄弟，十多个侄子。一般说来，负责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是村委会干部，但他们都尽可能地不想插手村里的事务。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他们之所以会粗暴地对待村民，是迫于乡政府和县政府的压力。

对于这一章的要点，我们可以归纳如下：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40年间，人口的流动性差，在户籍制度下，严格意义上并不存在人口的自由流动，城乡之间竖着一面高墙。到了80年代后期，农民工才可以进城务工。二，基础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生儿死亡率的降低，导致农村人口在40年间增长迅速。以高家村为例，其人口翻了一番。三，农民辛勤劳作，引进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带来的生产发展对高家村的生活水平没有明显的作用。人口增长抵消了生产的发展。高家村人仍旧陷在内卷化重复发展的泥淖中，未能富起来。四，虽然从70年代就开始控制人口的增长，但效果一直到90年代都不显著。原因之一是村民的抵制，另一原因是政府制定的其它的一些政策实际上刺激了人口的增长。公社时期，土地平均分配的政策诱导了村民多生小孩，80年代按人头分配土地的做法也起了同样的作用。人口增长还受到文化价值观，寻求社会保障和农村宗族观的影响。最后，9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之所以贯彻得成功是因为其强制性和残酷性。这些政策或措施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但对于中国政府和政策的制定者来说，控制人口是一项基本国策，关系到民族的存亡，必须严格落实。

注 释

1　如参看Joseph Needham, *The Grand Titra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 2 ed.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79); 以及他的宏篇巨著*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2008); 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2　Philip C. Huang,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3　中国政府后来继续提供补贴给城市居民，显然有政治上的原因。仅1985年，城市居民的粮食补贴就达到275亿元，是同年中国所有雇员总工资的

四分之一！见Zhu Ling, *Rural Reform and Peasant Income in China: The Impact of China's Post-Mao Rural Reforms in Selected Regions* (London: Macmillan, 1991).

4 一种例外情况就是所谓的“五保户”。一些出身背景比较好的，无子女的家庭会得到政府提供的“衣、食、住、医疗和丧葬”等方面的资助。但这些保障金的发放却没有系统，还经常被当地有权势的人滥用。实际上，这笔钱还是通过税收向当地农民征收的。每年大队会计帐本上都记有这笔税款的数额。高家村当时没有五保户。

5 王贵宸、肖德昌：《中国农村产业结构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54页。

6 赖瑞华、蒋谢新：《中国农业资金问题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7 引自Sir John Maddox, "The Case for Basic Research," *Campus Review* 6, no. 2 (1996): 8.

8 常常可以听到当前中国官方和国内外一些学者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都被关闭了。事实上，小学和中学都只是关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有些是1967年停了一年，有的是1967到1968停办了两年。在高家村，小学一直没有停办。一些大学早在1971年就开始招收小规模的“实验班”。

9 张戎是在西方传阅甚广的《野天鹅：中国三女孩》一书的作者，也是在70年代初招考进的大学，是通过当共产党高官的父母的关系进去的。在那本书里，她认为毛泽东的激进政策的目的就是摧毁中国的教育。

10 本书中所说的谷产量指的是从田里收割来没有碾磨加工的稻谷。加工后的大米只有原来稻谷的三分之二重。

11 值得注意到的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备受争议的最伟大的革命家和叛逆者毛泽东，似乎也不能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在1959年攸关命运的庐山会议上，毛反复对中共高级领导人说，他应当为发动大跃进造成的灾难负责，他将死而无后，祖宗的香火到他这一代就要断了。毛的两个弟弟在革命时期牺牲，他又把自己最喜爱的大儿子送到朝鲜战场，虽然有彭德怀的照护，还是死在朝鲜战争中。事实上，毛当时并不是已经没有子女。他与贺子珍的女儿李敏，还有与江青生的女儿都还活着。他与贺子珍的儿子，毛岸青，也还在世，只不过精神有点不正常。很显然，毛泽东并没有把这个儿子和他的女儿看作是自己的继承人。

12 文件名称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第5章

农村生活水平

生活水平的量化分析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缺乏确凿的村级统计数据的情况下。即使是记录最为详尽的1949–1978年，《大队台账》也并不完整，[1]其中的数据项目有半数多是空白的。以“公社收入”这一项目为例，1969年到1978年有数据记录，但1949年到1968年的数据却缺失。至于医疗和教育，台账只记录了1972年到1978年的情况。还有个问题是，台账记录的是整个大队的总数据，而各个生产队的明细账目则阙如。

生产队的账目十分不健全，许多重要项目多年来未作记录。生产队会计照理说是保管这些材料的人，但40多年来，会计这一职位几易其人，上下任会计之间又没有移交记录。且纸张在当时还很匮乏，记录用的纸张大多数被用作它途，甚至被会计家用来当手纸。

账目杂乱的另一个原因是，40多年来，生产队的组织结构变更了5次。农村政策激进时，政府要求农民组成规模较大的生产队。政策有所放松时，农民又被要求组成小生产队。政府实行激进农村政策的理论依据是生产队越大，公有制程度就越高，就更能体现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在大跃进时期，高家村的两个生产小队合并成了一个队。1960年，

又被拆分成两个队。1969、1972、1974、1977年这几年生产队合了又分，分了又合。每次变动，土地和农具就得重新分配，账目也得重建。

虽然我们缺少令人满意的官方数据，但有关高家村生活水平的其它信息还是可以获得的。这一章将讨论住房、主食、村民一天的劳动收入、饮食结构、单位产出、税费和消费等问题。

住房

1949年以前，村里有十二座房子，八座大的砖瓦房，两座小的砖瓦房以及两间土房。两间小砖瓦房分别是地主高天翔和富农高尽享的。8座大砖瓦房分别属于同是一个宗族的几个分支，同一分支的几家共住一座大房，他们都是中农或贫农家庭。1951年土改时，高天翔的砖瓦房被没收了，他搬到了一间土房居住。至于其他人家，房子的所有权没有变更。

七间大的砖瓦房全部是一个类型，砌有非常厚的砖墙，冬暖夏凉。为了取得这样的效果，房屋的建造者巧妙地采用了一种砌墙技术。砌墙所用的砖呈长方形，25公分长，15公分宽。与今天的砖不同的是，这些砖只有1.5公分的厚度。砖的颜色为青灰色。建房子时，砖不是一块叠在另一块上，而是五块放在一起搭成一个盒子。一块放于底部，四面竖放四块砖。再在砖盒中填充干泥土，一堵墙就是由成千上万的砖盒垒在一起做成的。砖块之间用石灰粘合。这些砖盒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保温系统。砖瓦房的造价并不太高，因为用来填充砖盒的泥土是就地取的，石灰是当地烧制的，所以也不贵，而且石灰的白颜色，不仅持久也适于装饰。

这些房子大门全部朝南开，这样就能避开冬天刺骨的北风，夏天凉爽的微风又可以吹进屋里。房子的东西面各有两个大厢间，后面是一间长方形的房。四个厢房铺设有橡木地板，房子的中间是一个厅堂，厅特别大，被房顶中间的天井分成两个部分，雨水可以从天井落到屋内的天

井池里。每个厢房有两扇木窗。窗上雕有当地最出色的工匠雕刻的图案和花。天井池是用大块美观的石板建造的。雨水可以通过天井池排到屋外。紧靠房子而建的小棚屋是同一宗族分支的两、三家人共用的厨房。

土屋的墙由黏土做的土砖砌成。河岸上的土非常有黏性，村民就直接用它来做土砖，土砖长20公分，宽10公分，厚10公分。用来做土砖的泥土先是被压实，再用水抹平。在泥土半干时，村民再把它分割成一块块。等到全干时，就成了坚硬的土砖了。这些土砖叠加在一起便成了一堵墙。因为这样的土砖村民自己就可以做，所以比砖窑烧制的砖就便宜得多。但土屋容易受到雨水的侵蚀，使用寿命不长。村民通常把稻草扎在一起覆盖在墙上，防止雨水侵蚀墙体。

那些土房子厅堂中间没有天井，屋内光线很暗。除了房子前面的墙上凿了两个小孔，就没有其它采光的窗户了。有些房子的屋顶上装有一到两块砖块大小的玻璃瓦，可以采集到一些光线。但在我的记忆中，没有见过当地有这样的瓦出售，也没见村里有谁买过。为了便于看书，出于无奈，我只好在我家房屋的后墙壁上凿了一个洞，用两块木板架了一扇窗。村民对我的举动感到震惊，他们的反应其实也可以理解，因为我后来才了解到，我开凿窗户的这座房子来头不小，已有200多年的历史。

村民没有在房屋的墙壁上开窗通光不是没有道理的。首先，几百年来，农民的生活规律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房间里几乎是不需要什么日光的。其二，如果有了窗户，就必须花钱买玻璃或是其它的材料，村民根本买不起。要是有窗户，冬天刮风下雨，雨水就会刮进屋。夏天的蚊虫也会破窗而入。我至今记得，在那些严寒的冬日，风雨不断地敲打着我开凿在具有“历史”价值的墙上的“新式”窗户。再则，房屋不安装窗户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1949年以前，与中国的其它地方一样，这个地区也常有土匪出没。甚至在毛泽东时代，邻村的小偷也会不时造访。毛泽东逝世后，安全状况则更差了。

不管从哪方面说，200多年来，这些老房子为高家村人遮风避雨，作用不可小觑。然而，随着60年代以来的人口增长，现有的房子已不够住，必须建造新房来安置那些新婚夫妇和新的家庭。但是1949年之后，大多数家庭都没钱建房子。从60年代到70年代，一座木框架的，墙体采用土砖砌的土房子造价是3,000元左右。一个男壮丁一天辛苦下来赚不到1元钱。假设村里最好的劳动力1天的收入是1元，就算他一年干300天，也需要10年才能凑足3,000元。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高家村没有人能一年赚到300元，要指望村民通过农田的劳作来攒钱盖新房是不现实的。

在住房问题上，政府对农民没有任何的援助。为解决住房难题，村民的办法是拆掉那些做工精细的大房子，然后用拆下来的材料建造小房子，可以多供几家住。截止到90年代，6座大房子中的5座都已被拆除。

拆除大房子不仅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也与农村家产继承的习俗有关。一个有多个儿子的家庭，如果仅有大儿子成了家，一家子人还可住在一起，但是，当其他儿子也成了家，家里地方又小，况且妯娌之间关系复杂，大家再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就不合适了。于是就需要分家，分家时必须平分房子和家里的所有东西。这个时候，除了把大房子拆掉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如果一户人家有四个或不到四个儿子，大家还是勉强能够住在一起的，因为每个儿子可以占用一个厢房，而父母这时只能住房子后面狭小的罩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但是，当其中一个儿子的小孩到了成家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原先分给他的房间不够住了，可又建不起新房子，只好把属于他的那部分房子拆了，用拆下的材料建小房子，多建几个小房间。

到90年代早期，高家村半数以上的家庭都建了“新房”，虽然都只是些简陋的小房子。新盖的这种房子比较低矮，通常是一个小家庭居住。房子中间也不再有天井，房间内不再铺设地板，而代之以土质地

面。房子的内墙原先用的木板，现在是土泥墙，有的甚至家庭用报纸，或其它废纸粘在一起将就。为了进一步节省成本，有些房子只有前墙和后墙是用烧制的砖砌的，前墙用砖砌是为了美观，后墙是出于对天气的考虑。两侧的墙用的全是未烧制的土砖。

从旧的砖瓦房拆下来的砖块和木材，兄弟几个平分后，每家人分得的材料不足以建造一座新房子。每个家庭还得攒几年钱，早作计划，今年买块板，明年买根木料，来年再添些瓦，到了准备好所有的材料时才着手他们一辈子最大的工程——盖新房。银行和政府对农民住房建设没有任何的贷款支持，大部分的费用只有10块20块地向亲戚朋友借。

村民之间还通过互助来缓减建房的费用负担。一户人家盖房子，亲戚朋友全来帮忙。除了必须请匠人（在60年代和70年代，他们每天的工价是1到2元，外加一天三餐饭）的话，其它的大部分由自己干或亲戚朋友帮忙。当然，帮忙是相互的。但你可能要等到很多年以后才能还了他们当年的人情，因为建造新房对谁而言都是一辈子的大事。

盖房子时，村民之间相互借用工具也是一种帮忙的方式。把大家的资源集中起来使用这一点非常重要。工具都是无偿借用的。考虑到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彼此间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就算你不情愿把工具借给和你家关系不太好的人家，最终你还是会把工具借出。况且，互相帮忙这种风俗在农村由来以久，你有工具却不借会被认为小气。当然，村民相互借用工具还有很实际的原因——将来说不准你要向别人借别的东西。

当地有一种传统，一户人家要建新房，通常会有一番庆祝。这也是一种重要的帮助方式。全村每户都会有一人被邀请参加酒席。酒席定在安装顶梁的日子，顶梁位于屋脊的正上方，是房屋中央最高的梁，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部件，而且还带有一点神秘色彩。因此，举办宴席时，要张贴祝福的红对联，鸣放爆竹。除了亲戚朋友，村里的长辈和帮过忙的村民都被邀请参加宴席，另外，宗族的头面人物和村干部也在被邀请之列，村民认为他们的出席是给这户人家长“脸”的事。参加酒席的亲戚

朋友和村民要给盖房子的人家一个红包作为礼物。一般是2至3块钱或5块钱。在六七十年代，10到20元就已经是非常慷慨的了。

在这种场合，一户人家送多少钱要出于多方面的考虑。首先是根据盖房子的这户人家以往给他的礼金多少来定，现在的回礼就像是偿还一笔旧债，这笔账可能能追溯到几代以前。另一点要着重考虑的是这户人家目前的声望和发展的前景。显而易见，多送礼给一户有权势或致富潜力大的家庭是不会吃亏的。有时，村民不得不借钱来送礼，村民觉得这种做法带来了相当重的经济负担，但这是不得不还的“人情债”。不过到了对方回礼时，礼金又未偿不是莫大的帮助。因为有时礼金总额可能会多达好几百元，这在六七十年代可是一笔大数目。相互送礼在经济上其实相当于一种投资方式，或者说是一种反向的按揭。村民先分期付款再回收贷款。但对部分村民来说，送出去的礼可能要多年后才能收回来，也有可能永远不能收回。

即使具备了上文中提到的各种有利因素，如，从旧房拆下来的建材，礼金形式的长期投资，多年的积蓄和村民提供的无偿帮助，如果没有其它的资金来源，还是有很多村民建不起房子。一直到70年代末，高家村也仅有三户人家盖了新房。一座是高朝银建的，他曾经是公社碾米厂的会计。另一座是村里的赤脚医生高时华盖的。地主高天翔和前妻生的儿子高云飞也盖了一座，他是个小学老师。这三人除了田里的收入以外，都有其它方面的稳定收入。

在六七十年代，流通的货币很少，很多仅靠务农为生的村民连续多年手里没有现金。在我小的时候，只有在过年时，大人才给我一点压岁钱，1角、2角或5角不等，最多给1元。而且这钱还是母亲的相好给我的，父亲从来没有拿过钱给我。这点钱我也只能保留几天，就得还给母亲作为家庭急用。对于我们农民来说，能填饱肚子就该谢天谢地了，可实际上，我们总是不够吃。

从1980年到1995年，村里又盖了八所房子。这怎么可能呢？村民

盖房子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发生的两个重大变化对高家村影响巨大。最明显的影响体现在村民有能力盖房了。一个变化发生在80年代初，毛泽东时代刚结束不久。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中国政府为推进工业化进程，强制执行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差价制度，工业品的定价比国际市场同类产品的定价高而农业产品的价格却“一直是美国的1/3，日本的1/5，欧洲市场的1/5”。[2]再者，农民还不准在市场上出卖农产品，必须按照指定价卖给政府。1979年以后，中国政府调整了这方面的政策。农产品的价格提高了25%–40%，国家强制收购粮食的做法也开始减少。[3]从1979到1984年实行的这些改革政策使高家村人的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他们开始可以积点钱建房了。

然而，1985年以后，情况开始恶化，其中原因之一是非农商品，比如化肥的大幅涨价，抵消了农产品增大的收益。另一原因是地方政府收取的各种名义的苛捐杂税。假如没有另一次的发展机遇，农民还要进一步陷入贫困。深圳等经济特区和其它南方沿海城市的工业发展吸引了相当数量的年轻人前往打工。这些民工打工赚来的钱不仅维持了高家村人的生活，而且提供了建造房子的资金来源。对于这两次变化后文马上要作详细论述。

高家村的这些新房全是按老样式建造的。两边有两个小房间，中间是厅堂，也作主要的过道，后面是一个狭长的房间，一部分用作储藏室，另一部分用作厨房。挨着厨房建的往往是一个小猪圈。房屋是木质框架结构，由23根实心的木杆固定在4根大柱子上，顶上架横梁。这种框架没有墙也能独自支撑住。四面墙可以由任何材料做成，砖块、木材或竹板，实在没钱用稻草也行。盖这样的房子不需用钢材。

高家村只有一座房子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是一座三层高，装有大玻璃窗，总共有12个房间的大房子。房主叫高汉正，他不在高家村出生，是在他父亲过世后他的母亲改嫁带到高家村来的。高汉正小的时候学习不怎么样，有时还顶撞老师，甚至跟老师打架。他有一个舅舅在景

德镇从事建筑行业。在80年代工业扩张时，通过他舅舅的关系，他承接了一些工程项目，靠雇佣廉价的农民工帮他干活发了财，成了村里唯一的“富人”。

通过对1980年以后盖了新房的八户人家进行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即使在后毛泽东的改革时代，农业收入的提高对高家村人的影响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八座房子中有一座是村里的医生高时华盖的。他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盖了一座房子，另外两座房子是做木匠的高朝进和高国仁外出打工赚钱盖的，还有一座是高仁主建造的，他是村里以前的富农的儿子——这是仅有的一座在80年代早期农产品价格上调后，村民靠农业收入建起来的房子。剩下的四户人家建得起房子主要是因为他们用的材料是从两座旧砖房拆下来的。

饮食

中国有句俗语：“民以食为天”，“天”是世界上最大、最神圣的，把食物比作天，意思就是说食物是人们最重要的东西。中国的许多农民从来就濒临挨饿的边缘，以至于中国人对饥饿都见怪不怪了。

我个人的经历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1965–1966年，我在离家10公里远的一所中学寄读。每个星期六，我都要从家里挑上一个星期的食物和柴火到学校。我没有鞋穿，只能光着脚走一条高低不平的沙砾路在家和学校之间往返。肩上的扁担一头挑的是8斤左右的大米和夹着少许肥肉或咸豆腐干的一碗腌菜或咸菜，另一头挑的是给学校做饭，够烧一星期的柴火。

学校有1个食堂，2个厨师，1,200多名学生和30来个教职工。食堂负责老师的饭和菜，但只给学生准备饭。每个班有50个学生，一日三餐一个大桶把饭送到教室里。我们早晨吃稀粥，中午和晚上吃干饭。饭用一把长勺盛给我们。早上我吃三两稀饭，中餐和晚餐吃五两干饭，大

家都在教室就着各自从家里带来的菜配着吃。我每星期五天每天都吃腌菜咸菜，从来吃不上新鲜的菜或肉食，新鲜的蔬菜保存不了，肉吃不起。

从1973到1976年，我在厦门读大学。伙食比以前好多了，但我还是吃不饱。举例来说，那时，糖还是限量供应的，每个学生每月四两糖。我每月初带上一个月的定量糖票去商店买糖。四两糖我几口就吃完了。一直到1977年，我到了英国才知道，二十多年来我其实是饿着肚子过来的。我第一次在加迪夫的学生公寓里自己做饭，炒菜时用油像用水一样，一星期吃了两升油，很快我的体重就增加了。我终于体会到了肚子吃饱的感觉。

高家村人的主食和这个地区的其它村一样是米饭。在汉语中，就餐指的其实就是吃米饭。年成好的时候，村民可以一日三餐吃米饭，年成不好的时就只能吃稀饭和一些杂粮如薯类、蔬菜充饥。薯倒是很容易种，产量也比其它作物高。奶制品从来就没有过。村民都没听说过黄油或奶酪。村民家里最重要的三种家畜是猪、鸡和水牛。水牛能犁地，被看成是主要的生产资料。因此母牛要下仔时，总会被悉心照料。一头壮牛可抵得上中等大小的房子1/3的价值。

村民家家户户都养猪。一直到80年代，猪都是村民唯一的现金收入来源，也是油和蛋白质的主要供应源。一头猪仔长到50到100公斤一般需要一年时间。猪宰杀后要么留于自己家食用要么由政府收购去。少数殷实的家庭一年养两头猪，一头卖给政府换点现钱，一头春节时宰杀留给自己家食用。在整个六七十年代，一头百把斤重的猪可以卖到100元出头。我家养的猪怎么也养不到150公斤以上。人都吃不饱，又怎么有粮食喂猪呢？家境特别困难的时候，我们家不得不吃大量的蔬菜。母亲还要我们去摘猪吃的野菜或草料。我们家的猪总不长膘。那时要判断一户人家日子是否过得好，最好的办法就是去他们家的猪圈看看。

过年杀猪对于农民来说可是一件大事。我记得在我生活在高家村的20年里，我家只有几次宰杀的猪肉是留给自己吃的，大部分的猪肉都要

卖掉用来还债，自己家通常只留下猪头、猪蹄、猪尾、猪下水和一部分猪肉。留下来的猪肉过年时只吃一点点，剩下的用盐腌好，遇上家里请匠人或过节如端午节、中秋节，才切下一小块。猪脂肪要用来榨油，用猪油炒的菜可是很香的。猪全身是宝，甚至猪毛洗净后也可以卖给国营商店，换得5角钱左右。

鸡和鸡蛋是理想的食物。然而放养的鸡会到附近的稻田里找食，圈养又无利可图。在人民公社的大部分时期，村民养鸡时不时地被禁止，因为放养它们会损毁庄稼。1994年我回到高家村时，村民又不准养鸡了。我弟弟和朋友为了招待我，只得到集市上去买鸡蛋。

村民一般不种太多的小麦或大麦，因为麦子的亩产不如水稻高，而且，面食软，不易填饱肚子。你吃一斤米饭可以吃得很饱，而一斤面粉，不管做成什么样的面食都还是不撑肚子。村民喜欢吃的面食是面条和馒头，但他们只有在特殊的场合才吃得上，比如端午节。当地有做面条的面粉作坊。但只有在家里有人过生日或招待客人时才会做一点面条吃。我过生日的特殊待遇就是一碗面条，有时加一到两个鸡蛋。妇女分娩后，亲戚朋友也往往会送来面条，这里的人们都认为妇女孕后多吃面食，奶水多。

村民在自留地里种各种蔬菜。虽然60年代后，高家村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但村民仍然保留有一些自留地。公社时期，所有的土地被认为归集体所有，不过每户人家，按人头多少还是有自留地可以种任何作物。具体每家有多少自留地没有一个官方的数据，在青林大队，记录在册的土地是3,484亩。1961年，有224亩在册的自留地，大约占总的土地面积的0.06%。据官方数据记载，一直到1978年，这一百分比基本上保持未变。不过高家村村民的人均自留地有0.1亩。从1961年到公社制废除，村民的自留地占总土地面积的百分比从来没少过10%。公社时期，多数高家村人在自留地上种棉花用于织布，或种蔬菜。一年四季，我们家不缺蔬菜，蔬菜用来喂猪或自己吃。家里粮食紧

张时，我们就得吃大量的蔬菜。对于身处富裕社会的人来说，蔬菜被认为对于健康饮食是十分重要的，但对于我们而言，蔬菜是太讨厌了。有时，我们吃了太多的蔬菜以至于觉得恶心。一日三餐地吃蔬菜当饭真叫人难以下咽。

大约每隔两年，村里也许会有一头牛老死，村民就能分到一点牛肉，然而最好的牛肉要卖到集市上去，所得现金留存于生产队。剩余的牛肉每家每户平分，一家大概能分到五公斤。这个地区，人们不养羊，在允许养鸡的年份，村民过年还会杀一两只鸡。[4]除此以外，高家村人就没有其它的肉食了。关于人均的肉食消费，没有官方的数据记载。在我的记忆里，我家一年中每人的平均猪肉消费不超过五公斤。官方的数据显示，1985年波阳县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鱼只有区区1.35公斤，肉6.35公斤；而城镇居民对应的是15公斤鱼，15公斤猪肉，1公斤鸡肉和1.5公斤鸡蛋。我家里就算有鸡蛋，也得卖给国营商店换取现钱。我家的平均鸡蛋消费一年不会超过每人15个。

早在1949年以前，一直到70年代初，高家村人通过水产品来弥补粮食的不足。高家村的池塘、小溪众多，这些小溪汇流到村东的小河。这条小河连着一个湖泊，通往鄱阳湖。鄱阳湖过去生长着大量的鱼类和其它水生物。春季各种鱼从鄱阳湖逆游到小河里产卵，村民可以很容易就捉到鱼，鱼腹中尽是鱼卵，这可是难得的美味。夏季，村民把池塘里和小溪里的水引到农田浇灌。水流干时，村民能够在塘底和溪床上捉到鱼。有时候，村民可以在一口小水池中收获10–20公斤鱼。冬季枯水期，村民把河和湖分割成很多段，把水排干来捕鱼。高家村前面有一个大水塘，每年过年时，人们就放干池塘水捕鱼。那时每户人家都置办有各种渔具，有些人家的渔具多达十种，除鱼以外，还有其它种类的水产品，如泥鳅、黄鳝、河虾、贝壳，还有各种田螺。在小河边或湖边的水草下放一张特制的网，村民就能捕到小虾，要是运气好，一次可以捕到一公斤之多。

但是这种营养丰富又低成本的健康食物，高家村人现在已经很难享受到了。90年代，村庄附近几乎无鱼可捕。每家每户也不再准备鱼具了。这种情况并不是高家村独有，整个波阳地区的水产资源都已大幅度减少了。就连鄱阳湖里的鱼也变得稀少了。举例说明，1965年，鄱阳湖的捕鱼量是6,222吨，而1979年这一数量减到了3,316吨，减少了56.6%。[5]

如前文所述，导致环境破坏的最重要因素是日渐提高的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据官方统计数据，1957年到1978年间，化肥的使用量从40万吨攀升到了880万吨。[6]为追求粮食单位产量的最大化，就必须精耕细作，增加化学产品的使用量，这就会破坏鱼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另一因素和波阳县消灭血吸虫病的运动有关，这种传染病多年来一直困扰着鄱阳湖周边地区的人们。血吸虫病是由一种只寄生在螺类体内的寄生虫传播的。人一旦感染了，血吸虫就会进入到人的血液中。这种疾病只在有寄生螺生存的水域中传播。大跃进以来，鄱阳湖周围的各县政府采取了两个有效的措施消灭了血吸虫病，但又同时危害了许多水生物。措施之一是使用飞机播撒杀虫剂。另一个是动员大量人员改变了许多溪流的河道。这两个措施一方面有效消灭了寄生螺和血吸虫，但另一方面也毁灭了这一水域生态环境中的其它水生物。

豆腐也为村民提供了必要的蛋白质。[7]一户人家做好了一大块豆腐，就切成大小相同的一块块，其他人家就会或来借几块，或用大豆来交换几块。借了豆腐的人家自己做豆腐时就会还上原来借的。我的母亲过去每月做一次豆腐，算是小生意。她先在石磨上把大豆加水磨成浆，再用一块纱布把浆液过滤出来，浆液中加入熟石膏，放入一口大锅里煮沸后冷却成胶冻状的豆腐乳，最后将豆腐乳裹到布包里，用一块石磨把水分压挤出来，豆腐就算做好了。做豆腐非常费时，母亲头一天晚上要花几个小时磨豆子，第二天用一整天的时间完成其它的工序。对于一个小脚女人而言，这样的活无异于一种煎熬。村民到我家来取豆腐时，他

们会拿来做这些豆腐所需的大豆，母亲辛苦一场的收获仅是下一次做豆腐时所需的原料和非常适合喂猪的豆腐渣。

高家村的人口不断增长，最终使得人们放弃了豆腐这种非常好的蛋白质来源，因为人们在饿着肚子时是没有心思按食物的品质和对身体是否有利来选择食物的。理性的决定是选择产量最高的作物来种植，只要能填饱肚子就成。高家村人的选择是种水稻。水稻一年可以种两季，单位产量比大豆和其它的作物要高很多。许多土地因此被改造成水田。一亩水田一年种两季稻，可以收获1,000到2,000斤谷子。而在同等面积的旱地里种植大豆只能收获150斤大豆。1949年以前，高家村的土地差不多有一半用于种植棉花、大豆或其它经济作物。到了毛泽东时代结束时，除了村民的自留地和小部分土地用来种植棉花外，村里几乎全部土地都种上了水稻。官方数据表明，1949年青林大队有800亩地用于种大豆，而到了1978年，这个数字已下降到了327亩。

有一种观点认为，激进的农村政策迫使农民放弃种植经济作物，从而导致农民收入的大幅度下降。[8]不可否认，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激进农村政策下，经济作物是被禁止种植的，理由是经济作物的种植会导致商业化进而滋生资本主义，但高家村人减种经济作物是一个长期的自觉的选择过程。在粮食根本没有剩余的情况下，市场化和商业化对村民的意义不大。下面让我们把目光转到后毛泽东时代的80年代末期以后。

90年代高家村的生活图景大不一样了。在环境恶化，自然资源枯竭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再一次的发展机遇，即中国南方沿海的工业扩张，高家村村民将无法摆脱生活的困境。发生在几百公里之遥的中国南方沿海的工业扩张对高家村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大量的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工，高家村人急于抓住这一机会。从80年代后期以来，越来越多的村民外出务工，到了1996年，30%的村民，全部是年轻人，且大多数是男性，离家外出打工。如此多的村民外出务工意义重大。首先，有限土地上的人口负担减轻了，同样数量的粮食可以为

更少的人消费。第二，外出打工的村民汇回来的钱增加了家里的收入。市场和商业化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对高家村才是有意义的。

现在，村民比以前更经常逛商店了，购买的物品从电视机到一般的日用品，品种繁多。一些专营副食品加工的家庭迅速富了起来。高家村人再也不做豆腐，而是到集市上去买。地里想种什么就种什么，不能种的就向别人买。1994年我回到村里，惊讶地发现我的弟弟经营的小买部在出售他从波阳县城批发回来的甘蔗、卷心菜和大蒜。

波阳县城怎么会有农产品出售呢？你可能认为农产品应该是从高家村运到城里卖才对。实际情况是城郊有许多菜农把菜卖到县城的集市上。我问过高家村的村民，他们为什么不自己种，他们的回答是要靠种菜来赚钱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术；而且，我还听说，如果一户人家种了这些农产品，很可能在没有长成之前就被人偷走了。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现在有钱买得起农产品了，而以前他们如果不能种，就只好不吃了。

服饰

高家村自给自足的程度可以从村民的衣物上非常清楚地看出来。以前，这里的村民有自己做衣服的传统。当地轧棉花的匠人挨家挨户地把村民自家种的棉花轧成细绒，冬夜里，妇女和女孩用一种传统的纺车把细绒纺成纱，然后再请匠人把纱织成布匹。六七十年代，村里有一个轧棉花的匠人和一个会织布的妇女。他们到各家干活，主人负责一天三餐饭，并付一元的工钱。从棉花轧好到织成布大多需一到两天，布织好后就请裁缝到家里来做衣服。

我父亲和富农高尽享过去是村里的裁缝。他们没有缝纫机，所有的衣服都是手工制作的。甚至连纽扣都是手工用布做成的。村民利用当地一种树的叶子将布料染成黑色。

做鞋子对村里的妇女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鞋底是用做衣服时剪裁下来的碎布料一层层用糨糊粘在一起做好的。布料粘牢后用粗麻线缝合，麻线也是村里的妇女自己动手搓的。这样做成的鞋底暖和，舒服而且耐磨。村民还能自己用麦秸杆编制夏天戴的草帽，用竹叶编制下雨天戴的斗笠。棕榈的棕毛可以用来制作蓑衣，既耐用又非常适合农田劳作时使用。每个村民都会用稻草编制草鞋，虽然草鞋穿不了几天就坏了，但会编的人不需要任何工具，花上半小时就能编好一双。

床垫也是用稻草做的。村民还能自己做蚊帐和被子。枕头是用荞麦壳填充的。在整个六七十年代，村民几乎不到商店买衣服，顶多就是买点洋布、盐和火柴之类的。村民把商店里卖的布叫洋布，因为这种布早先是从海洋那边的国外来的。他们喜欢这种布的原因是布的色泽亮，看起来时髦。但洋布很贵，而且还有定额限制，一人每年的布票还买不到两米。用洋布做的衣服，村民只在特殊的场合如过年或走亲戚时才穿。

每家每户必须把定量供应的洋布攒起来以备要结婚的子女之用。只有新娘子才有几套洋布衣服。一直到我1973年去上大学，我从来不奢望可以穿上洋布衣服。我最大的愿望，就衣服而言，是能穿上自家做的白衬衫而不是黑色的或蓝色的衬衫。但是母亲从不允许我穿白衬衫，理由是白衬衫需要经常洗，不耐用。再者，肥皂也是定额的，必须省着用。

80年代后期以来，情况有所改变。村民不再轧棉花纺纱了，这种手艺也已经过时了。如果你还穿草鞋和土布衣服，就会被人耻笑。村里的年轻人现在都穿皮鞋、橡胶鞋或靴子。人们也偶尔做布鞋，但是料子用的是洋布。村民现在穿的衣服有羊毛衫、茄克衫、雨衣、外套以及合成纤维做的各种衣服。有些人甚至穿起了西装，打起了领带。

收入

用西方人能够理解的语言来谈论中国农民的收入问题是困难的。在毛泽东时代，高家村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物物交换。况且，依据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也无多大意义。比如说，现在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大约是1元人民币相当于0.125美元，在深圳特区打工的高家村人的月平均工资是400元，折合成美元是50美元，除去生活费用，一个民工可以每月寄100元人民币即12.5美元回家。这点钱对高家村人意味着什么呢？不清楚高家村的物价和生活成本是不能很好地理解这笔钱的重大意义的。

鉴于本书不是经济学的教材和专题研究，我在此对物价不作全面的比较。再说也缺乏有关高家村的官方数据。但在论述70年代高家村的收入之前，我要列举当时的一些日用品的价格加以说明。必须指明的一点是，六七十年代的通货膨胀率是很低的。

一盒火柴2分钱，一斤糖6角钱，一斤猪肉6角9分，一斤大豆1角3分，一斤盐7分，一块肥皂1角6分，一斤鱼4角，一斤虾3角，一本教材5角，一双胶鞋3元，一支铅笔5分，一包香烟平均2角。一块手表或一辆自行车120元。工厂或大学食堂一餐饭花费不到5角钱。70年代初，一台晶体管收音机要100多元，而100斤稻谷政府的收购价仅仅是9.8元。

在讨论高家村人的收入之前，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在公社制下，社员的劳动价值是怎样计算出来的。每个农民都分属于一个10到20户人家组成的生产队，社员的劳动考绩的方式是计工分。每天，生产队长给大家分配任务，大多数时候，为了简化工作和有效监督劳动，生产队被分为几个生产小组，每组由一个组长领导，头一天晚上，生产队长把任务交给各小组长，再由组长在次日早晨分配任务给该组成员。

傍晚时，生产小组组长和生产队的会计一块记录每个出工村民的工分，从早到晚出工一天记10个工分，半天记5个工分。这些工分记录仅

仅是出工的时间，而没有考虑组员的个人劳动价值的差异，因此是毛工分。因为组员的身体状况和劳动技能因人而异，劳动能力不尽相同。

区别每个组员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价值的方法是年度的评分。组员劳动价值用工分衡量，称为底工分，底分3分到10分不等，有别于毛工分。最好的劳力的底工分为10分，他一天的实际工分就是10分，也就是说他的毛工分和底工分是一致的。工分制下，毛工分记录的是组员的劳动时间而底工分记录的是劳动价值。如果甲的底工分是5分，乙的底工分是10分，那么甲一天的劳动价值就只相当于乙的一半，如果甲劳动半天，他/她的毛工分是5分，底工分则是2.5分。

根据1964年的官方数据，村里最好的女劳力的底工分是5.6分，最好的男劳力的底工分是9.6分。换句话说，最好的女劳力一天的劳动价值只相当于男劳力的一半多一点。在70年代初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实行的是比较激进的公社化制度，最好的女劳力的底工分评定为8分。底工分评定在性别上的差异，在村民看来还是不无道理的，因为男女的劳动任务虽然不会永远但经常是不同的，比如说重活和脏活是不分给妇女做的。小孩的底工分是3到4分，老人是6到7分。你可以想象年度的底工分评定对村民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我的个人体会是，撇开性别上的歧视不说，工分制是相当合理的，大体上反映了每个组员的劳动贡献。

最后有必要指出，每个社员的底工分反映了他/她对生产队的生产的实际贡献，每个社员的最终劳动价值还取决于生产队全年的总收入。而总收入每年都不一样。假设生产队某一年的总收入是700元，队里所有成员的底工分总数是10,000分，那么每10个底工分的工分值就是0.7元，相应地，底工分为10分的劳动力一天的劳动所得是0.7元，一个底工分为5分的妇女一天就只能得到0.35元。

为了使工分制形象化，我们不妨来看一个家庭在1963、1972和1992年这三个在政治上很有代表性的年份的收入情况。1963年和1964年被政府认为是大跃进之后和文化大革命之前这段时间最好的年份。

1972年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1992年是邓小平改革时代的中期。1964年，我家有5口人，父亲高仁法，母亲高圆荣，两个弟弟，10岁的高常献和4岁的高常文，我自己当时13岁。学校放假时，我就出工，母亲也偶尔出工，父亲身体弱，队里照顾他，安排他照料生产队的水牛。我们全家当年的工分底数总计1,886分，每10个底工分在1964年值0.72元，我家的总工分值是135.79元。同年，队里分给我家的粮食和其它农产品折合价值为215.40元，算下来，我家还欠队里79.61元。

1964年100斤稻谷的定价是7.9元。我家分到2,600斤稻谷和价值约为10元的其它农产。2,600斤粮食稻谷勉强够吃。在当时的收入状况下，我父亲的工分底分是7分，他需要劳动244天才能买一辆自行车，一个顶尖劳动力干一天仅够买1斤猪肉或1斤鱼或1斤糖。1964年，村里14户人家为进钱户，23户为超支户。高仁开一年有大半时间在生病，年底结算负债最多，欠队里191.82元。高常绕，村里最好的劳力，账上盈余113.04元。

上文叙述的收入没有包括村民自留地的收入。有几年，我家的自留地有2.5亩，用来种蔬菜、棉花和其它经济作物。我前文已交待过，我们家是从来不缺蔬菜的，这些菜全是在自留地里收获的。另一项没有包括在内的收入是条件允许情况下的捕鱼、养猪和养鸡的所得。然而，一个家庭这两项收入是多少，很难统计出来，平均每个家庭一年总收入100–200元的估计应该不为过。

上文说的是一户人家当时的收入情况，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1963年一个生产队的收入情况。[9]全队的总收入（当时高家村分成了两个生产队）为7,317.90元，其中93.8%是农业收入，6.2%是养鸡和卖鱼等副业的收入，生产成本1,712.9元，其中1,576.22元，相当于总收入的21.5%，用于农业投入，75.98元，即总收入的1.03%为副业生产投入，其它的管理成本为60.09元，是总收入的0.8%。另外还要上交政府724.24元作为农业税，等于总收入的9.88%。除去生产成本1,712.29元

和农业税724.24元，剩余的收入就是生产队的净收入。然而，还要扣除195.25元（净收入的4%）的生产队公积金和146.25元（净收入的3%）的大队公益金。另外，90.80元要扣作大队干部的工资，最后只剩下了4,384.87元（总收入的60%）全队人平分。每户人家的平均收入为293.31元，人均56.86元。这个数字比1961年的人均收入增长了4.5%。在生产队记录本的首页上有记载，1962年政府再三强调生产队的收入要尽量分给农民，公积金和公益金在总收入中的比重要尽量减小。

1972年，我父亲过世已经好几年了，我是家里主要的劳动力。1972年我家的底分总数是1,099.4分，相当于89.05元。当年的“单位劳动价值”，即每10个底分的价值是0.81元，我还担任村学校的“赤脚老师”，挣了197.36元。1972年队里分给我家的农产品的价值是381.33元。这样一算，我家已经超支，欠队里94.92元。1972年我教初中一级学生的数学和语文，我全年的工资为197.36元。我学校里的同事，工作职责和我是一样的，但他们是国家老师，有城镇户口，他们的工资是我的五倍。

大学讲师一个月的工资差不多是我一年的所有收入。一个景德镇陶瓷厂的工人两个月就能赚到我做“赤脚老师”一年的工资。城市居民的生活费用并不比农村居民高，因为物价都由政府控制在同一水平上。不可否认农村居民的确可以在自留地里种点蔬菜，他们不需要到集市上买，但城市居民买菜的花费并不多，因为政府对农产品价格的控制和对城镇居民实行补贴，例如，70年代，一斤白菜价格仅仅是5分钱。尽管和具有城镇户口的同事比，我的工资相当寒酸，但村民都已经非常羡慕我这个“赤脚老师”了。

高家村人和该地区的其他农民一样经历了后毛泽东时代短暂的改革蜜月期。80年代初，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调，而工业产品的价格维持不变。农民也不用缴纳名目繁多的税费和提留了。但1984年以后，情况急剧恶化。有两个原因：其一，紧接着毛泽东去世，经过了一个平静期

后，化肥和农药以及其它工业物资的价格快速上涨。[10]其二，除去上缴国家的农业税，当地政府还向村民征收繁重的各种税款和提留。1991年，高家村村民要缴纳的税费的名目多达29项，1992年降到了16项，所有的税费都是按人头征收的。

1979年改革开始后，农产品的价格迅速上涨，但到了90年代初，价格的上涨已是名存实亡。举例说明，1992年，一百斤稻谷的政府收购价40多元，比1972年的三倍还多，然而，把投入的成本和其它费用考虑进去，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并不意味着收入的实际增加。以我弟弟高常献家为例，高常献有子女三个，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我母亲和他们住在一块，全家总共六口人。1992年，他家里有4亩农田，2亩旱地。旱地种棉花和芝麻。4亩水田的水稻产量是2,000公斤，价值832元，旱地种的棉花收获50公斤，价值300元，芝麻300公斤，价值360元，全年的总收入是1,500元。生产投入是80元用于买种子，648元用于买化肥。1992年的税费是每人80元，高常献全家需要上缴480元，全家净收入为292元。高常献和他妻子一年在地里劳动180天，每人每天赚0.8元。[11]

自1972年以来，虽然总的通货膨胀率达到200%，但高常献和他的妻子每天劳动的收入仍旧是0.8元，这差不多就是1972年村里最好的劳力一天的所得。在1992年0.8元仅够买2支肯特牌或三五牌的香烟。不过在90年代，村民的生活质量有明显的提高，反映在穿衣、住房和其它消费品上。这种变化的原因不是农业收入的增加，而是高家村人到离家千里之外的地方打工赚了钱。

消费品

在整个六七十年代，高家村人几乎不购买消费品。很多东西都是自己做。就连洗脸盆都是用竹篾箍的木盆。1962年我父亲花了三块钱，设

法买了个搪瓷脸盆。父亲说这个脸盆是留到我上中学住校时用的，任何人都不准用。脸盆在家里闲置了三年，一直到1965年我上中学时才带到学校使用。父亲声称自己信佛，平时除了买火柴和香，从不给自己买其它东西，但他买火柴和香不是为了供佛而是用来点烟。父亲烟瘾很大，但都是吸自己种的烟叶。为了省钱，他时常还用木杆而不是燃香来点烟。谈到父亲的节俭，我姐姐至今津津乐道的是他拒不用伞的故事。父亲的理由是每用一次伞，它的使用寿命就短一点。通常，高家村人只买得起当地伞匠制作的涂抹了桐油的纸伞，只有条件好一点的人家才有钱买布伞。

高家村村民从商店买的东西为数非常有限，最近的商店离村子有三公里远。他们不得不去商店买的东西有火柴、盐、肥皂、煤油、香和一些春节时用来写对联的红纸。如果有钱，再买些定量供应的白糖，至于酱油，村民一般自己用大豆做。他们还会用甘蔗、红薯甚至大米自制糖。酒也可以自己用米来酿，这样的米酒日文中称为sake。在我姐姐1960年结婚以前，家里买不起煤油，我们只能用一盏小香油灯，灯光非常暗，但很省钱。姐姐结婚后，家里灯光改善了很多，因为姐夫是一艘船上的机修工，时常会把一些用过了的机油送给我们家。我总是很热切地期盼着姐夫的到来。他每隔两个月就来我们家一次，每次都会带上几个苹果，或一些糖果和饼干，这些东西对我们家来说算是奢侈品了。姐夫来了，母亲会给他煮几个鸡蛋，我们小孩子在旁边看着，直流口水。姐夫带来的礼物，母亲会让我们尝一点，然后就收起来，留到重要的场合招待客人，或拿来送人。

一直到70年代末，高家村人没有谁买得起手表、自行车或收音机。从1962年到1970年，驻歇在村里的一个医生有一台收音机。每天晚上，高家村人成群结队地去他的诊所听广播。到70年代末，村里才只有两个人买了手表，一个是领国家工资的老师高云飞，他是地主高天翔的儿子，另一个是赤脚医生高时华。我1977年才好不容易买了一块

手表，花了120元，买手表的钱是从政府给我的奖学金补助中拿出来的，因为这一年我被公派到英国留学，为了使我们的个人形象体面一点，政府给了我们这些出国留学的学生一大笔钱，大约有950元。我从北京写信回家里，告诉我弟弟这件事，他怎么也不相信，这么多钱会无缘无故地给了我。在高家村人的眼里，这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在高家村时，我从小就想要三样东西，一把能折叠的小刀，一个手电筒（因为黑暗）和一双胶鞋（因为泥泞）。可是这三样东西一直到我离开高家村时都没能得到。

青林大队共有593户家庭，3,610个人。截止到1978年，全大队只有36块手表，12辆自行车，25台缝纫机，38台收音机。然而在今天，手套、袜子、手电筒、帽子、围巾这些小物件根本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了。80年代初，高家村只有2辆自行车，现在有42辆。电视机现在也有了，不仅有黑白的，还有几台彩电。

我1973年离开家乡，六年后家境才有了好转。原因之一是我的兄弟都已经长大了。但主要的原因是我开始往家里寄点省下来的工资了。1976年，我从厦门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当时，政府事业机关干部的工资级别分为24级，政府企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的工资级别分为8级。我的工资是事业单位中最低的一级，一个月的工资是38.5元。[12]到了1977年，由于我的贫农家庭背景和工作的良好表现，在我通过了英语听、说和写作三方面的考试后，被送到英国学习英文。我在英国三年，每月38.5元的工资学校一直照发。因为我在英国学习的所有开销全部是由中国政府承担的，每个月我还有3.08英磅的零花钱，国内每月发给我的工资我就可以全部寄回家。结果我家就成了继“赤脚医生”高时华之后，第二户买了自行车的人家。我1992年给家里买了一台彩电，我家也成了村里第一户拥有彩电的人家。

从90年代后期开始，这个地区进入了一个“消费增长期”。很多村民摆起了售货亭出售各种物品。售货亭一面正对交通繁忙的马路。晚上

可以锁起来。售货亭的大小刚够存放要卖的物品，售货亭三面都可以摆设物品。前面是一个小柜台，柜台后坐一人给顾客提供服务，这些货摊不能算是街角商店，因为村里没有街道，只有一条马路通到波阳县城，所有的售货亭都排列在马路边上。高家村的东面一公里远的马路两边有6个售货亭，西面约二公里处，还有6个。

高家村在80年代后期仅有一家售货亭，是高家村人的女婿经营的。他原来是部队军官，转业到县政府工作，后来被裁了员。1991年，我弟弟高常献用我给他的6,000澳元在马路边建造了一座3米宽，7米长的新房，开了一家售货亭。不久之后，原来的那家售货亭就倒闭了，因为它无法和高常献竞争。高家村人都对这件事感到非常高兴。1992年我回到家里，一个村干部跟我说，高常献的售货亭为高家村争回了面子。那个高家村的女婿算不上高家人，也不姓高。在高家村人看来，村里的售货亭由一个外姓人经营就意味着高家村不够富裕，开不起商店。1994年，高常献的商店一年的营业额约为30,000元，每月的利润却很小，只有200元左右。

高家村“消费增长”的出现有好几个原因。但农业收入的提高绝不是其中之一，主要的原因是村里的年轻人外出打工赚了钱。时至今日，这个地区30%的人都在外打工。1995年，高家村有98个人在外打工，假使每个民工平均每月寄100元回家(这是事实，后文中我们会叙述到)，总共就寄回了117,600元，这对于高家村而言，就是一笔巨资了。村民外出打工也大大减轻了农村的资源负担。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80年代以来的工业发展。一些消费品确实比以前，比如说10年前，便宜多了。一块普通手表，现在的售价是50元左右，有的还不要50元。而同样手表的价格在1978年以前至少是100元。如果把通货膨胀因素考虑在内，今天这个价格的手表，村民在15年前只要花12元就能买，但在当时，手表的定价是120元。这仅仅是一个例子，说明政府对工业品的定价是如何伤害了农民的利益。同手表一

样，其它的消费品，例如自行车、收音机、胶鞋、服装和电视机等的物价也经历了同样的变化。

大队的总体情况

表1（见附录二）提供的是整个大队的收入情况。其中列明了一些重要的收入指数：人均粮食消费、单位劳动价值和人均年收入。表格只提供了1969年到1978年的数据，在我有机会获得的账本中，1968年这一年的记录是空白的。记录不完整的原因，我在这一章的开头就作过交待。对村里人而言，1971年和1972年是毛泽东掌权时最好的两年。1973年是个灾年，春季和夏季连续发生了严重的洪灾和旱灾，村民们不得不靠吃返销粮度日（政府为了避免饥荒发生，把从农民那收上来的粮食存储在当地的粮站，需要时再卖还给农民）。从表中还可以看出，70年代后期粮食产量尽管比较稳定（人均粮食消费稳定持平），单位劳动价值却在下降，人均年收入维持原有水平。这种情况是政府的定价政策对农产品价格压制的结果。

70年代末，农村的情况其实是在恶化，这不能全归咎于集体体制，而是几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人口的持续增加。再则，环境的逐步恶化。还有就是那十分有害的政府定价制度。80年代实行了改革，农民生活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得到了遏制，其中农产品价格上涨的作用尤为显著。

总的说来，40年来，农民的生活水平几乎没有提高。虽然农业生产发展了，但其成果一部分被剥削性的定价体制和政府对粮食的强行收购消除，另一方面被增长的人口抵消了。从物质生活来说，高家村这40年的发展都是内卷化的、原地反复的，政府的歧视性政策、环境的恶化以及人口的增长共同导致了高家村村民依然生活在贫困旋涡中。

注释

1　《大队台账》曾被标为“国家机密”，包括各个家庭的阶级背景、党员团员情况、地方民兵数、每年的国家税收和提留、每年的生产总值、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农民收入、农作物分布和单位产量、生产队和大队企业机械化情况和生产发展情况。

2　Zheng Yi, "The Perils Faced by Chinese Peasants," *China Focus* 1, no. 3 (1993): 1.

3　Zhu Ling, *Rural Reform and Peasant Income in China: The Impact of China's Post-Mao Rural Reforms in Selected Regions* (London: Macmillan, 1991).

4　村民过生日、过年还是以中国农历为准。有时过年的时候都到公历的二月了。

5　刘汉艳编：《波阳县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第337页。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1993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第349页。

7　英文中的Tofu是通过日语，间接来自中文的“豆腐”。

8　David Zweig, *Agrarian Radicalism in China, 1968–198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9　这里用1963年的数据是因为没有搜集到1964年的官方数据。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两年的数据多少有点变动，但变化很小，不足以影响到我们的分析结果。

10　关于价格上涨的方式和原因参看陈峰：《化肥生产供应和销售的根本问题和出路》，载《改革思考》，1992年。

11　高常献家的数据是作者在1992年底和他的交谈中得到的。这一例子还在David Schak ed., *Entrepreneurship,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Chang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uthern China* (Queensland: Griffith University, 1994)一书中引用过。

12　据民间流传，在最初实行24级工资制时，毛泽东工资级别最高，但毛泽东仅同意拿第三级工资，每月大约是500元。

第6章

农村医疗卫生

如果要问在毛泽东时代，高家村人受益最大的是哪一方面，答案是医疗卫生。60年代后，新生儿死亡率大大降低。在毛泽东时代，高家村人历史上第一次可以在家门口享受到现代的医疗服务。政府对村民进行定期的疫苗接种，血吸虫病得到了控制。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第一，高家村新生儿死亡率的下降和医疗卫生状况的改善并不就只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正如我在上一章已指出的，在毛泽东时代，高家村人的经济状况没有多大好转。第二，如果认为高家村卫生条件的改善要完全归功于现代的医疗技术，如疫苗接种，那也是错误的。

现代医疗技术的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像高家村村民这样的人就有机会享受到。要使村民能受益于现代医疗技术，还涉及到政策意向、政府资源和有效的政府管理。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的确得到了改善，假若没有共产党政府的努力，这些成就有没有可能实现呢？这虽然只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但这个问题还是值得一问的，因为它和今天的情况有所关联。90年代，村民在外打工汇款回家乡，高家村的经济状况有了相当的改善，与60、70年代相比，90年代现代医疗技术的应用的确更为广泛了，但后毛泽东时代的种种迹象表明，高家村的

医疗条件在近年来却趋于恶化，因为政府对农村医疗的重视程度还不及毛泽东时代。

60年代以前

60年代以前，高家村人对青霉素、链霉素、安乃近、抗生素以及其它许多药物和它们的功效一无所知。事实上，他们从来就不服用西药，中医给他们开的药无非是些草药，可以入药的昆虫和动物之类，这些东西被研磨成粉或煎成药汁供人服用。中国的传统医疗方法是如何发挥疗效的很难说清楚。至少有一些做法是值得怀疑的，比如说，一个肺部有问题的病人，吃猪肺是否有用？一个人肾虚，就该多吃猪腰子，贫血了，就吃猪血和任何表皮红色的水果，如枣子。这些倒底有没有作用？我们不否认，一些昆虫，如蝉、蜈蚣、甲虫，和桔子皮、金银花之类，的确含有一定的药用成分，但是否能治病，治什么病是不能简单就说清楚的。还有一些疾病，如麻疹，或一些导致人发烧的疾病，中医确实不如西医的疗效好。

这么说并不是想贬低中医，中医有着悠久而丰富的传统，对一些疾病的疗效也是得到肯定的，我个人也曾得益于中医。我从小时候起，右耳就有感染，时常会发作，后来发展到了耳朵里有嗡鸣的程度。1985年，我的岳父向他的一位朋友提起这事，他的这位朋友是位非常知名的中医，他没见过我，从300公里之外的福州给我开了一个药方。我去厦门的一家中药店抓药，每一帖药含有20多种草药。在我当时工作的厦门大学有一个专门为师生熬药的老年妇女，我一天去她那三次，每次喝一大碗药汁，喝了两个月。这药还真管用，我耳朵里的翁鸣声少多了。不过话说回来，给我开药方的这位医生是一个具有专业资格的中医行家。中医对于一些慢性病可能有效，但对于急性病，中医的疗效就显得太慢了。

不管中草药效果怎样，高家村的村民通常是不去看医生的。像耳炎、鼻炎、牙周炎和疟疾这样的病是非常普遍的，村民们认为这些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因此也不去管它们，任其发展。在高家村，孩子的鼻子、耳朵和眼睛流脓就像吃饭、上厕所和睡觉一样司空见惯。我小的时候，耳朵发炎了，没有一个人会对此在乎，因此我也不在意，还以为这是生活中不足为奇的小事。

高家村人经常得的病还有：感冒、流感、腹泻、哮喘、关节炎、疮、痈、齿龈脓肿、支气管炎、肺炎和肺结核。我的父亲死于支气管炎，我的母亲患上了肺气肿。在高家村，每个上了60岁的男性和一半的60多岁的女性都患有这样或那样的咳嗽。女性得这种病较男性少，可能是因为她们当中抽烟的人少。老年人咳嗽也被认为是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事，他们从不去看医生，除非发高烧。在1949年以前是这样子，在毛泽东时代也是这样子，90年代我回高家村时还是这样子。当我叫高仁为（一位80岁的老头，他过去扮过菩萨）去让医生看看他的咳嗽时，他回答说："干嘛要去呢，像我这么一大把年纪，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去看医生也是浪费钱，太贵了。"

但是，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我当然能够支付得起我母亲看病的费用，但是去哪里看病呢？怎样去呢？这里没有乡村医院，而且没有哪一家城镇医院会收治她，因为她的病不被视为急诊病例。医院所能做的仅仅是给她打一针，然后打发她回家。我母亲的肺气肿从来没有治愈过，每到天气寒冷的时候，她的病就会反复发作。1997年2月初，她病得如此严重，以至于我那些在中国的兄弟姐妹都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等待着死神把母亲带走。在我的介入下，九江地区军医院最好的一位医生开车100多公里来给我母亲治疗，而我母亲也只多活了10天。

高家村人平时吃了不少的新鲜蔬菜，因此他们没有维生素缺乏的症状。一些缺乏的维生素也可以通过晒太阳和呼吸新鲜空气得以补充。尽管饥饿总是笼罩着高家村，除了能记起大跃进时期有过短短的一段饥荒

的日子，我回忆不起其他什么时候发生过严重的饥荒。因为有谷物和水产品等各种食物来源，营养不良对于高家村人来说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人们记得最困难的时期是大跃进后不久的1960年，那时高家村人不得不吃米糠做成的食物。高家村的老人对我说，在大跃进以前，包括1949年以前，高家村人从来没有吃过米糠。甚至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没有米饭吃时，他们也可以吃大量的蔬菜来维持生存。

60年代以前，在高家村，导致孩子死亡的最严重的病有：麻疹、腹水、水痘和天花。60年代以来的免疫疫苗降低了高家村的儿童死亡率，从1949–1963年的40%减至1963–1978年的6.6%和1978–1991年的7%。对于老年人来说，呼吸系统感染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唯一最严重的疾病。心脏病、心脏衰竭、高血压和其他心血管疾病很少见，而支气管炎、支气哮喘和肺气肿则是最常见的疾病。在1949年以前，甚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头几年直到60年代，很少有人能活到60岁以上。我的父亲死于1963年，享年58岁。假如不是从80年代早期以来就对我的母亲进行长期的医疗观察，她也活不到78岁。我在1994年回到高家村时，村民们不断对我说，我的母亲非常幸运，她能够花得起钱买药治病。当我父亲生病的时候，我们家根本没钱让他治病。在我母亲的最后十年里，她靠奶粉、鸡蛋和数不清的药维持生命；而在五六十年代，我的父亲根本买不起这些东西。

高家村的黄金时期

在60年代，中国政府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来使农村居民有机会享受到医疗技术，其中包括医疗资源的重组，结果有些医务人员被派住到农村地区。除此之外，政府还采取了大规模的疫苗接种措施。高家村人受益匪浅，不仅那些致命的疾病，像麻疹和天花完全消失了，而且县政府委派了两位医生驻在高家村，一位是李医生，他是一位全科医生，另一

位是胡医生，他是一名药剂师。诊所的位置之所以选在高家村，是因为高家村位于周边四个大队的中心，诊所可以为四个大队的人提供医疗服务。两位医生的工资由当地政府支付，每人每月领到大约60元钱。

虽然这两位医生在高家村行医看病，但他们并没有给村民们增加经济负担，实际上还增加了他们的收入。这两位医生，特别李医生，因为不需要赡养大家庭，他经常会定期从村民这儿购买季节性蔬菜和一些水产品，像鱼和虾等。李医生是村里花钱最多的人，他的消费给村民们带来了宝贵的现金。因为住得这么近，两个医生对村民们的情况都非常了解，他们从来不会因为村民们付不起钱而拒绝给任何一个高家村病人看病。有时候，高家村人只能拿给医生他们自家生产的蔬菜来抵消医疗费，如黄瓜、大豆、南瓜、卷心菜或者更值钱点的如花生或像面条、面包和米糕之类的食物。对于应急治疗，例如，给疮上药膏，他不会收取费用。如果小孩发高烧，李医生也知道如何处理。如果有他治不了的疑难病症，他会建议送往医院。

高家村的孩子在夏季最容易得的一种病是生疖子。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疖子长在身上、脸上、胳膊上和后背的各个部位。高家村里几乎每一个孩子都至少得过一次这样的病。有个男孩的头上长满了疖子，人们干脆称他为“烂头”。他长大后，在他的头上仍然留有许多伤疤。现在，人们还叫他“烂头”，他真名是什么反倒给忘记了。李医生治起病来非常干脆果断。他会先在感染处划开一道口子，然后挤出脓水，最后再贴上他自制的药膏。几天之后，病症就消失了。这些神奇的药膏是由橡胶织物和药汁制成的。李医生会从好几种中国草药里榨出药汁，然后把这些药汁熬成胶状，黑黑的，非常粘稠，最后把这些东西涂在橡胶织物上。

对于村民们来说，诊所也是一个文化中心。在整个村里只有这两位医生拥有收音机和报纸。他们的年纪都上了50岁，他们的家人也都不住在高家村，因此，他们喜欢晚上和村民们呆在一起。并不需要提前预

约，村民们只要走到诊所就可以随意畅谈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正是通过诊所，村民们了解了太空飞船和人造卫星，了解了核武器和越南战争。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村民们也是通过诊所和李医生的收音机开始知道北京发生的事情，他们也学会了唱广播里经常播放的样板戏。这两个医生，特别是李医生被视为是比村里人更亲的人，他们受到村里人的羡慕、敬佩和爱戴。对高家村人来说，诊所是上天恩赐的礼物：他们毫不费力就可以了解到文化知识，并可以享受费用很低的医疗服务，又可以从这两个医生的消费中增加额外的现金收入。

当然，这两位医生不能解决所有的医疗问题，毕竟他们只拥有非常落后的医疗设施，并且他们也没有接受过特别的训练来治疗疑难杂症。1963年，被认为是村里最能干和最聪明的劳动力之一的高常欣，在即将被当选为下一届生产队队长的时候，突然病倒了。这两个医生都找不出病因，也不知道如何对症下药。最近的医院也有几十公里远，并且连救护车也没有。事实上，在这个地区连一辆机动车都没有。最后他的家人只得求助于村里的王太公（“王大菩萨”）。王太公是一尊小小的木制雕像，只有半米高，身上披着红布，被放置在一张长长的供桌上。拜菩萨时，人们在雕像前点燃香火，燃烧着的香冒出灰烟，袅袅上升。两个妇女手持一个装有大米的竹制盆状器皿。另外一个妇女手里拿一根被当作神棒的筷子。慢慢地，筷子开始移动，并且在大米上划字。一位年老妇女解释说，王太公自己会给病人开处方，并且会到胡医生的药店里挑选草药。

经常充当王太公化身的高仁为像是被催了眠似的手舞足蹈。过了会儿，他就被王太公附体了。高仁为叫另外一个村民扶住他经常使用的一根用树枝做的木叉的一端，而他自己扶住另一头。这两个人开始左右摇晃这根叉子，直到高仁为开始喃喃低语一些难以听懂的话并且嘴角开始冒白沫。另外一个村民松开叉子，高仁为径直冲向胡医生的药店。李医生和胡医生大吃一惊，他们不让高仁为进药店。当村民们和两个医生协

商时，高仁为不停地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最后胡医生只好让步。高仁为走进药店，用叉子指着一个个装药的抽屉。胡医生根据他的指示，打开这些抽屉，并从每个抽屉里面拿出一些中药。高仁为没有说具体的量，因为在这种催眠状态，他是不能说人类的语言的。因此，胡医生只能凭他的直觉和经验决定每种药材的剂量。在高仁为指了十多个抽屉，胡医生开了十多个抽屉之后，处方就算开好。高常欣的家人把药拿回家，熬好后给他服下。

高常欣不久就死了，但是人们对王太公的信奉还仍然不变。据说高仁为能够在催眠状态下吞咽一块块的瓷器而不伤着胃，而这是任何一个普通人都无法做到的。尽管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高仁为吞咽碎瓷器，甚至也没看到过他吞一块破碗片，但是他在胡医生的药店抓药的那一幕至今还浮现在我的脑海中。1994年，当我回到高家村时，我去拜访了高仁为，并且问了他这件事和他是否真的具备吞咽瓷器的能力，他只是咯咯地笑着。

因为在高家村导致健康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如果能全面处理这些问题，就可能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而60年代以来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政府给村民普及基本的卫生知识，例如，学校的孩子通过学习，了解了细菌和病毒知识，并知道洗手和喝开水的好处。村里挖了一口井，以便提供更为干净的饮用水，村里人过去在村子前的同一口池塘里洗衣服、蔬菜和包括婴儿尿布在内的其它东西。慢慢地，村民们开始知道，保持房子亮堂和通风不仅对视力有好处，而且能够去湿气，因而有助于身心健康。当越来越多的孩子接受了教育后，村民们变得更加讲卫生。以前，孩子发烧就能引起各种各样的并发症，而现在，李医生能够完全控制住这种病情。

因为注意了个人卫生，其它疾病，例如头皮癣也随之消失了。白癣过去是高家村的一种常见病，过去共有七个村民得了这种病，他们都有“癞痢”的绰号，这是普通话“癞子”的地方方言称法，表示一个人头上

感染了白癣。鲁迅的畅销书《阿Q正传》中的主人公就得过这种病。这种病严重的时候会损坏头上的所有头发，并且流出一种令人恶心的黄色脓液，等到脓干了之后就会粘到头皮上。然而，60年代以来就再也没有人得过这种病了。蛔虫病也是过去的一种常见病，那些得了这种病的人往往是不经常洗手，或者是吃了没洗的蔬菜和水果的小孩。因为越来越多的孩子去上学，学校要求他们养成基本的卫生习惯，得蛔虫病的人就越来越少。

“赤脚医生”制度[1]

1972年，李医生和胡医生退休后，回到了他们自己家乡的村里。他们已经培训好了高家村村民高时华，他成了一名“赤脚医生”。截止到1972年，青林大队有三个“赤脚医生”，高时华就住在高家村。

当时的政策是这样的：村里的医生必须是当地人，而且，给他们发工资的不是政府，而是当地公社。为了降低成本和确保医生和当地人之间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当没有病人看病时，“赤脚医生”也必须像其他村民一样在地里干活。如果村民们干活时没有穿鞋，那么医生们也不能穿。因此产生了“赤脚医生”这个说法，其意思是只有了解了村民们的经济困难（没有定期的工资）和艰苦的体力劳动（在地里干活），医生们才能了解他们的健康问题和健康需求。

然而，事实上，青林大队的三个“赤脚医生”几乎都不下地干活。首先，3,000多人口的地方仅有三个医生，他们忙于给病人看病。再者，这三个医生并不像其他村民那样是出于经济困难而被迫下地干活，只有当大队领导有时准备实施上面颁布的激进政策的时候，这三个医生才可能在7月农忙期间到地里干活。在1972–1981年实施“赤脚医生”体制的整个时期，这样的事仅发生过几次。除此之外，这三个“赤脚医生”只在他们自己家的自留地里干活。在这个制度实施的最后几年里，他们

甚至都不再这样做了。相反，他们会叫他们的亲戚、朋友和其他村民来帮他们干活。作为回报，这些帮忙的人可以享受免费的医疗服务。这样，“赤脚医生”便穿上了他们的鞋袜。

这种制度是这样运作的：任何一个村民都有权利获求治疗。村民们每次去看医生都必须付挂号费和处方费，处方由医生在看病的时候开出，并由医生开药给药；挂号费不是一成不变的，当这个制度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挂号费是0.05元到0.10元，到70年代后期，费用涨到了0.5元。药费按理来说应该是药的实际价格，而这只有开处方的医生知道。村民在治疗的时候就要付钱给医生，有了医生开的发票，他们可以到生产小队的会计那里报帐。在一个财政年度结束的时候，生产大队的所有医疗费用，包括这三个医生的工资和买药品和医疗设备的费用算在一起，再来决定按人头算，每个生产小队应该支付多少。如果生产小队给它的队员报销的钱的总额超过了应支付的钱，那么该生产小队就有余款，余款将留下来抵消明年的应付款。然而，如果生产小队给队员报销的总额比应支付的更少，生产小队就必须付给大队差额。因此，至少从理论上讲，每个村民都有机会享受免费医疗，医疗费用由整个公社和生产大队承担。

有些统计数据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这种制度是怎样运作的，其成本是多少。我手头没有1972–1981年的完整数据，但是这里提供的这些数据足以达到我们的目的。在1973/1974的财政年度里，这种制度的成本体现在每个村民身上的应征收费用是0.87元，1977年是1.06元，1981年是1.89元。在1973/1974年里，高家村应支付的总额是203.45元，高家村的两个生产小队给成员报销的总额是243.73元。高家村在以前的财政年度里还有14.33元。因此，在1973/1974的财政年度里，高家村总计有余款54.61元。在1981年，高家村应付总额为481.95元，而实际上给队员报销的总额是509.36元，高家村还有27.41元余款。

1972年，看病次数最多的家庭去了八次，最少的就一次。三家只

去看一次病，六家看了八次病。生产队长高常绕家看病的费用最高，包括挂号费和处方药费总共八元。最低的看病费用是一元。1977年，在高家村，看病次数最多，达十八次的家庭共花费4.24元。同样是在1977年，高尽章——他刚好是村里的“赤脚医生”高时华的父亲，去了一次医院，花费了25.6元。

1972年，高时华和其他两位“赤脚医生”到设在生产大队办公楼的诊所里一起工作。这家诊所建在70年代有着大约3,000人口的青林大队的中心位置。高时华的家在高家村，而徐医生来自徐家村，江医生来自江家村。这三个医生白天在诊所里工作，晚上就回到自己的村子里睡觉。他们每个人在诊所里都有一个办公室，当然办公室里也有床。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会睡在办公室里。至少从理论上来说，他们当中必须有一个人睡在办公室里，以防有急诊病例。

最初对“赤脚医生”制度的设想是，不付给村里医生定期现金工资，相反，医生的收入必须像其他的村民一样按工分计算，并且和公社每年创收的财富直接挂钩。因为“赤脚医生”没有城镇居民户口，并且他们的家人也住在生产小队，他们的家庭像小组里的其他家庭一样，可以分到同样多的粮食和其它的农产品。

然而，这三个医生都是为整个大队服务，而不是为他们所在的生产小队服务。这种情况引起了三个问题。其一，如何说服其他的生产小队共同承担这三个医生的费用。其二，生产小队之间的收入不同，这样一来，家庭与家庭之间的收入也不同。收入不同是因为这些因素所致，例如生产小队的领导、规划、土地的质量和数量以及队员们的工作努力情况等。如果三个医生的报酬和他们所在的小队直接联系的话，那么碰巧住在一个更贫穷的生产小队的“赤脚医生”将会比他的同行赚得更少，而他们也不一定比他工作更努力。其三，尽管这三个医生都为整个大队服务，但是他们所在的三个生产小队必须给他们的家庭分发谷物和其它农产品。至少从理论来说，这三个医生必须回报他们的生产小队。然而，

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为他们生产小队的粮食生产作出贡献，而他们还要从小队分配给小队成员的非常有限的资源中拿走一部分。

对以上几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这三个医生直接从生产大队领取报酬而不是从他们所在生产小队领取。报酬的多少取决于大队的平均收入，而且每年各异。方法是：365天乘以大队的平均“单位劳动价值”。在1976年，大队的平均“单位劳动价值”是0.7元，那么当年高时华的报酬应该是255.5元，比最好的劳动力所得的报酬还要高。最好的劳动力都不可能赚那么多，因为即使他一天赚十个工分（这是极其少见的），他也不可能一年365天都工作。因此，这三个医生的报酬作为大队诊所成本的一部分，由所有的生产小队共同分担。因而，三个医生的报酬分担问题和三十个生产小队之间不同的收入水平问题得到了解决。然而，由于谷物和其它农产品的分发必须来自于一个生产小队，第三个问题永远也没法解决。因此，在每年的财政年度结束时，大队的行政部门会付给医生们现金，反过来，医生们也会花钱买他们所在的生产小队发给各家各户一整年的谷物和其它物品。

当然，这三个医生不能等到每年的年底发了现金才去消费。因此，在年中，他们可以从诊所借钱花。他们借了多少钱，就会写一张欠条，并注明日期和所借的钱的数量，有时侯还写明借钱的目的。同样在每年的财政年度结束时，每位医生的欠条会算在一起从全年的总报酬中扣除。诊所连秘书都没有，更不用说会计了。医生们必须自己算帐。他们给病人看病、开处方、卖药和收钱，并且不准从中获取利润，他们需要做的是，收取合理的药费以保证有足够的钱购买药品。挂号费是由大队规定的，并且每个医生从村民手里收取的费用应是诊所收入的一部分。

但是没有一位医生会记录每一段时间的病人情况或所收取的费用。他们确实能够从村民那里收取比购买药品所需更多的钱，以谋取私利。村民们监控他们是否多收取了药费的唯一方法，是和自己以前看病的经验进行比较。他们也许会问医生，为什么这种药品比以前更贵。这种监

控是可行的，因为毛泽东时代很少有通货膨胀。另一种监督机制是公社里彼此住得近，几乎人人都认识，隐瞒不了任何东西。例如，如果一位医生过着一种很不寻常的很富裕的生活，那么就有必要对诊所进行审查，这样的话医生将会陷入严重的麻烦中。在中国，至少在那个时候，仅仅怀疑就能导致一个人的垮台。

在这种体制下，三个“赤脚医生”不仅没有必要光着脚，而且吃得更好，穿得更好，赚得更多。他们手头有现金，尽管没有人知道他们多赚了多少。然而，村民们却把这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事实上，这三个医生工作都很卖命，并且没有被怀疑犯过什么错误。按照当地的标准，他们生活得还算富裕。高时华在70年代就能够建一栋房子，而且他还是1977年以前高家村里唯一一个拥有一只手表和一辆自行车的人。

村民们在这种医疗制度下也不会过得太坏。这种体制差不多是免费医疗体制，而实际上却没有获得国家政府的支持。其费用不是很高的原因，其一是非常低的消费水平和对物质生活的较低追求；其二是村民们不是经常去看病，他们认为很多病都是理所当然的，去看病反而嫌麻烦；第三个重要的原因是，这种体制不包括常规治疗外的疑难病症。例如，只要有一例外科手术，就足以使整个青林诊所破产。

血吸虫病

血吸虫病在这个地区是如何发生的，不得而知。高家村人回忆不起在40年代以前有过任何一例这样严重的病例，也许是因为在共产党政府使他们意识到这种病之前，他们并不认识这种病。依据《波阳县志》，波阳县的第一例血吸虫病是在1924年由一位美国人莫雷尼（Faust E. C. Moleney）发现的。到1956年为止，波阳地区的107个公社，211,788个人被认为感染了血吸虫病。这种病的后果非常严重，整个村子都很有可能会被它完全摧毁。在清朝末期，榨港公社的一个村子有110户人家，

共计1,500人，而到1953年，这个村子只剩下12户人家，因为村子里的大部分人都死于血吸虫病了。从1939年到1949年，在连湖地区的一个村子里，3,000个村民死于这种病，60户人家全部病死。

血吸虫病是一种长时期困扰着中国南方地区的疾病。到50年代中期为止，这种疾病侵扰了12个省，350多个县，1,000万人被发现患上了这种病，被这种瘟疫感染的区域涵盖了1亿人口。1955年，毛泽东提出彻底消灭这种瘟疫的想法。1956年，国务院成立了一支特派组来协调这项工作。到1958年，被血吸虫病侵扰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余干县据说已经消灭了这种病。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是如此的高兴，以至于他连夜写了一首诗，题为“送瘟神”。[2]

血吸虫病是由一种裂体吸虫引起的，这种寄生虫通过与含有寄生螺的水接触就会进入人体，然后进入皮肤并且到达膀胱和肠道。它们也有可能从这些部位扩散到身体的其它地方，这种病的严重程度取决于进入身体的寄生虫的数量。[3]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如果不治疗的话，病人会由于腹水导致腹部肿胀，并且几年之内就会死去。当地人称之为“大肚子病”。患者肚子变大，妇女不能生育。在其它情况下，吸虫会穿越血管进入脾脏和肝脏，慢慢地，这两个器官会被损坏，最后就会导致病人死亡。就算情况没那么严重，这种病也极其危险，因为十年或二十年之后它可以使脾脏和肝脏部位形成肿瘤。在病兆未显示出来之前，病人看上去可能非常正常。不经过药物治疗而要摆脱这种病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身体不能够形成抵抗这种寄生虫的免疫系统。

中国政府做了两件事来控制这场瘟疫。一件事是确认感染的人数并让他们服用杀虫药物。另一件事是彻底根除病源。最有效的方法是消除寄生螺，因为没有寄生螺做载体，寄生虫就不能繁殖而最終死去。1955年，波阳县建立了第一个血吸虫病卫生防疫站。1956年，县政府成立了一个工作组来协调全县范围内的治疗防疫工作，并且又建立了四个血吸虫病卫生防疫分站。1958年，又建立了一座血吸虫病医院来治疗

血吸虫病患者，县里还建立了好几个类似的地方性诊所。所有年龄在七岁或七岁以上的都被动员去进行每三年一次的定期体检，医生被派往乡村去监督这项工作。在70年代，血吸虫病的检验技术简化了，只要从耳垂上取一滴血就足够了。一旦被确诊患有这种病，病人就必须住院接受杀虫药物治疗。通常一个疗程会持续一到两个星期。在治疗后的半年，还必须对患者进行跟踪复查，其目的是为了确认是否还有这种病的踪迹。如果确实还有，又得开始第二个治疗疗程。在医院治疗期间，病人除了花钱买食物外，一分钱也不用花。在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为了鼓励穷人参与治疗，每天呆在医院接受血吸虫病治疗的病人都会得到和地里干活同样多的工分。为了消除寄生螺，时不时的就会动员大量村民把小溪河流和池塘的水排干，这种运动几乎每年都有一次。填平旧河挖新河，甚至为了使一些河流干涸来彻底消灭寄生螺，一些河流被迫改道。消除寄生螺的另外一种方式是在寄生螺大量孳生的湿地和水域里喷洒化学药物。例如，1971年，两架飞机在波阳县的上空飞行了46天，在110,000多亩有水区域喷洒了杀虫剂。尽管这些措施对消除寄生螺很有效，但是对环境也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大量的水生动植物也随寄生螺一起消失了。附录二的表格2显示了政府对波阳县血吸虫病瘟疫所做的工作和所付出的努力。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在两个最激进的时期，即大跃进时期的1958年和毛泽东时代文化大革命时期的1970年，大部分人都接受了血吸虫病的检查和治疗。这不可能是巧合。几乎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毛泽东都把批评目标瞄准一些享有特权和掌管权力的人，比如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干部，同时去帮助那些社会地位最低下的人，比如农民和穷人。在血吸虫病事件中，农民们确实从政府的努力中获益匪浅。要大规模对付血吸虫病就必须有坚强的政治意向、有效的行政管理和广泛的人民群众动员。直到1978年，毛泽东政权结束之时，占全村总人口将近六分之一的50个高家村人得到了血吸虫病的治疗。

我自己就被治疗过两次，一次是在县防疫站，一次是在地区防疫站。我的弟弟高常献也治疗过两次。我的一个朋友熊培康医生是中国治疗血吸虫病最著名的专家之一。他替别人做过800多次成功的手术，将感染了的脾脏从血吸虫病人身上摘除。所有这些手术的费用都由政府承担，假如不是这样的话，村民们不可能付得起手术费用。

后毛泽东时期

1992年，我曾去拜访熊医生。熊医生现在已退休在家，他喜欢听京剧消遣度日，有时还做一些咨询工作。在我们吃饭期间，他总是不停地发出抗议和抱怨。他抱怨说，现在的政府为农民做得还不够，每个人关心的只是钱。表格2也表明，自1980年以来，县政府还没为农民做过什么事，用来预防和治疗血吸虫病的所有地区防疫站都被拆除了，县防疫站也管理得很差，并且严重缺乏资金。1992年，当我重返我以前接受过血吸虫病治疗的医院时，几乎看不到病人，这个地方看上去像被遗弃了一样。因为现在不再是免费治疗血吸虫病，只有少数人才能承担得起在医院治疗的费用。因此，血吸虫病的发病率从1979年的5.6%上升到了1985年的13.63%。对此，我们并不感到惊讶。1996年，高家村有十人患上了血吸虫病。乡里的诊所给他们开了药叫他们自己回家服用，并且每个疗程花费了20多元钱。当地政府对瘟疫再现的危险早有预料。1994年，我就在江家村的墙上看到了一行大字标语，写着“再送瘟神”，这里套用的是1958年毛泽东写的那首诗《送瘟神》。

因为母亲逝世，1997年初我又去了一趟高家村。当时，那里有一位医生正在为村民们巡回检查血吸虫病。我的弟弟和姐姐都被诊断为患有血吸虫病。我催促他们尽早治疗。然而，他们的回答使我大吃一惊。他们想到波阳县医院再去检查一遍，因为他们不相信当地的医生。他们说，那个医生很有可能是故意把他们诊断为患有血吸虫病，好让他们到

他那儿去买药。不管我的姐姐和弟弟是的确患有这种病，还是医生故意错诊，这都意味着要么血吸虫病可能再次肆虐，或者医生确实是出于个人谋利的考虑而有意错诊。这两种情况都不是什么好的迹象。

1981年，“赤脚医生”合作医疗体系被废除。原来大队的三个医生都建立了各自的诊所。同时，村民们越来越不愿意去看病，因为他们每次去看病都要自己付钱，并且不知道看一次病要花多少钱。按照当地的生活水准，这三个医生都变得非常富裕。高时华在80年代又建了一栋房子，这次是用砖头建的，而不是用泥土。不幸的是，他在房子完工后不久就去世了，留下一个遗孀和三个孩子。江医生建了一栋有十个房间的混凝土房子，房子后院有个池塘，前院的大小如同一个汽车停车场，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单独的厨房。江医生是这个地区少数几个拥有摩托车的人。徐医生也建了一栋像城堡的房子，大厨房里还挖了一口井。这口井装有一个电动水泵，只要一按按钮，水就会自动出来。徐医生家是青林地区唯一采用电动水泵抽水的人家，这种方式比用压水机压水方便多了。他自己的土地出租给了别人，村民们还不断地把他们可以得到的东西送给他，作为对他的医疗服务的回报。他曾经吹嘘说，别人给了他太多的西瓜，多得让他的家人只好拿来喂猪。

同时，求菩萨保佑身体健康和求神问药，在这里再次变得流行起来。70年代后期，烧香拜佛差不多已经销声匿迹了。而现在，像中国许多的古老传统一样，人们又开始热衷于拜菩萨。离高家村一里远的寺庙重新修复了。1994年，当我去那参观时，有三个奇形怪状的塑像立于供桌上，塑像前面燃烧的香火发出的烟气袅袅上升。寺庙里有两个人，他们负责照看这个寺庙，并靠香客们的捐赠物为生。捐赠物可以是大米、面包、布料和钱。穷苦无助无望的村民节省下钱财，拿去庙里向菩萨还愿，就像我的母亲在60年代以前那样。这究竟是宗教还是迷信取决于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1995年，我带了两个同事拜访高家村，那个寺庙已被一场大火烧毁了。然而，塑像却没有被烧毁，他们被搁置在外供村

民们祭拜。我们参观那个地方时，被要求捐赠20元善款来重新修建那个寺庙。

在这个地区，我还发现有基督徒。对此，我也感到很惊讶。村民改而信奉基督教，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1949年以前，这里没有一位记录在案的基督教信仰者，1949年之后到80年代后期，也不可能有人在这个地区传教。在我上大学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基督教。现在据说在这个地区将近3,500的人口中，有50多名基督徒，他们大约一个月聚一次；在农闲季节，他们聚得更频繁。他们用汉语唱基督赞歌，并向基督耶稣祈祷。1992年，当我在他们经常聚会的地方——邻村汪家村的一所房子里拜访他们时，我看到在圣坛后面的墙上用大笔画书写着的中国汉字“爱”，每一个笔画都是由表示基督教教义的很小的一些汉字组成，包括“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只喜欢真理”，“不计算人的恶”，“不求自己的益处”，“不作害羞的事”。圣坛上摆放着两个热水瓶，一个大茶缸，两本中文版的《圣经》，还有一本基督教杂志《天风》，封面上画着圣母玛丽亚、圣婴基督和一群天使。

现在住在高家村的村民还没有一个是真的基督徒。我遇到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妇女，她在高家村出生，但现在住在江家村。我问她是如何成为一名基督徒的，她回答说，那些人很善良，他们在很多方面都互相帮助。在困难时期，比如生病和欠债的时候，他们会互相帮助，像到地里帮别人干活，互相借钱和其它的东西。至于他们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督教徒，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很显然，由于没有政府机构的支持，他们形成了一个合作团体来互相帮助。

我访问过一群自称是信仰基督教的教徒，发现他们是自发信仰基督教的，当地政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行干涉。那里没有任何意义上的教堂，村民们在他们自己家的房子里举行宗教集会。教会里没有教父或牧师，只有一个协调者，他叫汪彪贵，是我的一个熟人。在毛泽东时代，

他曾经在政治上表现得非常积极。我很想知道是不是有人从外面来到这里传播过基督教。汪彪贵说，并没有任何外在因素的介入，而是他在广东听说了基督教后，就产生了这个想法。

在离高家村大约60公里远的波阳县城，过去有一座由外国传教士建造起来的基督教堂，这个教堂是在1890年中国战败后用中国给外国列强的赔款建造的。传教士们在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胜利之前的40年代就离开了波阳县。在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教堂被用作了波阳县党校的办公和教学场所，来自全县的共产党官员都在这里学习共产主义理论。80年代以来，这栋楼就被荒废了，到处是碎玻璃和碎砖头。波阳县城里的人在精神上并没有像银宝湖乡的农民那样饥渴绝望，至少现在还不是这样。如果甘地说的“对于饥饿的人来说，上帝就是面包”是正确的，也许可以看到波阳县城教堂的复苏。

总的来说，1949年以来，农村医疗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由政府引进的医疗技术，如疫苗接种，大大地降低了高家村儿童的死亡率。卫生教育也帮助高家村人预防了许多以前困扰他们的常见病，政府的各种措施控制了致命的“血吸虫病”瘟疫。在毛泽东时期，医疗改善最显著的特征是，那些最贫困和社会地位最低下的人受到了政府的优待。然而，80年代以来的改革政策无视那些最没有地位的人。尽管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赤脚医生”体制似乎对高家村人来说还算运作得比较好。现在，这种体制已被抛弃了。缺乏有组织的医疗体系意味着那些看不起病的人往往求助于其它的方式，例如乞求菩萨的保佑。一小部分人决定选择信仰基督教，寻求教友之间的相互帮助。

注释

1 全世界都对这一医疗制度十分关注。专业的论述请参考Peter Lisowski, "The Emergency and Development of Barefoot Doctor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Society of Medical History*, no. 25 (1979): 339–392.

2　七律二首·送瘟神（1958年7月1日）

读6月3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千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神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3　Tony Smith, *The New Macmillan Guide to Family Health*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1989), p. 855.

第7章

农村教育

在毛泽东时代，教育是高家村村民受益较大的另一个领域。在1949年以前，高家村没有一个妇女可以算得上真正有文化。我的母亲高圆荣是唯一能够认得自己的名字和二十几个其它汉字的人。她儿时受过两年私塾教育，[1]嫁到高家村之后，原来学的大部分东西都忘记了。自1949年以来，高家村发生的一个变化是，村里接受教育的妇女的数量大大增加了。到1996年为止，在高家村有四十位妇女接受了三年或三年以上的教育。而在1949年前，仅有六个高家村村民能够读写，而且全部是男性。其中有两个来自地主家庭：高天翔和他的儿子高云飞。高天翔本人是个地主又是位私塾老师，高云飞拿到师专文凭之后成了一名小学教师。另外四个分别是：高仁允、高常余、高常财和高仁玉。他们几个的家境在村里算得上是中上水平。高常余后来在人民公社时期当选为高家村的一个生产小队的队长，并且任职了好几年。高仁玉和高常财分别是高家村两个生产小队的会计。只有高仁允没有担任任何职位，但不管怎样，他仍然是村里和家族事务中说话有分量的人之一。

除了高云飞，其他五人上的都是私塾。在私塾，学生只学儒家经典。授课安排在老师家里，学生不按班级分班，而是采取一对一授课的

方式。老师只教读书认字，不做任何解释，学生则大声朗读直到能背诵为止。接下来老师会教下一课，学生又开始大声朗读直到能背诵，就这样循环往复。学生学得越快，他/她要背诵的课文就越多。

早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城镇和部分农村地区就引入了西式的教学方法。1902年，波阳县开办了一所西式学校。1935年，波阳县政府决定取缔县里所有的私塾。然而，直到共产主义革命胜利以前，高家村的情况也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私塾根本没有开设如数学、化学、地理、音乐或绘画这样的科目，而且，甚至连使用算盘这样重要的技能也不教授，只有通过去商铺做学徒才能获得这项技能。

自1949年以来，高家村的教育可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50–1955年，在这期间，为村民和村干部开设了“扫盲班”。第二个时期是1956–1965年，高家村有史以来有了小学教育。第三个时期是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81年。最后，第四个时期从1981年到现在。在每一个时期，政府的政策对高家村的教育都有明显的影响。

1950–1955年

1952年，波阳县政府发起了一场识字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县政府为村民组织了两种“扫盲班”，一种称为“冬季班”，在12月和1月这两个月之间进行，这个时候正好没有农活可忙。另外一种班叫“夜校班”，这个班由县政府派下来的一位土改工作组成员负责。开设这些课的目的既是为了提高村民的识字水平，也是为了搞政治宣传。村民们先是从读写他们自己的名字开始，然后学习一些术语，比如：共产党、阶级斗争、地主、贫民。大体来讲，没有标准的教材，老师（无女性老师）常常是边教边编。起初，村民们还感到新鲜并有点学习热情，然而，一两节课下来，他们兴趣全无。他们看不出这些课程与他们的生活有什么相关的地方，而且也发现这些课很难学。上夜校时，大部分人

在上课几分钟后就睡着了，很多人还将此视为娱乐。妇女往往不会去上这种课，因为她们有家务要做，有孩子要照顾。工作小组经常挨家挨户催促人们去上课，但没有多大成效。

在高家村，大部分男人都只认识自己的名字，其中有三个较活跃好学的年青人——高常明、高常绕和高常银，他们还坚持学了一阵。高常明最后离开了高家村，在景德镇一家陶瓷厂当工人。高常绕后来在人民公社时期当选为生产小队队长。高常银走得更远，他最后成了大队书记，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才被打倒。

有趣的是，这三个人都来自贫农阶层。他们学习的动力是源自想改变社会地位还是受到生产小队的鼓舞，这不得而知。这三个人在打倒地主高天翔的阶级斗争中表现得最积极，也许这也不是巧合。高仁允是村里最善言辞的长辈，说话很有分量。1994年，他在一次我的采访中透露说，高天翔在1951年的土改中并没有被划为地主，他是在1953年的“重新划分阶级成分”中被划分为地主的。

这件事情的变化主要与高常明有关。1951年土改后，每家每户包括高天翔在内都按人头分到了土地。当时，高天翔免费借了一块地给高常明。后来，可能是在1953年，当高天翔向高常明要回那块地的时候，高常明不但拒绝而且还指控高天翔是“反攻倒算的阶级敌人”，意思是，他想在土地改革中要回已经充公了的土地。这事正好发生在1953年共产党发动的“重新划分阶级成分”运动之时，主要针对所谓的“反攻倒算”。领导运动的工作队队长相信了高常明的话，高天翔被贴上了“地主”的标签直到1978年去世。

为了训练那些对党忠诚，能够贯彻党的政策的当地村民，共产党当局挑选了少数人，为他们开设了专门的文化扫盲课。这些都是有能力学习的年轻的积极分子，高常银就是高家村的唯一代表。他是一个有抱负的年轻人，并且从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当贫农会成立时，我父亲当选为高家村的代表。他当选的原因有

两个：第一，当共产党掌权时，他非常穷（后面的章节中会提到这个故事）。第二，他与1949年一支共产党人民解放军路过高家村这件事有关。那时正值洪水泛滥成灾，部队蹚过小河向高家村以东迈进之时，一位士兵溺水了。因此部队停驻高家村并敲门求助。当时村里人都非常害怕，不敢开门，正是我的父亲第一个出来并说服其他的村民给士兵们提供帮助。

显然，士兵们把这事记录了下来，并且反馈给了土改工作组。因此，当家族长辈们竭力推荐父亲代表高家村去贫农会时，他一下子就被贫农协会接受了。而那段时期正是高常银表现得非常积极的日子，很明显他是有目的的。大约在半年之后，他叫我父亲回家，并告诉他再也不要去贫农会了，原因是：我父亲不识字，开会时也就不知怎么办。我父亲一声不吭地回到家，与其说是失望，还不如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此，高常银成了村里表现最积极的人。据高仁允说，因为高常银想保护自己，所以他变得越来越积极。据说高常银在1949年加入了九路军，这是一支由好几百人组成的拥护国民党的当地土匪队伍，后来这支部队在1950年被共产党铲除。因为没有证据证实高常银确实参加过九路军，他在阶级斗争中的积极表现使他提升很快。

由于高常银在土地改革中表现突出，他被选中参加专门为当地积极分子开设的扫盲课。这种课在波阳县开了好几个月，全部费用都由政府承担。高常银在195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最后提升为大队党支部书记。扫盲课的一个核心内容是灌输阶级斗争理念和学习共产党的历史，除此以外，还要学习如何维护公共和个人卫生，如何开收据等。

我现在还收藏着一本1950年印刷的课本，这本课本是当年一位积极分子使用过的，他后来成为大队会计。这本书总共有50页，包括43课。第一课是关于个人卫生的，学生应该勤洗手，勤剪指甲，保持脸部干净。第二课讲述细嚼慢咽的重要性。第三课讲如何预防痢疾。第四课讲消灭蚊子的必要性。第五课谈论太阳光的好处。接下来的这课讲的是

人民解放军的历史。随后两课讲中国人民如何与日本侵略者作战。还有几课是讲人们如何过上更好的生活。

1956–1966年

1952年，包括高家村在内的约有1,500人口的青林地区建立了第一所小学。刚开始只开设一年级，慢慢地，青林学校不断扩大，到1958年，已经是一所包含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小学了。我对学校的规模和学生的人数没有做过全面的统计，《大队台账》对1949–1971年间学校的事也无任何记载。

按照《波阳县志》，波阳县入学儿童的比例在1953、1958、1965、1979、1984和1985年的百分比分别是48.85%、80.6%、68.3%、84.13%、93.79%和94.8%。我无法核实这些数字是否可靠，甚至可以说这些数字可能不是非常准确。但不管怎样，这些数据显示出的总趋势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值得肯定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孩子上学率显著上升了；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这段时间里，比例再次提高。

尽管当前的中国当局宣称，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的激进政策导致了巨大的灾难，但颇有意义的是，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孩子的上学比例大大提高了。从1953年的48.8%到1958年大跃进的80.6%；后来比例再次上升，由1965年即文化大革命前一年的68.3%上升到1979年的84.13%，而1979年正好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宣布结束的三年之后。这些数据揭示了在60年代早期，当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政策——被毛泽东和他的激进追随者谴责为代表着“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在中国的教育领域占支配地位时，农村孩子的上学率由1958年的80.6%下跌到1965年68.3%。高家村的情况似乎和这些数据反映出的总趋势相吻合。

从1956年到1959年，25个来自高家村的孩子进了青林小学，其中只有3个女孩。到1962年，25个孩子中已有15个辍学，只有10人完成了六年的小学教育，而我姐姐是其中仅有的一位女孩。到1965年，只有3个孩子继续上中学，1个读高中，2个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进了初中。念高中的那个孩子现在在江西省的省会城市——南昌当技术员；上过初中的一位孩子现在在青林小学教书；我是另外一个念过初中的人。在1959–1965年期间，只有9个孩子上过学，其中只1个是女孩。3个完成了小学六年教育，其中2个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念完了高中。

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60年代早期与50年代相比，有更少的孩子上学。原因之一是，学龄儿童更少。1956年，当青林小学扩建后，对于那些以前没有机会上学的孩子来说，现在是他们第一次萌生想去读书的念头的时候。这一年也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做事最自信，对前途最乐观的一年，甚至那些已过上学年龄的人也纷纷进校读书。有两个高家村的村民上四年级时都已经16岁了。到60年代早期，由于前几年的大量扩招，上学儿童的数量减少了。

原因之二，在60年代，中国的教育体系渐趋于正规化，并制定了规范的全国考试体系，国家也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措施给社会地位处于劣势的农民以适当的照顾。对大多数农村孩子来说，要应付学习已经是够难的了，更不用说通过严格的考试。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必须帮助家里干农活，比如：捡柴火、抓鱼、父母在地里干活时照看弟妹、采摘野菜喂猪等。做作业时，他们没有灯光，甚至连桌子也没有。总之，他们的父母对他们的家庭作业一点也帮不上忙。他们开始讨厌上学，他们的父母也认为没有必要再送他们去上学。

原因之三，在大跃进之后的头两年，生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困难，而是非同寻常的困难。在1959年的最困难时期，村民们都快饿死了，他们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更何况去上学。

即使是学校的日常作息制度对孩子们来说也是让人气馁的。一直到

1970年，高家村还没有一所学校，离村最近的一所学校是一公里远的青林小学。学校7点开门。孩子们必须在早饭前赶到教室读半个小时的语文，这称之为“早读”，很明显，这是私塾教学残余下来的方法。早餐过后，上午从8:30开始上课，一直上到12:30。午饭过后，从2:30开始上课，直到6:30才结束。因此，孩子们一天得往返学校六次。设想一下，一个七岁的孩子，夏天必须顶着炎炎烈日，冬天冒着刺骨寒风，一天要走六公里的路。大多数家庭连一双胶鞋都买不起，一些孩子只得一年到头光着脚丫。如果孩子的学习成绩不好，我们应该能理解父母不情愿送女孩子上学的原因了。

然而，村民们还是喜欢让他们的孩子受点教育，他们对那些会读书识字的人既尊敬又羡慕。我的父母就是那种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送孩子上学的人。我的姐姐是60年代之前，村里完成六年小学教育的唯一女孩。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期，我的父母还坚持送我和姐姐去上学。我们家总是欠债，每年都亏欠生产小队。每次我的父母去领生产小队分发的粮食的时候，那些进钱户都会理所当然地在语言上或表情上流露出我们欠他们债的意思。但我的父母还是坚持他们的做法，继续送我们去念书。尽管我的母亲裹了脚，但她还是下地干活。1964年，我的父亲在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还是要我继续读书。尽管条件更好了，但还有很多人要省吃俭用才能送他们的孩子上学。截止到70年代，高家村只有一名大学毕业生，四名高中毕业生和七名初中毕业生。

1966–1981年

1966年，当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发动时，中国的农村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到那年，高家村已有三个中学生，高朝江和我寄宿在离高家村6公里远的油墩街中学，高朝栋是高中生，他寄宿在60公里远的波阳县第一中学。高朝栋是大队党支书高常银的儿子，他是高家村仅有的一

名高中生。油墩街中学是那个时候人口多达80,000个的油墩街地区的唯一一所中学。这所学校始建于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当时只开设2个班级，到1966年我在那读书的时候，学校已扩大为9个班，有30名教师，招收了大约450个学生。这所学校没有开设高中班，因此，任何想念高中的学生都必须设法考取县城的高中。

当然，高朝栋是全村人的骄傲，村里人很难见到他，因为他一年最多回两趟家。他穿着异样的衣服，说着不同的话。他学会了说被村里人认为是官话的普通话。村里人不再认为高朝栋是属于高家村的人了，因为他们听不懂他说的话。高家村人说的是中国九大主要方言之一的赣方言的一种变体。每当有人对他们讲普通话时，他们都认为是“打官腔”。我在阔别多年后回到高家村时，还能用家乡话和村里人交谈，他们都感到很惊讶。

在60年代后期，当高朝栋被村里人看成是遥不可及的特权人物时，我却还是个卑微的乡巴佬。每到星期六，我都必须走路回家，而到星期日的时候又得扛着一个星期的粮食、柴火走回学校。油墩街中学是一所有着严谨教学计划和出色师资力量的学校。在那里，我才开始了解一些代数、几何、生物、化学、物理的知识，并且学会了简单的英语。然而，这种严谨而富有启发式的教学只持续了一年。到1966年的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影响到农村。学校被迫停课，学生被鼓动去造反，去“批斗”他们的老师。从那时起，一直到1968年我从油墩街中学毕业，都没正式上课。之后，我回家成了一个普通农民。

在中国，现在流行一种说法：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摧毁了中国教育体系的“十年动乱”。像对待其它的概括性说法一样，我们必须谨慎对待中国政府对于文化大革命一贯坚持的说法。首先，文化大革命不是一件独立的长达十年的事件。在这十年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有些事是具有毁灭性的，而有些事是富有建设性的。中国的高等教育受到了最强烈的冲击，大学停课到1971年才开始重新招收学生。研究生教育完全中

断，直到1978年才重新开始。除此之外，中国在1971年以前也完全停止了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

然而，在小学和中学，尤其是小学教育，受到的冲击并不是很严重。确实，课程中断了一段时间，在一些情况下，中断了长达两到三年。有些老师受到不公正的迫害和不明不白的冤屈，在某些时候，他们还受到来自学生的可怕的暴力攻击，这些都是可悲的事实。就我来说，学习的突然中断也是一次痛苦的经历。我当然希望继续念高中，但由于文化大革命，我的希望破灭了。

然而，这些令人不愉快的事实不应该使我们无视文化大革命对中小学教育的建设性作用，至少对于农村居民来说是这样。事实上，早在1967年，在发生首次大动乱的半年之后，中国政府号召所有小学的学生“复课闹革命”，尽管事实上，一些农村学校直到1969年才恢复正常教学。青林小学实际上一直都没有关闭。从1967年到1968年，学校一直开设了课程。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教授的课程是：毛主席语录、数学、语文和其他的自然学科。然而，对于五、六年级的学生，则只教毛主席语录和他的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被称为“老三篇”，它们分别是：《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和《纪念白求恩》。[2]

短暂的中断后，中国农村的中小学教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大大地扩大了。从1969–1971年，激进政策鼓励公社建立高中，大队建立初中。而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许多公社根本没有中学，村里的孩子如果想继续读书，就必须寄宿在离家很远的中学。由于路途遥远和寄宿费用的原因，很多孩子根本不能上中学。

一些统计数据将会表明，文化大革命是如何对农村居民的教育起建设性作用的。1955年，波阳县只有两所中学；1956年，有三所；1957年，五所；1958年，又增加了三所；1962年，中学的数量增到了16所；到1966年，在波阳县城已有18所中学，大部分位于波阳县城和像油墩街一样的中心地带。在大约70,000人口中，就有6,500个中学生。

自1949年以来的27年中，中学的数量从2所增至18所，每年平均增加1.38所。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的激进政策下，从1969到1979年这10年间，波阳县的高中增至41所，初中增至265所，平均每年增加3.06所。即使我们把动乱的1967年和1968年考虑进去，波阳县中学的每年增长量仍为2.5所。到1979年，中学生的数量达到了29,238人，是1966年学生数量的4.48倍。

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政府、精英知识分子和学者针对在中国农村大搞教育而提出的指责之一是：农村教育的扩展是以降低教育标准为代价的。1980年，以提高教育标准为名，波阳县的高中数量由1979年的41所减至11所，初中的数量从256所减至52所。合格的老师从农村被调往波阳县城少数几所学校。对于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来说，这种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农村大搞教育的谴责和随后的政策反拨，很难说是合理的。

在60年代早期和80年代以来的这段时间里，教育资源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几所学校，而以加强教学管理和提高教学质量为名，这些学校大多位于中国城镇。其教学内容和方法都是专门为城镇居民而设计的，事实上，这些都是对苏联模式的照搬。确切说来，在教育领域中采取的文化革命政策，其目的是为了阻止这样的倾向。对于高家村人来说，60年代所谓的“提高教学质量政策”除了通过升学离开高家村的大队支书的儿子高朝栋有所受益外，对村民们并没有多大意义。对村民们来说，文化革命中实行的给孩子们开设读写技能课、基础自然科学课和基本计算技能课则显得更为重要，更有相关性。

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追求教育改革目标，使得贫困者有更多的机会接受教育，课本变得更实用和更不注重理论。小学教育的年限从六年缩短到了五年，中学由六年减到四年。为了使老师满足学校扩大的需要，在1969年之后同时采取了两项措施：第一，大量合格的老师被调往乡下学校教书；第二，受过教育的当地村民被招募为“赤脚老师”。之所以称作“赤脚老师”，其道理和“赤脚医生”一样，因为这类老

师并没有接受过从业的正规教育，国家政府也不发给他们定期工资。相反，在农忙季节，他们也应该像当地村民一样下地干活，像当地村民一样“光着脚丫”生活。

中小学教育

1969年，正是在这种激进改革的氛围中，一所涵盖了一年级到三年级的小学在高家村应运而生，我被任命为该所学校唯一的老师，即一名“赤脚老师”。我必须同时教三个年级。当我在给三年级的学生上课时，我会叫一、二年级的学生做练习。当其它两个年级的学生在做练习时，我会去给二年级的学生上课。所授科目有：书法、语文、算术、音乐、艺术、体育和农业技能。每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早餐前都有“晨读”，在这段时间里，我会坐在教室里监督学生。自从私塾以来，学校语文教育就把重点放在大声朗读记课文上。

早餐过后的第一节课是书法课。中国人不仅把书法看成是一种艺术形式，而且看成是衡量教育成果的主要标准之一。如果一个人写得一手好字，那么他就会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共产党官员喜欢练习书法，因为他们想显示他们有学问和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此，除了星期日以外，学生每天都必须练习半个小时的书法。在监督学生的时候，我自己也会练习。每周有三节体育课，总课时45分钟，农业技能课则有一小时。除此之外，每周还有一节音乐课，一节美术课。剩余的时间就全花在语文和算术上了。

当然，孩子们很喜欢上体育课，然而体育设施几乎没有。体育用品只有乒乓球和篮球，但是没有乒乓球桌，更不用说篮球场了。孩子们只得借助于他们的课桌用来打乒乓球。大部分时间，他们只是到处跑跑。我还得教他们一些自由活动项目和一些准军事操练，例如：站队、向左转、向右转。父母对体育课不太在乎，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从他们的

立场看，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的力气主要用于干农活，因此，他们认为任何非生产性劳动的体力活动都是在浪费精力。对于农业技能课，他们更不在乎，因为没有人需要从我这里学技能。然而，这是一门必修课程，这门课程对于那些没有机会看到植物是如何生长的城市孩子来说，也许是值得花时间学的。这表明，一直以来，中国政府千篇一律的政策是多么的古板：一些地方适用就强制推广到全国。

作为一名“赤脚老师”，我像其他高家村村民一样，可以领到生产小队分配的任何东西，而且我的工作量也以工分的形式记录了下来。在农活最艰苦繁忙的季节，我像其他村民一样也要在地里干活。这样一来，村民在教师身上的开销就很小。但是，他们必须花钱买课本和文具，如铅笔、练习本、毛笔和墨水。由于政府的政策，课本的费用非常低，一般是两角到五角钱一本。总的来说，一位学生每年在课本和文具上的平均花费是3到5元。尽管如此，这么低的费用对有些家庭来说还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当我在高家村教书的时候，村里所有的男孩和大多数学龄女孩都上了学。这是史无前例的，假如在高家村没有建学校的话，这也是不可能的。

从1969到1972年，我教过36个高家村的孩子，其中有21个男孩，15个女孩。在这36个孩子当中，有21个完成了三年的学校教育，但只有3个是女孩。那个时候，只有4个学龄女孩没有上过学。在这4个当中，就有3人是高家村仅有的两名共产党员——高常银和高常绕的女儿。高常银以前是大队党支书，但到1969年却丢了职位。高常绕那个时候是两个生产小队的队长之一。

尽管是在毛泽东时代最激进时期，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女性还是受到了明显的歧视。尽管按照中国城市和乡镇的标准来说，3到5元钱根本算不了什么，但费用仍然是制约农村孩子上学的一个因素。我们必须记住，对于农民来讲，一角钱有着很重要的价值，而城镇居民却根本不会在意。第二，需要干家务活时，女孩是第一个受累的人。要求孩子干

的家务活有：大人在地里干活时，照顾弟妹；母亲做饭时，往炉灶里添柴；采摘野菜喂猪；为家人纺纱。在这些家务活中，有些活是一直以来由女性做的，例如纺纱，但其它的不是。

女性受到歧视的根本原因是：她们在家里没那么受到重视(尽管她们的父母都爱她们)。因为没有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障，老人就必须依靠家人来照顾，女孩被认为不受重视是因为她们必须嫁出去，那么，为了养老就必须在他们的儿子身上进行保险投资。在中国的传统中，个人本身并不受重视。这种传统并没有因为1949年的革命而消失。个人的价值是以作为家庭的一部分来衡量的。最能象征性和实质性地表明这种集体主义家庭观的是生产小队的帐本：贡献与所得都不是记录在个人的名下，而是总地记录在单个“家庭户主”名下，户主通常是家庭里的一名男性。

尽管存在性别歧视，但在那几年里，上学孩子的数量增长很快。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学校的开办使得更多的孩子有机会上学，并且办学校没有花政府一分钱。在这个(青林)地区，1949年的人口是1,637人，1958年的人口为2,229人，1952年以前没有一所现代化学校。1969年这个地区的人口已达到3,048人，从1952年到1969年，仅有一所六年制的学校。到1972年，那里建立了十所村办学校，有3,160名一年级至三年级的学生。

尽管没有任何统计数字可用来对1958–1969间入学孩子的数量和之后几年里入学孩子的数量进行比较，但是，在青林地区，赤脚老师的数量由1968年的0个增加到1972年的23个，1978年的24个。这些数字清楚地表明了：自从1969年以来，上学孩子的数量显著地增加了。到1972年，这个地区的小学有378名学生，中学有71名。到1978年，当青林地区的人口达到3,610人时，中学生增加到153名，小学生增加到了600名。

到1972年，每个村庄都有一所从一年级到三年级的学校。在村里

读完三年级以后，孩子们必须去青林小学读四、五年级才能完成小学教育。1972年，由于小学教育的大力推广，青林小学也扩建为一所带有中学教育的学校，开设了初中一、二年级的课程。因为无法指望从政府那获得资金，学校只好招募“赤脚老师”。我被青林大队聘用为一名“赤脚老师”，在青林学校教初中。我在高家村的位置由一名只接受过三年教育的女“赤脚老师”顶替。就我个人而言，我也只接受过一年中学教育。我被指定教一些我自己也没学过的科目。每次走进教室去给学生（有些学生的年龄比我还大）上课前，我都必须认真学习这门课程。这种情况可能是后毛泽东时代的一些权威人士和中国知识分子精英谴责文化大革命政策降低了教学质量的原因之一。在1980年，由于诸如此类的谴责，青林学校的中学教育被迫停办。

教学质量问题不是在这里可以讨论的。然而，对于村民来讲，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策似乎和他们更相关，也更实际。不管怎样，对于高家村的村民，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接受最基础的教育。在大多数人没有机会接受最初级教育的情况下，还谈论什么教学质量问题？文化大革命时期实施的政策确实增加了上学机会，因此，有更多的人接受了教育。文化大革命前的18年时间里，在高家村只有一名高中毕业生，两名初中毕业生。相比之下，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时间里有了四名高中毕业生、八名初中毕业生、一名大专生和一名本科生。

高等教育和我自己的实例

就高等教育而言，政府如不采取些积极措施来帮助处于劣势的农村居民，农村孩子要和来自城镇的孩子竞争则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和那些来自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和党员干部阶层的孩子竞争了。来自城镇的孩子除了享有更好的教学设施和更好的学习资源外，他们的父母还有能力辅导他们的家庭作业，因为一般而言，他们的父母比农村孩子的父母文

化程度要更高。城里孩子的父母供得起孩子教育所需的大部分东西，比如：书、阅读材料、野外旅行、音乐补习班和艺术补习班，这些都是大多数农村孩子闻所未闻的。

并不是说农村人没有尝试过，一些人也努力了，但都没有成功。我的二弟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非常幸运，在80年代就进了中学读书，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好能够供得起他读书。他参加过四次高考，但每次都以四分之差名落孙山。每次失败后，我们家人都鼓励他去复读。按照农村的生活水准，连续三次复读高三，要花的费用是很高的，如果没有外界的帮助，很少有村民能够承担得起这笔费用。此外，我还必须通过走“后门”，比如说，靠人际关系，安排我弟弟复读和不断地参加高考。我自己也给弟弟补习过功课。在一般情况下，任何一个村民都不可能办到这一切。尽管我的弟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他还是没有通过高考。

当然，所有这一切可能仅仅意味着我的弟弟不够聪明。然而，他当然不像中国精英分子所认为的那样，所有农村人都是愚蠢的。自从我弟弟放弃高考以来，他一直都很成功。在80年代后期，作为打工者，他去了厦门。到1995年，他已是厦门一家厨具厂中一名香港老板的经理助理了，同时还兼任车间总监和工会主席。可以说他并不是个没有希望的人。

中国的知识精英总是认为农村人和农民生性愚钝。正如胡素珊（Suzanne Pepper）评论的那样，对于中国知识精英来说，那些“说话特别迟钝的人并不是身心有缺陷的人，而是‘典型的农民’”，他们说“农民干起活来就像牛一样”，而这种说法基于这样的看法，“农民天生就是干活的，他们必得接受这样的命”。[3]畅销书《野天鹅》的作者张戎在她严厉斥责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所有政策时，也同样持这种高人一等的态度。

不管怎样，多亏了农村激进政策，在1973年，青林地区才有了两个大学生。其中一个来自徐家村，另一个就是我，来自高家村。来自徐

家村的徐先期进入了上海交通大学，他后来成了一名铁路工程师。我进了厦门大学学英语。上海交通大学和厦门大学与江西省的地区性大学相比，都是国内知名度很高的大学。在1973年以前，青林地区只有两名大学生，他们都毕业于江西的地方性大学。

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可能已经在油墩街中学完成了正规的初中三年教育。因为是学校里成绩比较好的学生，我很有可能通过县城的初中升高中的入学考试，再加上得到我那位嫁到县城并且定居在县城的姐姐的支持，我甚至有可能顺利完成三年高中教育。然而，要通过激烈的全国高考进入大学的可能性却微乎其微。

像我这样一个甚至连初中都没读完的农民却能进厦门大学，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全国统一高考被废除了。在我上大学的1973年，地区教育局采取了考试的形式来筛选申请人。江西省出了两套试卷，一套涉及到写一篇文章，另一套测试数学能力。事实上，一些省份的考试试题特别难，就拿辽宁省来说，考试试卷还引发了一场政治事件。[4]我不知道我在考试中到底发挥得怎样，很可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不管怎样，我的试卷成绩并不说明我是完全没有希望了，就考试分数而言，我的分数已经足够了。

第二，政审更加重要。按照当时的意识形态，选拔学生的政策是：候选人只能由普通群众推荐，就我们那里的情况而言，就只能由村民来推荐了。然而，事实上，只有那些当地的掌权者才能决定谁才可以成为候选人。因此，该推荐谁为候选人成为当地政治上激烈争论的问题。候选人得有个好的家庭背景，这样一来，就排除了来自地主、富农，甚至是中农家庭背景的人。候选人还必须有认可的文化水平，比如说，中学教育水平。最后，候选人还得有极好的政治表现记录。这个标准包括了：在每场政治运动中，政治立场正确；没有过小偷小摸行为和没有牵扯到性丑闻（比如，婚前性行为）。

我有着贫农背景，并且在当地享有“文化水平最高”的好名声，因

为那时我已经在教初中生。除了政治记录外，我几乎是完美的。1971年，我被指控企图保留具有封建性质的高家村家谱。关于这个问题，我会在第九章中讨论。尽管如此，我还是被推荐为三名候选人之一去参加选拔考试，我这个政治错误并没有被提起。

要理解这一点，还必须讨论一下录取政策和当地错综复杂的政治。首先，候选人的数量取决于上级给定的名额。在教育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国家教育部根据中国所有大学的招生计划决定要招收多少学生。然后将总的招生指标分配到不同的省、市。每个省将招生指标依次分配给不同的县。接着每个县又将名额分配给不同的公社。1973年，分配给我所在的银宝湖公社的名额只有0.46个。换句话说，从银宝湖公社录取的学生还不到一个。

同时，国家也规定了不同大学的招生人数。比方说，如果厦门大学可以招收4,000名学生，这要由北京当局指定，并规定厦门大学在学校所在地——福建省和其他各省份的招生指标。按照这个名额，厦门大学会派一名工作人员到这些不同的省份去挑选候选人。像北京大学这样一流的大学有优先挑选权，然后轮到二流大学，依此类推。显然，大学的工作人员不可能到所有公社去挑选候选人，而是由每个公社推荐候选人给县政府，县政府有责任向大学录取工作人员提供被推荐候选人的名字和档案。

在整个推荐和挑选的过程中，每一阶层的官僚都有权力影响最后的结果。中央和省里有权来分配这个名额，大学录取工作人员则有权力从推荐的候选人中进行挑选，县政府甚至有更大的权力，因为它不仅可以决定给哪个公社多少名额，而且有权力决定向哪些大学提供哪些候选人的名字和档案。同时，在公社这一级，因为一个公社包含了很多村，干部必须确保某种程度的平衡。为了保证某种平衡，银宝湖公社向县政府推荐了三名候选人。一旦其中一个人被某所大学录取，另外两个就落选了，因为名额还不到一个。

在挑选三个候选人的过程中，公社决定让公社委员会的教育部门全权负责此事。因为农村学校规模的扩大，公社里大部分有才华的年轻人都成了学校的老师，从这些青年老师中挑选候选人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凑巧的是，公社教育部门的负责人正好来自附近的大高家村，而大高家村和我们高家村是同宗同祖的。这个人的名字又碰巧是高常艳，他很可能会被误认为是我的兄弟，因为他名字中的头两个字和我的是一模一样的(我的原名叫“高常范”)。村里取名一般采取这样的模式：出生在村里的每个人都同姓，同一辈的男性姓名中第二个字相同，只有第三个字才属于个人。

假如高常艳不是教育部门的领导，和我一起在青林学校教书的两位老师很可能会反对选我为候选人。他们都认为我和高常艳关系特殊，因此不敢去冒犯他们的上级领导。无巧不成书，那时公社的党支部书记是外乡人，但他恰好和高常艳关系不错。因为高常艳竭力推荐我，所有大队和公社干部都认为，如果反对推荐我，他们不仅会得罪公社教育部门的领导，而且会触怒在公社拥有最高权力的党支部书记。因此，他们都赞成了此事。

但这仅仅是开始。考试结束后，必须通过体检这一难关。在从油墩街前往大约30公里外的田畈街体检前，我把我的担心告诉了高常艳。因为慢性中耳炎的长期感染，我的右耳已经受损了，听力很差，我肯定通不过听力测试。高常艳吩咐那位带我们三个候选人去体检的工作人员，在这一点上要特别关照我。然而，他也无能为力。在去田畈街的整个路途中和体检前的整个晚上，我都非常担心和焦虑，不知所措。

第二天早上，体检准时开始了。除了把耳鼻喉部分留到最后外，我完成了所有的体检项目。这时候，我看到一个我以前的同学也在那里。他也来自油墩街学校，因为体格健壮的原因，他的绰号叫“黄牛”。我有了一个主意。我说服他同意在耳鼻喉体检中代替我。我大松了口气，我(他)顺利通过了耳鼻喉科的体检。

然而，我的苦难历程还没有到此结束。一切测试都结束后，我们还得一直等消息。那时候有人告诉我，徐先期已被上海交通大学录取了，我和另外一个人都落选了。对于徐先期被录取，没有一个人感到惊讶。因为他是我们三个人当中最有资格被录取的人。他是一名共产党员，而我们都不是；他服了三年兵役，被认为是个政治标兵；他还是大队委员会的成员。此外，他长得英俊又很体面(在档案中有每个候选人的照片)。我只得放弃，并不再抱什么希望。然而，就在新学期开始的前一个月，我收到了厦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说我被录取到厦门大学学习英语。这真好比平地一声惊雷，我惊呆了。我可从来没有想过要学英语，我连正确拼读英文字母也还成问题呢！

我一直都没弄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厦门大学录取。有人传言说，那位去波阳县选拔候选人的厦门大学老师对我的资料很感兴趣。但我却不能够证实这件事，因为据说那位负责老师在我到达厦门大学后不久就去香港了。然而，在1992年，当高常艳想要我帮他那年即将毕业的女儿找份更好的工作时，他告诉我说，我之所以能够进厦门大学，完全是得益于他的帮助。

听说我落选后，高常艳打了电话给一位姓黄的同志，他是波阳县负责向各个大学提供候选学生名字和档案的一位关键人物，高常艳叫他尽可能推荐我。高常艳告诉我说，这位姓黄的负责人正好是和他关系要好的师专同学。当黄向高常艳问起我是不是他的嫡亲兄弟时，高常艳回避了这个问题，他告诉黄，这个人究竟是不是他的兄弟并没有关系，他只要照做就行了。黄答应了，因此我进了厦门大学，成了一名英语系的学生。

然而，我却没能够替高常艳的女儿找到份更好的工作。像许多高家村的村民一样，高常艳高估了当代中国学者的影响力。再说，我已经不再住在中国了，我能够做的事情非常有限。我敬重高常艳的为人，对他曾给予我的帮助不胜感激，不管我进厦大这件事情是不是完全归功于

他。高家村人在这一点上也给了我压力，他们认为我应当感谢高常艳。我每次回中国都会给他带一点礼物，我自己当然明白我欠了他的人情。通过详细地叙述我怎样进大学这件事情，我的主要目的是想详尽地说明当地领导、社会习俗和政府的政策在当地政治中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后毛泽东时期

简要回顾一下当时全国范围内总的情况可以为了解高家村所在地区提供一个好的背景。1965年，中国所有在校中学生人数是1,440万，1977学年到1978学年，中学生总数为6,890万，另外还有100万技校生。1979年以来，后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当局开始废除文化大革命中的政策，中学生的总数开始下降。仅1980年的一年时间，总数就下降了将近1,400万。在这一年期间，中国就有23,700所中学关闭。[5]后毛泽东时期中国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再次引述胡素珊的话：

>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教育重点是倾向于扩大中学的教育规模，而其后教育政策调整的理由是，当时只有非常有限的学生才能上大学，似乎上大学才是教育的主要目的。此外，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学教育的快速发展据说已经"使得财政资源分布非常稀薄，并且加剧了合格的老师的匮乏"。[6]

然而，"赤脚老师"制度并没有花费国家政府太多财力。就拿青林地区来说，将青林小学扩建为带有初中部的学校并没有花费政府任何额外的资金，因为全部费用都由大队承担，而大队的经济收入来源于村民。能够证实后毛泽东时期中国政府的说法的唯一证据是：一些合格的老师由城市派往城镇或乡村地区中心教书。例如，当油墩街中学扩大为带有高中部时，从波阳县城派下了大量老师，到那里教书。当后毛泽东时期中国政府原先的政策被废除时，那些老师又重新回到县城去了。换

句话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城里的一些合格老师被下放到了乡村。

然而，青林学校扩建后，却并没有一位城里的老师派下来。因此，青林学校初中部的关闭丝毫不涉及财政上的原因，大量农村中学的关闭是受到一种意识形态策略的驱使，其目的是为少数人重新创造特权，并继续使农村居民处于社会底层。“目前，他们是如此坚决地奉行这项政策，以至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缓和这种教育不公平，甚至于毫不掩饰地为知识分子的孩子重新创造接受更好教育的机会。”[7]

在90年代以前的整个历史中，高家村仅有六个高中毕业生，其中有一个毕业于文化大革命前，三个毕业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两个毕业于文化大革命之后。而在1994年，全村只有一个学生就读于高中。到目前为止，高家村只有一个技校生和一个本科生，并且这两人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毕业的。在1996年1月，高家村有四个初中生，没有一个高中生。一些孩子不能通过小学升初中的考试，而有些孩子仅仅是因为付不起学费就辍学了。

举个例子来说，乡村教师高朝真的两个儿子就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没能够继续读初中。高朝真的妻子必须到景德镇的一家市医院做胆结石手术，一家人只得省吃俭用，来偿还由于医疗费而欠下的债务，而两个儿子也只有放弃他们的学业。十四岁的小儿子去了福建，另外那个十六岁的大儿子则去了广东打工。

一些孩子放弃读书是因为他们每个星期天得走七公里路到银宝湖乡的唯一一所中学寄宿。银宝湖中学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大队建立起来的，后来唯一没有被关闭的学校。主要原因是这所学校坐落在金家村，即以前的公社行政所在地，也就是现在的乡政府所在地。高家村的孩子现在也像我以前一样，每到星期六就走路回家，每到星期日身上扛着一个星期的食物又返回学校。除了距离和寄宿费用问题，高家村的孩子还面临着其他一些我在60年代后期甚至都不用考虑的问题。

随着公社制度的瓦解，已经松散的村民越来越不服从于政府的政

策。表明国家政权削弱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对于维修灌溉设施之事，村民们几乎不参与合作。大量的灌溉设施，像在60年代和70年代时期使用过的，现在几乎都不能再用了，残存下来的几个也已年久失修。每个村庄都各管各的。80年代早期以来重新抬头的宗族势力以更为强大的力量开始影响当地政治，村与村之间的世仇时不时引发冲突。对此，政府却无能为力。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金家村和一个比它小得多的邻村之间的世仇。金家村有1,000户人家，是银宝湖乡最大的村庄。1991年，金家与其相邻的小村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武斗，动用了当地制作的土炮和铳，相邻小村有十七人被金家村村民杀害了。当县领导和警察赶来调查此事时，因为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实情，这次调查竟无功而返。一个来自金家村的瘸子自称他是此次争斗的唯一发动者和组织者，他愿意为死去的十七个人负全部责任。令人惊讶的是，县领导和警察除了接受这个说法外竟然毫无它法。这个瘸子被带走关进了监狱，此事也就被认为了结了。包括县领导和警察在内的每个人都明白，这个瘸子站出来并要求承担责任其实是由金家村的宗族安排的。作为对这位瘸子的回报是：他在监狱里待多久，金家村的村民就要照顾他的家人多久。在很大程度上，乡政府被金家村的村民控制了，因此，对发生在管辖区域内的械斗假装不知道。在两村争斗达到顶峰时，金家村到处都安排了人站岗，任何想经过金家村的外人，就算在公路上都要受到询问和搜查。

银宝湖乡地形呈长方形状，在它的最南部有金家村和一些其它小村庄，最北端有高家村、徐家村、江家村和其它一些小村庄，其中部也有一些小村庄。公社时期，公社政府之所以设在金家村，除了因为这个村庄最大之外，没有任何其它的原因。假如没有金家村的支持，当地政府也不可能运转自如。公社制度被瓦解后，当地政府更名为乡，出于同样的原因，乡政府也必须设在金家村。主要的不同是，在公社时期，最重要的公社干部由县政府任命，他们通常是来自外地的共产党干部；而

在后毛泽东时期，乡政府干部由当地选举，这样一来，乡政府主要被金家村的村民控制了。因此，在公社时期国家政府过去常用的权利平衡和制约在后毛泽东时代已不复存在。结果是，政府几乎对地方政治失去了控制。

出于同样的原因，银宝湖乡唯一一所中学也必须建在金家村。来自其它村庄的孩子如果想继续上学，就必须到金家村寄宿。为了吓跑那些来自银宝湖乡北部村庄的孩子，以便他们独自享用这所政府资助的中学，金家村的村民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进行骚扰。这些手段包括对女学生的性骚扰和明目张胆的抢劫。金家村的孩子则通过嘲弄和打骂的手段公开欺负来自北部村庄的孩子。来自江家村的一位女孩曾被一伙金家村村民抓住，村民们对她进行百般凌辱。时不时的就有一群金家村的村民包围教室，并开始吆喝："某某滚出来！操你妈的蛋！"最近这事变得更加严重，以至来自北部村庄的孩子晚上都不敢出门。这些事情也许不一定是由金家村的宗族组织所为，但所有这些事却都是针对北部村庄的孩子，老师也不敢干涉。曾经有一位老师试图与金家村的村民理论，结果，他被狠狠地揍了一顿，并被告知如果他再敢干涉的话，他们会杀了他。

1994年我回高家村时，来自北部村庄的村民、村委会干部和一些教职工向我详细讲述了这种恐怖的情形，他们想自己花钱在北边建一所独立的中学来结束这样的事情。然而要建一所学校谈何容易。以前那所用来充当中学部的学校已经被拆除了，加之又没有老师。没有政府支持而共同筹资在当地雇佣有才学的人，像毛泽东时期的"赤脚老师"（当然现在也找不到这样的老师），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并且不管怎样，村委会和村民之间还存在着很深的敌意，以至任何试图筹资的举动都被认为是腐败的村委会干部想靠此发财致富。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将会看到，鉴于一贯的情形，村民们对村干部所表示出的怀疑也是非常符合逻辑的。1994年当我再回高家村时，这些老师、村委会干部和村民都来向我

求助，他们认为我是海外华人，我只需当场从我口袋里掏出10,000美元用来捐赠就行了。在他们的世界观里，所有的海外华人都是富有的。

后毛泽东时代所带来的政策对小学教育也有影响。1969年在高家村建立的学校并没有被关闭，它仍然保留了一年级和二年级。不过，跟文化大革命时期不同的是，三年级学生必须到青林学校去上学，高家村原来的校舍已经被拆掉分了。1981年公社制度瓦解之前，所有的农具和财产都归属于两个生产小队，但随着公社制度的瓦解，这些东西都分家到户了，因此校舍也被拆掉了。从那以后，任何想从事教书这一行业的老师都必须在他(她)自己的家里教，就像传统的私塾老师一样。高朝江教了头几年，他是我在油墩街学校时的校友，并且是高家村60年代后期的两个初中生之一。然后，高朝真接了他的位置，他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位高中毕业生。于是，高朝真家里的正厅就被当成了教室，其中有十二张凳子，两张更高点的长凳子被当作桌子。桌子前面是一块黑板，就是我当老师的时候用过的那一块。“教室”的后面是老师家的厨房，右手边有个用竹子做的隔板隔开的房间，那是老师和师母的卧室。因为高朝真的两个儿子都离家到沿海城市打工去了，所以这样的安排并不是显得很混乱拥挤。

在90年代，高朝真每月大约可以赚到90元，一年总共有1,080元，其中有540元由国家政府支付，剩下的540元由村委会给，而村委会的收入来源于村民纳的税和学生缴的学费。90年代初以来，一年级或二年级的学生每年必须付大约60元的学费；到1995年，学费上涨到70多元。一个五年级的学生现在每年必须缴纳大约150元学费，一个初中生每年必须付250元。学费是每年年初缴纳，之后上交给村委会。学费开支可细分为十二项，包括了注册费、课本、练习本、保险、考试费用和县、乡、村的教育经费。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一阶段，所谓的(县乡村)三级教育经费也通过地方税从每个村民那儿征收，换句话说，同时征收了两次教育经费，第一次从每个村民身上征收，第二次又从学生那儿征收。

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早期这段时间里，很多高家村孩子上不起学，其中大多数是女孩子。举个例说，在1994年，八个已经过了上一、二年级年龄的孩子从来没有受过一天教育，其中大部分是女孩。在70年代早期，当我还在当老师的时候，大部分孩子，包括女孩子在内，至少都接受过一两年的教育。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早期这段时间，女孩辍学主要是因为费用太高了，如果执意要村民们做出选择的话，出于社会保险的原因，他们宁愿选择让男孩子去上学。

然而，据高朝真讲，到1994年，在高家村，所有小学一二年级的学龄儿童都入学了，七个男孩和六个女孩读一年级，三个男孩和五个女孩读二年级。高朝真给出的原因是，90年代以来，高家村村民外出打工时，开始明白让孩子读书的重要性，他们让所有的孩子都接受教育，包括女孩在内。从高家村外出打工者那儿得到的反馈信息表明：受的教育越多，找到一份更高薪水的工作的机会就越大。打工者接受教育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动力是：他们可以写信回家。我们在十一章里将会提到，那些14到16岁的孩子离开家到遥远的地方打工是多么的不幸。写信是维系父母和儿女之间感情的一种重要方式。最重要的是，正是这些打工者的汇款才使村民们能够付清孩子的学费。

为了进行教学质量的管理，县教育局时不时地举行一些全县范围内的考试，然后对考试结果进行评比，给那些考试成绩好的学校的老师颁发奖金。因为只考三门——思想政治、语文和数学，因此，其它课程都被大多数老师忽略了。例如，在高家村就没有开设美术、音乐和体育课，甚至在青林地区的中心小学——也没有这样的教学设施。在70年代，当我在青林学校教书时，那里还有两个篮球场，一张乒乓球桌。1994年，当我去看望原来我工作的地方时，什么也没有了。那里的老师告诉我，即使你有资金建一个篮球场，篮球架马上会被偷走。在村民们看来，无论如何，体育活动都是一项愚蠢的消遣方式。

政府考核教师的目的是为了培训农村“赤脚老师”，而这些老师都不

具备城镇户口。对那些想改变身份的老师，他们可以参加定期的考试。任何一位有五年以上教学经验的老师都可以参加考试。如果通过了考试，老师可以得到一张文凭，也可以获得城镇居民身份，还可以领到政府发的定期工资。考试的科目有：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教学法、课堂心理学，再加上语文和数学。按照高朝真所说，这样的考试非常难通过，他失败了好几次，现在已经放弃了希望。通过这样的考试选拔制度，再加上80年代以来陆续解聘了一些70年代的“赤脚老师”，青林地区现在有十二位老师享受国家待遇，其他九位老师的工资由该区的村委会支付。

结束这一章前，值得强调的是，在共产党执政的头几年，政府做出了真正的努力来改善高家村的教育和提高其文化程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最激进的时期，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地区教育领域的发展最为显著。正是在这两个别人认为是毁灭和动乱的时期，在青林地区，农村居民有更多的机会接受教育。另一方面，在80年代改革初期，农村地区的许多学校关闭了，农村孩子上学的数量急剧下降，所有这些都是在所谓的精简人数和改善教学质量的理由下进行的。在90年代，由于有打工人员带来的收入，农村教育状况才再次得到改善。

注 释

1 私塾是中国过去的一种儿童教育方式。如需详细深入了解，参看Colin Mackerras, "Education in the Guomindang Period 1928–1949," in *Ideal and Reality: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Modern China, 1860–1949*, edited by E. Fung and D. Pong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5), pp. 1531–1583. 以及文章中的相关参考书目。

2 最后这篇文章是毛泽东为纪念白求恩医生之死而作的。白求恩是一位加拿大医生，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帮助共产党军队。

3 Suzanne Pepper, *China's Universities: Post-Mao Enrolment Policies and Their Impact 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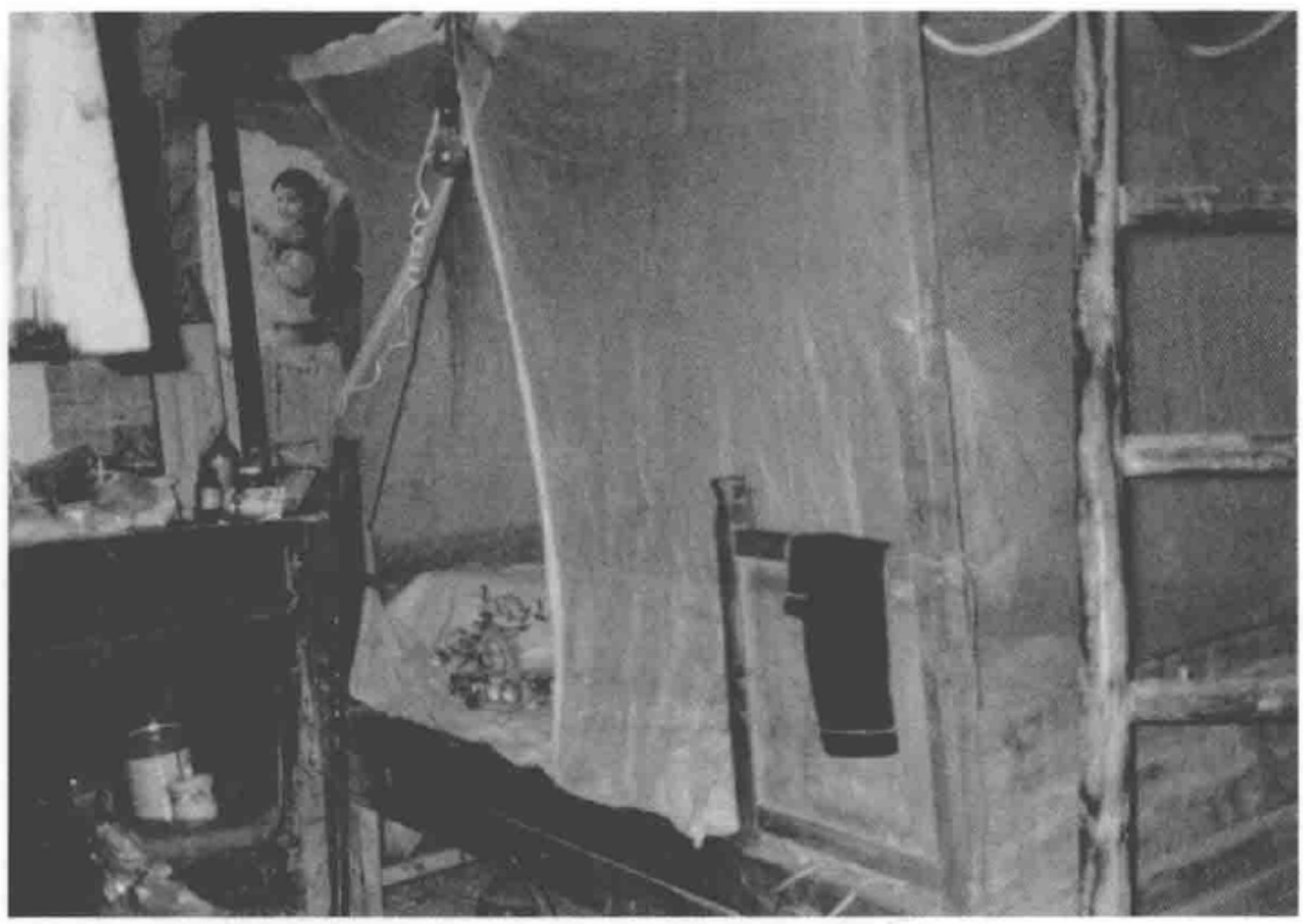
the Structur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a Research Report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4), p. 115.

4　当时辽宁一个考生叫张铁生，拒绝回答试卷上的问题，并且在试卷上写了几句抗议的话，抱怨说他这样的人（他当时是一位生产小队的队长）和城里人一起考试，并且城里人还有专门的辅导，这种竞争不公平。碰巧，张铁生的试卷被当时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看到了。毛远新和其他激进的左派共产党领导人借此机会攻击党内的保守派。

5　这些中国官方数字引自上引书Suzanne Pepper, *China's Universities*, p. 14.

6　Ibid., p. 13.

7　Ibid., p. 116.



当时比较流行的高家村人用的床和设施

高家村传统房屋的砖墙，书中第五章对这种建筑作了详尽的描述。

高家村传统的厕所

高家村附近的庵庙

村民家中宣传基督信仰的“爱”字

90年代初民工在深圳的“住房”

90年代初波阳镇（现叫鄱阳）里一栋历史建筑的一角。1949年以前是天主教教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是县委党校。

90年代初高家村地区结婚仪式之一是把嫁妆扛出来敲锣打鼓让附近的村民欣赏

20世纪90年代初作者家屋大厅内主墙壁上的布置。这在当地比较典型：中间的大幅文字叫中堂，两边是对联。从内容上可以看出，对联作者是根据本书作者出国留学这件当地非常轰动的事件而写的。那条作为香案的木板中间有一个香炉，旁边是本书作者父亲的遗像。墙壁的后面就是所谓的厨房，当地叫灶屋。

这是作者为英文版《高家村》题的书名。“高家村”的“村”字是官方行文加上去的，本地口语中叫“高家”。

第8章

大跃进

关于中国大跃进的话题，早已有许多作品谈论过。[1]集体化的意识形态，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情，以及对速度和规模的盲目追求，而最终导致大跃进的急躁冒进，其起始可追溯到50年代中期。然而，大跃进的高潮时期仅仅是从1958年到1959年，持续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毛泽东本人就开始要求作出调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经济都面临着力求快速发展的压力。早在1955年7月，毛泽东在给各省委书记的一次演讲中就表示了对负责农业的邓子恢的不满，批评他是“右倾机会主义”，有“右倾保守思想”，而“右倾保守思想”实际上指的是谨慎地发展集体主义。1956年6月20日，在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的建议下，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其内容主要是提倡既要警惕“右倾保守主义”，也要反对“左倾冒险主义”。据报道，毛说过这样的话：“我才不看这种东西”。[2]而且，1957年的反右运动也已为大跃进的激进主义铺平了道路，因为人人都被大规模地批斗知识分子吓坏了，没有人敢批评大跃进的激进政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跃进的大部分观点都不是来自毛泽东本人。按照一种说法，毛泽东提出“十五年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超英国”，这一想法是在赫鲁晓夫的口号“苏联要十五年赶超美国”

的影响下产生的。[3]1957年12月20日，刘少奇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中华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透露了毛泽东的这一想法。一向以讲求实际和谨慎著称的刘少奇在1958年7月5日竟然也说，中国只需花两到三年的时间就可以赶上英国。他对北京石景山的工人说，他们可以在他们的有生之年看到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4]这里的共产主义意味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的全面实现。

最能体现中国在发展上急于求成的“跃进”一词，实际上是由一位行事谨慎的人发明的，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周恩来。在毛泽东批评了他的保守主义思想之后，他在1957年彻底改变了态度。[5]1958年4月，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的地方政府把人民公社的思想首次付诸实施，产生了第一个人民公社。1958年8月，当毛泽东在山东省访问时，当时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向他谈到了人民公社的做法，毛泽东不假思索地说：“人民公社，好。”一位记者听到了这句话，几天之后，在《人民日报》上就出现了大标题：“毛主席的教导：人民公社好！”。因此，全国许多地方纷纷创办了人民公社。

大家在公共食堂一起吃饭的想法也源自一些地方政府的尝试。1958年7月8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提倡在人民公社建立公共食堂的报道，报道中提到建立公共食堂的八大优点，包括：在工作中提高生产效率，因为人人都是同时吃饭同时上班；把妇女从厨房中解放出来；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粮食；减少家庭争吵和改善公共卫生。刘少奇也支持公共食堂的做法，1958年7月14–18日，当刘少奇在山东访问时，他大力赞扬这种做法，并且建议每个工厂应该自己炼钢铁而不是依赖进口。[6]

1958年7月，负责中央计划的两位主要的共产党领导人——李富春和李先念，在他们提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中说到，中国在工业上赶上英国只需三年时间，并且农业增长率可高达35%。另外一位制订中央计划的主要成员薄一波，在1958年6月17日做了个报告，题目就是《两年超过英国》。

一些地方政府一再编造亩产万斤水稻的神话，例如，1958年7月15日，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在共产党理论杂志《红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驳“粮食增长有限论”》的文章。他在文中说，广东一亩地生产3,000–10,000斤粮食是有可能的。性格冲动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说，他亲眼见过这些“事”：在广东省番禺县，红薯产量为每亩1,000,000斤，甘蔗每亩600,000斤，水稻每亩50,000斤。[7]另一位激进的共产党领导谭震林据说说过这样的话：粮食产量有多高仅受个人想象力的限制。[8]

后来李锐说他问过毛泽东：为什么不对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粮食产量的数字表示怀疑？毛泽东回答说，他是受到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写的一篇文章的影响。钱学森说，如果有充足的阳光，亩产10,000斤水稻是有可能的。[9]受到这种理论上的科学方法的误导，一些地方的农民被告知安装电力设备，以便在夜晚给地里的农作物提供光照，并且使用吹风机给密植的水稻苗通风。

当时中国从上到下各级领导人都在一种狂乱的渴望和热情的驱使下，欲将贫穷落后的旧中国转变成富有的社会主义新国家。他们被激情冲昏了头脑，尝试着各种各样的实验，但结果却往往令他们自己都大感震惊。当周恩来——发明了“跃进”这一新名词的人——在一所学校看望他那位泰国养女时，他自己都难以置信学生竟然在学校后院炼钢铁。[10]

各省各县对炼钢的热情尽管程度不同，然而，到处都是一片狂热，以至于共产党中央政府很早就不得不警告地方当局不要过于头脑发热。1958年8月3日，中央政府发布了一份传阅文件，警告各级领导务必谨慎。[11]1958年8月29日，北戴河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在这项决议里，地方政府被警告不要“太急于求成”，并告知他们不要从集体化这儿期待奇迹发生，集体化只能一步一步地实现。[12]

然而，各个省市仍然在竞相猛刮“浮夸风”。从某种程度上说，地方领导越激进越富有想象力，他们尝试的实验就越疯狂越荒谬。从可获

得的信息中可看出，山东、河南、河北、安徽、广东这几个省最大胆、最狂热。因此，在这些地方，后果也越加严重。江西省是受影响最小的省份之一。1960–1961年，饥荒遍及全中国，成群结队的安徽农村居民背井离乡来到江西乞讨求生，其中一部分人也来到了高家村。对于高家村人来说，安徽人成了饥荒难民的代名词。

饥荒和死亡人数

1959到1961这三年是人们提到的三年饥荒时期。不少中西方学者皆声称，在这几年里，中国的死亡人数可能高达3千万到5千万。[13]实际上用确凿的证据来得出一个比较确切的死亡人数是不可能的。一种估算方法是：按照那时正常的人口增长率和死亡率来计算，估计大约有3千万或更多的中国人在1959年到1962年期间失踪了，那这些失踪的人口就是死亡的人口。

按现有的知识水平，我们在得出结论性的数据时要分外小心。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在大饥荒时，出生率一定很低。举例来说，在1957年，江西省就有7,000,000多个婴儿出生，而在1961年，仅有420,000多一点。[14]50至60年代间，全国每年的平均出生率超过30%，而在1960年，仅有20.86%，1961年为18.02%。[15]由于饥荒持续的时间长和人口的基数大，较低的出生率肯定在较大程度上导致了人口的减少。因此，在这点上，所谓失踪的人口不能够全被算到死亡人数里面。

第二，我们不能确定由中国政府发布的数字是不是准确的。那时并没有人口普查，而且就技术和管理而言，数据采集也是混乱的。[16]除了1953年进行过一次人口普查，1957年之前甚至连一个抽样调查都没有。“1958年年初，中国的统计体制开始崩溃，直到二十多年之后才完全恢复。”[17]大跃进初期，统计体制就曾有过一次崩溃。“大跃进在人口统计上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官方公布的1960年底全国人口总数比上一

年年底估计数还少约1千万，这带有一定的主观性。”[18]

第三，即使是1953年进行的人口普查，其精确度也值得怀疑。1953年中国官方进行的人口普查结果宣称：中国人口由1947年的4亿5千万上升到了1953年的6亿。在这之前曾组织过人口普查的中国著名人口统计学家陈达对这次人口普查进行了批评，为此，他在1957年受到了中国政府的批评。按陈达所说，1953年的人口普查是不科学的，人口数主要是在地区随机抽样的基础上得出的估计。[19]作为中国人口统计学方面的专家，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何炳棣在他的著作《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中，也质疑1953年人口普查在技术层面上的可信度。按照1953年的人口普查，在1947–1953年间，包括几百万军队卷入的国共内战那几年，中国人口的增长率竟然是30%。如此看来，一些所谓的“失踪人口”可能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最后，大跃进期间，流动人口数量很大，这也是人口监测方面的困难之一。从1957–1960年，由于工业扩张和工业分布广，从事工业的人数成倍增长，导致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动到城镇。在中国政府的政策调整下，从1960到1963年，将近有3千万人口又从城镇返回农村。在农村居民流动到城镇地区这一过程中，一些人的户籍就有可能在城镇和他们原先居住的村子重复登记了。但是，当他们从城镇返回农村时，他们在城镇的户口就被取消了。

高家村困难的日子

尽管江西省领导的表现并不是最狂乱激进的，但是江西人民和高家村村民也同样忍受着大跃进所带来的艰难困苦。高家村自1949年以来的第一起自杀事件就发生在大跃进期间。由于家庭困难，一位妇女上吊自杀了。在每一个高家村村民的记忆中，最困难的时期都是大跃进那几年。高家村人必须挖野菜并用米糠充作食物，年老的村民都不曾记得在

1949年以前吃过米糠。而米糠是很难消化的，并有可能会损坏肠胃。高家村人后来谈论得最普遍、次数最多的事就是，吃了米糠后很难通便，许多人只能借助汤匙才行。

在我呆在高家村的整整20年里，我至今都想不出，家里有哪一天能有足够吃的东西。1962年我姐姐嫁到波阳县城之后，我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去姐姐家。她家一顿普通的饭菜对于我来说都不啻是一顿盛宴，差不多每次去她家，我都会因吃得过饱而拉肚子。并不是我姐姐家富裕，也不是说她为我做了特别的好菜。她家也仅仅是有一份固定工资收入的城镇普通家庭，但她家的生活对我们农村人来说已经够好了。对于农村人而言，生活往往是为了求生存，然而，大跃进使得生存更加艰难。在这困难的几年中，我记忆里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母亲给我们带回了一只红薯，当时我们全家已经有好几天没吃什么东西了，母亲只好到江家村的一个朋友家，想从她那儿获得一些帮助。她的朋友给了她两只红薯，我母亲吃了一只，并带回一只给我和弟弟吃。

那时我只有七岁，但是由于饥荒，我也必须到山坡上、河流边、田梗上和湿地里去挖野菜吃。那个上吊自杀的女人是我们家的一个邻居。她家经常吵架，特别是那个妇女和她的婆婆。1960年，生活变得极其艰难，她的婆婆总是不停地唠叨，年轻妇女应该吃最少最差的食物。她的婆婆强迫她吃树皮和观音土（“菩萨土”，据说是当地可以吃的一种土壤，说是菩萨的善心可以让人能消化吸收这种土），到最后这位妇女实在受不了了，在自己家的茅房里上吊自杀了。除了这件事和江家村的一例死亡案例，我再也没听说过在那几年里我们这几个村子发生了任何由于饥饿或饥荒而造成的死亡事件。值得注意的是，附录二中的表格3表明了青林地区人口变化的情况，其中数据并没有因为大跃进而显示出异常变化。

从表格3来看，1958年和1959年的人口增长率很低，1959年和1960年的人数是一样的，这里似乎出现了些反常。从表格3中的数字

看，1959年到1960年，女性增长了22个，同时男性减少了22个。然而，在据称是大跃进时期最困难的一年——1961年，人口却反常地增长了203个。有两种似乎可信的解释：第一，1960年的记录数字并不准确，1961年记录的数字必须补偿1960年记录中出现的错误。另外一种更可信解释是：1958年以来，在大跃进时期的政策指导下，地方工业扩张得很快，当时来自这个地区的大量农村青年被招募到景德镇、九江和波阳县城当工人。在大跃进期间，有五个家庭离开了高家村，一家人去了九江，三家去了景德镇，还有一家去了莳山国营农场。然而，当中国政府开始对激进农业政策做出调整时，许多人又被命令返回农村。高家村就有一家人进城后又返乡了。

地方工业扩张及其后果

大跃进的一个主要的目是将工业分散并鼓励地方的积极性。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通过动员广大群众，中国领导希望工业能扩大得更快。这就是毛泽东有名的“群众路线”，这也被认为是共产党用来战胜国民党的神奇武器之一。其二就是希望不经过城镇化过程和不改变农村居民的住地，就能将中国农民转变为工业工人的美好愿望。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这两个方面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又再次出现。有充分证据表明，从大跃进时期开始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进一步得到鼓励的分散工业和提高地方积极性的措施，对中国的经济也产生了一些有利的影响。例如，80年代以来的乡镇企业经济被认为是后毛泽东时代改革的支柱之一。研究表明，许多成功的乡镇企业直接继承了这两个时期的探索成果。[20]

1958年，波阳县被国家轻工业部指定为十大“实验县”之一，来进行“社办企业”实验。这种方法开始于1958年2月，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波阳县城就建立了3,623家地方工业企业。这些企业的生产领域从瓷器

制造、水泥、煤炭和木炭生产到玻璃和纸张制造以及钢铁生产等，范围广泛。例如，我的姐姐就进了一家瓷器厂当工人，并且成了一名在碗碟上描画的能手。这些企业有些存活下来了，而很多不久之后就倒闭了，因为人们认为这些企业不切实际或是浪费资源。例如，瓷器厂两年不到就倒闭了。因为过于热情和缺乏合理的协作，地方政府的种种积极急躁的措施还导致了环境破坏。大量树木短短几天就给砍光了，速度很快，以致1958年10月14日，县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停止这种危险的做法。然而，这种创造性的做法确实促进了波阳县的地方工业，截止到1965年，这些企业中仍然有149家在经营。

为了完成中央政府规定的钢铁生产定额，从省到公社的各级政府都催促着要鼓足干劲、打破常规，想尽各种方法大炼钢铁。后院熔炉炼钢铁就是大跃进时期既荒唐可笑又令人难忘的一幕。然而，如果认为中国全国上下遍地都在发生着这样的事情，那也是错误的。银宝湖公社就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波阳县确实尝试过在离高家村大约40公里远的山区——莲花山建造一个熔炉。二十多个高家村村民也投入到了莲花山的炼钢中，大部分人去了几个月就回来了，有些人工作得久点，但最多也只有五个月的时间。他们的工作是将木柴和木炭运到熔炉里。至于莲花山炼制钢铁的规模则不得而知，因为没有可得到的可靠信息，更不用说统计数据了。然而，因为仅仅高家村就有二十多人参与了这次炼钢，我们可以认为莲花山的这次徒劳的炼钢应该规模不小，并且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和能源。

因为没有生产足够的钢铁，甚至连无用的铁屑都没炼制出来，县政府便命令公社和大队从村里的各家各户收集钢铁来凑足规定的钢铁量。我对当时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一群来自村外的人，板着脸，由村里的积极分子，比方说高常银领着，挨家挨户进行搜查。锅和锭（锭是另外一种古老的烹饪器皿），都给砸成碎片；家里的铁制品除了锄和犁之外都被拿走，以凑足钢铁定额。钉子、调羹、铲子和铁锹都被充公，甚至

连门销都被拆下来拿走了。这可是闻所未闻的事，村民们个个害怕得说不出话来。搜集到的铁器有好几吨，都从村上交到了大队，从大队上交到公社，又从公社上交到县里。1994年，我问过一些村民，他们的那些家庭用品最后交到什么地方了，最后变成了什么，但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事就是农村居民如何被过去的或目前的当权者粗暴对待的一个典型事例。

公共食堂和共产主义

将烹饪用具充公也是可行的，至少从理论上来说是这样，因为那时家家都不用做饭了。1958年5月，高家村建立了一家公共食堂，但是在1959年年底就解散了。食堂里有三个专职厨师为村民们做饭，每天一日三餐，干了有一年半的时间。实际上，高家村的村民从来不在公共食堂和其它家庭共用一张桌子吃饭。中国其它地方的人也是这样做的。公共食堂只做米饭，高家村的各家各户仍然要自己准备菜。因此，高家村的每个家庭都允许保留一个锅。

每到吃饭时间，当村领导大声宣布开饭后，每家每户会派一位代表去领饭。村民手里拿着一只桶，排成一队，等待厨师将饭盛在桶里，然后带回家分给家里的每一个人。每个家庭分到的食物取决于家庭成员的人数，当然，厨师们对每个家庭的人数知道得一清二楚。如果他们忘记了，拿着桶等候的其他人就会提醒他们。在我家里，到公共食堂领取食物通常是由我来做的。起初，分给每个人的饭都足够，我们小孩也认为这件事很好玩。然而，慢慢地，食物开始逐渐短缺，分到的饭量也越来越少。我记得有一个时期公共食堂只能提供米粥，米粥因为水多而稀，我们村里以后一直开玩笑说，这粥都可以用来当镜子照了。因为缺少食物，村民们都没力气干活。用他们的话说，两碗那样的粥只能提供到厕所撒一次尿的力气。

妇女从厨房中解放出来了，小孩也被放到一起照顾，老年人和残疾人除了坐在一起聊天以消磨时间外，就什么活也不用干——这在当时确实如此。在公社制度以前，妇女除了干家务活之外，只需在田地里偶尔干干活；而在人民公社时期，高家村的妇女开始头一次像男人一样在地里干活。在人民公社建立以前的合作社时期，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农具和自留地，用来种果树和蔬菜之类的东西。在大跃进时期，除了家里的房子外，一切私人物品都放在公社里，大家一起用。在中国有些地方，家庭富裕的村民的谷物和财产被拿给家境贫寒的家庭用，目的是为了人人平等。青林地区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这大概是因为在命令停止这些激进政策前，他们还没来得及跟上潮流吧！例如，在大跃进期间，村民们甚至还有私粮（参看附录二的表5）。

从技术角度看，这些数字也可能不准确，因为在中国农村，要达到那样的准确度是不大可能的。《大队台账》中的统计数据也许还存在其它的问题。例如，现在还弄不清楚大跃进以前那几年私人种植庄稼的情况。青林地区的土改是直到1950年才进行的。土改后到成立合作社前这段时间，村民还允许有私有的土地。使事情更加混乱的是，从《大队台账》中的记载来看，村民们在1961年才开始拥有自留地。整个青林大队分给村民的自留地是224亩，从1961到1970年，一直没变。但1971年降到149亩，1972–1974年又增至305亩，然后又减至241亩，之后一直在这个数字上下波动，直到70年代末。私人种植庄稼的土地并不包括到1961年才开始分到的自留地，因为自留地情况在《大队台账》中有单独的一个表格记载。而且，确实村民吃的蔬菜都是自己种的，而不是青林大队集体种植的。除了所谓的自留地，村民们还拥有其它的小块土地，来种植一些供他们自己消费的农产品，这些土地在记录上都没有得到反映。按照这些官方记录，将私人可以自由支配的这两种类型的土地加在一起，每个人也只有0.36亩。然而，我从自己的亲身经验中知道，在毛泽东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高家村村民留作私人使用的土地大约是

每个人约0.5亩。换句话说，至少就青林地区而言，激进的农村政策并不像官方宣称的或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激进。

村民们被迫做这做那，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可村里的那些积极分子却精力充沛地忙于开会和传达上级领导的指示。一切事情都发生得如此之快，包括积极分子在内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也预测不了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村里最大的领导——高常银，不停地重复他在县城开会时听到的消息，说共产主义很快就会在中国实现，人人都要过天堂般的生活了。当别人问高常银什么是共产主义时，他的回答在过去好几年后，还一直是村里人的笑料。他说，到共产主义时，人人都能住进楼上楼下有电灯和电话的几层高的外国式洋房。我仍然记得他说的几句话："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中国人总认为几层高的外国洋房一定既舒适又现代。对于供不起煤油灯的村民来说，电灯很显然是人间天堂般美好生活的象征。

值得提及的是，当时前苏联和中国都沉浸在对共产主义的美好憧憬中，人们无不期望现代化的实现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了便于苏联的普通老百姓理解这一点，据说列宁曾经做了这样的概括：共产主义就是集体化和电气化。不过对于高家村人来说，高常银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当时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理解。

农业生产

对于大跃进时期高家村的粮食生产和粮食分配情况，现在还找不到资料，也没有可靠的数据来说明。然而，《大队台账》却记录了1949–1978年间的生产产量，当然还需进一步调查才能确定那些数据的可靠性。这些数据表明，大队的粮食生产产量有所下降。

假如有两年的产量完全一样，按常理，那是不太可能发生的。然而，在表6中，1961–1964年这四年的粮食产量数据却连续一模一样。

因此，这里提供的数据可能并不很科学。然而，这些数据仍可以说明青林大队生产产量的大致情况。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与1957年相比，1958年的产量有大幅度下降，随后的两年，产量又保持不变，直到1961年才有了少许的上升。但是，1964年总的生产产量比1950年还要少。而1950年大队的总人口为1,723人，但到1964年，人口已增长到2,678人了。在那几年里，粮食的严重短缺是可想而知的。

假如不是各种因素同时对村民们不利，仅仅是粮食生产产量稍微下降，甚至是产量大幅度下降，也不一定会导致饥荒。1949、1954和1973年这三年是粮食产量最差的三年，因为这三年的自然灾害最为严重（见表7）。据大队的官方记录，这三年里受到洪灾影响的土地面积分别是3,963亩、4,088亩和3,954亩。因此可以说，这三年里遭受到的自然灾害的影响确实是非常严重的。但不管怎样，村民们在这三年里并没有遭受饥荒。

可以解释这一点的一个原因是，在1949年和1954年，人口规模相对更小。但是还涉及到其它因素。1949年前夕国民党政权解体时，共产党政权还没有完全建立好。因此，我们若认为，那时从村民那儿征收的税收并不是很多，这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尽管我不能提供任何数据来证明这一点。然而，在1973年和1974年，我的亲身经历可以证明高家村人确实得到了政府的帮助，以避免遭受饥荒。我们当时可以在当地的一家粮站以政府规定的价格购买政府储备的粮食，我就亲自到那买过粮食，并用一辆手推车运回了家。然而，在大跃进时期，高家村人从政府那儿买不到粮食了，因为到处都粮食紧缺。到1961年，政府储备的粮食都已被抢购一空，政府反而尽可能多地从农民这儿征收粮食，以满足城镇居民的需要。

受灾原因

大跃进期间粮食产量下降的原因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中国官方和学者提供了几种解释。其中一种解释是，从1959年到1961年，全中国经受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有研究资料表明，这连续三年里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的可耕种土地分别是206,820,000亩、344,950,000亩和400,380,000亩。[21]然而，连中国人自己都不认为自然灾害是导致灾荒的主要原因。比方说，刘少奇就曾说过，这只是“三分天灾”。

经常提到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中国建设的最关键时期，苏联向中国撤回了技术和资金的支持。苏联在那时突然撤回对中国的资助确实削弱了中国的经济，然而，如果说这对中国的粮食生产有着直接的影响，并由此造成大饥荒，也有点牵强。

还有一些理由也被提到，但它们仅仅是基于猜测。比如说，大锅饭造成了粮食浪费；粮食腐烂在地里无人收割（因为人人都被叫去炼钢）；掘地三尺的“深耕法”浪费了时间和精力。这些情况可能都有，但都仅是个别现象，且持续的时间不长。对于农民而言，甚至包括地方上的基层官员在内，谁会傻到自己一边挨饿，一边却让粮食烂在地里呢？

另外还有一些说法，如所有地方政府都纷纷吹嘘各自的粮食产量猛增，中央政府于是就从农民手中征收更多的粮食。[22]这也很难让人相信。如果说政府从农民手中征收了大量的粮食，那么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些粮食用到哪里了？为什么全国到处都是粮食短缺？为什么中国政府1961年还得从国外进口40亿公斤的粮食，1962年进口得更多？现在找不到这样的数据来说明青林地区上交给国家的粮食有多少，但我问过一些村民，他们都否认当年规定要上交更多的粮食给国家。

以上所说的这些导致粮食减产的原因，在青林地区都没有出现。没有谷子留在田里白白烂掉，也没有因为大家在一起吃饭而浪费粮食——

因为即使在公社食堂吃饭的那几年，也没有哪个人吃得太饱而浪费粮食的。在青林地区，农民家没有那种后院熔炉，也没有哪个蠢到真要挖地三尺。即使在全国来看，那种种如后院熔炉炼钢的荒诞行径也很快就被制止了，像粮食产量“放卫星”和所谓所有东西人人共享的“共产风”等奇谈怪论，也早在1959年全国范围的大饥荒发生前就销声匿迹了。因此，发生这样的大饥荒肯定有一些结构性的原因，而不是一两件孤立的事情就能造成的。

结构性的问题之一是因为工业布局的分散和地方工业的扩张，工业人口迅速增长。1957年，工业人口总数是2.45千万，到1960年，这一数字猛增到5.02千万。[23]工业扩张对粮食生产和消费会产生两个直接的影响。一是农业资源减少。这是因为，工业扩张一方面会消耗可用于粮食生产的可耕地，另一方面还会减少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第二个影响是，工业人数的增加就意味着城市粮食消费的增长，需要更多的粮食从农村运送到城里。1958年，工业人口增加到2.99千万，其中有1千万就来自农村地区。1959年4月30日，中共领导人中制定计划最为谨慎的陈云就抱怨说，太多的粮食从农村收上来卖给城里人。他说，与1958年相比，1959年就有90多亿公斤粮食被运来满足城里人的需求。刘少奇在1960年5月3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也承认，所有的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粮食，城市在向农村抢粮食。他说，工业扩张得太大，加上交通设施和教育等的落后，农民不可能生产足够多的粮食来满足城市的需要。[24]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中国政府从1960年开始把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遣返到农村地区。到1963年，下乡人口达3千万，高仁昌一家就是此时被迫从景德镇迁回高家村的。1958年高仁昌去景德镇，在一家陶瓷厂工作，全家也随他一起迁到景德镇。他因为被指控曾在1948年加入过反共的九路军，便无法逃避这个强制性的返乡运动。因此，高家村不得不接过政府扔下来的负担，多养活四口人。

另外的结构性问题来自于1958年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经济体制上的变化。在合作社制度下，生产和分配的单位都比较小，因此可以更好地监控劳动成果和个人付出的劳动量。这样一来，个人的报酬就和个人的劳动紧密相连。突然一下子给推进到生产和分配单位都较大的公社制，这就难怪村民即使不是彻底的厌恶，也会感到困惑和不知所从。相互协调是很困难的，监督个人劳动就更复杂。在这个混乱的体制转变过程中，一种与个人贡献紧密相连的分配奖励制度就必须得赶紧制定出来。因此，有相当多的劳力没有用到农业生产中，这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当时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的王绍飞注意到了这些问题。1959年5月2日，王递交了一份报告，详细陈述了这些结构性的问题。[25] 这些问题并不容易解决，有些问题直到两年后才解决。那时村民们已经适应了公社体制，而且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样，一种小队协调、个人监督、按劳分配的制度就形成了。

根据高家村人的说法，当时有一种命令严重影响到粮食生产，那就是作物密植。正如杰斯帕·贝克（Jasper Becker）指出的，受到苏联科学院院士李森科（T. D. Lysenko）伪科学观点的影响，当地官员在上级的命令下，强迫高家村人过于密植秧苗。这种做法在高家村人看来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也直接导致水稻的减产。

大跃进时期，由于急于发展、热衷革新和狂热的激进政策，再加上无知和个人的野心，中国各级领导想尽各种五花八门的方法，尝试让中国尽快实现现代化。尽管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大跃进对中国各地的影响不尽相同，但中国农民却因为大跃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也许如人们经常说的那样，大跃进并不是完全没有理性的、疯狂的行为，可能也有它自己的逻辑和理由。然而，这一惨重的教训却应记住——中国这么大，在统一管理下，任何愚蠢和错误的政策都会带来巨大而又严重的后果。

总之，值得再次指出的是，大跃进给高家村造成过饥荒，但确实没有人饿死。像土炉炼钢和公共食堂这样的蠢事在波阳县出现过，但青林地区却没有发生。后来在我的追问下，一些村民承认，政府那时并没有因为当地官员虚报粮食产量而多向村里征收粮食，当然国家也没有让他们少交粮食，高家村粮食不够是因为粮食减产。减产的主要原因是，村民在同一时间内突然面对这么多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技术的根本性变革，确实还没有准备好。因而缺乏有效的管理，就会干扰到生产行为。这种情况在全国都是一样的。他们本应像后来的1973年那样，获得国家的帮助。但国家没有救济他们，因为那时全国到处都粮食短缺，再加上工业人口的迅速增长，情况就变得更为严峻。无论粮食供应多么紧张，政府都想确保城市有定期供应，因为城市如发生饥荒，会更加触目惊心，会更加威胁到国家的稳定。所有这一切最终就导致农村居民孤苦无援，只能忍饥挨饿。

注释

1 如：Byung-Joon Ahn, "Adjustments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ir Ideology and Legacy," in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edited by Chalmers Johns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3), pp. 257–300;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vol. 2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Joseph Williams, "A Tragedy of Good Intentions: Post-Mao View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odern China* 12, no. 4 (1986): 419–457; Alfred Chan, "The Dynamics of Policy-Making in China: The Case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 unpublished PhD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1988; Felix Greene, *A Curtain of Ignorance: How the American Public Has Been Misinformed About China* (London: Cape, 1965); Isabel Crook and David Crook, *The First Years of Yangyi Commune*, vol. 8 (London: Routledge, 1966);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The Quest for Development since 194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Jean-Luc Domenach,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ase of One Chinese Provinc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5); Jasper Becker, *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 (London: John Murray Publishers, 1996).

2 谢春涛：《大跃进狂澜》（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第270页。

3 文聿：《中国"左"祸》（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第281页。

4 马齐彬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增订本）（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第148页。

5 谢春涛：《大跃进的狂澜》，第12页。

6 马齐彬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第148页。

7 陈毅：《广东番禺县访问记》，载《人民日报》，1958年9月26日。

8 董保存：《谭震林外传》（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第160页。

9 李锐：《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香港：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3），第158页。钱学森的意思很可能是说如果有足够的通风和光照，加上合理密植，理论上是有可能的。这个故事也可见《开放杂志》，第11期（1992）。

10 Sirin Phathanothai and James Peck, *The Dragon's Pearl*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11 马齐彬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增订本），第149页。

12 Geoffrey Hudson, A.V. Sherman and A. Zauberman, *The Chinese Communes: A Documentary Review and Analysi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London: Soviet Survey, 1959).

13 Edward Friedman, Paul G. 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Barry Naughton, "The Pattern and Legacy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Mao Era," in *Perspectives on Modern China: Four Anniversaries*, edited by Kenneth Lieberthal (Armonk: M.E. Sharpe, Inc., 1991), pp. 226–254; Andrew James Nathan, *China's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Jasper Becker, *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 (London: John Murray Publishers, 1996).

14 马巨贤、石渊主编，易宜曲副主编：《中国人口：江西分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第78页。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第83页。

16 关于这点，请参看（日）若林敬子著，周建明译：《中国人口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17 Judith Banister, *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3.

18 Ibid., p. 41.

19 Wim F. Werthheim, "Wild Swan's and Mao's Agrarian Strategy," *China Review* (August 1995): 7–9.

20 比如参看彭昆仁：《广东乡镇企业运行机制的探讨》，载《中山大学学报》，第4期（1992），第8–14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及事件的回顾》，第一、二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Edward Friedman, Paul G. 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黄道霞、戴舟、余展编著：《激荡中国农村的变革：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Samuel P. S. Ho, *Rural China in Transition: Non-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Rural Jiangsu, 1978–199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钟朋荣、杨庆兵：《横店之迷》，载《半月谈》，第19期（1994），第46–47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1991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Christine Wong, "The Maoist Model Reconsidered: Local Self-Reliances and the Financing of Rural Industrialisation," in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dited by William A. Joseph, Christine Wong and David Zwei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53–182; Kristen Parris, "Local Initiative and National Reform: The Wenzhou Model of Develop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134 (June 1993): 242–263.

21 赵丰：《天堂挽歌》（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第242页。

22 丁抒：《从大跃进到大饥荒》，载《华夏文摘"大跃进"历史专集》（上、下），总第75、76期（1996年6月）。

23 马齐彬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第193页。

24 同上，第200页。

25 同上，第164页。

第9章

文化大革命

在海外的中国研究领域中，有大量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1]1980年以来，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当局把1966–1976这十年称为“动乱和灾难的十年”，每年都会出版卷帙浩繁的谴责文革的中文和其它语言的书籍。也有很多传记和回忆录，倾诉文革期间作者经历的可怕的噩梦和令人咋舌的非人遭遇。知识精英有些受到过严重迫害，有些被常年下放农村或者被剥夺他们认为应有的正常生活方式，他们便把这些个人经历写成了文字。对于共产党执政者和知识分子而言，文革比大跃进更具破坏性。如果要在共产党执政者和知识分子之间在看待毛泽东时代上找到什么共同点，那么，无疑就是毫不留情地谴责文革。

这当然事出有因。这两类人群在文革中都是挨批的主要目标和阶级斗争的主要受害者。也由于此，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农村所受的影响也许最轻微。当然在一定的时期内，激进的农业政策对某些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也造成了负面影响。

但青林大队却没有受到这样的影响。1967和1968年被看作是文革破坏最严重的两年，青林大队的粮食产量却稳定地增长了（见附录二表6）。1972年，青林大队的粮食产量创了历史最高纪录。1973年因遭受

特大水灾，粮食产量急剧下降。1974、1975、1977和1978年的洪灾都造成了破坏，虽然没有1973年那么严重。只有1976年没发什么洪水，粮食产量增长也非常显著——创造了青林大队历史上的第三高。70年代后期更频繁严重的洪水刚好证实了第二和第三章中提到的环境恶化的后果。

生产

人们常说，比如前面提到的崔大伟（David Zweig）的权威性解释，受文革中激进的农业政策危害最严重的是经济作物。文革中激进的农业政策在两个方面抑制了经济作物的生产。一方面是毛主席的自力更生哲学思想的提倡。为了养活这么多人口，同时又不能依赖进口，就只能督促农民牺牲经济作物来多种粮食。另一方面的原因更多地与意识形态有关。经济作物属于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东西，势必受到压制。激进政策认为市场化和商品化会滋生资本主义，而文革就是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文革时农业激进政策对这两点有明文规定，但它们对青林等地的影响却不明显。

从附录二表8可以看出，自1973年以来，棉花、油菜籽和芝麻产量有些减少，但实际上花生产量在这些年却上升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村民自己种的棉花、油菜籽和芝麻籽的产量从70年代中期下滑，同期花生和蔬菜产量出现了上涨（见附录二表5）。不仅如此，村民自己种植的烟草从1949至1972年间的每年9担上升到了1973年的12担，接下来几年又一直升，最后到了15担，但到1978年又降至12担。前一章中已经讲到，这个区域的经济作物生产有一个逐渐下滑的趋势，但这作为一种总体趋势，在文革前后其实都是如此。所以，与其说这是激进的农业政策导致的，还不如说是迫切需要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而导致的结果。

争夺权利和农村宗族关系

文革开始前的1966年，青林地区有三个生产大队，包括青林大队、西分大队和官田大队，而官田大队里有徐家村、曹家村和高家村。高常银是官田大队的支部书记。南面是曹家村，北面是高家村，两个村差不多大。两个村之间是徐家村，这个村有前面两个村加在一起那么大。

大队有四个重要的头头：队支部书记是高家村的高常银，会计是徐家村的徐从轩，副队长是曹家村的曹大江，队长是汪家村的汪标华——他不是官田大队的人，显然是来平衡三个村的权利的。理论上，支部书记权力最大，接着是队长，再是会计。而事实是，汪标华比他职位所应有的权力更大，大多数时候高常银要行使权力就必须和汪标华联合起来。因为高家村只有徐家村一半大小，高常银的权力基础比较薄弱。为了继续掌权，他尽力讨好徐家村的村民，高家村村民怪他从没给高家村办过好事。即使这样，高常银还是随时可能从钢丝绳上掉下来。他没掉下来只是因为有公社领导保护着他。文革一来，上面的保护没了，高常银也就下台了。

批斗高常银的两个“造反派”是徐从贵和高仁开，两人与高常银都有私人恩怨。徐从贵过去是徐家村生产小队的会计，1963年开始，中国农村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中展开了“四清”，为的就是打击基层干部的腐败。1964年运动波及到官田大队，徐从贵被发现有腐败问题，因而遭到罚款和撤职的处罚。由于徐从贵下台时，正好是高常银当大队书记，这样两人也就有了矛盾。

高常银和高仁开的结怨另有原因。高仁开是个篾匠，会用竹子编篮子之类的农家用具。他经常走东村去西村，出外做工，有时还在外过夜。也许因为他经常不在家，他老婆便和高常银勾搭上了。更糟的是，青林几乎人人都知道这个事，被带绿帽子在乡下可是丢尽脸面的事。当然高仁开不能把高常银怎么样，但文革却给了他机会。

文革一开始，徐从贵和高仁开变成了战友。党支部书记养情妇本身在政治上就有很大的负面后果，因为共产党员不应该在这方面出问题。然而，他们两个并没有用这件事打倒高常银。一方面，高仁开不想因为他老婆偷男人而使自己成为大家公开的笑料。不管怎样，被别人说成是个人报复总不好。他们还有更厉害的武器对付高常银。他们宣称掌握了高常银以前参加过反共九路军的事实。如果证据确凿，单这一项罪名就足够毁了高常银。根据高家村族长之一高仁允的说法，土改一开始，高常银成了入党积极分子就是因为他想借此赎罪。他积极支持共产党，表明对新政权的忠诚。高常银的努力没有白费，政府不仅没有追究他可能和地方土匪势力曾有的关联，还让他入了党，并当上了大队支部书记。

1966年文革开始，高仁开和徐从贵用这件事攻击高常银。他们写大字报贴到大队办公楼的墙上，控告高常银不仅参加了第九路军，还极力诋毁地下共产党员。带着发给文革“造反派”的工资和每日的补贴，他们到九江、景德镇和波阳县城收集证据，证明高常银不只是反共九路军的普通一员，还是其中的积极分子。

他们更是控告高常银企图用枪打死两个为逃避第九路军的追捕而途经高家村的地下党员。大字报上他俩说，当这两个地下党员从油墩街逃出来，跑进高家村前的山里面时，高常银拿起枪从后面向他们射击。高常银自然是矢口否认，但是这个控告足以让高常银官位不保。1969年，官田、西分和青林三个生产大队合并为一个青林大队，高常银被搁置在一边，成了在高家村赚工分的普通农民。因为高仁开和徐从贵找不到证据或证人证明高常银有枪，并向那两位共产党员开了枪，从而使那两个党员被捕，并被第九路军杀害，高常银才得以保留了党籍。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复职。

油墩街学校的文革情况

1967年，文革的热浪传到了油墩街。因为我的出身，我成了第一批红卫兵。我出身贫农家庭，学习成绩优异。红卫兵的首要活动就是写大字报批斗老师。我刚到学校一年，对被批斗的老师一无所知，什么也写不出来，为此我很沮丧。在我脑子里，这些老师都有些奇怪，他们和我了解的农民不一样，比如女老师穿高跟鞋我就觉得很奇怪。教我的五个老师中，有三个没结婚，其中一个是50岁的女老师。还有我们的女数学老师，她35岁了，个子高挑，长相也不错。对此，我同样觉着奇怪。我总是问自己，这些人有什么问题。我也是没想到我们学校的教务主任能长这么胖。每次他从我身边走过时，我总是偷偷地看他，直到他在我视线中消失了，我还在想，谁可能有这么大的肚子。英语这门课更是让我一头雾水。字母“w”发“dabuliu”的音，我就用三个汉字“打”、“不”和“六”来标注这个音。我纳闷这到底是什么鬼意思。

读到大字报里说，我们的地理老师洗澡时，总是让水温恰好保持在37℃，我很震惊。另一个老师被揭露不喜欢学校的厕所，他每次方便总要跑到附近的树林里。一些高年级学生抄了地理老师的家也就是他的办公室（他没有家人就住在办公室），没收了他的日记。在一篇日记里，这个可怜的光棍记录他有一次坐公交车时，对坐他旁边的妇女想入非非，结果批这个老师“思想肮脏”的大字报马上贴出来了。这些高年级学生见多识广，敏锐地把这定性为“资产阶级”行为。我佩服他们。但一些学生野蛮地打老师，我感到难以理解，很同情这些老师。我发现那些打老师的都是平时学业不好的学生。

1966年8月，我被选上作为一名学生代表去北京见毛主席。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坐火车。但一路上，我们还得自己带着被子。我的被子打满了补丁，不是因为我要显示革命的吃苦精神，而是因为这是我家唯一可带走的被子。我们一路上上下下，坐了四天的火车，一天到晚除了啃

饼干外就没有其他东西吃了。但我却很喜欢这为我们特制的饼干，吃起来很甜。这趟北京之行，来回花了将近一个月，令我非常开心。所有的东西都是那么新鲜、有趣，令我兴奋不已：长长的火车、喀嚓喀嚓的轮子声，平整开阔的北方平原、宽阔整洁的北京街道、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巨大的天安门广场。出于某些原因，我对紫禁城却并没多大的印象。现在看来，这可能是因为当时我认为它是落后的旧中国的代表之故吧。

在北京，我们就睡在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地板上。我们就像士兵一样，组织严密，纪律严谨。我们的组织都是军事化的，大家分成班、排、连。无论到哪里都带着毛主席的《红宝书》。坐在共交车上也唱革命歌曲，背诵毛主席语录。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学习北京红卫兵的革命经验，所以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阅读他们的大字报，甚至我都没有机会去看看长城。我贪婪地阅读着大字报，并尽量都记下来，也不管自己是否真正弄清上面写的是什么。到动身回来时，我已经有三大本密密麻麻记满了这些大字报内容的笔记本。其中有一条报道陶铸一次演讲的笔记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陶铸说，除了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外，其他谁都可以怀疑、可以“炮打”。我那时不明白这些事情，所有的事情离我的生活、我的视野似乎都太遥远了。

有一天，我们被带到天安门广场去见毛主席。我们早上五点就起来，坐在广场上等候毛主席的到来。我们被反复叮咛，坐在那里要安安静静，更不能乱动。我们与其他几百万红卫兵一起在广场上等了几个小时，不断地唱着革命歌曲，读毛主席语录，大声呼喊口号。大家都是那么年轻、那么激动，一点也感觉不到疲劳和厌倦。最后快到中午时，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坐着几辆敞蓬轿车出现了。车子开得很快，我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楚就过去了。一些人激动得大声喊叫，嗓子都嘶哑了，有些人还像小孩子那样哭了起来。我的感觉没有那么强烈，对我来说，这个过程太短暂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然而，回到村里，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我去北京见了毛主席，高家村人人都感到很自豪。他们不断地问我毛主席长得怎样。我不敢告诉他们，我其实并没有看清楚毛主席的样子，于是我根据照片上的样子，描述毛是如何如何。在村里人看来，我能够被选上去北京见毛主席，可不是普通的人物。甚至在我从北京回来后，我姐姐、姐夫的朋友，那些在我们看来很聪明的城里人，看我的眼光也不一样了。其中有个人还真的来给我看相，想知道我是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他们都认为我生来命就不一样，是大富大贵之命。

官田大队的文革情况

然而，我的运气并没有就此好起来。北京回来后，学校停办了，我的教育也就此中断。此外，我并没有真正弄清楚什么是文化大革命。一些高年级学生，没有被选去北京见毛主席，似乎却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他们“炮轰”油墩街乡政府“司令部”，夺取权力，穿上了人人都想得到的新军服，甚至还有新的自行车。看上去都是那么神气，这些“造反”的男学生成了学校里漂亮女生关注的对象。

1967年底，我卷起包裹准备回高家村，作为红卫兵，成了一名“保皇派”，而不是“造反派”。尽管我直接卷入到了打倒高常银的权力斗争中，但我还是以传统意义上的“对”和“错”来判断事情。在我看来，没有有效证据证明高常银参与过反共活动。我没有意识到这场斗争背后复杂的宗族联系和个人动机。我写了几百份大字报为高常银辩护，因此成了这个地方有名的写大字报“高手”。在那时，我并没有想过，自己为高常银辩护就是因为他是高家村人。

好几年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是被一些高家村人，如村里的赤脚医生高时华利用了，利用我保护另一个高家村人。事实上，大部分高家村人都不喜欢高常银。村里人都认为他非常傲慢、不讲情义，

总是为了自己的前程去巴结领导。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过去如何对待我的父亲，以及在阶级斗争中他与高常明对地主高天翔的粗暴和虚伪。然而，不可否认，打倒高常银已经伤害到了高家村的声誉。尽管没有其他人公开站出来保护他，但也几乎没有谁真的愿意看到高常银的垮台。事实上，我卷入进去，主要是因为受了高时华的鼓励，他给我提供了各种需要的信息。

同样，我也是在多年后才知道，高时华鼓动我保护高常银，是有其个人目的的。高时华和高仁开的父亲是兄弟，两家曾共住在一栋房子里。兄弟两人商议好不拆老房子，弟弟也同意哥哥多住一间房。然而，两家的人口越来越多，小一辈的人之间常常发生些摩擦，主要就是因为哥哥多住的那间房。两家的争吵越来越多，关系越来越僵，以至于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彼此都不说话。高时华开始憎恨高仁开，不想他在政治上成功发展。

高时华想保护高常银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1967年，徐从贵的弟弟徐从春也开始学医。高时华敏锐的政治嗅觉告诉他自己，如果徐从贵达到了他的政治目的，那么，要么是徐从贵自己，要么是徐家村的另外一个人将会掌管官田大队。最后的结局必然是提拔徐从春当大队医生，那么徐从春就有机会获得城市户口。

高时华的政治意识后来真的得到了证实。高常银一下台，徐从贵就成为官田大队革委会主任，但1969年三个大队合并为青林大队时，他却并没有什么更进一步的提升。大队合并时，来自江家村的人成了青田大队的主要领导，主要是因为江家村是个大村子，是徐家村的三倍。江家村的人掌管青林大队一直到1981年大队解散。青林大队解散后，高家村、曹家村、徐家村又再次组成一个单位，叫官田村委会。自1981年后，官田村委会的主要领导就由徐家村人担任了。

在1967年那阵子，我完全不了解这些复杂的地方政治。我只是认为保护高常银是对的，就这样做了。高常银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件事，

其他高家村人也没有。尽管我作为红卫兵在前面，高时华在背后，我们一起为高常银辩护，但他最后还是给推下了台。高常银的儿子高朝栋那时是高中里的红卫兵，也帮不了他父亲。他那时很少回家，成天忙着在县城里搞造反、搞各派间的战斗。

“阶级敌人”和村里的宗族关系

文革期间，官田大队和高家村发生的另一件事就是斗地主和富农。斗争的起源和过程都与宗族关系紧密相连。为帮助理解宗族关系在这件事情上的作用，有必要先解释下村里的宗族情况。

虽然所有高家村人都传自同一个祖先，但在谱系上却分属五个不同的分支，因为他们分别是老祖先的五个儿子的后代。每个分支又都是一个整体，分支内的人彼此间的关系也要密切得多。比如，困难的日子里，哪户人家想要人帮忙，首先想到的是找同属一个分支的人家。甚至小孩玩耍时，彼此间打斗，也是同一个宗族的孩子会彼此帮忙打其它分支的小孩。

有件事可以说明，村民们是如何各自认同自己的那一分支的。这个例子牵涉到高水兰的婚姻。高水兰是富农高尽享的女儿，那时她不仅是村里最漂亮，也是最聪明的女孩。虽然只上了三年学，但她自己却能读书识字。文革时，高家村组成了一个戏班，高水兰就出演两本京剧样板戏的主角（其一是阿庆嫂），成为当地有名的女演员。高水兰家在村里的那一分支很小，想娶她的高常权家也属村里的一个小分支。但是高家村里最大一个宗族的几个男孩想阻止这场婚姻。他们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嫉妒高水兰要嫁给高常权。那时高常权长得既强壮，又能干，随时能抵制来自高家村大的宗族分支的挑衅。阻挡婚姻的这帮人以高朝栋为首，他是前任村支书高常银的儿子，又是当时村里唯一的高中毕业生。但最终，在同一宗族长辈高常余的劝说下，他们几个还是收回了阻挡计划，

高水兰和高常权两人的婚姻还是继续了下去。那些人不再干涉这个婚姻的原因主要是最合适娶高水兰的高朝栋是不会和高水兰结婚的，因为高水兰是富农的女儿，成分划分上属于阶级敌人。

在村里事务，特别是选谁当小队队长和会计方面，需要多方面的考虑，来维持村里各个宗族之间的权力平衡。高家村五个分支中最大的一支正好包括高常银一家。高常银倒台后，村里两个生产小组合并，原来担任其中一个小组会计的高常财也随之被撤职，主要原因就是他是高常银的弟弟。1969年后，大队就总是小心地避免任命高常银那一分支的人担任小队队长，担心高常银会垄断高家村的权力。

但唯一的例外是高常余。虽然他也属于高常银这一分支，但当过两届小队长。他被当选，原因就是他不仅确实很能干，既吃苦耐劳也比较公平，而且大家都知道他与高常银的私人关系很差。高常余不喜欢高常银，主要是因为他讨厌当年高常银为了自己的前途，粗暴、不公正地对待地主高天翔。当然，高常余也一直没有得到大队领导的信任，因为作为地主高天翔的侄子，他无法掩饰自己对高天翔的同情。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小队里的情况不妙，需要一位好队长，他就会被任命为队长来处理麻烦事；但一强调阶级斗争的政策，他就又会被撤职。

在高常银被撤职后，文革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地主和富农成了斗争的对象。上面没有任何指示和命令，也没有谁说过，要斗哪个地主和富农、怎样斗、由谁来斗。但当时的政治气候就是谁都可以随意把地主和富农揪到批斗会上来。通常没有谁还对地主和富农有什么个人的怨恨，这是因为，自1949年后的很长一段时期，这些地主和富农并没有被当作人看。被划分为地主和富农后几乎20多年，他们一直就被贴着阶级敌人的标签。粗暴的迫害、羞辱和不公正的歧视早已让他们没有权利为自己的利益辩护了。他们不敢拒绝任何人，也不敢冒犯任何一位村民。

即使在1949年前对地主富农有过怨恨的穷人，这么多年后也没有什么私人恩怨了。因此，当政治气候使文革的目标转向这些地主和富农

时，高家村并没有什么人采取行动，来打击地主高天翔和富农高尽享。只有一位高朝银，他当时是官田大队革委会委员，他家在高家村属于一个小的分支。他来到高天翔家，要高天翔交出所有的书。高天翔顺从地交出了所有书，整整一箱，全是中医医书，然而高朝银又把书上交给了官田大队革委会，当时正好是徐从贵当主任，徐从贵就把所有的医书都给了他学医的弟弟。

与此同时，青林学校的那些小红卫兵们也正在到处寻找阶级斗争的目标，他们把目光转向了这些地主和富农。但由于父母的管制，加上生活在错综复杂的宗族关系中，他们不能也不想批斗自己村里的地主和富农，因此就把目光投向邻近的其它村子。学校里，高常银那一分支的几个7到12岁的小红卫兵就挑出了徐家村的反革命分子徐添云作为斗争对象。他们搜查徐添云的家，给他开批斗会，拳打脚踢，还押着他到各村游行。而学校里徐家村的小孩也一样批斗高天翔。

由于政策允许斗争阶级敌人，没有一个村子可以保护自己的村里人。这时期高家村的其他阶级敌人没有被批斗，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富农高尽享早在1960年就死了，家属通常不是斗争的目标；另一个原因是高尽享不属于高常银那个分支，但高天翔却是。很显然，国家政策、宗族结构和派系一起发生作用，左右了这群不幸的人是否成为文革的斗争目标。

公社和大队的领导都很清楚村里的宗族和派系会保护各族自己的人，他们也同情属于自己宗族的地主和富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增强阶级斗争的气氛，更好地监督“阶级敌人”，公社就命令所有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搬出各自的村子。1969年9月，高天翔一家就搬到了江家村，富农高尽享家也搬到了徐家村。同样，江家村的一户富农和一户地主也被迫搬到了高家村来住。直到1979年2月，他们才各自搬回原来的村子。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把这些人赶出自己的村子，最后达到的效果却与公社领导预想的情况截然不同。远离了这些早就想摆脱的

复杂的宗族关系网，这些地主和富农不再与各自村里的宗族冲突有联系。他们努力劳动挣工分，也不卷入当地任何的宗族纠纷。作为毫无利害关系的外村人，没有谁在意他们。村里其他人反而都对他们非常友好，因为再没有什么人会指责村民对“阶级敌人”友好是出于宗族关系的考虑。高家村人对从江家村搬来的这两户人家都非常客气，总是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客人，有时甚至比客人还要尊重。1994年，我曾和这两户先搬进后又搬出高家村的人家有过交谈。他们告诉我说，1969到1979这十年，是他们生活中最好的日子。他们总是念念不忘这过去的十年，常常会回到那生活了十年的村里去看看。

另一位宗族关系的受害者

1971年高常银事件的另一个转折点让我也成为文革的受害者。同样，这件事也与高家村里的宗族冲突有关。事情的起因是我想找些纸来练毛笔字。1971年，我成了高家村学校的“赤脚老师”，由于要常写大字报，还要教学生练字，我渐渐对书法越来越感兴趣，通常每天都要花半小时练字。然而，我却无法想练多久就练多久，因为没有练字用的纸。那时在中国农村，纸是很缺乏的，村民不可能买到很多纸。在高家村，有的村民甚至都没有纸上厕所，他们就只得用薄竹片或树叶来代替厕纸。为了练字，我常常到处找纸。如果能找到旧报纸，就拿来练字，还常常在一张纸上写了一遍，干了又写一遍，反复几次，直到全都是黑的，实在不能写为止。

一天，我在生产队的储藏室里发现了一堆纸，是记载高家村宗族各系的族谱。我十分高兴，以为这是一堆废纸，就拿了几页回家练字。这些族谱在高家村已经保存了好多年，用的都是上等的宣纸。族谱里记载着从第一代高家村人以来，所有出生在高家村的人的情况。村里每个分支，族谱里都有详细的记录。我拿这些纸的时候，房子里并不只我一

人，还有高常银的弟弟高常财和我在油墩街学校的同学高朝江。高朝江和高朝银一样同属村里的一个小分支，而我家则和高常银同属一个分支。

在那时，两个分支间已经有摩擦，因为高朝银替换高常银代表高家村当选为大队革委会委员，而高常银在文革一开始就倒台了。这样做的理由是大队革委会里每村至少要有一个代表，高常银的倒台就意味着高朝银的提拔，因此两个分支间的矛盾就不可避免了。

1973年，青林地区出现了文革的另一波高潮，叫一打三反。一个由两人组成的工作组被派到高家村监督一打三反运动。这两个人都是来自江家村的村干部，我私下里也认识他们。当地组织者在这次运动中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扫除被看作是“封建”遗毒的族谱。因此，所有族谱都要被没收并烧毁。当时，我根本没有意识到宗族冲突的真正含义，就想都不想随手拿了几页。

实际上，我当时的想法和官方政策是一致的，在我的思想意识中，也认为保存村里的族谱是一种封建行为，但又想到这么好的纸最好是能先用来练练字而不是就这么烧掉。当时我还是有点害怕，这也是我不敢全部拿来的原因。但我并不是怕被人说成保留封建族谱，而是担忧，在没有被允许的情况下拿东西，会发生什么事情，自己不敢确定。然而，我知道如果向他们说，他们也肯定不会同意。这样，我就拿了一些，希望工作组不会注意到这几页失去的族谱。我的错误在于我从来都没有好好想过当时在高家村发生的事情，我轻率地拿走了这几张“毫无用处”的东西，根本没有想到高朝江会去工作组告发我。事实是，高朝江去了，他告发了我。

还有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也给我添了麻烦。那段时期，我精神上感到有点苦闷，村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激起我的兴趣。那年，两位医生也离开了高家村，村里甚至没有一张报纸可读。当然，我也买不起收音机，也没有书看。我已经把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看了好几遍。我还买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工资、价格和利润》，恩格斯的《反杜林论》

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和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我花了很多时间读着这些干巴巴的书，过了不久，就觉得十分乏味，便又开始读一些中国古典名著。一天傍晚，我坐在自家门槛上读古典小说《水浒》，工作组的一位成员正好从我家门前经过，他和我打了下招呼，问我在读些什么。我把书给他看了看，接着他就说要把那书拿去看看。我没说一句话就让他把书拿走了。后来，我就被指责成是在读“封建黄书”。

因此，我犯了两项罪。一是保存“封建族谱”，二是读“黄色封建书籍”。我被停职，不能再教书，并被带到青林学校让群众批斗。把我关在青林学校，显然是因为我是老师，那么批斗我的“人民群众”也应该都是老师。“批斗会”连续进行了两个星期，每天晚上，我都被命令坐在一条板凳上，周围都是要来批斗我的青林学校老师。晚上接受他们的批斗，白天写认罪书。我不能回家，饭也只能在学校里吃。我母亲被允许来看过我一次，她当时说不出一句话，只是不停地流泪。在“批斗会”上，只有两位老师说话，其他人只是坐在那里，看着这两个人在导演这场“戏”。

这两个人就是青林学校的校长江镜环和徐先灯。这两个人，特别是徐先灯，对我大喊大叫，啪啪拍打着桌子，要我交代一切问题。江镜环是个典型的小官僚，上级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这也是他为什么能保住校长这个位子的原因。他有城市户口，还领着国家工资。在被派到青林学校以前，他在好几所学校干过。但在其他它学校，他总是与别的老师发生摩擦。然而，他一直能当校长，主要原因还是他能不折不扣地听从上级的话。

徐先灯的情况又是另一回事。我是后来才明白，让我在青林学校接受批斗的主意完全是为了徐先灯的便利。徐先灯娶了徐从贵的妹妹，整件事背后的阴谋就是徐从贵想要继续整垮高常银。到1971年，高常银依然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很有可能会重新上台。尽管他失去了领导职

位，但也并没有完全倒下。没有证据证明他1948年真的试图开枪射杀两名地下共产党员，他不仅保留着共产党员的身份，在高家村依然还有很大的权力和影响，因为他家是高家村宗族中的大分支，有很大的势力。高家村的任何重大决定，名义上掌权的高朝银都必须与他商量，否则就有可能无法实施。

徐从贵想要的就是让我承认，是高常银指使我藏下族谱的。因此他派他的弟婿徐先灯来做这件事，这样既符合政策，又很方便，因为我和他都是老师。但是，徐先灯不敢明明白白地说出来，他想要的就是让我检举高常银。自然，我一直坚持说自己并没有保存封建族谱，我反复申辩说，我只不过是想拿几张纸练字而已，而且我确实是在上面写字了。徐先灯知道我说的是真的，但还是一直坚持希望我承认，并且还给我写好了一份“认罪书”，说高常银是背后的主谋。但我拒绝签字。最后我在另外一份“认罪书”上签了字，承认自己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读《水浒》和拿了几页族谱，这才被允许回家。

文化大革命的革新

然而，文化大革命却不只是政治上的攻击和宗族间的阴谋争斗。至少对青林地区的人而言，确实有狭义上的文化的革命。与党的干部和知识精英相比，文化大革命对村民在政治上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从文化上讲，他们反而受益较多。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影响反映在四个基本方面：教育水平的提高，前所未有的文化和体育活动，宗族间冲突反而部分减轻，以及国家在农村生活中的作用得到健康的扩展。

教育方面

由于实施各种教育改革措施如“赤脚老师”制度等，高家村村民的文化水平得到了迅速提高。1969年高家村建立了一所招收一到三年级学

生的村办学校。当时农村这些村办学校取得很大的成功，甚至在后毛泽东时代，当地政府都没有解散它们。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带动，高家村不可能会有一所村办学校。由于有了这所学校，几乎高家村的所有小孩都接受了至少两年的学校教育。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的小孩，包括女孩，都获得了三年的小学教育。能达到这种状况，不仅是因为村办学校使得小孩上学更为方便，还因为学费也很低。“赤脚老师”也像其他村民一样，工资也是以工分计算。并且，书价在政府的规定下，也非常低。

文革期间，父母愿意把小孩送到学校读书的另一个根本原因是，激进的农村政策非常平等，农民没有理由不送孩子去读书。公社制度的最显著的平等措施是基本口粮全部按人口平均分配。因此，那些劳动力多、孩子少的家庭实际上是在补贴孩子多、劳动力少的人家。换句话说，在那些赤字与有盈余的家庭间，在粮食收入方面就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收入的差别主要来自各家的日常开销和自留地的粮食产量。一个家庭给公社的贡献，即在生产队的劳动量，与生产队分配给他们的报酬是不一致的。负债还是盈余只是体现在帐本上，不知道要拖到哪一年才会兑现。

事实上，正是这点也成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解散公社体制的基本理由。理论上说，个人的劳动付出如没有得到回报，就不会有动力努力工作。因而，一些中国和外国学者就借此认为公社制度鼓励的是懒惰，奖励的是那些不愿意工作的人。然而，我个人的经历和青林大队的生产统计数据却并不支持这一说法。村民确实都是勤苦劳作的，但也不是像当时官方宣传的那样，都是大公无私，在为实现一个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努力，他们实际上就像地球上的所有人一样，经济上都是精打细算。尽管缺乏一个劳有所得的有效奖励体制，他们仍努力劳动，原因在于他们有长远的考虑。

家庭运气的好坏是难以预测的，每个家庭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遇

到困难。那些现在孩子还比较少的家庭，几年后有可能孩子就会多起来；一个壮劳力也可能会突然生病。从长远来看，这一制度照顾到了每个人。更重要的是，还有一套复杂却人人熟知的监督制度，如每年都会计算底工分。村民彼此都很熟悉，故意偷懒是很难逃过其他村民的眼睛的。因为生活的群体都很小，彼此间的关系也很密切，村民相互间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所有的村民一起在小队或小组劳动的时候，每个人都得努力工作，如果一个人没有全力劳动，就会被大家指出来，受到公开指责，甚至是非常严厉的批评。此外，也不是完全没有直接的劳动奖励，比如，生产队收成还不错的时候，那些进钱户在年终的时候就会分得一些现金。遇到急事的时候，他们还能从生产队借到一些现金。过年的时候，如果赤字户杀头猪过年，就会拿一些猪肉抵债给村里的进钱户。

尽管这一体制有很多的缺陷，但最终都没有理由让小孩去劳动来增加家庭的收入，再加上学费又很低，因此，家长都愿意把孩子送到学校去读书。只有个别的例外，一般是父母都得去地里干活，而家里牙牙学语的婴儿无人照看时，家中年纪大本该上学的孩子就只得留下来照顾弟弟或妹妹。但即使是这样，行事方便灵活的村办小学也能够解决这一问题。

1981年，后毛泽东政权摧毁了公社制度后，高家村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那些送小孩读书的人家就必须要支付，至少是部分支付老师的工资，因为他们要给孩子交学费。第二，一些家庭就有可能被迫让孩子去地里干活来减轻家里的负担，因为家家户户都靠自己了，不再是集体劳动。第三，村办学校的老师不会再允许学生带着弟弟或妹妹来上学，边照顾小孩边读书，因为老师有提高教育质量的巨大压力。这一点已在第七章中讨论过。

有证据表明，高家村的教育状况从文革后的80年代初期开始，已经逐渐恶化，这一点同样在前面第七章已有过详细论述。这一恶化的趋

势后来得到改善，并不是由于政府对农村的教育投入，而是远离高家村的中国南方工业发展的结果。那儿迅猛发展的工业在像高家村这样的地区激起了一波外出打工的浪潮。这一点将在后面第十一章详细论述。

文化活动

中国知识界和一些外国学者经常宣称文化大革命焚烧书籍、抨击传统中国文化，使得中国成为文化的荒漠。对于城市居民和精英知识分子是否确实如此，并不是本书要讨论的要点，但对于像青林地区的农村人而言，这种概括性的论断却有点言过其实。首先，这些地方无书可烧。地主高天翔的书被没收，但却没有被烧掉，而其他村民几乎连纸都很少见到。至于其它传统的中国文化，不管有没有文化大革命，有的东西本身也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被人们抛弃。第六章中我曾描述了村民扮演王太公，给人开药方的做法，对于诸如此类，包括记录家谱这样的做法，我看不出它们对高家村的村民有什么积极的影响。但其它一些传统文化习俗，如春节、端午节、祭拜祖先和死者的清明节以及中秋节等，在文革期间还是像往常一样举行，只是有时没那么大张旗鼓，这点在随后的第十二章将详细阐述。

文革前，整个青林地区找不到一台照相机，也没有一座戏院。文革前和文革期间，波阳县城和油墩街地区各有一家戏院，上演一些地方戏，但是这些戏只是演给那些城镇居民和共产党干部看的，青林地区的普通村民从来没有机会去戏院看这些戏。文革前高家村有一支村民自发组成的乐队，有一架鼓、几口锣和一对喇叭。村里也常常有会拉二胡的人。遇上婚嫁丧娶，村民就会坐在一起，吹打几支民间曲子。他们既没有乐谱，也没有歌词，这些曲子完全是靠口耳相授才传下来的。文革期间，乐队还一直保留着，也时常在结婚和送葬的时候吹奏和演出。只是在1971年，工作组进驻高家村后，乐队才停止了演出。1980年，当我

从英国回到高家村时，村乐队在我家房前敲锣打鼓、喇叭齐鸣，以庆祝我回到家乡。

其它的文化活动如庙会等在这个地区从来没有举办过。文革期间，高家村只有两样事情停了下来：一是扮演王太公，一是续写族谱。但自80年代以来，人们又开始重修族谱，不过年轻人却不再相信王太公之类装神弄鬼的事了，村里也找不到王太公的塑像。

此外，文革期间，这里也有些文革前从未有过的文化活动，但在文革结束后又销声匿迹了，再也没有出现过。1968–1973年间，青林地区出现了很多剧团，经常演出八本样板戏。这主要是受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的推动，以及电影和广播中大肆宣传和播送的结果。青林学校和青林大队也有这样的剧团，甚至高家村也有个演出队。村里不少人都参与其中，包括富农的女儿、儿子和地主的儿子。年长的在乐队里吹吹打打，年轻的就扮演各种角色。没有专业的导演，所有演员都是业余的，只是在闲暇时才演戏。所有的编排和演出都非常简单，因为他们演的这些剧，村民早已在广播和电影里听过、看过好多次了，甚至都能背出其中著名的几句台词来。演员要做的只不过就是把台词变成人人熟知的当地方言土调。其它的动作，就像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只要模仿下就可以了。

大概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高家村演出队共上演了四本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红色娘子军》和《沙家浜》。他们有时还被邀请到较远的一些村子演出。通过阅读和背诵这些台词，高家村人的文化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与此同时，演戏也丰富了他们的文化生活。这在高家村可是史无前例的，无论是在文革前还是文革后都是村民文化生活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这些文化活动能在文革时出现主要有一个原因。首先是文化大革命创造了文化革新的氛围，激发了各个地方的创造性。这些演出极富创新性，虽然台词和动作是模仿京剧的，但音乐却是采用当地的民间曲调，

既有文化上的乐观主义也体现了集体创作的精神。由于国家的宣传机器不断重复展示，演出就变得比较容易了。他们的演出都不是很复杂，这样做也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虽然演出队的排练大都安排在晚上和雨天进行，但所有演出都受到了生产小队的资助。生产队要给外出演出的队员同样记全天工分，在他们排练时还要给补助，服装和其它开支也由生产队支付。没有一个集体体制的支持，所有事情根本不可能完成，甚至想都不敢想。

体育运动

一些高家村人如今还能以怀念的心情记得的活动就是体育运动。通常说来，农村人，特别是老年人，都不大在意体育运动，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但是，当大队干部组织各村进行体育比赛时，年轻人都很踊跃参加，这不仅仅是因为政府提出了要求，更是因为每个人都想给自己的村子争光。不管怎么说，参加比赛的青年人都很开心。并且，虽然有些老年人在抱怨，但他们只要参加了比赛，还一样可以得工分。事实上，这里的村民也仅只是参加了篮球比赛，因为篮球既容易学，可以参加的人又远比打乒乓球的人多。令当时村里年轻人非常高兴的是，高家村甚至还建了一个篮球场。在农闲或过节的时候，篮球场就成了户外活动的中心。篮球不仅给村里年轻人带来了许多乐趣，也增强了村民的团队精神，促进了村与村之间的交流。在后毛泽东时代，组织这样的比赛在村民看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甚至学校都很少有体育活动了，因为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必须投入到学习竞争中去。集体精神完全轰塌，甚至在青林学校都无法安置下一个篮球场。1994年，我要青林学校的校长解释一下原因，他的回答竟然非常简单，篮球场的设施都被村民拿走了。

村内通婚

像以往一样，文革期间青林地区的地方政治是与各村的宗族势力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同样，高家村的政治又是与村里各个宗派分支相联结的，这可以从文革初批斗高常银的事情中看出来。然而，到文革结束时，各种复杂的宗派冲突和摩擦反而大大减少了。表面看来，这是由于文革期间政府鼓吹和大力宣传反对传统文化的结果。实际上，只要仔细考察下那时的家庭构成，就会发现，原因主要来自家庭结构的变化。不同分支间的婚姻关系开始扩大，一旦两个不同的分支间有了通婚，两个宗族或宗族的两个不同分支间的分歧就立即淡化了。

1949年以前，高家村内没有一例村内通婚的家庭，婚姻通常都是由媒婆安排的。到文革前，村里只有一户是村内通婚，男方入赘到女方家。入赘过去是，现在依然是男人的一个耻辱，常常只有无父母的孤儿、穷苦无依的人、无望无助的人才会同意入赘。而高家村这户同意入赘，有很多的原因。女方高梅花不仅人长得漂亮——这可在任何时候都是好资本，而且又是最能干的女人，她挣的底工分是村里女人中最高的。其次，高梅花家境也不错，有一栋大房子，但是她父母生了四个女儿，没有儿子来继承家业。第三，男方高常钦兄弟四个，三个哥哥已经结婚，都有了小孩，家里房子虽然也很大，但全家这么多人都挤在一起，高常钦虽已到了结婚的年龄，但家里却实在空不出一间房给他结婚用。因此，招赘就成了两家最好的解决办法。即使这样，生性高傲的高常钦也还是不喜欢这样做，在父母和哥哥们要他结婚入赘时，他还是极为不开心。

文化大革命以来，高家村出现了八户村内通婚的家庭。并且，这些婚姻都不是由于家庭环境而被迫的。事实上，父母当时都反对过，但最后年轻人都坚持要结婚。原因也不难发现，首先，高家村的年轻人受过更好的教育，因此不可能接受包办婚姻。更重要的是，文革时的集体生

活和文化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有利于年轻人建立亲密关系。至少有两对婚姻，是男女一起演戏时产生好感的结果。其中一对就是富农的女儿高水兰和后来成为生产队长的高常权。

集体劳动的制度也催生了许多浪漫故事。大家一起劳动，常常会搞点幽默，开几句玩笑话。年轻人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晚上都聚在生产队记自己的工分。这就给他们提供了机会展开各自的追求。确实，即使是在传统中国，中国农村的穷人们在两性关系上也不像知识精英那样约束自己，但妇女参加公共活动，在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方面获得解放，其表现得明显和深入的程度，在青林地区，文革期间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比如，正是通过当地的民兵军事训练活动，高朝信和江同俄才互相爱慕，并结婚组成家庭。

国家机器

1949年以前，青林地区的村庄仍然是一个个彼此分离的个体，每个村子都是独立的、自给自足的个体，政府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在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公社制曾一度使得国家可以介入这些个体中，但直到70年代初期，国家的介入依然是有限的，因为这些地方的经济还是完全的农业经济，具有很强的自足性。生产小队和生产大队这种结构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没有摧毁村里的宗族和分属关系。因而，青林地区的村子还是彼此分离的个体。到70年代初，文革的一些政策才使得国家和村民的关系紧密了些。

吊诡的是，这种密切关系并不是因国家的粗暴干涉才产生的，如后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政策，相反，这种国家与农村的紧密性是通过鼓励地方的积极性才创造出来的。首先，教育的发展，建立村办学校和“赤脚老师”制度让更多的村民进入到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当时，国家和地方政府间在组织结构上有更为方便直接的联系。比如，文革前，无

论是公社还是大队，更不用说生产小队，都没有权力管理地方的教育。在哪里建学校，派什么老师，派多少老师等等都是由上级政府制订计划和安排。村民和地方干部完全由政府统一管理，政府根据情况决定给还是不给教育资源，而村民和地方干部无权干涉。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要鼓励发展地方的积极性，这种做法被改掉了。这种变化状况同样发生在农村的医疗卫生方面。这也是为什么在1972年以前的《大队台账》中没有教育和医疗卫生等相关数据。此前，地方政府根本无法得到这些统计数据。

同样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政府动员广大村民修建了许多水利灌溉工程，有的工程甚至调动了成千上万的群众参加。为修建这些工程动员这么多的人，并且这些村民都是义务劳动没有报酬，这种情况在当今的中国是不可能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地方民兵。青林地区的民兵组织在文化大革命前后都一直存在。但也正是在文革期间，这些年轻的男女民兵才得以全面、有效地组织起来，人人都有很高的成就感。这些民兵队员被有效组织起来，进行军事训练、修建大队的基础设施、参与各种文化和体育活动等。青林的民兵队员并没有像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被灌输好战的思想去打倒阶级敌人和外国侵略者。他们的训练既有组织性，又很实用，要求培养团队精神，培养某种目标感和纪律性。在青林地区，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政府把真枪实弹发到农民手上。

国家和村队间的行政联系也反映在对地方政府的地理安排和组织形式上。青林大队的队部就位于该地区的正中心，由三栋坐落在一起的房子组成。一栋房子里安排村诊所、一家小店和食堂，另一栋用作大队办公室，还有一栋是大队的会议室。大队正式干部是五位：党支书、队长、妇女主任、大队会计和民兵连长。他们的工资由村民支付，并全职处理大队的日常事务。在大队和公社，公社和县政府间，一直存在着一条沟通的渠道。

在后毛泽东时代，青林大队被分成三个小的村委会，原来大队队部的房子都拆了分给各村。各村村委会又有五名成员，加在一起就是文革时大队干部的三倍。这些村干部拿的都是村里的全职工资，但并不是全天上班。村里既没有办公的地方，组织结构上也缺乏和乡政府直接沟通的管理渠道。这些村干部更不会组织文化和体育活动，他们的工作也很少顾及到当地的教育和医疗卫生。就像1949前的村保一样，村委会的职责好像就仅仅是为国家收税，给村干部收提留。就这么一个举动，文化大革命期间建立的国家机器就被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府一夜间撕扯粉碎，村里的社会结构又倒退到了1949年以前的样子，甚至连“乡”这个名称也是1949年前曾经用过的。然而，人人都把这种“复旧”称之为“邓小平改革”。

地方企业和水利工程

文革期间还有一些其它的创举。比如说，第一个大队企业——榨油坊，就是在1973年建立的。1974年又建立了另外一家大队企业。到1976年，青林大队有了七家大队企业。1972年大队开始有了碾米机、面粉机、轧棉机、柴油机，到1976年，大队有10架柴油机、7台碾米机、1台面粉机和2台轧棉机。1973年，青林大队开始采用机械灌溉，到1976年，大队有了12台水泵灌溉稻田。高家村还买了柴油机，来带动水泵灌溉农田。而在此前，所有农田灌溉都是靠传统的水车。在这一时期，还建立了其它许多新的项目，如养鱼场、林场、养猪场和农业实验站。此外还有许多的技术革新，如在早春用塑料膜给稻种催芽等。但所有这些革新和工程项目如果与文革时许多耗费大量劳力的巨大的水利基础工程相比，都算不上什么。1967–1968年，青林大队在没有任何外部和政府的帮助下，独自建立了三座巨大的水坝，即青林大坝、西分大坝和官田大坝。三座大坝加在一起有九公里长，共用土石七百多万立

方，全部是村民用铁锹、铁铲挖起来，用扁担和篮子挑上去的。

可以用几个要点来总结本章。第一，与城镇地区不一样，文革期间像高家村这样的农村地区没有许多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动乱。这有个主要的原因：一是农村没有许多知识分子和党的高级干部，这样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即受害者自然就比较少。当时农村缺少各种可怕的暴力行为，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农村的高中生和大学生很少，而这些年轻人却是城镇里最激进、最有暴力倾向的造反者。像高常银这样的农村党员干部是遭受到了迫害，但程度远不及城里人。文革期间，地主和富农家庭也受到了打击，但这种情况不仅仅只发生在文革时期，从1949年以来，地主和富农就一直是阶级斗争的对象，他们受斗争的历史一直到80年代才结束。

第二，文革期间的国家政策是和当地的宗族势力交织在一起的，实施过程中相互影响。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斗争的政治氛围，而这种斗争则实际发生在农村不同的宗族或宗族分支间。徐家村民批斗高天翔，而高家村就打倒徐添云。文革的政治气候也为农村居民出于个人恩怨进行报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徐从贵想要扳倒高常银，就是因为徐从贵是在高常银当权时的一次四清运动中被解职、受到处罚的。高仁开想打倒高常银则是因为高常银和高仁开的老婆有一腿。高朝江向工作组举报我，因为他家所在的宗族分支刚好与我家那派相互不和。

第三，文革期间，像高家村这些农村地区，不仅农业生产活动没有受到干预，并且在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等方面还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农村在教育、医疗和文化方面的改善并没有花政府的钱，而是在文革激进的农村政策的鼓励下，当地村民集体努力的结果。从这些方面来看，文化大革命是一段具有积极作用的革新时期，这些革新举措使农村居民受益良多。

注 释

1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著作极为丰富，即使是择要略举，也将不胜篇幅。如需对这方面的文献有更综合性的考察和评价，可参考Mobo C. F. Gao, "Maoist Discourse and Critique of the Present Assessmen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6, no. 3 (1994): 3–21; 以及Mobo C. F. Gao, "Memoir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7, no. 1 (1995): 49–57.

第10章

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

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公社体制的解体。在公社体制下，除了分配给村民的小块私人土地外，土地在理论上归公社集体所有，由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经营管理；但实际上，土地归各村所有，由各生产小队经营管理。公社体制解体后，土地在理论上归国家所有，由各户经营管理；可事实上，由各户经营管理的土地依然归各村所有。例如：如果国家要在某块土地上兴建一家工厂，国家或有关企业必须给土地所在的村子支付一笔赔偿金。同样的，如果某村民想在某块土地上建房屋，他也必须向村子缴纳一笔钱。

当公社体制于1981年解散时，高家村把所有的土地都集中起来，再按人口把土地分给各家各户，即：每人分得同样多的土地。现在，各家经营自己的土地，觉得土地适合种什么就种什么，国家只要求村民上缴一定数额的农业税。为了避免私有化给意识形态带来污点，中国政府先把这个分地到户的工程称作“生产责任制”，表明土地并不归各家各户所有，虽然他们有权支配土地。到了1984年，政府再次告知村民说，这个体制至少会维持15年不变甚至更久。为了稳定农村形势、鼓励投资，中国政府后来又进一步宣布，生产责任制会无期限地持续下去。在

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初期，高家村每五年把本村土地重新分配一次，以平衡各家各户因生死嫁娶等造成的人口数目变化。1994年，中国政府决定通知村民不必再重新分配土地。因而，不管各家各户人口如何变化，现在的分配制度依然保持不变。

从理论上看，公社体制的解体和各家各户平均分配土地并没有什么大胆之处，实际上，整个理念意味着20世纪50年代初实行的“耕者有其田”计划的恢复。为了消除对所谓的农村改革的误解，我们必须明确以下几点。第一，农村改革不是邓小平的想法或政策。70年代后期，四川和安徽两省的农民开始悄悄地搞这项实践，后来还得到了两省省委书记赵紫阳和万里的支持——赵紫阳后来当上国家总理，接着还担任过中央总书记；万里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

第二，公社体制于1978年在全中国范围解体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在江西省，1979年只有69.5%的村庄实行生产责任制。到1981年，采用责任制的村庄上升到92.6%，1982年，这一比例上升到99.3%。[2]而高家村直到1981年才分田到户。

第三，仅仅是公社体制解体本身导致了中国农民收入急剧上升的说法是不正确的。[3]所谓的通过“私有化”来解放生产力的看法不应该被浪漫化，事实上，在促进农村收入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是政府允许提高农产品的价格。

第四，认为公社体制在全国破产，农民毫无保留地欢迎它的破灭，这种观点也是不正确的。从粮食产品的增长速度来说，公社阶段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糟糕。事实上，从1959年到1977年，粮食产品的年增长速度为2.9%，并不明显低于改革阶段（1978–1990）的3%的年增长速度。[4]因此，人们毫不奇怪地发现，有一些公社多年来一直抵制着政策的变化，而且由于社员不愿意公社解体，公社体制到90年代依然发挥着某些作用。[5]

另一方面，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除了消灭了公社体

制，同时也摒弃了前几十年中形成的某些积极的创造性因素。如上章所述，曾经普遍高效、本质清廉的国家机器随着公社体制的解体而消失。在青林地区，解体的不仅是生产队的组织机构，还有队部所在地的建筑。地方权力结构及管理村庄事务的水平几乎回复到1949年以前的状态，似乎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从未发生。至于90年代，腐败和粗暴的行径更甚于1949年前，这是因为从前的乡绅接受了以儒家道德准则为基础的教育，现在取而代之的却是些不受任何约束的地方官员。摒弃了高效低廉的“赤脚教师”和“赤脚医生”制度，贫困者更是处于无助的境况中。

在高家村，人们卖掉校舍，拆毁生产队仓库，把余下的建筑材料分给各家各户。位于村中最佳地段的篮球场被高常绕占据，他是从前生产队的负责人之一，也是本村仅有的两名党员之一。他在球场上建了一座房子。学着他的样儿，别的村民也纷纷占据能够弄到手的土地。高家村曾经有两条纵横交错穿过村中心的小道，像一个十字架。1992年我逗留高家村期间，那两条小路已经不见了，村庄的自然外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村中再也没有一条正式的小道了。脏水沟和臭猪舍随处可见，阻挡着道路。村活动中心也不存在了，供孩子们玩耍的场所也没有了。一句话，村里再也没有了公共活动场所。

村长在家里处理村庄事务。我注意到村民上缴的税款之一是订报费。因此我问村长高常权，能不能借些报纸给我看。他妻子设法在一个灰尘扑扑的角落找到一些碎报纸片；高常权自己不看报，也没有别人看。因此他妻子就用报纸包东西。

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农村的另一个特点是家族政治回归村庄生活。即使是在江西省省城南昌市的一个郊区县，据报告，也有数以万计的村民参加了族谱的重修典礼。湖南省临武县的273个行政村中，[6]据报告有230个村已成立了宗族委员会；其中38%的宗族委员会成员是共产党员或地方干部。[7]据报告，湖南省两村庄之间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

的世仇，在1993年重新上演，缘起是刘家庄的村民毁坏了李家庄的村办工厂。于是，两村村民带上自制的武器进行械斗，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8]

在银宝湖、青林和高家村，嚣张的宗族政治也开始盛行起来。金家村村民能够阻扰警方调查因村庄世仇造成17人死亡的械斗事件，表明了国家政权有效性在银宝湖乡丧失到了何种程度。高家村成立了由9人组成的宗族委员会。它有权力对涉及高家村的重大事务做出决定，如：给谁多大的建屋地基等。1994年，六户人家在盛情款待宗族委员会成员之后，获得了在最佳场地上盖房的许可。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银宝湖各村宗族结构和宗族权利的复兴恣意泛滥。如果两个异姓村子发生争斗，结果可能不取决于公正公平的竞争，而取决于以村子大小为基础的力量展示，就像处理两国的冲突一样。该县的权力机构没有能力处理金家村和周边小村之间的世仇，这一事实表明：除了向国家上交农业税，这些村庄与国家之间毫无瓜葛。银宝湖乡少有村间械斗的原因是：有势力的大村庄对自己的地位心满意足，而弱小的村庄又无力挑起战争。高家村人永远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汪家村人围堵过他们的水资源，还想不顾一切地用武力来算清这笔帐，但现在高家村无力发起这样一次械斗。1992年，在我逗留高家村之际，年长的高家村人还议论着要买枪来对付汪家村人。

像别的村庄一样，高家村也恢复了记录族谱的做法。高家村宗族委员会负责族谱的续订和保存。如西方基督教以传统形式给孩子施洗那样，生于高家村的每个孩子都必须上谱（名字被记录进族谱）。对男孩来说，上谱是个非常庄严的时刻：当人们给男孩取好名并把这名字记进族谱时，男孩必须根据约定礼仪焚香祭祀。每年正月初一，所有男性村民都得拜谱，以铭记整个村子都是同一祖先的后代。

同宗各分支之间的冲突也开始渗入乡村生活。高家村由于不同分支之间互相通婚，20世纪70年代末期，分支间的紧张局势和矛盾冲突得

到了大幅度的缓解。但是，种种迹象表明：村民们已开始再一次确认自己的宗谱分支。1992年我回家时，村里人想利用我的归乡来作为加强宗族分支认同和团结的机会，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趋势。

一天，一群男村民来看我。我有点惊讶，因为他们是一起来的，而通常他们只会自己单独来。我们坐在一起，边吃花生边聊天。半小时后，又有一群男村民领着乐队来拜访我，我还是没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来到我住的老屋，开始为我唱民歌，演奏古老的乐曲。他们离开约半小时后，另一群人来了，依然是各家的男主人。这次他们带了些礼物。然后，又来了另一群男人。终于，在黄昏时分，最早来看我的那伙人又来了，这次带来一块布料给我作礼物。直到那时候，我才明白过来：每群人代表着宗族里不同的分支！第一支最先想到集体拜访我的主意，接着别的分支也跟着来了，每支都想在礼仪方面超过别人。第一支不想失面子，也不愿输给别的分支，就再次来到我家。由于他们第一次来时没有带礼物，这次就带了块衣料来。最后，我的旧房子里堆满了礼物，衣料和书法作品挂得到处都是。在母亲的催促下，我为他们拍了五张照片作为回报，每张照片包括一个分支的所有成员——男女老少全都坐在一起。

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喜欢宣称，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把农民从公社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而大幅度地提高了生产力。麦克米兰（John McMillian）、惠利（John Whalley）和朱利静认为，每单位农业投资带来的产量增长，78%应归功于生产责任制；而林毅夫则认为86%应归功于这一制度。[9]

中国农民能在自己的土地上为自己种粮食，他们将会干劲更足，这种假设有其合理性。因为责任制给农民一种所有权和自主种植农作物的权利的感觉，人们很自然会认为，他们要比在公社体制时更辛勤地劳作。但是，认为农民在公社体制下没有主人所有权感的假设是错误的。事实上，在生产队队长的领导下，作为生产小组（由十到十五家住户组

成)的成员，所有村民都有一种强烈的所有权感和自我管理的意愿。而且，详尽的工分、队务评估和监督制度足以用于协调和监督管理。

如果说公社体制使社员缺乏动力的话，部分原因应归结于缺乏一个立即的奖赏系统，无法使农民的欠款和收入在年终偿付清楚。那些欠生产队钱的农户无力还款，所以生产队也无法付款给有进帐的农户。中国农村没有现金流通，主要由政府控制价格、垄断农产品采购。因此，价格和采购体制的改变是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政策的一个关键因素。

公社时期，政府除了向农民征收农业税和地方税外，还垄断了整个粮食市场，农民生产的剩余粮食都必须以国家定价卖给国家。促进农村收入增长的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政策之一就是提高农产品价格、减少国家强制性的购买量。1979年前，国家禁止农民到市场卖东西，要求他们必须把东西以国家定价卖给国家，这被称作统购统销。根据规定，180多种农产品必须卖给国家。1979年，统购的农产品减少到62种。1981年，通过统购方式卖给国家的粮食总量仅是1978年的64%。[10] 统购种类和定额的减少使得农民能在市场销售农产品，而且各类统购产品的价格也在1979年提高了25%到40%不等。因此，如果政府能在公社时期改变价格政策和购买政策，它们也能在提高农民收入方面发挥同样的效果，这样的假设也并非无稽之谈。

1985年之后发生的变化证明，价格政策和购买政策是一个关键因素。1985年后，农民在完成定额之后，可以把产品以高出定额的价格卖给国家(粮食和油菜子的价格高出定额价的50%，棉花的价格高出30%)。他们还可以以议价卖出产品，议价稍稍低于市场价。此外，议价出售并不是强制性的，村民们自己可以去市场出售产品。

高出定额和议价采办的粮食以低得多的价格卖给城镇居民，这给政府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如1994年，政府为此就一共补贴了220亿元，占财政总收入的14%。由于认为农民在农产品价格增长中获益太大、对城镇居民的补贴扩大了政府的财政预算，政府在1985年采

取了相应措施：降低农产品的统购价格、提高工业产品的价格。1985年，谷物的国家统购价是1984年的72%，同时，化肥价格比1983年高出43%，农药的价格比1983年高出82.8%。[11] 统购政策再次加强，没有完成定额任务的农民被禁止在自由市场进行粮食买卖。尽管政府1984年做出承诺，生产责任制最少15年不变，全国农产品产量却在1985年有所下降。如：国家人均粮食产量由1984年的392.84公斤下降到1985年的360.70公斤。[12]

由于价格增长和市场自由化，高家村村民的收入在80年代初期总体上都有了增加。产品产量数据显示（见表格9），收入的增长并不是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带来的，因为自1981年实行改革以来，产品产量并没有明显的增长。

数据显示，1972年和改革前的1979年都是丰收年，另一方面，在实行责任制两年后的1983年，农产品产量大幅度下降。1982年和1985年的生产数据又显示粮食产量大幅度上升，而且1985年的数据和全国总产量的趋势不吻合，因为国家数据显示，农产品产量在1985年是下降的。这大概是因为，政府颁布新政策与在青林地区最终实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因为当地的市场发育也极不完善。总之，由于1985年后政策的变化，农产品产量的增长并没有导致农民收入的增加。

由此可知，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府对粮食价格和统购政策实行的改革在80年代早期确实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但是，高家村收入的增长是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才获得的，特别是贫富之间两极分化的进一步扩大。相对富裕的家庭能够高价购买化肥和农药来提高产量，贫穷家庭却不得不在买不起化肥和农药的情况下辛苦耕作。

高家村有两户人家长期靠乞讨为生。其中一家是高常亮家，高常亮是先前生产队的负责人之一。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家就已经欠债，因为他有呼吸道疾病。由于家里无钱给他治病，他在1986年就过世了，那年他才55岁。从那以后，他的妻小每年春天都出去乞讨，直到新庄稼

收割他们才回来。另一户靠乞讨为生的人家是高朝典家，他家乞讨是由于他不善计划和管理家庭开支造成的。在1949年前和毛泽东执政期间，高家村还没有谁靠长期乞讨为生。

由于价格上涨和市场自由化，高家村大多数人家的日子都比以前宽裕了些，但即便这样，种田并不能让这个地区的农民真正富裕起来。高家村只有一户人家真正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但他家的钱不是靠种田赚来的。他叫高汉正，高汉正本不是高家村人，1967年他随母亲改嫁到高家村并改姓“高”。高汉正获得了亲叔叔的帮助，通过叔叔在景德镇的关系，得到一些建筑合同。作为包工头，他使用廉价的农村劳动力，靠吃差价赚钱发了大财。1991年，他在高家村建起了一幢三层的高大住宅，造价约七万元人民币。房子是钢筋水泥结构，有宽大的玻璃窗，朝南的、可供夏天乘凉的大阳台。这是高家村有史以来的第一幢高大建筑，高家村的人为他们的养子感到十分骄傲，说他为村子挣了面子。曾经除了捉弄人便一无是处的逃学顽童，现在却成了村里的重要人物，在所有隆重的宴席上，他都会被请去坐贵宾席。

官田村委会由徐家村、曹家村和高家村组成，村委会里最富裕的家庭并不从事农业生产。除了徐医生，还有两位富人是徐国华和徐先真。徐国华有钱，是因为他经营着当地的农药化肥买卖，代政府卖化肥农药给农民。他有权决定卖什么、卖给谁、以什么价格卖。他可先以某种价格从公家购得这些宝贵的商品，再以另一种价格把它们卖给农户。他能肆无忌惮地这么做，不但因为徐家村在这三个村子中势力最大，而且还因为本地当权者对他的生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是徐先教的儿子，而徐先教是乡政府的副乡长。

徐先真的致富方式和他的同村老乡大同小异，他为政府经营着一家棉花收购站。徐先真在公社时期是一位棉花质量评级员。80年代以来，商业化和私有化政策使得他垄断了本地的棉花业务，当村民向国家出售棉花时，他们的棉花必须被评出一个等级，因为不同等级的棉花有不同

的售价。唯独他有权力对出售棉花进行评级，因此，在购买棉花时，他可以将棉花定成偏低的等级，而在出售给国家时，他又可以拔高棉花的级别，以高价卖给国家。

改革带来的另外后果是犯罪的迅速增加，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安全感。公社时期也有犯罪，那时个人犯罪远远少于由同宗村民共同参与的犯罪形式。小村庄通常是受害对象。那会儿，村民们会合伙地去偷邻村的东西，偷到的东西大都是树木、仓库里的粮食，有时还可能是一头水牛。农民一直靠水牛拉犁，因此它过去和现在都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在70年代，一头好牛价值600元，而建一座传统结构的新房子也只需花费3,000元。村民并不经常偷邻村的水牛，因为他们无法把水牛藏起来。去远处偷水牛也不容易，因为水牛走得不快，那时农村也没有卡车，村民没有什么办法把它们运送回来，因此偷牛事件很少发生。犯罪者通常都是势力强大的村子的村民。高家村人从来不敢去别的村子偷盗，因为自己的村子太小。到70年代末，高家村周围的树木要么被村里人自己砍倒，要么被其它村子的人偷走。村里的仓库也有一次被人破门而入，偷走了几千斤稻谷。

集体时期另一种普遍的偷盗方式就是拿自留地里的瓜果蔬菜。孩子们特别喜欢偷西瓜和其它各种水果，几乎每个孩子都干过这个。后来成了高家村有钱人的高汉正以及前官田大队书记高常银的儿子高朝佐就是偷瓜果出了名的孩子。大人有时也会偷摘别人自留地里的东西。对于这些偷盗行径，很难有解决办法。但是，有一种风俗却极有震慑作用。我们经常听到有人在村子里来回高声叫骂，一手拿刀，一手拿着砧板。遭了偷盗的主人(通常是妇女，极少是男人)大声诅咒着小偷，说偷东西的人下辈子会被切成几大块，她边高声咒骂边用刀把砧板剁得咚咚响。即便你不相信人有下辈子，被人这样咒骂也是很恐怖的。

但是，自80年代后期以来，一种不同性质的偷盗和犯罪方式出现了。现在有了行凶抢劫事件，盗窃比以前更有组织性，而且规模更大。

如1992年，有人偷走了徐家村三头最大的水牛，他们用卡车把牛运走，再把牛杀死当牛肉卖。因为有明显迹象表明谁是盗牛贼，警察本可以把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的，可警方要求徐家村先付给他们4,500元，然后再着手展开调查。由于徐家村村民付不出这笔钱，这个案子也就一直没有被受理。

农民外出打工时，也常常沦为城镇罪犯的受害者。高家村一位村民在鹰潭火车站被迫花45元买了3斤香蕉，单价是市场价的10倍。高常文在厦门火车站时，曾亲眼看见一群人把自己的一位朋友打昏过去，并从他身上拿走了500元钱。1991年，14岁的高志明去广州找工作时，被一群人狠狠地揍了一顿，身上仅有的20块钱也被抢走了。高志明没有找到工作，又身无分文，不得不从广州一路乞讨回家。

有些地方坐公交乘火车都不再安全。不但抢劫偷盗事件常有发生，而且政府雇员敲诈勒索现象也很普遍。每年春节期间，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会回家与亲友团圆，国家铁道部门的一些员工就尽其所能地敲诈农民工的钱财，因为这些可怜的民工通常会随身带些现金回家。我弟弟高常文在厦门打工时，1992年春节，他搭乘从厦门至南昌的火车回家。他坐在火车上，一名乘务员坚持说他带的纸盒箱太大，不能放到行李架上，其实每个人都清楚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高常文给了那名乘务员20元钱才算解决了箱子问题。

上述各项事件加上我在1992年和1994年旅行期间的所见所闻，很好地体现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状况。一次，我搭乘晚班轮船从南昌去波阳县，一位船员趁我睡觉时把我戴在手腕上的手表取了下来，看见我被他弄醒，他又赶快把手表放在我的枕头下。我也就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还有一次，当我坐在一辆由景德镇开往高家村的汽车上时，一伙年轻人突然把我围了起来，推来搡去的，接下来我就发现自己的护照落到了他们中某个人的手上。

有一次，我从南昌乘火车去厦门，我买的是卧铺票，睡在我下铺

的是一位迷人的女士。半路上，一名中年男子把她叫醒，说她睡的是他的铺位。但女士说自己在南昌火车站买了这个铺位的有效车票，可是那名男子也有一张有效票。原来，卧铺车厢乘务员把同一个铺位卖了两次，其中200块钱就塞进了自己的腰包。女士无法和男子争斗，只好让出铺位，在凳子上坐了一晚上。乘务员说，谁睡这个铺位都与她无关。

第二天黎明，火车在广东省韶关火车站稍作停留。车厢内空气很闷，坐在窗前的一名乘客想打开窗户呼吸些新鲜空气。窗户刚被打开，我们还没来得及反应，从窗外伸进一只手，一把将那名乘客挂在窗户旁边的衣服抓了出去。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一名男孩带着战利品——商务文件、身份证和400元现金——不紧不慢地走远了。

高家村长达200多年的历史中，也首次出了一名抢劫犯。他叫高占林，1988年在一辆挤满乘客的公交车上抢劫，那时他才16岁。他掏出刀，命令一位商人模样的人交出密码箱。可他不知道怎么开锁，只好找来一把斧头，劈开了箱子，却发现里面塞满了太阳镜，并没有如他所想的那样装满了钱。高占林两周内就被抓获，判处有期徒刑8年。1994年，他还没有被释放，被转到另一家劳改营去了。

基层腐败

80年代末流传着一种说法："毛泽东时期的官员廉洁奉公，华国锋时期的官员无影无踪，邓小平时期的官员是百万富翁。"尽管城市官员和南方沿海地区官员中许多成了百万富翁，青林地区的官员当然没有百万富翁。然而，乡、村级党政领导却位居该地区的首富之列，建房是他们变富的明显证据。银宝湖乡的每个村子里，最好的房子大都是乡、村干部家的。银宝湖乡党委书记出生于当地的大余家村。他家新盖的房子大得像城堡，四周还用高高的砖墙围起来。他们抽的香烟也

很贵，每支烟相当于一斤大米的价钱。他们都有摩托车，有些还是日本台湾的进口货。

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表明当地贫富两极分化的程度。1991年春节期间，书记在放鞭炮时炸伤了一只眼睛。由于他坚持要获得最好的治疗，他先被送到南昌，然后又被送往广州动手术，前后共花去了20,000多块钱，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这可是个天文数字。据说他还送了主刀医生10,000元现金。1992年，银宝湖乡人均年收入为400元（上报给县领导的数据为600元），[13]作为银宝湖乡的书记，他的正式工资大概为每年4,000元。人们不禁要问：他的钱是从哪弄来的呢？

要想解答上述疑惑，我们必须大致了解1978年后当地财政体制运作形式的变化。1978年是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改革的里程碑性质的年份，1978年前，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规定：各地各级的一切收入都必须上缴国家。在农村，农民缴纳农业税，把公余粮以国家定价卖给国家，为国家财政收入做出贡献。作为回报，国家负责一切开支，如当地的教育、医疗、道路和农业投资。国家还负责支付公社及公社以上各政府部门官员的工资。生产队长和会计的工资由生产队以工分的形式支付，生产大队负责人的工资也由村民支付。每个生产队上交给大队部的数额每年都不一样，由当年的产品产量来定，但上交的比例却是固定的——总收入的2%。生产队除了上缴约占总收入10%的农业税外，还得支付固定份额的公积金和公众福利款。附录二的表格10中，各项数据显示了各年度生产队上交的不同物品占总收入的比例情况。

尽管已掌握数据的年度还不够，不足以供我们得出任何重要结论，但它们至少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之前及文化大革命之中，以及公社体制解散前夕的一些情况。尽管农民每年都缴纳公积金，但农村没有任何公共事业，除非他们自己出力；尽管他们缴纳所谓的福利款，但农村除了几家象征性的五保户外，[14]事实上什么福利也没有。国家彻底地剥削了农民几十年。为了保证城市地区低廉的生活花费，政府就剥削农民，强迫

农民以国家定价把尽量多的粮食卖给国家。中国政府的宣传机构把国家强制性的统购统销称作“鼓励农民把余粮卖给国家”。事实上，那些年里中国农民少有余粮。为了确保城市低廉的粮食供应，国家规定了农户只能消费自己累死累活生产的粮食中的固定份额。

很明显，那些年里，农民必须缴纳的税种并不多，而且要缴纳的税费比例是固定的，村民们也知道他们将会得到什么，而且对自己所作的贡献也显得乐于承担责任。至少，他们辛勤劳动、忍饥受渴不是为了地方恶势力的利益，但是在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时期，特别是自80年代末以来，农民逐渐沦为了地方恶势力的牺牲品。

这个过程始于国家决定向地方政府下放更大的权力。70年代后期至80年到初，中央政府启动了“财政包干制”的政策，主要内容包括：地方政府可以支配它们所征税收的一定百分比，而不必像过去那样把税收全部上交。这一体制出台的理由是：它可以刺激各级地方政府征收到尽可能多的税收，因为他们征到的税收越多，供他们支配的份额就越大。同时，这一体制还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分担同样百分比的开支。理论上，这一体制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是合乎情理的。第一，中央政府在征税时会面临更少的困难；第二，由于地方各级政府有钱开支，他们可以把这些钱更好地花在他们辖区的农民身上，因为是他们而不是中央政府更了解当地的情况；第三，它可以鼓励地方政府大力发展地方企业。

然而，事实上，在一个政府官员尚不能完全负责的国家，这一体制只是为滥用权力和贪污腐败开了方便之门。不难看出，财政包干制度可以造成以下三个结果：第一，征税变得极端随意，农民的命运完全操纵在当地权力机构的手里。第二，征到的税款可能会浪费在一些无益的、怪诞的、荒谬的项目上，而置医疗和教育等基本服务于不顾。第三，为贪污腐败打开了方便之门。不管征到的税收数额是多少，地方官员想私吞多少钱就从中拿走多少钱。阻止当地官员腐败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第一是因为查他们做的账目没有标准可依，第二是因为他们可以贿赂上司脱离困境。在那些地方工业繁荣的农村地区，当地权力机构可以征收到充足的工业税，地方税收的包袱不至于全部落到农民的头上。在波阳县银宝湖乡，由于那里没有任何成规模的工商业，沉重的税收包袱就完全压到了无助的农民身上。

1991年，波阳县就发生了依靠滥收税费搞浪费工程的事件。1990年新上任的县长想发展工业，因此他想出了一些极好的项目。他用三种颜色命名这些项目：银色为棉花种植项目，蓝色代表波阳湖四周的养鱼业，金色代表烟草种植项目。由于该县已有长期种棉花和养鱼的历史，他在这两个领域里没什么可以插手的。因此县长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金色的烟草上。根据他的命令，适合大规模种植烟草的每个乡，家家户户都必须建立一间烟草烘烤室，此项大概得花费700元。谁家不建烘烤室就罚谁家的款。许多人家只好按照上级的指示建起了烘烤室。县领导没有要求银宝湖乡这样做，因为该乡以种植水稻为主。

为了筹到建造烟草加工厂的钱，每位国家干部包括老师和乡干部都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借500–2,000元给县政府，具体数目依各自的工资多少而定。县政府保证偿还欠款，如果无法还现金，至少也会以等价的香烟偿还。不愿交钱的人就直接从他们的工资里扣。

事情的最后结果是：县政府放弃了这个项目，因为当地的土质无法种植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优质烟草，而且中央政府也不批准这个项目。县长只顾命令农民建立烟草烘烤室，向国家干部强行借款建立烟草加工厂，却不知先去获取中央政府的批示，也不测试本地的土质。因此，成千上万间毫无用处的烘烤室耸立着，像一座座碉堡。出了钱的人不知何时可以收回欠款，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把钱拿回来。波阳县金色项目的理念和实施方式不由让人想起大跃进时期那些给老百姓造成严重损失的工程。

1990年，村委会命令高家村和徐家村的村民种橘子树挣钱，而且

他们得到了贷款供村民购买橘子树。高家村人被要求必须把橘子树栽种到村前的山上。为了种橘树，山上原有的松树被砍掉，每家挖出一定数目、体积达1立方米的深坑。刚开始的时候，村委会承诺，村民挖一个坑就可以获得一元钱。后来，他们又自毁诺言——村民们不但没赚到一分钱，相反，死一棵橘树，他们就被罚款17元。1992年，我看到栽种的大部分橘子树都已死了。无人测试过当地的土质是否适合种橘子树，也没有谁考虑过如何系统灌溉橘子树的问题。现在，农民们却不得不自己掏钱还贷了。

1994年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这回要求村民在同一座山上栽种桑树。至少这回村民是有酬劳动，栽十棵树就结算一次钱款。我亲眼看着他们的栽种过程：他们先挖出一个浅坑，再往坑里塞进一捆桑树苗以完成定额，有人甚至连土都懒得扒，就让树根裸露在外面。我给他们提意见说，这样种树，树是不会成活的，就算它们能活，也不能把一捆树苗都栽到一个坑里。村民们劝我别担心，说这只不过是走个过场罢了。果然，没有一株桑树存活下来。

1989年，青林地区要求村民每人凑5元钱，好在稻田之中建亭子，这样村民夏天干活的时候就有个休息的地方。人人都支持这个好主意。总共40,000元钱如数凑齐。但是直到1994年，也没建起一座亭子，村委会也无人向村民解释那些钱都用到哪里去了。

1990年，村民获知，先前的青林大队欠了公家大约20,000元。为了还清债务，每个村民得上缴18元。据向我提供消息的人（其中一人是村小学教师）说，整件事纯属骗局，无人解释钱被用到哪里去了。这些都足以说明当地干部是怎样谋私利的。

高家村的领导人高常权也是官田村委会的委员，他特别嗜好烟酒，每天抽一包烟、喝一瓶谷烧酒。这两样消费每天得5元钱。他1995年的年工资不超过1,000，除了他名下的田地，他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而且还得养活自己一家四口。高家村的人很奇怪，高常权喝酒抽烟的钱是

从哪里来的呢？或许由于他抽烟喝酒花费太大，他家确实没有建起大房子，最起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对高家村人来说，多少也算个安慰。

用公款摆宴吃喝是最普遍的一种浪费方式。如果有会要开，或者出现了无力缴纳费税的困难户，或者有人违反了计划生育，村委会委员就聚集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决定吃什么、在哪儿吃。通常，一名委员就专门负责购买聚餐的饭菜和酒水。宴席设在不同村庄不同村委会委员的家里，这种安排不但使这些宴席不为旁人所知，而且使得他们自己可以保留每次宴席吃剩的东西，剩余的东西通常很多。如果宴席是为了招待客人而办的，那场面就更加隆重了。

由于我是位重要的客人，而且又是海外华人，他们以为我一定非常富有，会捐款赞助当地的一些项目，因此我回家时他们设宴招待了我几次。宴席通常有十几个菜，还有许多白酒和啤酒、高档香烟。当地对香烟还有个特别的风俗，除了吃饭时发散给各位抽的香烟外，在座的每个人，包括不抽烟的人，都能得到一包高档香烟作为礼物。香烟的牌子时有变化，取决于客人的身份地位。90年代初期，这种场合最便宜的发三九牌香烟，每包售价3.7元，最贵的是红塔山牌香烟，约10元一包，刚好10斤大米的价钱。

每年村委会用于招待客人和聚餐的费用很难查清。如果有些招待费必须入账的话，村委会做帐时会把它划入管理费。以下数据可以表明，村委会是如何奢侈浪费村民的血汗钱的。在青林地区，有一座湖属于各村的共同财产，在1981年公社体制解体时，人们无法把集体所有的一块湖划成小块小块的分给各家各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家讨论后同意把这湖用作公共养鱼场，并且成立了一个管理委员会来管理这个养鱼场。90年代初，养鱼场的平均年收入超过30,000元。但是村民并没有分到一毛钱。管理委员会负责人在1993年告诉我，1991–1993年间，经他个人签字的招待费大约就有60,000元，用于款待六个村的村委会成员、乡干部和县干部。也就是说每年的招待费达到20,000元，这还不包括六

个村委会各自的招待费用。渔场的剩余收入也以物品的形式送给了当地干部：所有村委会成员都能经常得到免费鱼，该委员会负责人还承认：他们常常给县、乡干部送鱼。这种行径在当地被称作“打狗”，意为“给狗扔食物，免得它吠叫”。

各级官员用公款大吃大喝，农民税费的包袱就变得越来越沉重了。以下是农民在90年代初必须上缴中央政府、县、乡和村委会的各项税费数据，表明农民肩负着多么沉重的税费负担。1991年，高家村必须上缴中央政府的税收是5,198.4元，含4,463.5元农业税、357元特别农业税、168.9元屠宰税和209元教育税；它必须上缴县级部门2,909.43元，其中，1,686元教育费、妇女儿童健康保险费67.44元、计划生育费369.21元、广播电视费75.87元、徭役费683.91元；同年，高家村上缴乡级部门共5,647.42元：1,405元教育费、421.5元徭役费、112.4元五保户费、拥军优属费182.65元、建筑费140.5元、无男丁家庭保险费606.96元、家禽家畜免疫费150.88元、国库券和民兵训练费140.5元、没有完成1990年棉花生产指标罚款2,300元、订江西省报费28.1元、其他订报费140.5元和印花税8.43元；最后，高家村还得上缴村委会2,718.5元，其中，村委会会费140.5元、村小教育费838元、村委会成员工资1,459元以及村委会管理费281元。

1991年，高家村共有308口人，当年上交的人均税费为53.48元。当年的人均总收入为400元（但上报给县级领导机关的人均年收入为600元），1991年人均缴纳的税费占了人均总收入的13.3%。如果除去缴纳给政府的税收，上缴的本地费为人均36.6元，占人均总收入的9.9%。

同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相比，这些税率也许似乎不是很高。但是，这种比较是不合理的。首先，税收方式是退步的，农村里人人都得纳税，人人税率相同。其次，政府和当地政府官员没有拿出农民交纳的税费款，去做有益于农民的工程。文化大革命以后，当地没有兴建一所学校或医院，可农民依旧得缴纳教育费和医疗费。政府在村里没修过

路、建过排水设备，更别提其它的公共项目。如果需要修路或挖灌溉渠或别的什么公共工程，村民们就得自己动手、另外交费。1990年，县、乡两级政府机构从高家村运走了价值1670.79元的稻谷，以抵消强行摊派到高家村的修渠款。[15]这还不是全部，高家村还得为别的工程项目作出贡献，并提供诸如麻包之类的建筑材料。第三，与农民相比，城镇居民不但免除了个人所得税，还能享受几乎免费的住宅、教育和医疗。他们还享有国家的粮食补贴，而且官方数字显示，他们的人均收入最少是农民收入的三倍。

农民们必须缴纳四重税收——分别向国家、县、乡、村级机构纳税。此外，如果他们有孩子上学，他们必须用现金支付孩子的教育费。他们还被迫缴纳徭役费，但对于国家和政府的各种徭役，他们随时都得出力。他们还要为从没看过的报纸付钱，为他们憎恨的计划生育掏腰包。那所谓的“妇女儿童保险费”其实是用于负担妇女强制堕胎的开支。1991年，他们还必须购买自己无力承担的国库券！而这一切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之上：自80年代末以来，在以国家定价把国家强制摊派到头上的统购份额卖给国家之前，农民是不允许到市场出售任何农产品的。这是赤裸裸的掠夺和剥削。然而，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当权者和知识精英却高唱着什么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使农民转变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了等等。

60年代初，数据显示，农业税约占总收入的10%，公积金和公众福利款占7%。在青林地区，大约60–70%的总收入用于村民分配，余下的部分用于缴纳各种基金、税收、农业投入和管理。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我无法获得有关高家村交税的确切数据，但国家部门的数据显示，农民缴纳的税费数额有所减少。[16]

1991年，各项税费占农民总收入的13.3%。表面看来，似乎农民的税费负担比毛泽东时代有所下降。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把以下三个重要因素考虑进去，就会发现，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第一个因素，在毛泽

东时期，用于农民分配的总收入的60–70%是除去了农业投入之后的百分比。自80年代后期以来，农业投入成本如化肥成本快速上涨。第5章讨论过的高常献就是一个好例子。1992年，高常献的庄稼收入是1,500元，可他购买化肥和农药的开支却高达728元。仅此一项投入就占了他总收入的48%。

在对这两个时期作比较时，要考虑的第二个因素是，公社体制解体前统计的收入数据不包括自留地的收入。由于高家村有10%的土地被划为自留地，因此自留地中谷物蔬菜的收成至少占到村民总收入的10%。[17]

第三个因素，在毛泽东时期，要么国家直接投资于教育和医疗事业，要么一旦集体集资了用于公共事业的款项，村民们就不必再掏腰包了。1952年国家出资建立的青林学校，在1958年扩建了一次。到目前为止，该地区除了几所由村民自主经营的村小以外，青林学校依然是该地区唯一的一所完小。60年代，国家公派了两名医生到高家村，现在的青林地区却连一位公派医生也没有。文化大革命期间，村民们集体承担一所高中、十几所村小和一家赤脚医生诊所的费用，不过，那时上学和看病都是免费的。可自80年代以来，尽管村民上缴的教育费是过去的四倍，上学依然得交钱。

1992年，当地收费变得更加强取豪夺，新的税费名目不断出现，如村干部保险费（可能是村民和村干部之间冲突增加所致）、住户档案登记费、房产保险、高压电线网和程控电话费。后两项收费名目完全是为了城镇居民的利益，因为高家村这样的地方根本不存在高压电线网和程控电话这样的玩意儿。总而言之，高家村人均缴纳税费80元，占人均总收入的20%。

波阳县以及整个江西省，在这方面还不是受害最严重的。湖南省和安徽省都报道了农民暴乱反对当地政府横征暴敛，情况严峻到了惊动中央政府的地步。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同时发表严肃讲话，要求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1992年2月19日，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紧急通

告，阻止地方税费的增加。最高人民法院和监察部同时发文明确指导方针以约束地方政府。文件明文规定，地方总收费（国家的农业税除外）不得超过农民总收入的5%。但直到1996年，什么也没有改变。高家村的农民了解中央的税收政策，也了解地方费收的指导方针，但这些都无力改变现实。1993年征的地方费比1992年还高，而且，收费还会进一步增加。

当地政府只要提供一串虚假数据就可以抹掉强行收费的影子。如，1994年上报的人均收入为800元，而真正的人均收入却不足500。据村委会会计所言，有人通知当地政府机构说，如果他们上报的数据没有体现人均收入的一定的增长率，江西省政府就不会接受他们的年度报告。在中国，虚报数据是当地政府由来已久的习惯。现任波阳县教育局长在70年代初曾是我的学生，在和我的一次访谈中，他告诉我，据他所知，波阳县有关教育的一切数据至少被夸大了30%。

如果村民拒绝缴纳各种费收，村委会就命令民兵冲进村民家里，见什么拿什么。猪和家具可能被拿去抵费。高家村有两家遭受了这样的命运。一位是村小教师高朝真，由于妻子住院花了很多钱，他不得不让自己14岁和16岁的儿子退学去城里打工。由于他付不出那年的各项费款，村委会就派民兵把他家的猪牵走了。

村委会成员之所以如此放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工资和税费的完成情况直接挂钩，乡政府明确规定，如果村委会只完成70%的费收任务，那么他们就只能拿70%的工资。事实上，各级政府都可以自行制定政策。为了催促村民们按时交清费收，官田村委会颁布了一项政策，对没有按时上交的费款加收30%的利息。而且，政策进一步规定：收得的利息分给村干部作奖金。

村民们并不是没有抵制过当地权力机构的行为。高仁为是本地一位多姿多彩的人物，过去还诚信菩萨王太公。有一次，他和村干部吵了起来，并和冲进他家搬家具的民兵动了手。于是他就被逮捕了，在同意交

2,000多斤稻谷的罚款后，他才被释放。

1991年，西分村的40多位村民在一封告状信上签了名，把信交到县级政府机关。他们告的是西分村支部书记，因为他除了别的错误外，还用公款去包养三个情妇。但他却毫发未损，1994年时还是村支书。当我问别人，他为什么能毫发无损时，他们告诉我说，他不断地给领导送礼，早就把相关领导贿赂好了。青林有句俗话说得好，“吃人嘴软，拿人手短”。

尽管如此，还是经常有人拒绝交费。像高朝典那样的人，村委会就拿他们没有办法。高朝典家没有任何值得拿走的家具，每年粮食一吃完，全家人就得靠乞讨谋生。1994年，高朝典欠了村委会1,000多元。他还得另付30%的利息。村委会却对此无能为力，因为他家实在没什么可以拿走的东西了。

同样，即便是债务结构也反映着宗族政治在其中的影响。1994年，徐家村人欠官田村委会的钱款超过了40,000元，而高家村除了高朝典，谁也不允许欠村委会钱。这不是因为高家村人普遍比徐家村人更富裕，而是因为徐家村在官田村委会的三个村子中最大，村支书和村委会会计都是徐家村人，此外，徐家村还有官田唯一的医生徐从春，乡政府副乡长、唯一出身青林的乡干部徐先觉也是徐家村人。因此，村委会和民兵对徐家村人就会客气三分。当然，如果有人像高朝典那样彻底破产了，那谁对他都束手无策。但是，欠了村委会40,000多元的徐家村人并没有破产的，他们凭籍徐家村的势力，能躲过某些费税，至少可以拖上一段时间。

尽管农民背负着沉重的税费负担，尽管当地干部常用蛮横的方法征收费款，但欠款现象依然存在，当地权力机关依然缺少投入公众事业的钱财。1994年，银宝湖乡一位副乡长在和我谈话时对我说，银宝湖乡政府1993的财政预算超支了70,000元。当村民们为高额多样的费收大声抱怨时，当地政府却认为自己已经破产了。

但是，始于70年代末的改革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给高家村带来了积极影响。一，放弃了公社体制的高家村人比以前更自由，即：他们能自己决定在自己的土地里种什么，能自己安排劳动时间。二，80年代初的价格改革推动了高家村人收入的增长。然而，我们必须一分为二地看问题。

第一，高家村人为了追求利益而选种什么作物的自由实际上是有限的。首先，高家村必须生产足以养活自己的粮食。高家村人不能因为经济作物能提高他们的收入就选种经济作物，他们也无法从市场买到供自己消费的粮食：交易代价可能支付不起，而且事实上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市场。其二，当地权力机关还会命令村民该种什么作物。上级政府不时强行分派给村民的定额也决定了他们的种植选择。如在1992到1994年间，村民们不得不完成摊派的棉花定额，不是因为棉花能给高家村人带来收益，而是因为中央政府给江西省摊派了一定的棉花定额，以支持中国的纺织业。

价格改革带来的积极影响也必须加以仔细考察。简单地说，价格改革的好处只是昙花一现，主要由以下两点造成。一，自1985年以来，国家统购定额和市场销售的限制强加到了农民身上。高家村人必须先完成国家的统购定额，才可以去市场出售东西。而且，由于当地政府规定了大多数农产品的最高定价，实际上并不存在真正的市场价格。二，工业产品的价格增长立即迎头赶上，农业生产投入的高成本抵消了农业产出价格增长带来的好处。在和我的访谈中，高家村村民估算了一下，90年代初，有些农户的亩产量比70年代的亩产量增长了1/3。但是，我弟弟高常献和其他高家村人又对我说，增产不是由于农民拥有了土地所有权，主要是因为他们经常往田里喷洒高效化肥。

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给高家村人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是它也毁坏了发展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些积极因素。最明显的领域就是农村教育和医疗。70年代通过合作形式发展起来的当地教育和医疗事业，尽管存在

许多缺点和问题，却切实地给高家村人及其它地方的农民提供了基本却关键的服务。中国的精英阶层可能无暇考虑这样的合作团体，但对农民来说，它们是有效的、支付得起的组织。自改革以来，更多的教育和医疗资源流向城镇地区和特权阶级，乡村居民不得不自己想办法照料自己。好在大多数村里的小学，包括高家村村小，都没被拆除，尽管规模不如从前，但它们依然在农村教育中发挥着作用，给村民提供最基本的教育服务。但是，现在出现了宗族文化的回归，范围更广、层次更高的地方官员的腐败，犯罪率的上升，以及地方费收的任意和专横。

大体上看，改革前和改革后，农业收入本身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高家村人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农业收入的增长是以严重的环境后果为代价而取得的退化性发展，使得高家村人依然处于贫困的境地。如果说80年代初的改革带来了繁荣富强的希望的话，那么这份希望在80年代末已经惨遭破灭。给高家村人带来眺望未来机会的，是南方沿海地区的工业发展。

注释

1　陆学艺：《联产承包责任制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2　江西省统计局：《奋进的江西，1949–198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

3　有关中国农村改革研究的较近成果，可参看Joseph 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bate* (New York: M.E. Sharpe, Inc., 1994), pp. 19–55.

4　John Wong, "Implications of the Growth Trend in Mainland China's Grain Production," *Issues and Studies* 28, no. 1 (1992): 38–41.

5　关于公社体制的作用和功能，以及有些公社抵制后毛泽东时代的政策变化的方式，可参看William Hint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Was It Necessary? Was It Successful? Is It Still Going On?," *Monthly Review* 43, no. 6 (1991): 7–8; and *The Great Reversal: The Privatization of China 1978–1989*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0).

6 行政村不同于自然村，是一个行政单位。行政村村委会管理的人口大致相当于公社时期一个生产大队管理的人口。一个大的自然村，像位于银宝湖的金家村，可以划分为两个行政村，也就是，两个村委会；而像高家村这样的小村子，不得不和徐家村和曹家村一起形成一个自然村。

7 蒋振昌：《大陆干群关系之研究》，载《中国大陆研究》，第35卷，第11期，第51–62页。

8 *China Focus* 1, no. 10 (1993): p. 8.

9 John McMillan, John Whalley and Lijing Zhu, "The Impact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7, no. 4 (1989): 781–807; Justin Yifu Lin, "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2, no. 1 (1992): 34–51.

10 Xi-yi An,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Agricultural Marketing in China," in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Miracle with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edited by John W. Longworth (Brisban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87), pp. 18–25.

11 Ibid.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1995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第31页，表格2–9。

13 上述数据由徐先安提供。徐先安是徐家村人，现就职于波阳县政策研究室。

14 如果老人出身好、没有子嗣，国家保证老人的五项基本生活需要：住、食、衣、医、葬。但实际上，国家资助很少，根本无法保障上述五项费用。高家村就从没有一家五保户。

15 银宝湖乡官田村委会高家村1990年县乡上垫积累及联湖联溪圩公款表。

16 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税收的减少情况，见李宏略等：《中国农民负担史》，第4卷(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第290–312页。

17 根据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的观点，有些地区，自留地和副业收入可高达总收入的25%。Martin King Whyte, "The Social Root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144 (December 1995): 999–1019; 另见Liyi He and Claire Anne Chik, *Mr. China's Son: A Villager's Lif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第11章

外出打工[1]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大量农村人口背井离乡到中国南部沿海发达地区打工。到90年代中期，外出务工人员数量接近一亿，这些打工人员大部分都来自农村。[2]1995年，高家村就有98人去外地打工，约占当时全村人口的30%。如此大比例人口的外出不仅减轻了高家村生态资源方面的压力，而且也给村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现金收入。

这一现象不仅局限于高家村。在江家村，1992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均净收入是200元左右，这远远低于外出打工人员的收入。当年外出打工人员的汇款达13万元，使江家村人均净收入增加了216元。据乡政府领导介绍，1992年，银宝湖乡20%的人口都已外出打工。1994年，拥有14万人口的油墩街就有4万人外出打工。

中国这一前所未有的打工现象是由一系列因素相互作用产生的。其中之一就是政府户口管理政策的松动。另一因素是南部沿海地区工业的迅速发展，为农村人口提供了大量工作机会。第三就是80年代后期农村景况的不断恶化。农业投入和税收的增长使农民不得不离开家乡外出打工。

我们在第十章已看到，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政策，如公社的解体和承包制的形成，虽然并没有导致青林地区的国家管理体系完全崩溃，却

给了当地政府官员滥用职权和贪污受贿的可趁之机。而村委会和乡政府这些基层政权的职能也降低为仅仅是向饱受腐败官员欺压的村民征税。70年代末期的改革使农村回到了宗族管理的状态，人们甚至可以想象1949年的革命好像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样。因为在这之前，村民还可能得到受过儒家教义熏陶的乡绅的同情和怜悯，但现今的地主只会更加肆无忌惮，因为他们不再受任何道义的约束。

当然，我们必须谨慎，不要夸大了1949年之前和后毛泽东时代的相似之处。其中一点就是宗族并没有和共产党地方官员融成一个政治群体，而在1949年之前，宗族势力和乡绅是相互勾联的。如今中国的宗族势力和地方政府官员之间依然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只不过在很多方面双方的权力是相互交叠的。而且，如果国家要实行某项政策，它还是有能力命令地方政府官员依照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自90年代初期以来，青林地区和高家村强制实行了相当数量的人工流产和结扎手术。当地的宗族势力不能够，事实上也没有去阻止这些粗暴的措施，并且国家还能制定农村生产和采购的配额，规定农产品的统购价格。至少到目前为止，宗族势力的影响重心不在于和国家政权相抗衡，而在于村内。

虽然公社的解体和财政包干制下的分权并没有导致国家的分裂，但却使得像青林这样的农村地区村民的境况日益恶化。这也是农村人口纷纷外出打工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在其它一些地区，比如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的广东和福建（既是境外投资也是乡镇企业发展壮大的结果），那里的情况就比较乐观。工业化使这些地方的很多村变成了镇，镇变成了城市。城市化进展迅速，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逐步瓦解，随之消失的还有农村的独立分离的“自然村”结构模式。这些地区的商业也非常发达。[3]在大多数商业发达省份，每七个农村人口中就有一个从事非农业劳动。[4]因此，工商业迅猛发展的结果就是当地政府能从工业生产中获得足够的税收，而无须

为了财政收入残酷剥夺农民。

所以，后毛泽东时期财政包干制的一个积极影响就是推动地方政府吸引外资，扩大乡镇企业，建立本地产业，尽管也有些项目不切实际，并造成了很大浪费（比如波县阳的烟草项目）。[5]不幸的是，像波阳县这样的地区，如要靠自主发展地方产业，现有条件并不是很好。波阳的地理位置处在内陆，又缺乏基础设施，这既造成外商不愿来这里投资，又制约了本地乡镇企业的发展。

从毛泽东时代以来，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对于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6]根据一项统计，乡镇企业的“工业生产量每年增长约17%，而服务业产值每年增长达19%”。[7]到1991年底，中国乡镇企业生产总值达110万亿元，占全国工业生产总值的1/3。这些企业雇佣员工超过1亿人，而总投资额却只占全国的5%。[8]在发展最快的广东省，乡镇企业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1991年，乡镇企业的收入占广东省生产总产值的62%，出口总值为35亿美元，约占广东省当年出口总额的25%。[9]

这一成功通常会被归功于后毛泽东时代的集体制的解体。在典型代表此类观点的一个评论中，维克兹亚尼（Marika Vicziany）就说道：“中国的经济改革牵涉各个方面，但首要的是农业集体制的解体。这一集体制的解体带动了农村巨大的创业精神，随之而来产生了各种经济行为，使得农村工业成为国家经济中最具活力的经济因素。”[10]然而，应该注意的是，乡镇企业所有权形式和公社体制从原则上来说是没有差别的。与毛泽东时代生产队的土地和企业归集体所有一样，后毛泽东时期的乡镇企业也属于集体所有，并受当地政府控制和管理。[11]因此，有些中国学者甚至将后毛泽东时期的乡镇企业称为“地方性的国家社团主义”。[12]

此外，乡镇企业并不仅仅是在后毛泽东时期才涌现出来的，它可以追溯到毛泽东时期，是在过去的成功经验和传统基础上才发展起来的。[13]大多数成功的乡镇企业都是由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生产队创办的企业发展而来的。大跃进时期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政策（这是一项平衡

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中心规划工业和本地工业的政策），1958年，中央政府经营的1,165家企业就有885家下放移交给地方政府。[14]在“社办企业”政策下，公社担负起了经营小型铸造车间、煤矿、发电站、水泥厂、化肥厂、农机和食品加工厂的任务。到1958年，共建立了600万家公社工厂。[15]到1959年上半年，公社经营的社办企业达到70万家，生产总值达到71亿元，占全国工业生产总值的10%。[16]

在60年代初期，由于刘少奇和邓小平实行的调整政策，这些公社工厂大多数都关闭了。但地方政府已经掌握了一些相关的经验和技术。文化大革命时期，当再次强调中央权力下放并鼓励发挥地方主动性时，这些经验和技术又派上了用场。到1976年，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的工业生产总值已达到了123.9亿元。[17]到1978年，也就是毛泽东逝世后改革即将开始的时候，全国已有152万个生产大队和小队企业，它们后来都被称为乡镇企业。到1990年，这些企业的数量实际上已下降到145万个。当然1978年后得到发展的不是企业的具体数目而是整体规模。1978年，152万个乡镇企业雇佣的工人数量是2,827万；到1990年，145万乡镇企业雇佣的工人数量就达到了4,592万。[18]

根据黄佩华的统计，到1979年，中国的队办企业中已有9万多家小型水电站；全国所有的农具、几乎全部的中小型农业机械、一半以上的化肥、三分之一的水泥和45%的煤都是由这些地方的队办企业生产的。[19]这一普遍情况也在白惠娴关于温州模式的研究中得到了证明。根据白惠娴的研究，文革期间，由于国家对农村的干涉和控制大大减弱，家庭生产和商贸成为温州的显著特征。到70年代中期，温州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已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模式，80年代著名的“温州模式”就是在这一经济模式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20]

80年代以来，江苏、浙江、广东和山东的这些乡镇企业迅速发展，而像江西省的波阳县这些地方却缺乏这样的发展机遇。与上海和广州周边地区不同，青林地区以前根本没有商贸传统，经济上完全处于封

闭落后、自给自足的状态。这里交通非常落后，没有什么市场，也缺乏新发展所需要的信息技术。然而这并不能说青林地区的村民就没有想过要建立队办企业。比如，1974年官田大队就经营着一家油坊，还雇请了7名员工；1975年又建立了另一家集体企业碾米厂；到1978年，青林地区已有7家队办企业，包括1家砖瓦厂，共雇佣员工116人，年毛收入达4万元。然而，到1981年公社解体后，这些企业都开始亏损，随后都解散了。

我们不难找到这些企业不景气的原因。首先，大部分企业，如面粉厂、炼油厂、扎花厂，都是加工型的而不是制造型的。大队唯一的制造企业——砖瓦厂，由于缺乏燃料，也注定了失败。家家户户都要砍柴做饭，这里所有的山早已被砍得光秃秃了。到60年代末，青林地区大部分人家都只能到很远的山区去买柴火。那时村民常常用手推车到50公里外的地方买木柴运回来。青林地区买不到煤，而用木柴烧窑价格又高得惊人。这些砖瓦厂能够运转几年，主要还是有集体的扶持。一旦失去这种支持，企业存在的经济基础也就没有了。由于没有市场、技术、信息和外来投资，在青林地区发展地方企业，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确实是十分困难的。

到80年代，四面八方的压力和困难全堆在高家村村民身上。因为人口持续四十年的增长，生态的破坏已到了灾难性的程度。为了取柴做饭，村子周边的森林和植被早已被破坏殆尽。为养家活口，满足新增人口的吃饭需要，农民不得不大量使用化肥、农药来提高粮食产量，结果导致大量的水生物种濒临灭绝或完全消失，这在过去可是人们的一种重要营养来源，现在，村民们只得单独依赖种植粮食生存下去。

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高家村这样的农村地区有很多困难，但原因却不是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府和中国知识精英所宣称的那样，也就是说，造成这些困难的原因不在于文化大革命时的政治运动导致了中国领导阶层的混乱，也不是因为当时的公社制度鼓励懒惰，抑制创

新，真正的原因是来自人口翻番的生态压力和政府实施的剥削农民的定价制度。

后毛泽东时代价格体制的改革给80年代初的高家村人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间，但到了80年代末，随着农业投入的迅速增长和国家重新实施农产品强制统购统销政策，农产品价格上涨带来的利益又再次被剥夺。80年代末，由于人口的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也越来越多。然而，当地却没有地方工业可以吸收剩余劳动力，给地方政府增加税收。最严重的是，财政收支包干政策更使得地方政策只能想尽各种办法从本来就已经十分贫困的农民手中榨取尽可能多的财政收入。正是在这种迫不得已的环境下，远离高家村的南方沿海地区的工业发展给许多农村家庭带来了一线希望，缓解了这种一触即发的危机。

1995年，高家村共有85个青年男子和13个青年妇女离开家乡外出打工。他们的年龄大部分都在14到25岁之间，只有高仁方是48岁。他能在这个年纪还出去打工，是因为当年集体制时学了点机械修理。当年他被派去负责管理高家村的水泵和发动机，灌溉农田。现在他利用这个技术成为广州一家工厂的机修工。还有9名高家村人，过去在村里学了些手艺，是村里的木匠、漆工、篾匠，他们也可以用这些手艺外出打工。但他们做的活通常都不需要什么技术，现在大部分是做衣服鞋帽、日用品、小玩具和一些简单的工具。这些活都是一些简单重复、十分乏味的体力活，不需要动什么脑子。

1995年，外出打工的高家村人中，有34个去了广东汕头，18个去了海南，14个去了福建厦门，7个去了江西省会南昌，4个去了九江，4个去了景德镇，1个去了武汉，2个去了兰州。其余的人都好像没有固定的工作，只是四处寻找做些零工。那些到较近的三个城市（南昌、九江、景德镇）找工作的人，如果是女的，大部分就是做保姆，男的就做木工、油漆工。高家村人在这些地方找工作的方式在目前中国农村地区具有代表性。首先，他们都选择去亲戚朋友所在的地方。那些去南昌、

九江、景德镇的高家村人都同住在这些城市的，原先从高家村搬过去的人沾亲带故。50年代高家村有5人迁往九江和景德镇，文革期间又有2个去了南昌。到80年代，这些人或他们城里的朋友还是能够帮助他们在高家村的亲戚在城里找个工作的。

其次，中国南方沿海地区的企业通常都不用做招工广告，这些地方有许多来自农村的年轻人想要找工作。企业如想招更多的工人，往往只要让员工推荐同村的人就可以。这样一来，企业老板既可以省掉很大一笔广告费，还可以避开政府在工作环境和税收等方面的审查。由于避开了正式的招聘渠道，很多雇主甚至都不用同打工工人签劳动合同，而且，那些老员工还得担任各自介绍来的同伴的担保人，担保的范围包括劳动纪律、工厂偷盗、教育程度和实际年龄等，如果有哪一项不对，不仅新的员工要受惩罚，还会连累到给他担保的人。由于存在这种招工方法，一个工厂里常常有很多员工是来自同一村的村民。比如，高家村外出到厦门打工的8个人就都在同一家厨房器具厂打工，并且都是由高常文介绍过去的。

还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做法就是，这些村民不仅帮助同村的人，还常常帮助同一宗族分支的人。因而，高家村去厦门打工的人是同一个宗族分支，而去汕头的、去海南的，又都属于另外的两个分支。以高常文为例，每年春节他回高家村过年，就有很多家长来找他，求他把自己的孩子带到厦门去打工。可是他每年只能推荐一到两个人，因此他常常就根据宗族关系来做决定，带亲近的人去打工。

90年代，外出打工人员的收入，每月大概300到400元左右，或每天8到10元。如果工资是以计件来算，可能会有400多元，但这种计件的比例总是固定的，一个月能挣到600元的情况是很少的，哪怕工人的工作强度已经到了身体的极限。打工者通常住在工厂的宿舍里，宿舍房间面积一般是10到16个平方米，住10到16人。床是双层的，铺盖由工人自己带来。房内通常只挂了一个电灯泡，其它什么都没有。工人所有

的东西要么放在自己床上，要么塞在床底下。每个人床上都挂了蚊帐，算是有点私人空间。

所有住宿的人还都得付房钱，每月30到50不等。有些工厂还不提供宿舍，在那里打工的人只好自己搭些棚子住进去。工棚都是用木盒、竹棍以及从垃圾场捡来的一些材料做成的。这种工棚在深圳、厦门、汕头随处可见。每个工人都有个塑料桶或脸盆，生活中要用水，就可以拿来到附近的水龙头或水井提点水。吃饭就在工厂的食堂里，每天的饭菜都很简单：早餐就是稀饭和腌菜，中午和晚上吃的是米饭和一点时鲜蔬菜，偶尔夹了几片猪肉。大部分工人实在吃不饱，就只得到街头小店去买点吃的。

这些农民工每周都要工作六七天，每天工作10到14个小时，有的甚至要做20个小时。对于大部分工人来说，大部分休息时间都是赶紧睡觉，只有偶尔才玩会儿扑克或麻将。本地居民有时会在工厂附近摆上一两台桌球。在厦门，工人玩一局桌球要花去5角，深圳则要1元。一些年龄还很小的打工仔由于生活太过枯燥，往往会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在赌博上。对于这些打工者来说，空余时间最常做的就是老乡之间串串门、聊聊天。偶尔他们也会在街头小店看会儿电视，有些工厂也会在食堂放上一台电视机，让工人看点电视节目。

他们的工资也不可能是按小时计算的，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每小时能挣多少钱。这是因为这些厂里不会实施8小时工作制。由于没有合同，即使签了合同，工厂老板从一开始就不会告诉工人每天的劳动时间。工人仅仅只能推算出一个月大概的工资是多少。因此，这些私人企业最常见的做法就是迫使打工者尽可能长时间地工作，从而榨取更多的利润。如果有谁不愿意加班，就会立刻被赶走，或扣减工资。计件工资也一样有很强的剥削性，因为预先并没有规定单件的工资标准，只是简单地告诉工人，做得越多，收入就越多。

广东省工会的一项调查表明，60%的工人每周工作7天，没有任何

的假期；一半以上工人每天平均工作10到12小时，每天都会加班3个小时以上。龙华镇有一家工厂，工人一个月竟加班达244小时。[21]8个高家村人在厦门打工的这家厨具厂，1993年淨利润超过2千万，而同期这家工厂的工人基本工资每月才250元，再加上100元的加班费，一个工人一个月收入总共才350元。而且，加班时间既没有口头约定，更不用说什么书面规定。每人每天平均加班4个多小时，每周30小时。有时，老板说顾客的订单增加了，加班时间甚至会多达一天8个多小时。如果哪个工人拒绝加班，就会从他的基本工资里扣除5–10元作为惩罚。几次不加班就会被开除。打工者根本没有选择，只得每周多加班30个小时，一个月才得到100元加班费。

这些私人工厂的工作条件非常简陋，没有什么安全设施。厂房里拥挤不堪，污渍斑斑，夏天又非常闷热。1994年我曾去看过几家工厂，厂房里的机器噪音令人难以忍受。对珠海7家台资工厂的一项调查表明，工厂里空气中所含的化学物质，如甲苯、乙苯，超出国际标准8到10倍。[22]中国新华社记者李年贵曾写过一篇内参，里面提到，在一次参加体检的260个工人中，有46个发现有贫血或白细胞异常。在车师乡参加体检的486个打工者中，83%的人患有各种疾病，27%染上了职业病，17%受过工伤或患有抑郁症。[23]

经常有报道说这些工厂的安全条件很糟糕，常常虐待工人。报道最多的工伤事故就是工人的手断了，或手指被削掉了。在深圳一家电脑硬件生产厂，一周内就发生五起这样的事故，都是工人的手指被机器切断了。工厂老板拒绝采取任何预防措施来避免今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故。广东东莞市的一项调查指出，1993不到两个月时间里，就有60多个工人断了手指，10个失去了胳膊，还有2位死亡。[24]

目前还没有国家统计数据说明多少打工者因工受伤或死亡。然而，上述提到的这些统计数字却足以说明情况的严重性。1994年，4,000位村民离开银宝湖乡外出打工，6位在工作事故中死亡。根据这一比例，

1994年全国1亿打工人员中，就有15,000人因工伤而死亡。

不同地方处理这些事故的方式也各不相同。根据银宝湖乡6位村民的死亡补偿金推算，90年代死亡补偿金平均每例大概1万元。1990年，江家村一个小伙子在工厂生产事故中伤到腿，到现在还不能自主走路，当时获得的伤害补偿仅为5,000元。1991年高圆贵在汕头打工时，摔断了腿，老板只付了80%的医疗费，事后还把他开除了。在有些地方，工人受伤住院，老板只付医疗费，工人只要稍有好转能做事，老板就马上要他上班干活。如果工人不能继续做工，就很快会被开除，有的还能拿到点补助，有的连一分钱也没有。在有高家村人打工的那家厦门厨具厂，曾经有个工人，一只手的手指全被机器切断了，工厂在支付了他医疗费后，只给了他六个月的基本工资，也就是1,500元。

这家工厂的另外一例工伤事故中，一个工人整个手臂上的皮肤都被机床撕掉了。工厂老板付给工人20,000元作为医药费。这笔钱相当于两例死亡的补偿金。[25]这样一来，工厂老板倒宁愿看到工人在生产事故中死掉而不是受重伤，因为治疗和补偿重伤的工人会花费更多的钱。曾有过这样的事例，为扩建厂房而清理一片林地时，一个打工者被倒下来的树打中，老板看到工人当场就死了，竟然开心地笑了起来。因为在他看来，死亡赔偿金远比医院治疗费要低。这个香港老板笑着说，工人鲜红的血正好预示新厂开张就会“红起来”。

打工者还遭受到其它各种形式的剥削和虐待。工厂老板常常要工人加班，加班的时间长得令人难以置信，达到身体无法忍受的程度。因而，工人都因身体吃不消而请假迟到，那点所谓的正常工资就被老板扣除了不少。根据一项报告，广东89%的工厂使用过这种方法，扣除工人的工资在1993年总计达85万元。横岗镇的一家工厂两个月就扣减工人工资13万元。[26]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推迟发工资或随意违背加工资的承诺。比如，厦门的这家厨具厂，无论何时，只要订单一到，老板就要求工人必须拼命工作，并承诺给每个人加工资。但接连过了两年，加工资

的事却从来没有发生过。有些老板还找各种借口干脆不发工资。深圳一家皮具厂1993年全年都只发给工人每月100元作生活费，理由竟然是老板不在。[27]据说华泰电子厂的工人春节要回家过年，老板就扣除工人半个月的工资。富永镇一家服装厂的工人好几次罢工，因为老板总是拖欠不发他们的工资。8月的工资拖到10月底还不发，11月和12月的工资也拖欠不发，而那时正是工人准备回家过年急需用钱的时候。[28]

许多情况下，工厂的纪律和规定都是主观任意的，没有任何的外部监管。广东宝安的一家工厂有13条厂规，其中一条是任何违反厂规的人要遭到像对狗一样的鞭打。[29]大部分工厂都用罚款作为主要的管理手段，工人上厕所、生病或临时有点事迟到都要被罚款。福州一家台资工厂就规定工人生病请假一小时要罚款两元，超过一小时就算缺工一天，要扣除三天的工资。

工厂老板使用各种方法威吓这些打工者者，以让他们服从老板的命令，这些方法包括向工人收取各种各样的押金。在招工时，老板就要求工人先交纳，或从第一个月的工资中扣除安全押金；如果有合同的，则要收合同押金，还要收工具押金、暂住证担保金和辞职押金等。这些押金加起来有400到1,000元。就是因为这些令人愤慨的押金，很多工人不得不顺从老板，继续受老板的剥削。

即使不收这些押金，中国的私人企业也很容易招到这些宁愿像奴隶那样工作的农民工。中国巨大的剩余劳动力就如一支庞大的“后备军”，可以提供无数的工人。能找到有现钱的工作——即使按西方的标准来说，这点工资是多么微不足道，剥削有多么深重，但对中国农民来说，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在他们的一生中，直到出来打工后，才看到了那么多现金。每个月300–400元的工资，他们至少要省出100元，有的甚至省出200多元来。在他们的老家农村，每年1,200–1,400元的汇款可是一笔巨款。至于这些私人工厂的工作条件，在他们看来，还是比在水田干活要好些，至少不用日晒雨淋。这些来自农村的年轻人并没有意识到

工厂的环境对健康的危害，一是他们根本不知道，另外就是这些病症发作的周期一般比较长。对于事故，这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却总是以为自己比较幸运，这种事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除了可以挣到现钱的刺激外，这些年轻人常常感到很兴奋，能到这么远的地方来，还在大城市里工作。

不管这些打工者对自己的工作和工作条件有什么样的感觉和想法，有一点是明确的：中国施行的是一种类似于18和19世纪欧洲式的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只不过，这种资本主义又有些中国特色，可以减轻一点工人的痛苦和苦难。一来是打工者都有一种责任感，会照顾同村的老乡。由于前面提到过的这种招工方法，往往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人会形成一个小群体。传统中国文化使得许多人都会接近和照顾老乡，哪怕只是来自同一个省，但比起外省人来，总要感觉亲近些。远离了自己的家乡，同一个县的人，特别是同一个村镇的人，彼此间就像家人一样了。一个人病了，其他人肯定会站出来帮忙照顾；有急事时，彼此间都会借钱互相帮助；碰到外地人欺负同乡，他们就一起还手；甚至还会一起反抗老板的欺侮。没有工会等组织给他们撑腰，但他们这种群体认同感有时对老板也是一种震慑，对付一群怨恨不满的年轻人远比对付一个人要难得多。

高常文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因为高常文是第一个离开高家村外出打工的人，也是村里外出打工者中文化水平最高的，所以每隔一两天就会有老乡来找他帮忙。找他的人，有的是想找份工作，有的是来借钱，有的则是因为没有地方住。高常文是一家工厂的经理助理，每月工资是八百多元。五年来，他共借出两千多元给那些来找他帮忙的人，也没有想过要他们还钱。有的时候，一些高家村人，或是原来青林大队的人，会突然来找到他，希望他能帮助搞定一切。遇到这种情况，高常文就只能想尽办法帮助老乡找份工作，实在不行就给他买张回乡的火车票，送他回村。如果不这样做，高常文就没有脸面再回到高家村。那七个在厨具

厂打工的高家村人都是高常文介绍来的，高常文是他们的担保人。因此，这几个村民对高常文也非常忠诚。无论高常文想做什么，他的这些“老乡”都会随时上前帮忙。高常文说，如果老板敢把他解雇，他的这些人都会立刻全部离开工厂。正是这个原因，高常文说老板对他就非常谨慎。

“推动”高家村村民大量外出打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如果哪个年轻人留在村里不出去打工，看起来肯定很古怪。事实上，高家村几乎所有青年人都出去了，留下来的少数人都是身体有点缺陷的。每户家庭至少有一个年轻人出去打工，有的家庭出去的甚至多达三个。到1996年，高家村仅有四户人家没有人在外打工，两户是小孩还太小，大人年龄又比较大，都不能出去打工。另两户虽然孩子已经到了可以出去打工的年龄，却还留在家里，因为他们其中一户是村长，另一户是村会计。高常权是村委会委员，喜欢抽烟喝酒，他的儿子没有出去打工，就因为他自己是村长。这两户人家实际上管理着整个高家村。其他村民要么是人到中年，要么是年迈体衰，只能在地里干点农活，挣点钱还农业税，还得将一些子女在外打工寄回来的钱上缴村提留。

高家村的这些外出打工者每年都能给家里寄些钱回来。1993年，平均每人年汇款是2,000元，只有三个人的汇款达到5,000元。一个是砖匠，正好碰到汕头急需他这样的工人。另外两个是小包工头，承包了几处工地，雇请了几个工人。由于付给工人的钱比上面的大包工头给的少，他们就多挣了点差价。在高家村，5,000元绝对是很大的一笔钱。村民用打工挣来的钱建房、送孩子上学、交税，更重要的是还要省点钱给儿子将来结婚用。村里的年轻小伙子常常是外出打工好几年才挣够一笔钱，回家娶个媳妇。

这么多年轻人离开高家村，把在外打工挣的钱寄回村里，这也使得高家村发生了许多变化。有些变化很明显，有些则比较缓慢深远。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村民的生活有了些好转，尽管还有很重的赋税。村里很

多人家(除了孩子小，没有人在外打工的家庭)现在不仅有钱上缴税费，还能送孩子继续上学读书，至少可以让孩子读上一到三年。

1994年，村里所有一到三年级的学龄儿童都能在学校读书。一些村民还建造了新房，为孩子将来结婚做好准备。更明显的变化是，村民身上穿的衣服也比以前好多了。他们可以买得起胶靴、自行车、手电筒、手套，甚至太阳镜等一些小物件，戴手表也不再是什么稀罕事了。1996年，村里已经有20多家买了电视机，大部分都是黑白电视机。

由于我这个另一种意义上的打工者的帮助，1949年后高家村第一次有了自己村民开的小店，店主就是我弟弟——高常献。顾客中的大部分都是高家村人，村民消费的工业产品也迅速增长。1994年，小店的年营业额就达三万元。最令人惊奇的是，高家村人不再种植那些供自己吃用的蔬菜和作物。他们不仅不再自己织布，地里也不再种大蒜和甘蔗，而是去村小店里买。我弟弟不仅常去波阳县城采购些纸、糖、肥皂、香烟、啤酒和鞋子等日用品，还从波阳县城批发时鲜蔬菜卖给村里人。大家可能以为应该是农民种植这些蔬菜卖给城镇居民，但现在情况正好相反：这些季节性蔬菜都是从100公里外的波阳县城运到农村来卖的。若不是有了这些打工者挣来的钱，高家村人就得过吃不上这些蔬菜的日子了。

高常献从县城买回来的这些农产品都是一些种菜大户种的。他们住在城镇附近，每天用肩挑或用手推车拉，把菜运到城里的农贸市场。许多工业产品如鞋子、衣服、塑料器具等就是在南方沿海城市生产出来，通过广州、深圳或厦门的一些批发商卖给波阳县城的商家。

因此，到我弟弟把这些商品卖给高家村人的时候，在这个贸易链上，已经发生了五次交易：从工厂到批发商，从批发商到当地的零售商，从当地的零售商到波阳县城的零售商，再从波阳县城的零售商到我的弟弟，最后再卖给高家村的消费者。

这个“贸易链”说明今天中国的市场机制已经从南方沿海地区延伸到

了内陆地区。按照西方的标准，这种机制是混乱的，代价也很高。如果产品能直接卖到消费者，那销量就会更好。第二，这种链状市场机制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波动效果，从南方沿海地区波及到遥远的内陆。第三，从工业发展和个人收入来看，这也说明了中国的地区差异。波阳县的工业发展情况自毛泽东时代结束以后几乎没有什么变化。1985年，波阳县不仅没有从工业企业中获得一分钱的税收，反而损失了423,000元。[30]

由于缺乏工业发展，城镇居民的个人收入自毛泽东时代以来也没有什么增加。1985年，在国有企业上班的工人年平均工资是695.1元，集体企业工人的年工资是608元。1993年，江西省城镇工人的年平均工资是1,799元，[31]每个月平均工资仅是157.8元；而同年在外打工者每个月则平均可以挣到300–400元，这在沿海地区还是最低的收入。由于有这些在外打工者挣来的钱，高家村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比当地的城镇居民挣到更多的钱。

大量农村村民外出打工，也同样带来了许多社会和政治的影响，有些还十分明显。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肯定会造成从社会价值和道德观到人口和经济结构等多方面的变化。一个明显而直接的影响就是没有年轻男子会留在农村。除了春节过年外，高家村平时都是静悄悄的，而这种外在的平静带给人们的却是一种荒凉废弃的感觉。物质上，村民的生活是有所好转，但整个村子却显得毫无生机，没有活力。活动的中心不再在村里，村民的渴望和期待都远在千里之外。事实上，村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高家村的历史上，村民第一次意识到，他们不必再依靠这里的山山水水来维持生计。生态和资源方面的压力急剧减轻，30%的高家村人不再靠土地为生，人均拥有的粮食数量因而更多了，对地方的水土资源的榨取也就大大减轻了。

还有些比较明显的影响，比如，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开始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宗族和亲属关系。他们从外部世界获得了许多新的思想，认为地方的宗族仪式是非常愚昧的。1993年春节期间，我在高家村过年，

那些在外打工的村民回到村里，就很少再愿意参加那些宗族里的事，有的人也仅仅是因为想到这样做没有什么害处，出于好玩才参加的。村里老人试图劝说一些年轻人组织起来，去找汪家村解决长期以来的水源争端，但这些年轻人根本不理他们，认为他们说的话是典型的老年人的唠叨话。现在在这个地方已经不可能再发动宗族械斗，原因很简单，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年轻人了。80年代末急剧增加的青少年犯罪案件在90年代初也迅速减少，原因还是在于周围没有什么年轻人生活。

村民外出打工带来的后果，有些不是很直接，但影响却很深远。尽管20世纪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变革，包括1949年共产党的暴力革命，但在中国的农村地区，传统的东西依然根深蒂固。比如，子女必须服从父母，妻子要听丈夫的。然而，自80年代以来，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不再是父母，而是外出打工的子女。由于家庭对父亲的依赖降低，母亲与子女的关系使得母亲有了情感上的依靠，因此开始变得更加自信起来。在与父亲的关系上，年轻人自己也变得更加独立，有自己的思想、行为和价值观。这些看不见的变化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和政治上的影响，因为这些年轻人变得更加不安分，不再那么温驯听话，远比上一代农民难以管教。他们开始蓄起长发，戴上厚厚的太阳镜，开始张扬自己的个性，有的还宣称不愿同本地的女孩结婚。

四个高家村小伙子在外打工时认识并娶了外地的女孩，他们并没有征求父母的意见。高常文娶的是也在厦门打工的波阳县城里的一位读过书的女孩。以前，没有城里的女孩愿意嫁给农村人。许多打工的年轻人都有男朋友或女朋友，但不一定就是想和他/她们结婚。一个高家村民已经成家，有了三个小孩，人到中年还在外打工，但却在广东找了个情妇。1993年我采访过一位高家村的女孩，她在景德镇做保姆已有好几年了，她告诉我说，她还不想结婚，还想过几年单身自由的日子。1992年春节，高朝林突然从外面带回来一个老婆，令他的父母都大为吃惊，惊慌失措。那些年老的村民完全不能理解这些事，也无法干涉，感到十分困惑。

高家村的人口变化非常迅速，但却不稳定。如果继续下去，就会有更多的年轻人离开高家村。这些人最后会在哪里定居下来呢？目前政府和高家村人都认为，这些年轻人最终都会结婚回到村子里来的。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位在外打工的高家村人回家定居。过去的情况常常是，村里的年轻人结婚都比较早，年纪不大就生了小孩。而在90年代，他们都是很晚才结婚，生小孩就更迟了，主要原因就是他们都得忙着“挣钱”。如果中国经济突然崩溃，或是所有的外商撤回投资，或中国爆发内战，或是中国政府强迫所有的农村打工人员回到农村，这些外出打工的年轻村民才有可能不得不返回家乡，否则是很难看到这些年轻人回到像高家村这样的农村永久居住的。

现在预言将来的事的确还为时过早，因为这种情况只持续了不到十年。有的村民是不会再回到高家村来的，如高常文。他已经在波阳县城买了套房子，一旦夫妻两人辞掉外面的工作，就准备回到波阳县城做生意。那些娶了外地女人的高家村人也不可能再回高家村住。如果这种状况还继续下去，并且中国还能保持稳定，经济保持目前的增长率，高家村作为一个整体最终将会消失。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还必须找到解决办法，使这些年轻人能成为城市居民。但目前，政府似乎还不知道如何处置这些问题。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一旦这些年轻人永久回到高家村这样的地方，情况会变得更为混乱：他们不会再忍受父母那代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已经有了新的思想，这将带来深刻的政治影响。

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生态的恶化和具有剥削性质的定价制度把高家村这样的地区带到了危机的边缘。80年代初期的价格体制改革给农民提供了一点新的呼吸空间，可到80年代末，情况又迅速恶化。但远离高家村的南方沿海地区的迅猛发展又给了高家村新的发展机会。村民外出打工不仅减轻了高家村的生态负担，也带来了宝贵的现金收入，村民可以用这些钱缴税费、支付教育和医疗费用、购买现代商品。

很显然，高家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外出打工人员的血与汗换来的。

尽管按照“西方”的标准，这些人工作和生活的条件是极其恐怖的，但如果让他们有机会选择的话，他们都不会回到高家村。原因有很多：第一，为了生存，就必须外出打工。经济上的“推动”因素就是打工挣到的钱对他们来说确实非常有诱惑力。第二，大家都认为能在外到处看看，到城里工作是很有“面子”的事。年轻人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他们为此也非常自豪。第三，打工者自己也认为在工厂里做工不一定比在田地里劳作更辛苦，至少与农活相比，不用到外面日晒雨淋。至于健康危害和恶劣的工作环境，由于危害不是很直接，也不是很明显，这些来自像高家村这样的农村地区的人也就常常不想那么多，忽略不顾。因为这些外出打工者并不把健康危害和工作环境看作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最后，他们始终有种兴奋感，能看到外面不同的世界，买得起以前没有见过的时髦衣服等。

注释

1 本章的数据和资料来自本人1992年去厦门和1994年去广东的两次实地调查。有的资料和数据也被引用在：Mobo C. F. Gao, "Migrant Workers from Rural China: Their Conditions and Some Social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outh China," in *Entrepreneurship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Chang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uthern China*, edited by David Schak (Brisbane: Centre for the Studies of Australian and Asian Relations, 1994), pp. 21–38; 以及 Mobo C. F. Gao, "Welfare Needs and Problems of Migrant Workers in South China," in *Social Welfare Development in China, Constraints and Challenges*, edited by Wing Lo and Joseph Cheng (Chicago: Imprint Publications, 1997), pp. 101–120.

2 Martin King Whyte, "The Social Root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144 (December 1995): 999–1019.

3 欲了解这些地区的商业化发展的情况，可参看William A. Byrd, "The Impact of the Two-Tier Plan/ Market System in Chinese Industr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1, no. 3 (1987): 295–380; *China: Internal Market Development and Regulat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4); Jean C. Oi,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Andrew Watson, "The Reform of Agricultural Marketing in China since 1978," *The China Quarterly* 113 (March 1988): 1–28.

4 Barbara Entwisle, "Gender and Family Businesses in Rural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no. 1 (1995): 36–57.

5 了解对财政改革如何影响到农村地区工业发展的有关讨论，请参看Jean C. Oi, "The Role of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The China Quarterly* 144 (December 1995): 1132–1149.

6 Gary Jefferson, "Are China's Rural Enterprises Outperform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Report Number Ch-Rps#24, Washington D.C., 1993.

7 Christopher Findley, Andrew Watson, and Harry X. Wu,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in China: The Impact and Prospects for the Out-of-Plan Sector," *Asian Studies Review* 17, no. 2 (1993): 3–29.

8 《新华月报》，1993年第1期，第49页。

9 彭昆仁：《广东乡镇企业运行机制的探讨》，载《中山大学学报》，第4期（1992），第8–14页。

10 Marika Vicziany, "Economic Liberalisation in Asia: Its Meaning and Consequences, Introduction," *Asian Studies Review* 17, no. 2 (1993): 2.

11 Louis Putterman, "The Role of Ownership and Property Rights in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144 (December 1995): 1047–1064.

12 Jean C. Oi,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World Politics* 45, no. 1 (1992): 99–126; Jonathan Unger and Anita Chan, "China, Corporatism and the East Asian Model,"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3 (1995): 29–53.

13 关于这一点，还可以参考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The Quest for Development since 194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Elizabeth J. Perry and Christine P. W. Wong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Carl Riskin, "Small Industry and the Chinese Model of Develop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46 (April-June 1971): 245–273; Dwight Pekins ed., *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 in the PR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Christine P. W. Wong, "Ownership and Control in Chinses Industry: The Maoist Legacy and Prospects for the 1980s, Collection of Papers Presented to the U.S. Congres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in *China's Economy Looks Towards the Year 2000* (Washington, D.C., 1986); David Granick, *Chinese State Enterprises: A Regional Property Rights 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14 薄一波：《若干重大事件与决策的回顾》，第二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第798页。

15 Edward Friedman, Paul G. 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15.

16 黄道霞：《激荡中国的农村变革》（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第115页。

17 同上。

18 中国乡镇企业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乡镇企业年鉴（1978–1987）》（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8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1991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第315–378页。

19 Christine Wong, "The Maoist Model Reconsidered: Local Self-Reliances and the Financing of Rural Industrialisation," in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dited by William A. Joseph, Christine Wong and David Zwei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53–182.

20 Kristen Parris, "Local Initiative and National Reform: The Wenzhou Model of Develop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134 (June 1993): 244–245.

21 许挺飞：《羊城晚报》，1994年5月21日，第2页。

22 余季文：《外商企业侵害劳工事例综述》，载《九十年代》，1994年4月，第56–59页。

23 见李年贵：《一些外商投资企业严重侵犯职工合法权益》刊登的一篇报道的摘要，载《九十年代》，1994年4月。

24 《大陆消息，共党问题研究》，第21卷，第4期（1994），第88页。

25 1994年5月作者同四位高家村外出打工村民的采访内容。

26 《深圳特区报》，1993年1月3日。

27 《深圳商报》，1994年1月14日，第1页。

28 同上，1994年2月1日，第11页。

29 《羊城晚报》，1994年3月29日，第8页。

30 刘汉艳编：《波阳县志》，第516页。

31 游会龙编：《江西统计年鉴（199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第70页。

第12章

变化和延续：文化及风俗

尽管有许多的社会动荡，土地所有制和政治结构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并且这种种变迁长达四十多年，但高家村看上去却没有什么变化。要不是中国南方沿海地区的工业迅速发展，吸引了大批高家村村民外出打工，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在政策上的种种调转回头性变化很有可能把高家村带回到1950年代时的状态：家庭拥有土地，生活上自给自足，但仅能维持生计。

在文化风俗方面，发生了很多事情，但变化却很少。村民打工带来的收入使村里的经济走出自给自足的模式，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与此同时，所有制的形式和生产方法却基本上与1949年以前保持一样，体现了国家经济上的连续性。国家政策上的回头转变，不仅结束了40年的农村激进政策，也重新回到了1949年前的经济状态。这种连续性同样还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地方的文化活动和社会风俗等。

宗族文化和村中事务

传统延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处理村里大小事务时，都要考虑到宗族关系。尽管在高家村，宗族文化并没有以外在的仪式和建筑如宗祠或

族长等形式表现出来，但宗族文化的影响却深入到村民生活的每个角落。高家村从来没有建过祠堂，村里也没有正式的族长，但宗族结构从1949年前一直到现在都潜在地影响着村里的大小事务，只不过这种影响机制很难用直接的构型来描述。总是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力量，它们相互交织，相互平衡着村民的生活。

村里不同宗族支系间有不同的利益和影响势力，彼此相互制约。村与村之间又有复杂的关系，一旦有了冲突，这种关系便会占据上风；此外还有政治上的变化和外来的政策干涉，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仅影响到村内的宗族支系间、村与村间的复杂关系，反过来，政策本身最后又受到这些宗族关系的影响。所有的这些因素互相作用，互相平衡，它们综合作用在一起，深深影响到村民的生活。这可以从几个例子中得到说明。

高常明后来离开了高家村，成为景德镇一家瓷厂的工人，但他在村里的时候，却十分调皮。他天生就像是个不安分的人，总是给其他村民带来麻烦，因此从小就得了个绰号“害精”，“害精”这个名号也一直跟随着他。前面第七章提到过，他拒绝归还高天翔借给他的地，并指责高天翔是“反攻倒算”的阶级敌人。高天翔被划分为地主，打上这种政治标签，高常明应“功不可没”。

高常明的行为非常恶毒，一点都不公道。然而他自己其实也是宗族压迫的受害者。他父亲死于30年代初，当时他还是个小孩。按照当时的传统儒家礼法，他母亲必须在高家村守寡抚养高家的血脉。可他母亲与附近汪家村的汪叠应好上了。其实这在村子里也算不上什么大事。比如，高常银和高仁开的老婆勾搭在一起，我的母亲与高仁允是相好，还有富农高尽享死后，他那寡居的老婆也至少和两个男人发生过关系。但高常明的母亲却过于轻率，公开和汪叠应在高家村同居，这令高常明家族的长辈们无法容忍。最年长的两位，高仁辉和高仁坤，就决定把高常明的母亲卖掉来结束这段丑闻。高常明的母亲听说此事后，就逃回段家村的娘家。段家村那时比高家村还大一倍，高家村找不到任何法子把她

要回来。最后高常明的母亲嫁给了汪叠应，留下高常明在高家村，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他后来有怨恨，成了高家村的叛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父亲高仁法的故事也是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村里宗派纷争和村与村的关系在这个地方是多么复杂。我父亲是族里他那一代人中最年轻的。按照宗族传统的做法，他必须要听从那些比他年长的兄长和其他长辈的话。40年代，国民党政府在这个地区实施“保甲制”来巩固政权。在这一制度下，像高家村这样大小的村子组成一个“甲”，甲长由政府任命，负责为政府收税，特别是要为政府拉壮丁去攻打共产党。比高家村大三到四倍的村子，或三、四个高家村这样的村子，就组成“保”，保长管着下面各个“甲”的甲长。我的父亲，既不识字，身体又差，却被村里的老人推出来做“甲长”，因为当时高家村没有一个人愿意担任这个差事。

1944年，保长为完成政府规定的指标，命令高家村这一“甲”要送一个壮丁去参加国民党军队。责任落在了我父亲身上。因为没有哪个村民愿意去当兵，父亲只得准备去买一个壮丁。段本益在段家村很有权势，也十分富有，因而后来在土改时被划分为地主。他答应派一个段家村的壮丁给我父亲，条件是500大洋。[1]当时商量的做法是我父亲先付钱给段本益，然后段把壮丁交给保长，保长再把钱还给我父亲。但是我父亲把钱交了后，想去领人送到保长那儿时，这个人却不见了。我父亲就去段家村要人，段家村人不但拿了钱拒绝交人，而且还威胁说，如果我父亲还纠缠于此事，就要把他绑起来痛打一顿。高家村太小，根本打不过段家村。我父亲不仅没有从段本益手中要回那500大洋，反而又被迫再付了100大洋，因为另外一个人也逃得不见踪影了，这个账也算到了我父亲头上。父亲只得又多花了好几百大洋再去买了两个壮丁，但这两个人还没被送到国民党军队，就逃跑了。

因为高家村完不成政府的指标，县政府就派了几个警察，带着枪，

要我父亲承担责任，因此我父亲就被当作壮丁带到了县政府。他们在给父亲做体检后，发现父亲身体太差了，根本不合格，就把父亲放了出来。父亲身无分文，只得一路乞讨，走了60多公里路才终于回到家。最终还是我父亲的姨妹夫高仁昌答应去国民党军队，这件事才算了结。高仁昌在部队也没有真正打过仗，因为他很快就找到个机会，从部队逃了出来，又回到了村里。

这一切都是父亲在族里长辈命令下去做的结果，但父亲最终却落得个破产的结局。由于当了这个甲长，父亲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卖掉了家里值钱的家具以及我母亲的首饰，最后还欠了1,500公斤稻谷的债。

后来在1950年，我父亲又一次被族里人要求去承担族里的责任。共产党组织成立贫农协会，族里的长辈高仁坤和高仁辉要我父亲当高家村的代表。刚开始村民对共产党并不了解，有点害怕，担心也和国民党一样。族里的长辈让我父亲去做代表，不仅因为我父亲是族里辈分最小的，很听话，还因为他也是最穷的。村民对共产党唯一的了解就是共产党不会伤害穷人。共产党政府接受我父亲这个代表，是因为父亲1949年帮过共产党的军队。由于有这些原因，我父亲就成为官田农民协会高家村的代表。但不到半年，野心勃勃的高常银就取代了我父亲。因为高常银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和其它政治活动，很快就当上了官田大队的书记。

正如前面所讲的那样，文化大革命期间，来自政府和宗族势力的影响又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着高家村的大小事务，互有怨隙的村子的红卫兵就各自迫害、殴打对方村子的地主和富农。高家村的红卫兵批斗徐家村的“反革命分子”徐添云，而徐家村的红卫兵就迫害高家村的地主高天翔。文化大革命给农村长期存在的宗族纷争提供了一个合法的借口。然而这种合法性也有个范围。尽管高家村和汪家村的矛盾更多更深，但这种相互迫害“阶级敌人”的事并没有发生在高家村和汪家村之间，这是因为两个村子不属于同一个大队。同样，这种政治气候也没有引起雷家

村和高家村相互殴打对方的“阶级敌人”，因为这两个村分别属于不同的县管辖。

宗教还是迷信？

能体现高家村传统延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80年代以来各种宗教活动又重新出现了，只不过这些活动在毛泽东时代被政府认为是迷信。高家村以西半公里处，过去有一座庙，叫桃花庵，里面放了12尊着了彩的木菩萨。我童年的记忆中，这个地方总是阴森森的，那些佛像更是吓人。大跃进时，这些菩萨像都给搬走烧掉了，但庙还在那里，青林地区的一些村民还常常偷偷地去烧香磕头，好像那些菩萨还在那里一样。

庙的四周是一片竹林，寺庙及这些土地一起都归青林大队集体所有。竹子在当地是非常宝贵的资源。竹笋是中国菜中的一道美味佳肴，一年收获两季，分春笋和冬笋。更重要的是，有两种非常重要的农具也是用竹子做的，到今天还是这种做法，一是人们扁担两头挑着的竹筐，一是用来晒稻子的竹垫。用竹筐把稻谷从田里挑回来，还得用竹垫晒上至少两天，直到晒干后才能储存很长的时间。从朝鲜战场回来的一个退伍士兵被派来看管这片竹林，他在战斗中受了伤，腿有点跛。他就住在这庙里，但他并不信菩萨，甚至也不要其他人相信。桃花庵正式公开的宗教活动虽然中止了二十多年，但自80年代以来，这里又重新成了一座庙宇，村民又搬来了六座菩萨像放在这个庙里，供人祭拜。1995年，这座小庙起火被烧毁，有的村民就在空旷的废址上继续拜神求菩萨，一些积极的村民还到处筹款准备重建。

这些村民求神拜佛似乎并不是寻求精神的寄托，而是出于实际生活的需要，如想发财、求好运，或问药治病。确实，在村民看来，任何一尊塑像都有可能是“菩萨”。毛泽东的雕像是“菩萨”，耶稣基督的雕像也是一个“菩萨”。为了各种生活目的，村民会拜各种各样的菩萨。有的

菩萨其实就是中国历史上一些非常有名的人物，如三国时的大将关云长，军事家诸葛亮等。这种宗教行为上的杂合，也许是中国政府对宗教活动的打压并没有对汉族地区的农民造成很大伤害的原因。桃花庵的十来座菩萨被烧这件事，并没有影响到高家村人，因为他们还有自己的“菩萨”可以去求助，那就是“王太公”。甚至在文化大革命鼎盛时期，王太公也没有受到丝毫伤害，这座塑像被村民一家一家地传过去，接受村民的祭拜。第六章中我们提到过，高仁为曾扮过“王太公”转世。他在1964年被认为失败了，因为菩萨并没有治好病，从此他再也不敢装神弄鬼。但他却并没有因为假扮“王太公”这种在官方看来是“封建迷信”的行为，而受到任何迫害。

这个地方流行的另一种宗教活动就是祭祀祖先。祭祖这件事一直以来都是根深蒂固的，80年代后，变得越发盛行。祭祀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清明节上坟，在祖宗坟前烧点纸钱和香，另外就是农历过年时候，也要烧点纸钱祭祖。有的人家还会在祖坟前祭拜时燃放爆竹，表示对祖宗的敬意。爆竹炸得越响，时间越长，就表示越虔诚。另一种祭祀祖先的方式就是要摆上食品供死去的祖先享用。过年时，从腊月二十八到三十号，家家户户都会摆上酒筵，全家人一起吃团圆饭。酒席开始前，要把准备好的祭品放在祭台上，先让祖先享用。在烧香时，全家人都要双手合拢，向祖宗鞠躬顿首三遍。大年初一，高家村所有的男丁一大早又聚在一起，举行隆重的宗族祭祀仪式，每个人都像前面说的那样，又必须鞠躬三次。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宗族祭祀活动不再举行了，但村民在家里的祭祖行为还是一直延续下来；只不过在政策最激进的时候，只能是偷偷地祭拜一下。

最能体现村民生活中传统的延续和变化方面的例子莫过于祖坟的位置和维护了。在村民看来，祖坟修得越大，维护得越好，就表明对祖先越有孝心。[2]通常人死后，后人就会把尸体放进棺材中，在选好的地方挖个深洞，把棺材埋进去，再盖上土，堆成高高的坟堆。坟堆越高越

大，家人感觉就越好。在这里，挖人家的祖坟那可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但是，在过去四十年中，却有许多坟地被铲平，坟墓被移走，坟堆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低了。当然，这种情况是慢慢形成的，有许多的实际原因，主要还是生存的需要。高家村的人口越来越多，村里的土地有限，每一寸都不得不利用起来。一些坟地被推平种上了庄稼，因为要建造水利工程灌溉农田，还有一些被移走了。这一切都是逐渐完成的，并没有外部的干涉。

若没有当时的政治气候，村民很可能会有各种反对和抵触，但破坏坟墓却不是政治的需要。像中国农村发生的许多事情一样，这种变化往往被解释成是共产党政权破坏宗教的表现。然而，它也可以同样被解释成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不全是政治的原因，也有社会发展和经济的因素。

用木料做棺材来埋葬死者，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今天。这里的人死后都是土葬而不是火葬。这里也从来没有什么火葬场，村民一想到火葬都会感到很恐惧。他们认为，保存好完整的尸体就可以让死者延续生命。因此，后人的职责就是要尽可能地把先人的尸体保存完整，时间越长越好。这种思想和行为还是受到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儒教中“孝道”的影响。同样的原因，小孩子在社会等级中是没有任何地位的，因此一个小孩若是夭折了，从来没有人会认为他的尸体值得用好棺木好好保存，通常就是用几块木板钉个盒子埋掉就算了。

而对于老年人，用的木料越好、越厚实，棺材越重，那么后人就显得越发孝顺，在村民眼里，这家人也就越有面子，越发受人尊重。最好的一种棺材是用杉木做的，木料越粗越好。几片薄木板钉在一起肯定是做不成棺材的，会被认为是对死者的不敬。村民之间也常常相互比较，谈论着这家或是那家的棺材做得怎样，花了多少的木料等等。

因而，这在村民身上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大家都想为死去的长辈尽可能地做一副最好的棺材。有的时候，用巨大的中国杉木做的棺材，装

进尸体和用来保存尸体的石灰后，需要24个壮汉才能抬起来，送到墓地。棺材钱是农村家庭中三笔最昂贵的开支之一，其它两笔就是用在儿子娶媳妇和建新房上的花费。确实，对大多数农村夫妇而言，他们一生中所指望的就是能完成这几件大事：给子孙留座房子，让孩子早日结婚成家，能体面隆重地安葬父母。为此，他们要付出很多努力，做出巨大的牺牲，才有可能完成这三大愿望。

由于树木越来越少，木材越来越珍贵，棺材的价格自然也就上涨得很快。在60年代，一副好点的棺材要花300多元，按照当时农村的标准，这可是一笔巨款，还不包括运费在内。因为当地并不产这样的杉木，村民得拉上板车到60公里外的地方去拉木材。每次运棺材都得要两个身材健壮的男子，每人拉着一辆板车，上面分别放着棺材盖和棺材盒，花上三四天才能把棺材运回来。附近的树木越来越少了，村民只得到更远、更远的地方去买棺材。80年代后，一副上好的棺材要花好几千元，还得到200多公里远的地方才能买到。现在，人们一般是雇上一辆汽车运输棺材，但也有付不起车钱的人家，那就只得还是用板车自己拉了。

当地另外还有一些传统留下来的活动，如算命等，这些活动从未在农村消失过，即使在最激进的时期，算命先生们也依然走村串户。这些算命先生通常都是眼睛瞎了的男子，他们四处给村民算命，换点吃的养活自己。算命先生到了某个村子，有的人就会喊他进去，先赶紧端上些吃的，然后就听他开始算命。想算命的人只要先报上自己的生辰八字，算命先生就会告诉他以前他做过些什么事，将来还会发生什么等等。算命先生说的话总是很含混不清、模棱两可，似乎用在什么人身上都有道理。村里每个人的命一般都要被算好几次。每次村里来了算命的人，母亲都会喊进来，要给我算命，因为我在外面工作，对村里人来说，我的命可不是一般的。

婚姻和妇女

结婚的开销往往相当大，对于有许多儿子的家庭，这种经济负担尤为沉重。通常这种负担要落在新郎家的身上：男方必须预置一间新房，新房里要有一张床，一副蚊帐，一张梳妆台，一个衣橱和几个木箱。20世纪60、70年代，有些家庭还要买上一台缝纫机。现在还要有手表、自行车和电视机或电风扇。新郎还得负责嫁妆，其中包括一套新娘婚服、数件新娘的嫁衣和鞋袜、洗脸盆、椅子、毛巾、牙膏牙刷、围巾、手套、靴子、被子、丝绸铺盖、枕头等等。通常还要给新娘打一个银项链和一副银手镯。新娘娘家所办的两次筵席（订婚筵与起嫁筵即结婚前一天的筵席）也要由男方支付。结婚这一天在新郎家还要举办一次更大的筵席。两次筵席的规模视被邀请的亲戚和宾客而定。在村民的眼中，筵席越盛大，食物越丰富，婚礼就越受尊重。

20世纪60和70年代，结婚的平均开销在两千元左右。20世纪80年代开始，花上一万元办结婚筵席已属平常。在一些例外的情况下，女方会支付部分或全部费用。这种情况之所以能发生，往往是女方家很有钱。可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新娘会有什么不尽完美之处，要么容貌差，要么性格不好。有时如果新郎相当出色，新娘家也会准备好嫁妆甚至承担新房的一部分费用。所有嫁妆事先需约定并准备好，放在新娘家里。结婚当天，新郎和一群乐手以及一些身强力壮的男子挑着起嫁彩礼，一大早就来到新娘家，然后返回新郎家赶赴婚礼和筵席。新娘现在不再坐轿子，而是坐手推车或自行车。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一些有钱人家开始用摩托车接新娘子。当迎新队伍离开新娘家门时，乐队敲起锣鼓吹起喇叭，迎接新人的仪式就正式开始了。如果新娘家离新郎家路程远，要经过许多村庄，迎接新人的队伍就得很早动身，每进入一个村庄，乐手们便开始吹吹打打，喜气洋洋穿行过每个村庄，村民们都会出来观看，并对新郎新娘以及彩礼品头论足。如果彩礼极其丰厚，

当地村民会把它当作传奇故事说上数年甚至数代。因此这是家族的荣耀，也是家族成员的骄傲。当迎接新人的队伍到达新郎家时，鞭炮鸣起，响彻天空，整个村里的人都会出来看新娘子和陪嫁嫁妆。嫁妆会放在屋里让大家观看和评论。

过后不久，主婚人（通常是年长的族长或是某个有地位或见识的人）说上几句客套话宣布婚礼开始。这时新郎新娘面对神龛站在一起，首先，主婚人会叫他们向新郎的祖宗牌位叩三个头，[3]之后向新郎父母叩三个头，接着再向新郎的亲戚们叩头。假如新郎亲戚很多的话，整个过程要足足半个钟头。最后，大家会要求新郎新娘嘴对嘴吃或喝些东西，但决不会要求他们当众接吻。

等这一切结束，就可以开筵了。一张方桌坐八人，每张桌至少要上十二道菜。有些人家上的菜会达二十四道之多。菜数越多，菜肴越丰盛，主家就越光彩，越有名望。20世纪80年代后，一些有钱人家在婚筵上所上的菜已达三十六道之多。菜肴数目不可以是奇数，因为结婚是成双成对，是偶数。请客桌数也表明请客人家的地位和身份：桌数越多就显得越有名望。20世纪90年代期间，尽管在高家村没有哪家婚筵摆过一百多席，但在这个地区也有耳闻。婚筵上的宾客包括：新郎本村每户至少来一人，愿意来的地方官员，本族的长辈（往往是男性），五六个最年长的村民（包括女性），以及任何有身份和地位的人，比如村里的教师等。出席婚筵的宾客必须给新郎家送礼金，20世纪60、70年代，礼金平均数额是2至5元，到了90年代，送20至50元已属正常。听说有些新郎家办婚筵还能赚上一笔。

结婚当天晚上会请村里乐手们为筵席助兴。乐队通常由六到八个自学成材的乐手组成：一个打鼓，一个敲锣，两个拉琴，还有好几个吹喇叭。他们边奏边唱，唱的是地方戏，每出戏都有一个角色，也不需要排练。这些地方戏从来也没有写好的词和谱好的曲，它们是靠口耳相传的。戏会唱到半夜，这时新郎和新娘该入洞房了。

可是，新郎新娘非得等闹完洞房后方可清净。有人要趁新人不注意，从新房中拿走一件寝居物品，比如一只鞋或一件衣服。这件事通常由一伙彻夜不睡的年轻人来做。当来拿东西时，如果这对新人被吵醒，婚礼也就结束了。为了最后这件事能尽快做完，通常这对新人会故意不锁上卧室的门。可是他们不知道闹洞房的人什么时候会进来，因此整晚也睡不了。

包办婚姻在这个地区依然经常发生。大多数情况下，要经过一个相当复杂的做媒过程方能促成一段婚姻。一般的做法是，一家人会请某个人充当媒人去另一家说媒，请媒人说媒的可能是年轻人或其父母。另一家可以直截了当地拒绝，也可以不表态，以求更多的选择或保持说亲中的优势。只有当两家同意订婚，年轻男女才能相互见面，通常男子在过节时会上女方家去拜节。女子要等订了亲才能上男方家的门。通常由媒人来为两家安排定亲和彩礼事宜。

年轻男女要等订婚后才可以私下讲话，而且，女子如果直盯着男子看，会被认为不懂礼节。然而，男子和女子都会私底下被询问他们对彼此的看法，他们之间的对话则是由媒人来传的。女子往往在决定是否订婚和嫁妆的项目等事情上有很大的发言权。一旦女子对男子的长相满意，她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从她未来丈夫家获取尽可能多的东西。有时订婚协议可能会拖延好几年，并且女子通常都会为她父母尽量争取到最大的经济上的好处，有些甚至要求新郎家资助新娘弟弟妹妹的教育费用。新郎新娘要等到婚后才能有机会培养相互之间的理解、感情和爱。

高家村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没有童养媳了，我姐姐高玲俐是最后一位，可是收养女儿的现象相当常见。高家村有两户人家由于不能生育，各自收养了一个女儿。后来这两名女子通过招赘又给高家村招进了两名外姓男子。如果某家没有儿子，女婿就得入赘岳父母家，他们的子女得跟着姓高。

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高家村已有九对同村男女成婚，这是高

家村婚姻模式最显见的变化。结婚前他们都是青梅竹马，相互钟情。村里人记得在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之前，从未有过一起这样的例子。随着村里越来越多的孩子接受了教育，村里年轻人开始越来越抵制和排斥这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的婚姻。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集体制，它为年轻人提供了一起劳动，更好了解彼此的机会。有两对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京剧排练和表演过程中坠入爱河的。

但是，传统依然存在，许多婚姻仍然由父母包办。20世纪50年代后，还产生了三桩由父母包办的表亲结婚的婚姻。这种婚姻可能非常不幸，其中两对结婚后所生的四个小孩，要么残疾，要么智障。第三对算是幸运的，因为这对夫妇是远房表亲，所生的小孩健康无恙。这三对由父母包办的婚姻，主要还是出于经济的考虑，在聘礼上，女子也没有说话的权利。这些家庭相互之间都是关系很好的亲戚，双方都不愿讨价还价，婚礼也办得尽可能简单，这样可以省一大笔钱。实际上，其中两对夫妇在一起生活得很幸福。唯有一位女子，叫桂圆，表明她当初根本就不想要这桩婚姻，这一切都是她父母的错。

桂圆的丈夫高仁方已经去广州打工，他是高家村唯一一位年过四十，已婚，有子女的打工仔。高仁方在外打工到现在已有五年多了。过去他每年春节会回一次家，可是，自从1994年后，他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也没给家里寄多少钱。有传言说他在广东有个情人。对于这种情形，桂圆无能为力。她只得耕种分给她家的田地，照料她那有智障的孩子。作为女人，桂圆无法提出离婚。在高家村，唯一的一起离婚事件发生在解放前。那时，地主高天翔休了他的发妻后又娶了个老婆。

离婚这种事不仅涉及传统礼教中只允许丈夫休妻这样规定，而且一般说来，离婚的人还得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地主高天翔有钱，离得起婚，而其他村民没钱就做不到。在这方面，共产主义革命并没有给农村带来什么变化。他们连生存都很困难，根本没有人会离婚，他们只能认命。比方说桂圆，如果真的离婚了，对桂圆而言并不见得就是好事。在

高家村生活这么多年，她已经走不出去了。尽管高家村出去打工的女孩子要真正做到自主自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她们因为有了打工挣来的钱，也开始能够主张自己的权利。目前，那些离开村子外出打工的高家村人大部分都是年轻的男孩，而他们的父母通常把女孩留在家中，有的父母是出于对女孩安全的考虑，但更多的则是想女孩可以帮家里多做点家务活。

总的说来，共产党政权在中国农村妇女解放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男女平等的思想不仅政府认可，在农村地区也广为传播。村里的妇女能够，也确实可以挑战村里的长辈和自己丈夫的权威，她们敢说："我不怕你！男女是平等的。"如果高家村哪位妇女要离婚，不管是道德上的还是政治上的，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她这样做。只是常常出于现实生活和经济上的考虑，她们在做出离婚的决定时，会非常谨慎。

一个女人一嫁到另外的村子，她的名字马上就会从原来村子的户籍中划掉。她既不能继续享受原来村里的各种资源，也不能继承父母的财产。传统上，父母的财产只能由儿子继承，现在的农村还是这种做法。一个离了婚的妇女除了立即再婚之外别无选择，她已在一定程度上被困住了。

关于这点，我们举最后一个例子来说明。高家村首富高汉正的女儿和其在外的恋人离家出走，虽然高汉正不赞成，但他们还是得到了村委会同意结婚的批准书。结婚两年后，这个男子因犯罪被送到监狱服刑。高汉正非常愤怒，认为徐先修代表村委会同意他女儿嫁给一个罪犯，那徐先修就必须承担责任。但徐先修确实有权力开具证明书，同意这对年轻人结婚，高汉正在法律上挑不出错。为了表达自己的愤怒，他就来到徐家村，打了徐先修几个耳光，然后赶紧跑回高家村。如果不是跑得快，他很可能会遭到徐家村人的痛打。

从法律上讲，妻子和丈夫共同拥有家庭财产。理论上，妇女离婚

后，可以得到法律上属于她的那部分财产，带或不带小孩都可以独自生活。而实际上，如果一个女人要离婚，生活中的各种事情都将不利于她。首先，大多数情况是，一栋房子里住了好几户人家，离婚分给这个女人的财产微乎其微。其次，即使这户人家有自己的房子，如果离婚，那双方都没有能力付给另一方一半房价。若是拆掉或买给别人，那实际生活中就导致丈夫、妻子还有小孩都无家可归。第三种可能情况就是男女双方离婚后依然是朋友，分开住在这栋房里，但这样的情况下，离婚就永远是不可能的。离婚对男方在经济和实际生活中也有很多的束缚，但比起对女方的影响，程度可能没那么严重。即使他不考虑经济上的因素，也不会仅仅因为不爱妻子而跟她离婚，这在当地村民和地方官员看来，都是愚蠢而荒诞的，根本不会来处理这样的事，所有的想法都是劝他们和好，夫妻间凑合着过下去。另外，夫妻间任何一方与别人发生了私情也不足以导致离婚。

结婚头两年，妇女常常感觉自己是丈夫家的客人。公公婆婆通常对她非常客气，有时甚至是在讨好她。这就让她感觉有点孤立，家里的事情也常常没有她说话的份。生活中若是要点钱用，还得经过丈夫的手。这种谨慎而又疏远的婆媳关系常常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这位年轻的妇女若是遇到不开心的事，就会随时卷起包裹回娘家去。有的时候，因为和丈夫吵架或是与公婆不和，媳妇会跑回娘家一住就是几个月。男方家里如果实在着急，希望媳妇能回来，两边村里的一些干部就得出面，试图找一些办法劝解他们。大多数情况下，妇女生了小孩后，与娘家的关系就开始淡了下来，并且因为她已成为母亲，给家庭养育了后代，她在家里的地位也开始变高了。

高家村妇女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主要是因为两个方面的原因：教育和参与生产劳动。正如前面“农村教育”那章中已提到的，50年代以前，高家村只有一个妇女读了点书，是位半文盲。现在，高家村35岁以下的妇女都接受过两到五年的教育。1949年以前，我母亲那一代的女

人都只能呆在家里，而现在的所有妇女都像男人一样在田地里干活。从60年代到80年代初的集体制时期，虽然大多数的决议最后是由男性作出的，但妇女能够参与处理村里的事务，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自80年代末以来，妇女和男子一样享有各种平等权利，可以平等地投票选举村长和村委会成员。[4]因为外出打工者大部分都是年轻的男子，留在高家村的女人远比男人要多，但即使是这样，高家村也没有一位女性被选举或任命为村长。

事实上，也没有哪个女性愿意站出来参选村干部。即使在集体制的时候，政府规定每个生产小队都要任命一位妇女主任，也很难找到愿意出来担当这个职位的妇女。道理很容易明白，首先，她们的长辈和家庭都不鼓励妇女积极参加公共事务。第二，在一个夫权的社会里，女性找不到自信，缺乏决断能力。第三，在集体制时代，担任生产队妇女主任得不到任何物质上的回报，相反，还必须带头辛苦工作，成为他人效仿的榜样。80年代以来，当上村长或村委会干部就会得到很多物质利益，但妇女还是不能和男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男人不用做家务，也不需要照顾小孩，他们可以随时离家三四天去参加会议，或在晚上也敢独自去其它村子开会。村干部到村民家收税和提留，或是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当地村民往往会进行各种方式的抵抗，也常常导致身体方面的打斗或至少是口头上的争吵。所有这些都不适合一个女人去做。80年代以后，村干部把大部分时间和金钱都花在吃喝玩乐方面，这些事情常常又与他们的工作紧密相关。因此一个农村妇女就不大适合卷入到这种生活中。

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确实提高了她们的地位，哪怕在社会上可能没有提高，但至少在家里，她们的地位是提高了。只要比较一下那些去田地里干活的妇女和没有去干活的妇女在家里的地位，就可以看出来。人民公社时期，高家村有14位妇女从来没有或很少去田地里干活。她们都是老一辈人，小时候裹了小脚，不方便去外面做事。当然仅仅由于裹了

小脚就不能去田地里干活，这还可能不是全部原因。我的母亲也裹了小脚，但她还是必须每天出去挣工分。不下田干活的这些妇女，有些是年老体衰，有些是身体虚弱不可能像男人那样在外面劳动，还有一些不必出去做事，因为家里有足够的壮劳力，而且家里也一直是队里的进钱户。她们中间只有一位拒绝下田干活，还总是说自己身体不好，她名叫容秀，是一位强势的女人，是生产队长高常绕的老婆。高家村就只有两名共产党员，其中一个就是高常绕。尽管家里经常是赤字，是队里的超支户，但由于丈夫是队长，容秀也就不必去地里干活了。

除了容秀和另外一位妇女(她的丈夫平常总是沉默寡言，性格非常随和)外，高家村不下田干活的其余十二位妇女都非常温顺，对丈夫百依百顺。她们中间有两个人的丈夫与高家村别的女人有私情，这在高家村几乎是人人皆知的，而她俩却不敢有任何抱怨。与她们正好相反，那些在田地里干活的妇女却没有一个怕丈夫的。她们像男人一样抛头露面，言谈举止都显得十分果断，充满自信，完全不像那些只在家里的妇女那样，连大声说话都不敢。家里的事情，比如家里收入怎么安排，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等等，她们也往往更有决定权，而她们的丈夫也没有一个与别的女人产生私情。

然而，地位的提高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些妇女除了要做家务和照管小孩外，还必须比那些呆在家里的女人更辛苦地在外干活。田地里的农活是非常辛苦的，气候条件更是十分恶劣。幸好，在公社集体制时期，妇女常常干些轻点的体力活或是安排条件好点的工作，并且在田地干活的时间也比男人要短点，休息次数也多些。比如，她们在干活期间可以允许回家照顾下婴儿。

虽然像洗衣做饭等家务活都得女人做，但村里的男人也一样十分辛苦地劳作着。早晨，女人在家里洗衣做饭，男人就已经在地里埋头干活了，通常是两三个小时后才回家吃早饭。中午，女的回家做饭，男的还继续留在地里干活。到了傍晚，还是妇女先回家准备晚饭，她们的男人

依然还在地里劳作。在集体制时期，村民家自留地的农活大部分都是男人在生产队出工前或收工后才抢着时间做的。高家村的男人既不酗酒，也不会把时间花在茶座里，因为这里从来就没有供人休闲的茶座。在80年代末期，高家村还没有男人赌博，但后来，一些男人开始用麻将和扑克赌博，也有些妇女像男人一样打麻将赌钱。高家村也总是有些家庭争吵，但家庭暴力和打架等事件还是很少发生。

农村节日

在中国，共产主义政权增加了四个新的节日：三月八日(妇女节)、五月一日(劳动节)、六月一日(儿童节)、十月一日(国庆节)。然而，这些节日都是城市居民和拿国家工资的人才过的，对于农村人，它们并没有什么意义。大部分村民对这些节日都没有什么精神上、情感上的印象，在农村生活里也没有与这些节日有关的任何庆典活动。只有在文化大革命最高潮的那两年，村里的妇女会在妇女节那天不用上工做事，还可以得全天的工分。至于其它三个节日对村民的影响，几乎就仅限于学校读书的孩子在儿童节那天不用去上学而已了。

但是，村民对传统的节日却非常重视。所有的传统节日中，最重要的就是春节。春节通常在农历腊月二十八就开始，一直到正月十五才结束。农村人可以有这么长时间过春节，就是因为春节正好是农闲季节，一般是公历二月，不用去地里干活。从腊月二十八到十五，每家都会准备三次隆重的家庭晚餐，这也是村民辛苦一年来吃得最好、最奢侈的三餐饭。一年到头，他们节省下每分钱，就为了这个时候。整整一年，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花费，而春节过年这几天，他们几乎花费了一年所有的存蓄。平时养的鸡和猪等，要到过年时候才会宰杀；做的新衣服，也会留在过年时才穿。结婚办喜事也会放在过年的时候。一到过年，家里每个人无论在外多远，都会赶回家来吃团圆饭。

80年代以来，每到春节，成百万的打工者都会赶回家，过年后又返回到工厂去做工。有的人为过年回家要坐几天几夜的火车，辗转上千公里，也许就是为了在家呆那么几天。每年一到春节，中国政府就不得不组织调增几千辆火车和几百万辆客车来应付这不可阻挡的人流。过年的时候，每家每户都会买回大量的糖果、糕点、烟酒等。对于这些普通的村民而言，过年才是他们唯一不考虑成本之类，而纯粹是为了开心花钱的时候。

腊月三十除夕的时候，每个孩子都会盼着得到压岁钱。三顿丰盛的晚餐前，村民都会放鞭炮庆贺。吃完饭，孩子们常常提着灯笼，在村子里到处嬉戏。连续三天晚餐前，还得要祭祀祖先，把准备好的食物摆出来供祖先享用，然后全家人再叩头三遍。正月初一早晨，所有人家都会放鞭炮，祈求新年好运。鞭炮的声音越响，持续的时间越久，就意味着家庭的运气越好。新年第一天的早餐一般是酒酿煮年糕。用完早餐，村里所有的男丁都要向族谱鞠躬祭拜，然后挨家挨户拜年。他们一边聊天一边吃着花生、自家做的饼干、糕点等。正月初二开始，村民就开始到其它村子里的亲戚朋友家拜年。最先要去给岳父母拜年，然后是给其它一些关系密切的亲戚拜年。每去一户人家都要花上半天，如果有时路途长点，还要一整天。这样大家彼此拜访，相互拜年，一直会持续到正月十五。每个人都会穿上最好的衣服，确实这也是大部分村民一年来唯一穿新衣服的时候。

农村里另外一个重要的节日就是每年农历三月（公历是四月）的清明节。到了这个时候，村民就会做一些可口的甜米糕，摆到祖坟前给祖先享用，然后烧些香和纸钱。这个时候大家一般都会把祖坟修葺一下，在坟堆上添些土，把老鼠或兔子挖的洞堵上，盖点土。清明节后另一个比较重要的节日就是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比较而言，端午节的气氛就要欢快得多了。清明节是家庭内部的事，而端午节则更多的是公众的节日。到了端午节，每家都会做糕点，用竹叶包粽子。如果过节期间的

天气还比较好，河边或湖堤上常常聚满村民，观看水面上的龙舟赛。有的时候，还会在开阔的地方演些地方戏或京剧。

在青林地区，龙舟赛也不是每年都会举行。遇到水灾比较严重的年份，眼看庄稼颗粒无收，村民都没有了过节的心情。另外，在毛泽东时代，政治最激进的那两年，一些地方政府禁止村民举办龙舟赛。政府压制龙舟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害怕引起村与村之间的争斗。在龙舟比赛中，每个村民都想自己的村子获胜，相互竞争着为自己村里赢得荣誉。在油墩街，每隔一两年就会发生因龙舟赛而引起的村与村之间的械斗，导致许多村民受伤。高家村是从来不参与这种比赛的，甚至连一艘龙船也买不起。

最后一个传统节日是农历八月十五的中秋节。中秋节是一年中最平淡的一个节日，但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却是文人经常吟咏和庆祝的一个节日。对那些文人墨客而言，中秋的月亮是最圆的，最适合欣赏月景和感悟人生。那些诗人或漫步或端坐于花园中，中秋赏月，往往会令他们诗兴大发，写几句诗词赠言给好友以抒发心怀。而对于农民来说，无论是在1949年之前还是以后，这一直都是他们无法达到的奢望。但是，中秋过节时，家家户户都会买些月饼，让孩子也能开心些。在中国人看来，圆圆的月亮象征着团圆，因此，中秋节是家庭成员一起团聚的日子。

在这些传统的节日里，那些已经订婚的男子都必须去拜访他们的岳父母。每次去，他都得精心准备些礼物，礼物的数量和贵重程度不仅受到未婚妻的仔细查问，而且女方父母和村里人也会查问和比较。有的时候，女孩为了帮她未婚夫和自己以及家里父母赢点面子，会故意夸大事实，在告诉村里人时，多说些男方送来的礼物。不过这种夸大其辞会带来正反两方面的作用。订婚后，如果女方或女方家庭不同意这门婚事，女方和她的家人就会到处诉说男方家里太穷或条件太差，以前送来的礼物根本没有说出去的那么多。结婚后，丈夫就不会每个节日都去拜访女

方父母了。结婚后头两年，丈夫还会和妻子一起每年去女方娘家看望两三次，后来就成了例行公事一般，每年就只在春节去看望下女方父母亲。

总的说来，共产党政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在高家村这样的农村地区并没有人们所说的那么严重。在文化和风俗方面是产生了些变化，有些变化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造成的，有些则是经济上的需求造成的，比如，铲除坟墓和墓葬用地的减少主要就是由于经济上的需要。妇女接受教育和参加农业生产等方面的变化，大大改变了妇女的命运。毛泽东时代宗教活动的衰败和毛泽东死后宗教活动的重新复苏就清楚地表明了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条件共同影响着农村社会。当村民可以得到国家组织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够看得起病的时候，传统的求神拜佛就迅速减少；而没有这些医疗服务或看不起病时，那些传统的迷信活动又会很快重新出现。

农村的婚嫁风俗和村民都想生儿子的問題，也可用这个道理来解释。农村包办婚姻和索取礼金等都是与经济上的要求紧密相关的。女子一旦结婚就不可能再给娘家挣钱了，因此娘家人就会在女孩结婚前向男方家索取尽可能多的礼金，一方面是用来给女儿多准备些今后过日子用的嫁妆等，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把女儿养大成人的补偿。因而，不考虑经济方面因素的恋爱结婚通常得不到父母的认可。同样，亲戚间相互通婚，双方都可以省下不少钱。农村地区重男轻女，部分原因来自中国的传统，但这种行为一直继续存在，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农村地区缺乏社会保障体制。城里人有各种社会保障措施，至少毛泽东时代是这样，因此对女孩的歧视问题并不是很严重。共产主义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仅仅只在社会经济发生倒退的时候才会造成一些变革，而在其它情况下，传统依然得到继承，一旦思想意识上的束缚稍有松动，传统的做法又会很快重新复苏。

注释

1　“大洋”是当时流通的一种硬币，用银做成，又叫银元。

2　“孝”是儒家的主要教义之一。在儒家看来，秩序井然的社会是建立在等级制度之上的，人人都要有伦常意识，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对长者要孝顺。对祖先的崇拜和祭祀就直接出自这里。

3　新郎新娘要跪在地上，低头触地磕头三次。

4　地方村干部的选举是中央政府实行的政策之一，自80年代以来开始不时地在一些地方实施。村民这方面的情况，我出于几方面的原因，不想做过多的讨论。首先，这种选举并没有按照政府的要求定期举行。地方政府只有在上级政府严厉敦促的情况下才组织这样的选举。上面的监督一有松懈，当地政府就任命自己的官员。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选举是否举行都不会给村民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人民公社解体后，生产活动都是以家庭为基础，村干部的责任主要就是收税和执行计划生育政策。那些村干部，无论是选举出来的还是上级任命的，做事的方式都是一样的：通过征收村民的税款和提留，尽可能多地为自己捞些好处。至于计划生育方面，过去和现在的村干部也都是一样，尽力阻扰或推延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至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阻挠这种政策的实施，这还得看上面推行这一政策的力度。无论怎样，现在人们的想法和行为方式一般都是尽量抓住能得到的东西，每个村民都在想法找到保护自己的方法。第三，自80年代末以来，高家村大部分年轻人和能干的村民都外出打工了。那些留下来的男子本身就不是很多，也就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了。目前还没有哪位女性愿意出来做候选人，更不用说那些老年人或是中年人了。

第13章

高家村和外部世界

高家村人对村外的世界知之甚少，20世纪80年代随着不少村民外出打工，人们才开始了解村外的世界。很多人连公交车都没坐过。一来他们没钱出去，二来他们确实也不太需要出远门。我母亲在村民中竟算是最见多识广的一位。她到过不少城市，像景德镇，南昌，还去过上海——她女婿跑货船去上海时，她没花钱，搭顺风船也去了一趟。后来，她坐火车来厦门看我，成了她那辈人里唯一一位坐过火车的人。

村里人对村外的世界漠不关心，过去四十年的坎坷生活和村里的种种变化就已经够让他们操心的了。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正当他们刚刚适应了毛泽东的大集体制度时，这个制度却被取消了。一代又一代高家村人的生活重心只是如何生存下去。因此，他们对别人的判断往往注重实效。比如，村里人觉得毛泽东是皇帝，吃的穿的都是最好的，和其他皇帝一样，毛泽东是金口玉牙，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说的都是真的。对于政治思想或精英的政治斗争，他们不了解也不关心。他们认为发生了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有时，他们对强加于他们的政策会感到不满，也会有怨言，比如政策严禁他们到集市上卖鸡蛋，家家户户都希望能分到更多的自留地，讨厌老是开会等等，可对那些强加于他们的政策

与限制，他们并不认为是毛泽东的错，而是怪村里那些当官的。

在毛泽东时代，政策不断变化，却没有一项政策可以说使村里人在物质生活上有重大的提高。最明显的实惠是教育与卫生政策，所以他们尊敬毛泽东。村里人听说了刘少奇的下台，但却不知道刘少奇的方针政策对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认定刘少奇是“奸臣”，要不然刘少奇身上也不会发生那么大的变故。

村里人对邓小平的态度十分冷漠。20世纪80年代初，毛泽东之后的中央政府实行了一些改革，给村民带来了一些实惠，如提高农产品价格等。然而，因为邓小平从未正式成为国家第一领导人，推行改革政策并不是以邓小平的名义进行的。无论怎样，这些改革措施所带来的好处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农业生产费用迅速攀升，紧接着地方上党员干部腐败之风盛行，贫富两极分化严重。人们了解到是邓小平运用权力，导致这些情况的发生时，就指责邓小平，认为发展中的一切问题之所以产生都是因他而起。村里人现在想起或谈起毛泽东的时候，仍饱含着无比的热情与崇敬。20世纪90年代我重返高家村，发现还有不少人把毛泽东像高挂在家中。提到邓小平，他们都叫他“邓矮子”，而毛泽东却威严尊贵，很具个性。村里人觉得邓小平的外貌看起来就不像皇帝。

地方党员干部对邓小平所持的否定态度更让人印象深刻。他们中的几乎所有人在毛泽东逝世后都更加富裕了，盖了大房子，开的是摩托车，可在毛泽东时代他们可能连自行车也买不起。毛泽东时代之后，物质生活得到了提高，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这一点从青林地区也可以看出来：盖了更多房子，人们穿得更好了。但是没有人喜欢邓小平。对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地方党员干部都说是因为当下中国的贪污之风太盛，尽管他们有些人自己就是局中人。另外，他们还抱怨说现在犯罪案件太多，和以前比没有什么安全感。外出打工确实给家里赚来了钱，可村里人感到这些变化难以捉摸，也难以把握，觉得生活有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外出打工的和留守在家的都不知道以后的生活将会如何。对政

策略知一二的村官说，中国正在倒退回“旧社会”，那些不识字的老人也叹道，“现在的社会太黑了”，“人心太坏”，有些人觉得中国南部地区的部分政府官员为了发财把地卖给了外国人。

尽管人人都在抱怨别人把社会搞得乌烟瘴气，一片“黑”，但为了暴富，他们自己可能就会毫不犹豫地干起“黑心事”。有这么两件事也许能说明些问题。1996年，广东某纺织厂为降低进货这一中间环节的费用，派人来银宝湖乡的余家村（有一千户人家）直接进购棉花。来人看好了棉花，谈好了价格，签了合同，付了钱就高高兴兴回去了。这可是笔大生意，有好几千吨棉花。可货到了广东，厂家打开货一看，看到的却是惊骇的一幕：砖头竟被精心地裹在了棉花里，里面的砖头加起来足以盖一所房子。无独有偶，邻村村民卖给某榨油厂的芝麻里竟掺了炭屑。

村里人对村外的世界一直就不甚了了，所以1994年乡亲们向我问起2000年的奥运会和悉尼时，让我颇感意外。1994年时，村里已经通了电，也有了电视机。中国媒体开展了全国范围的2000年申奥大行动。看到连高家村人都会锁定申奥频道，我才明白后来的申奥失败让中国人失望伤感的范围之广和程度之深。乡亲们对香港的询问也让我有些意外，他们问英国会不会为了保住香港和中国打起来，如果真打起来，中国会不会赢。一次，我从澳大利亚给波阳打长途，可总也打不通，事后我姐姐觉得奇怪，竟问是不是打不通电话和中英在香港问题上的争议有关。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对外国人就怀有复杂的感情和态度。高家村人也不例外。他们不了解外国人，而知道最多的莫过于外国生活的富足和外国人的物质优越感。他们相信外国产品的质量出奇地好，对于外国产品他们一律冠以“洋”（字面意思是“海洋”，意为从海洋那边来的）。以前中国人称火柴为洋火（外国的火），而高家村人现在还这样叫，还有煤油叫洋油（外国的油）、机帆船叫洋船（外国的船）、枪叫洋枪（外国的枪）、肥皂叫洋皂（外国的肥皂）、人造布料叫洋布（外国的布），似乎这

些货品比国产的同类产品质量更好些。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但他们的枪连只兔子都杀不死，煤油灯比青油灯亮堂多了，洋布更鲜亮也更好洗，所以他们深信“外国”也就意味着“财富”。

村里人对非洲和南美一无所知，对外国人的印象只局限于白人。他们听说过一些城市如上海、青岛等有外国人盖的洋楼(外国的房子)。洋房很漂亮，至少有两层高，还带花园。对村里人来说，这简直是童话，因为他们的房子是灰色的，泥土地面，只能遮风避雨而已。他们偶尔也听说一些香港或从美国回国的华侨回家时都带了不少钱回来。

甚至连政府宣传都给村民灌输了这种印象。20世纪60年代风靡一时的电影《红色娘子军》中，有一位共产党员乔装成香港侨胞，为组织一场革命起义，打入了某地主防御甚严的大房子。这位党员打扮成华侨后，显得十分富有，衣冠楚楚，地主本人对他也十分恭敬。

我定居于澳大利亚后回到高家村时，乡亲们都认定我发了财，连村里和镇里的官员也或直接了当，或拐弯抹角地要让我为村里建学校捐款，为一些水利工程提供赞助。乡亲们传说我给了我的兄弟姐妹很多钱，他们就要盖大洋楼了。

村里人对“外国人”了解很少，我头次回国时，他们都不知道该问些什么，问得最多的是英国人吃什么。我说爱吃羊肉，他们竟断言外国人身上肯定有难闻的气味。外国人吃生的蔬菜，喝冷的牛奶，这点让他们觉得难以接受，认为是没进化的人才会这样。他们想不通外国人为什么不吃鱼头，不吃猪头肉，也不吃猪蹄和猪心。我请他们尝尝巧克力，可他们都不爱吃，说太苦了。

通了电，有了电视，乡亲们才知道外国人长什么样。但外国人的长相让他们觉得很奇怪，想不通黑人怎么会长得那么黑，白人个子太大，毛太多，眼睛陷得太深，鼻子又太高。我70年代当“赤脚老师”时认识的一位好友叫曹俊荣，他是一位地方干部，1994年他曾问我觉得外国人怎么样。我含含糊糊地谈了一下，又反问他同样的问题。没想到，他虽

受了六年教育，当了三年兵，到过中国不少地方，却回答说外国人长得不好看，从电视上看外国人常会在公开场合接吻，他还反问，男人怎么会亲那样的一个女人？

一次我回村带了两位澳大利亚同事去。对村里人来说，这可是件难忘的事，他们可能在以后很多年里都会谈到这件事。我们到了村里后，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赶来看这两位外国人，毕竟这可是他们头一次看到“活生生”的外国人。其中一位同事有个像弥勒佛那样大的啤酒肚，他走到哪，孩子们就跟到哪，嘴里还不停地说他怀孕了。另外一次回村，我带了一个20多岁的女学生同去，她是位金发碧眼的美女，当我向一群村民介绍她的时候，其中一位名叫高仁允的80多岁老人，他曾是我母亲的相好，告诉我说，他看不出那位学生是位年轻姑娘，他还以为是个白发老太太呢。

村里的老一辈虽然对村外的世界没什么了解，可他们对自己以及对世界的看法却很明确。有些看法是在生活中形成的，有些是从祖辈那传下来的。像高家村人仍然信奉中国上千年的传统观念“学而优则仕”。1981年我从英国回村，他们满以为我已经在政府机构担任了什么要职，可看到我从又挤又脏的公共汽车上下来，也没人给我拎包，他们都很失望。他们本以为我会带着司机，坐着小车，跟着一帮保镖回村的。其中有村民当时就评论说，我早已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了。1981年的一天，我正在家里捧着一本书看，走进来一位乡亲，他诧异地问，像你这样已经读完了世界上所有书的人怎么还要读书？

当城里人正为众多外国的汽车和化妆品品牌搞得眼花缭乱之时，高家村人却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我要给弟弟买块手表，他选的却不是外国的，而是国产的。1994年我想给他买台彩电，他又说要国产的，说是东西坏了，国产的至少可以找到人修。正因为他们的贫困，他们必须现实。一位上海姑娘随意潇洒一回的花费，可能相当于一位村民多年辛辛苦苦的积蓄。

为了生存他们也必须现实。几年前，我邀请母亲去澳大利亚，虽说母亲还没认真考虑这件事，可家里人都一致提出反对，说那么多钱可以用在更要紧的事情上。他们还说，如果旅游，让母亲在中国玩一圈更划得来，到国外去并不划算。对他们来说，他们生活圈外的世界与他们没有关系也没有意义。初次回国，乡亲们让我说几句英语给他们听听，听了后却彼此议论说这种“鬼话”听不懂，没意思。

中国的主流知识精英和不少城里人都认为，像高家村的这些农民都是愚昧无知的，因为农民们与世隔绝，还固守着旧有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这种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的，但如果我们带着一点理解的态度，换个角度去看，可能会明白，村民的生活观和世界观反映的是一种尊严，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自豪。他们对自己很确信，对自己的生活也有某种自豪。他们的生活自成一体，直到最近，都还没有机会去考察或理解别样的生活。

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对外面的世界很冷漠，更确切地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别样生活的可能。他们一直被视作负重牲口一样的生物，又有谁会在乎他们的所思所想呢？古往今来，精英阶层想的都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剥夺农民的劳动，只有发生了大饥荒，可能引发农民起义的时候，精英们才会对农村生活关心起来。毛泽东的某些政策，像大跃进的确害苦了农民，但毛泽东却是真心尝试设法改变农民生活的领袖。他想让农民组织起来，一边进行农业生产，一边进行工业生产，以缩小城乡差别。正因为此，毛泽东还号召城市青年到农村去生活，到农村去工作，“向农民学习”。但他的政策被认为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遭到了后来领导者的否定。不过，发展乡镇企业无疑是毛泽东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可当代的精英们并不以为然。

农民遭到的歧视与不平等待遇可以从1996年我遇到的一件事上了解一二。高常森是位年过七旬的老人，我回高家村时，他来找我，恳求我救救他孙子。他孙子在北京打工，为了筹备和当地一位姑娘的婚事，

他回了趟家，可家里拿不出聘礼。小伙子想把他放在北京的钱拿回来，但他没有让北京那边的人帮着把钱汇过来，也许是他不知道怎么汇，也许是他根本就不相信银行和邮局系统（官方的媒体中确实常有报道，农民到邮局或银行取钱，却取不了）。于是，他又回北京去，想把钱带回来，回去后却一直没有音信。直到最近，高常森接到北京警察发来的一个信封，打开信封，里面也没有信，只有一张纸条，说他孙子已经被捕了。我仔细看了一下，纸条上只盖了一个公安局的章，写了十几个字，没有解释为什么抓人，没有说明会怎么处理，没有联系电话，没有地址。高常森不清楚怎么去北京，就是知道也出不起路费。就算村里真有人去了北京，也不知道找谁。村里有人帮着高常森到处去打听，帮着到村委会和乡政府去问情况，可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乡亲们围着我和高常森，他在我面前伤心地抽泣着，他们让我想想办法，帮帮忙。我取道香港返回澳大利亚时，在江西省的省城南昌逗留了一下，请我南昌的熟人帮忙查查，看能不能想点办法，可对这件事谁都没有一点头绪，不知从何帮起。

高家村人对村外世界的冷漠受到了他们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方式的限制。教育可能对他们的世界观会有所改变，但这种改变十分有限。虽说在毛泽东时代，他们的教育状况有很大的改善，但他们所受到的教育仍然太少了。对大部分人来说，离开学校后，学校学的东西根本派不上什么用场。那些因教育而改善了经济状况的，像我和高朝栋，自走出村子后，就不再是村里的人，村里的生活也和我们无关了。

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期两个方面的发展很可能会改变村里人对村外世界的看法。一是村民有了电视，二是村里的年轻人外出打工。不过因这两者而产生的思维方式上的变化却还不明显。思维方式上的变化，不论是好是坏，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显出它的作用来。虽然村里人从电视上得到娱乐，但他们还没有把电视屏幕上播的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电视里的生活离他们的生活还很遥远。城里人可能在渴望过上西

方人那样的生活，学生会被诸如“民主”这样的观念所吸引，但却别以为高家村人看完电视后会有类似的感受。有不少城里人请我帮他们移民去澳大利亚，或到那里留学，可村里人却认为这种想法简直荒谬可笑。

外出打工者与留守在家的想法有所不同。我弟弟高常文在厦门打工，他想去澳大利亚，因为他觉得那儿的收入更高。其实，打工者的经济条件改善了，他们也看到了并体会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只要他们还在外打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不属于高家村村民这个群体了。他们大都是年轻人，思维方式还未定型。他们结婚之后是否会回村呢？在城里生活多年以后，他们对自己以及村外的世界又会如何评价？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也许将会对中国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因而也许会对整个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14章

结论

1949年以来的高家村的历史并不能代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本书的目的也不是要概括出所有中国农村的特征，相反，本书研究的目的是要说明，发生在一个村子里的事情与人们通常听到的对1949后中国的描述可能是不一样的。

在国外，人们一谈到1949年后的中国，就总是联想到这样几幅画面：农家后院的土炉炼出些无用的废铁；大跃进时人人敲着锣扑杀麻雀；文革时红卫兵烧书、殴打老师和党的干部，人人都拿着红宝书大声喊口号，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表示忠诚。或者，时间更近些，天安门广场上坦克从学生身上压过，警察殴打藏民。然而，所有这些画面都不适合解释高家村发生的变化。

当然，这里还有个方法论上的问题，高家村这样的个案，对于研究中国究竟有多大的价值？应该承认，虽然这一案例研究并不能推导出整个中国的一般特征，但确实可以提供一些洞见。任何对中国的概括性的说法，在“科学意义上”都是有缺陷的。这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存在着各种地区差异和不同的变化。我们希望能做到的就是为更好理解中国提出一些可能的洞见。

造成中国的地区差异，原因有很多。其中值得考虑的一个基本因素就是存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农村的中国和城市的中国。中国的农村和城市不仅经济上悬殊甚大，政治上也完全不一样。中国农村发生的事绝对与城里的情况不同，反之亦然。中国沿海地区与中部地区不一样，中部地区又与西北地区不同。1949年以前的历史给中国沿海地区留下与内地完全不同的社会和经济条件。比如，广东毗邻香港，许多家庭有海外关系，他们在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条件是高家村人所不具有的。但高家村发生的事情却可以在很多方面反映出湖南、安徽、河南和四川等省的农村情况，因为这些地方都有相似的历史和经济条件，当然这些又不同于广东或甘肃、新疆等地区。

即使在同一地区内，由于政策执行力度不一样，也会产生差异。共产党政治中有较不正规和比较浓厚的个人色彩和专横作风，仅仅由于一把手个人性格和爱好不同，同一种政策在不同的省竟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比如，大跃进时期，安徽省的领导比江西省的领导更大胆冒险，因此安徽的饥荒就比江西的严重多了。事实上，大跃进最困难的时候，有大量的安徽农民逃荒到江西讨饭。

因为中国是一个所谓的共产主义国家，西方的主流媒体就常常把中国看作是一个铁板一块式的整体，其中任何人任何地方好像都是千篇一律的。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巨大差异，各地政府对中央政府政策实际存在的不同反应和执行力度，却常常被忽视。因为西方主流媒体急于要谴责共产主义思想和实践，它们并没有考虑到，地方条件和传统的影响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对1949年后中国农村地区的发展产生影响和作用的。

高家村人大部分是文盲或半文盲，但他们却不是如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是非常落后或封建反动的群氓，是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障碍——“一袋袋的土豆”。他们也并不像中国那些高高在上的学术精英们所说的那样，是死硬的保守主义者，尽管传统的重担确实仍然重压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也不像城里那些

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那样，曾对社会主义中国抱着浪漫的想象。他们并不是狂热的毛泽东主义者。虽然常常受到当地官员的欺侮和监管，这些村民还是理性而讲求实际的。

中国的农民为中国的工业发展，为城市居民的福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那些城里人，特别是中国的部分精英分子，不但没有对这些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表示丝毫的同情和感激，反而还瞧不起农民，指责农民造成了中国的落后。他们认为中国“农民意识中的封建残余”造成了中国缺乏民主传统，因而形成中共政治上的个人倾向和独裁作风。

1949年之后，高家村的发展过程中有几点我们需要特别指出来。由于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技术和实行精耕细作的生产模式，高家村的粮食产量有了飞速增长，但这并没有给高家村人的生活带来明显改善。这主要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加在农民头上要其为中国的工业化服务的需求。政府直到80年代还规定农民人均允许消费的口粮，“多余”的粮食必须按国家定价卖给国家。二是四十年来高家村的人口翻了一番。同世界上所有的农民一样，高家村人也是靠土地维持生计的。人口多了一倍，而土地总量又不变，如果粮食产量又保持不变的话，那就意味着村民的收入减少了一倍。只有粮食产量增加一倍，才能维持以前的收入水平。

因而，高家村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肯定有赖于许多相互作用的因素。若是其它因素不变，人口就必须得控制住。为使村民能自愿控制生育率，就需要建立一套社会保障体制，并提高村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为建立稳固的社会保障体制，并提高人口的教育水平，村里的经济发展就必须取得非常大的突破，而发展经济就必须实行商业化和对外引资。以上这些原因，有的我们已经讨论过，有的只是稍稍提到了，还有些如国际的因素等我们并没有论及。这个地区既没有大规模的商业化，也得不到外部投资，相反因为政府需要资金解决其它更紧迫的问题，而制定了歧视农村的定价制度，高家村人早已无钱可花。因而，他们不得不依靠

有限的土地和日益减少的资源，被迫陷入他们自己根本无法摆脱的贫穷的陷阱里。

高家村人口迅速增长主要是农村医疗卫生状况的改善和儿童死亡率下降的结果。1949年共产党革命带来的一个最明显的好处就是在农村引入了基本的医疗卫生技术，如免疫接种和控制如“血吸虫病”等瘟疫。1949年以来，高家村另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村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在毛泽东时代，高家村有很多人开始识字和学文化，村民的教育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我们必须指出，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高家村在医疗卫生和教育方面获得了很大的改善和巨大进步。但是到80年代后，卫生和教育状况却开始恶化起来，主要原因就是7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歧视性农村政策。直到90年代，由于有了外出打工人员的汇款，以及他们本身强烈的文化需求，农村教育状况才再次有所改善。

1949年以来高家村发生的另一个重大变化就是环境和生态的变化。人口的增长导致粮食需求的急剧增大，也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发展。第一是经济作物的减少，越来越多的土地被改成稻田。人们为了填饱肚子，不得不放弃种植经济作物。这种变化通常被解释为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因为毛泽东时代的激进农村政策的目的就是要打压经济作物，以免滋生商业现象和资本主义。但高家村村民减少种植经济作物以增加粮食产量实际上与当时的农村激进政策并没有多大关系，并不是受意识形态方面的推动，而是出于要养活这么多人口的需要。

经济作物的减少不仅意味着村民现金收入的减少，同时还带来更深远的影响，其中之一是导致农村自给自足程度的降低。在70年代初，高家村村民花钱最多的商品就是食盐、肥皂和火柴，其它的日用品都可以自己生产或加工，但到80年代末期，他们生活中大部分的日用品都得从商店里购买，而到90年代，由于有了打工挣来的钱，村民除了种点粮食和蔬菜外，其它生活用品都是到商店或附近村庄的专业户那里购买。

第二是生态方面的破坏。为了增加粮食产量，人们使用的化学品也越来越多，导致水生物大量消失。种植水稻离不开水，水田的附近必须要连着池塘、小溪或是湖泊等，而这些江河湖泊里面有许多的鱼、虾、蟹等水生物，是村民获取蛋白质的便利来源，水里丰富的水草又是村民养猪和其它家禽的天然饲料。但大量化学品的使用却几乎将这些丰富的资源灭绝殆尽。夏天的夜晚，村民很少再听到那悦耳的蛙鸣，想要吃鱼也只有到专门的养鱼场才能购买到。

因为要靠土地养活这么多人，对土地的榨取就越来越重，水土流失的现象也变得越来越严重，造成一些河流，如黄河和长江等河床的逐渐升高。因为对鄱阳湖及周边水域实行围湖造田，鄱阳湖的水域面积在不断地缩小，结果就是土壤的存水能力下降，河流湖泊的蓄水量减少，鄱阳湖水流向长江的速度降低。因此，我们看到，近年来鄱阳湖地区的洪灾次数越来越多。到90年代，这里几乎每年都会发洪水。

中国农村地区有一个持续几千年的特征，许多村子的村民都是同一个宗族的，村里所有男子都同姓，子女也随父姓，并且同辈的人取名时，第一个字必须要一样。每个村民都把自己看作是宗族的一分子，宗族就是他们的社会，其它的事情要么是假的，要么就超出了他们的生活范围。每一个宗族村落都有属于自己的领地，1949年之后也没有多大变化。在高家村，1949年共产党革命既没有改变自然村的这种经济状况，也没有动摇村民的宗族意识。

高家村这样的宗族村庄无论从政治还是社会的角度来说，都是一个完整独立的整体。除了大跃进期间一段非常短暂的时期外，曾在全中国农村到处建立的人民公社，也没有创造出超越传统宗族村庄的社区生活方式。在那时，小的宗族村就是一个生产小队，大点的村子就分成两、三个生产小队，更大的村子就组成一个生产大队。宗族村庄在经济上的情况怎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子里的领导。公社制度并没有重新分配各个村的土地资源，只有在农村政策最激进的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各村

的人力资源安排上才做了些调整，但也主要是用于一些水利灌溉项目。由于管理不善或缺乏各种资源，一些宗族村庄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但很少能得到条件好的其它宗族村子的帮助和支持。

总之，无论是群体的身份认同还是村民的经济状况，共产主义革命并没有超出宗族村落的框架。因此，自1949年以来，在高家村和其邻村的历史中，宗族和谱系特征与共产党的政策相互重叠、相互干预和相互交织，这并不令人奇怪。不管是选举党的地方官员，还是在水利工程建设中的人力调配，或地方纠纷的处理中，宗族及其谱系关系都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关于这一点，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前面提到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宗族及其谱系关系对政治的影响。

虽然宗族势力可以保护村民的利益，但是宗族并没有组织性地与政府进行抵抗。比如，在人民公社时期，没有哪个村子的宗族敢于抵制国家征税和政府的价格控制制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几十年，主要是因为政府的税收体制还比较透明和稳定。但从80年代末以来，地方税收的征收过程开始变得随心所欲、腐败滋生，因而导致民众非常愤懑，开始起来抵抗。但是，这种抵抗行为也只是个别的、孤立的。高家村所在的地区，由宗族组织进行抵抗的现象暂时还没有出现。

即使是这样，在宗族势力比较大的村子，一些村民还是很勇敢地拒绝缴纳任何税赋。但高家村村民却不敢。至于国家控制的价格体制，村民就找不到什么抵制的方法了，因为他们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卖，也无处可卖。此外，宗族也无法去反对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公平地说，国家在这方面的政策在近几年前并没有在农村地区造成严重的后果。甚至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最有效的时期，在政策的执行方面也并不总是一致的，有时抓得很严很紧，有时又很松弛。因而，即使一个宗族想要反对，也不知如何去面对一个本身就不稳定的政策。

中国传统的一些方面在农村仍然在发挥作用，与共产党的政治经济

一起共同影响着村民的生活。比如在公社时期，劳力多的家庭很显然是在补贴资助劳力不足的家庭，这种情况常被认为是毛泽东时代的平均主义政策造成的。而事实上，当时公开宣布的政策是，在公社里，人人都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但实际上多年来劳动和奉献得多的人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因为赤字欠款的家庭没有能力付款给贡献多的家庭。因此，“按劳分配”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实施，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欠款的村民确实无法偿还债务，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复杂的宗族关系。因为一个村子里，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同属于一个宗族，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定的宗亲关系，考虑到同宗同族，彼此间就不好用过于强硬的手段来解决这些债务了。

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文学经常把中国农村居民的贫穷归咎于人民公社时的“吃大锅饭”，认为这种经济体制阻碍了村民的劳动积极性，但高家村的例子却说明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公社实行严格的监督和评价制度，并且高家村自1949年以来粮食产量一直稳定增长。农村居民收入低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农民缺乏劳动积极性，而是国家价格制度的剥削本性。80年代初期农村居民收入的急剧增长与其说是由于集体制的解散，还不如说是价格制度改革的结果。如果国家定价制度和统购政策在80年代依然保持不变，即使在高家村实施家庭承包责任制，村民的低收入也不会有丝毫改变。

在另一方面，也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在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农村集体医疗制被后毛政府摧毁了。与此同时，农业投入不断增长但农民收入依然徘徊不前。农村居民开始骚动，变得非常不满，农村地区的犯罪率也迅速上升。这种糟糕的状况直到90年代初期才被遏制住，因为中国南方工业的迅速发展为村民提供了许多工作的机会。

高家村外出打工者在许多方面为改善自己家乡的面貌作出了重大贡献。首先，那些对现状不满的年轻人都离开家乡外出打工，农村的犯罪现象得到控制。其次，因为靠土地为生的人变得越来越少，对土地的生

态破坏就减轻了。再次，打工挣来的钱可以帮助村民还税、治病和送子女上学。到90年代中期，约30%的高家村人离开村子外出打工。他们不仅要忍受恶劣的工作条件，还常常遭到工厂老板的责骂，经历很多精神上的折磨。但是，高家村的年轻人还是非常希望能在工业发达地区找到工作，多挣点钱帮助在农村的家人。

除了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带来的医疗和教育方面的改善外，高家村的发展在90年代以前一直都在原地打转。通过精耕细作而增加的收入一部分被国家的歧视性价格制度剥夺掉了，一部分又被快速增长的人口抵消掉。80年代末期中国的工业发展给村民提供了外出打工的机会，高家村才有可能历史上第一次打破这种原地止步的发展。

然而，直到1996年，也就是本书涉及到的最后一个年份，这还只是一种可能性，并且我们还不能说这种原地不前的发展循环圈已经给打破了。首先，我们还不清楚，中国的工业还能不能以这种速度发展下去，从而可以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其次，这些打工者的命运怎样，现在也不清楚。中国农村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外出打工现象还是近几年的事，并且这些打工者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他们结婚后会做什么？他们最终在哪里落脚？是留在城里还是回到农村？最终结果如何，政府的政策最为关键。而目前还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政府的政策会是怎样的。

我们可以预测如下的这些情况或趋势。第一，假如中国工业发展的速度还能继续吸收年轻的农村村民到城市打工，并且国家采取措施允许这些打工人员在城里结婚和定居下来，那么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将会十分快速，离开高家村的人将会越来越多，而回来的就会越来越少。因此，在这一进程中，传统的宗族文化和习俗将会渐渐消失，高家村也会消失。

第二种假定就是，年轻的村民在外打工几年后，又回到农村。他们挣到了一些钱，回到村里建房、结婚，最后就在村里定居下来。据说这

种情况已经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一些打工者回到家乡抓住各种机会在本地经商做生意。或是由于工业发展停滞，城里已无工作可找，一些打工者被迫回到农村。也就是说，高家村出去打工的人或是因为老了，或是因为找不到工作而返回了高家村，同时一些年轻人，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又出去打工。这种情况一代一代地循环下去。目前看来这是最有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高家村还会存在下去，但却是处在主流生活的边缘。

第三种可能情况就是，中国的工业化依然会继续，但发展的速度却不能够吸纳所有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一些打工人员会回到农村，另外一些可能就在工作的城市定居下来，成为城里人。中国的城市将会逐渐扩大，但并没有达到产生许多城市贫民窟的扩张速度。那些回到家乡的人用他们在城里打工挣来的钱和学来的技术，在本地建立公司和企业，发展地方经济。像高家村这样的村庄将不会消失，并且因为人口压力减少，而能保持一种生态可持续发展。这可能是最好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高家村会存在下去，而且会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

外出打工者一旦真的回到农村定居，他们是否还能容忍传统的生活方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吸收了很多新思想，见识了新的生活方式。城市的工作经历已经扩大了他们的视野，他们的期望早已和祖辈的大相径庭。高家村这样的农村里的居民也会提出分享中国现代化成果的要求。无论将来的趋势会是怎样，对于农村居民而言，深刻的社会变革已在所难免。如果有健康的国际环境、有利的国家政策，这种变革就会朝好的方面发展；反之，则必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附录一

有关农村研究的部分英文文献

Baum, R. *Prelude to Revolution: Mao, the Party and the Peasant Question, 1962–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Bernhardt, K. *Rents, and Peasant Resistance: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1940–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Brandt, L. *Commercialisation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East-Central China, 1870–19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Buck, J. L.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Nanking: University of Nanking, 1937.

Chalmers, J.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Chan, A., R. Madsen, and J. Unger. *Chen Village: the Recent History of a Peasant Community in Mao's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Crook, D. and I. Crook, *The First Years of Yangyi Commune.* London: Routledge, 1966;

———.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Ten Mile Inn.* London: Routledge, 1959.

Endicott, S. *Red Earth: Revolution in a Sichuan Village.* London: I.B. Tauris & Co., Ltd., 1988.

Esherick, J. *The Origin of the Boxer Uprising.*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Faure, D. *Rural Economy of Pre-Liberation China, Trade Increase and Peasant Livelihood in Jiangsu and Guangdong, 1970 to 1937.*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Fei, Xiaotung. *China's Gentry: Essays on Rural-Urban Rel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Freedman, M.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rn China*. London: Athlone Press, 1970.

Friedman, E., P. G. Pickowice and M. Selden. *Chinese village and Socialist Stat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He, Liyi, and Claire Anne Chik. *Mr. China's Son: A Villager's Lif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3.

Hinton, W. *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 *The Great Reversal: The Privatization of China 1978–1989*.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0.

Howard, P. *Breaking the Iron Bowl: Prospects for Socialism in China's Countryside*. Armonk: M.E. Sharpe, 1988.

Huang, P.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Huang, Shu-min. *The Spiral Road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Through the Eyes of a CCP Leade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Hu, Hsien-Chin. *The Common Descent Group in China and Its Functions*. New York: Viking Fund, 1948.

Kelliher, D. *Peasant Power in China: the Era of Rural Reform*, 1979–1989.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King, F. H. *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or Peasants Agriculture in China, Korea and Japa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27.

Kulp, D. H.. *Phoenix Village, 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 New York: Bureau of publications,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25.

Lardy, N. R. *Agriculture in China's 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Lippit, V. *Land Refor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New York: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1974.

Lyons, T. P. *Poverty and Growth in a South China County: Anxi, Fujian, 1949–1992*.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East Asia Series No. 72, 1994.

Madsen, R. *Morality and Power in a Chinese Village*. Berkeley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Myers, R. *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epei and Shantung*.

1890–194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Oi, J.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arish, A., and M. Whyte. *Village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 *Chinese Rural Development: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Armonk, NY: M.E. Sharpe Inc., 1985.

Perkins, 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 Chicago: Aldine Press, 1969.

Perkins, D., and S. Yusuf.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Perry, E., and C. Wong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otter, S. H., and J. M. Potter. *China's Peasants, the Anthropology of a Revolution*.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owell, S. *Agricultural Reform in China: From Communes to Commodity Economy*.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

Putterman, L.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Collective and Reform Eras in Perspec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Rawski, T.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Riskin, C.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the Quest for Development since 194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Stavis, B. *The Politics of Agricultural Mechanisation in Chin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8.

Tam, O. K. *China's Modernization: the Socialist Mechanisation Scheme*. London: Taylor & Francis, 1985.

Thireau, I. "Recent Change in a Guangdong Villag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9/20 (1988): 289–310.

Unger, J.. "State and Peasant in Post-Revolutionary China,"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17, 1 (1989): 114–136.

Wang Hong Sheng. "From Revolutionary Vanguards to Pioneer Entrepreneurs: A Study of Rural Elite in a Chinese Village."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1995.

Wittfogel, K. A. *New Light on Chinese Society, An Investigation of China's Socio-Economic*

Structur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38.

Wong, J. *Land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York: Praeger, 1973.

Wong, J., Rong Ma and Mu Yang (eds.). *China's Rural Entrepreneurs: Ten Case Studie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5.

Wou, O. Y. K. *Mobilising the Masses: Building Revolution in Hena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Yang, C. K. *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 London an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59.

Zhu, Ling. *Rural Reform and Peasant Income in China, Input of China's Post-Mao Rural Reforms in Selected Regions*. London: Macmillan, 1991.

Zweig, D. *Agrarian Radicalism in China, 1968–1981*.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附录二

统计图表

表1　青林大队收入指标表

	年人均谷物消费（斤）	单位劳动价值（元）	人均年收入（元）
1969	398	0.90	61
1970	312	0.80	65
1971	595	0.85	71
1972	545	1.087	98
1973	169	0.56	43
1974	377	0.76	60
1975	310	0.74	57
1976	403	0.70	63
1977	342	0.61	50
1978	339	0.51	51

数据来源：《大队台账》，第66–68页。

表2　波阳县血吸虫病防治表（1953–1985）

	体检人数	体检人数感染人数	注射率（%）	治疗人数	感染螺丝完全清除面积（亩）
1953	873	99	11.34		
1956	12,764	3,864	30.27	1,984	
1958	395,658	19,539	4.94	13,591	
1962	19,217	2,505	13.0	3,571	44,700
1963	30,371	4,578	15.07	3,185	58,660
1966	61,770	8,363	13.54	8,433	17,894
1968	26,543	4,845	18.25	4,000	
1970	412,986	22,963	5.56	23,211	172,181
1979	120,103	6,770	5.6	10,728	380,578
1985	54,163	7,380	13.63	6,359	9,182

数据来源：《波洋县年报》，第754–755页。

表3 青林地区人口表

	大队数量	生产队数量	家庭数量	总人口数	男性人口数	女性人口数
1949			465	1,673	920	753
1950			470	1,723	947	756
1951			475	1,757	967	810
1952			490	1,822	984	838
1953			498	1,885	991	894
1954			504	1,949	998	951
1955	1	13	523	2,013	1,049	941
1956	1	13	569	2,141	1,115	1,026
1957	1	13	566	2,192	1,120	1,072
1958	1	13	519	2,229	1,133	1,096
1959	1	13	547	2,253	1,147	1,106
1960	1	14	563	2,253	1,125	1,128
1961	3	31	544	2,456	1,269	1,187
1962		32	551	2,530	1,285	1,245
1963		32	558	2,604	1,310	1,294
1964		32	565	2,678	1,337	1,341
1965		32	570	2,752	1,430	1,322
1966		32	571	2,826	1,420	1,406
1967		32	573	2,900	1,480	1,420
1968		32	583	2,974	1,507	1,467
1969		19	599	3,048	1,540	1,508
1970	1	19	623	3,050	1,563	1,487
1971	1	18	617	3,042	1,573	1,469
1972	1	23	625	3,161	1,683	1,477
1973	1	23	627	3,217	1,675	1,542
1974	1	22	615	3,251	1,696	1,555
1975	1	24	632	3,416	1,786	1,630
1976	1	24	651	3,532	1,811	1,721
1977	1	31	626	3,518	1,807	1,711
1978	1	31	593	3,612	1,903	1,709

数据来源：《大队台账》，第5–6页。

表4　选定年份波阳县家庭和人口数量表

	1949	*1953*	*1956*	*1958*	*1964*	*1982*	*1985*
家庭数量	129,437	140,430	146,015	149,295	153,846	186,410	193,444
总人口数	508,240	553,961	592,434	627,858	694,974	1,062,338	1,071,184
平均每户家庭人口数量	3.93	3.95	4.06	4.21	4.52	5.70	5.54

数据来源：《波阳县年鉴》，第136页。

表5 私营作物产出表*

	谷物		棉花		花生		油菜籽		芝麻		蔬菜	
	土地面积	总产出	土地面积	总产出	土地面积	总产出	土地面积	总产出	土地面积	总产出	土地面积	总产出
1949	311	416	20	6	12	24	20	12	33	20	70	219
1950	310	416	20	6	12	24	20	12	30	18	70	220
1951	310	416	20	6	12	24	20	12	32	19	70	220
1952	310	416	20	6	12	24	20	12	35	21	80	240
1953	310	416	20	6	12	24	20	12	30	18	85	250
1954	310	416	20	6	14	28	20	12	30	18	90	270
1955	320	436	20	6	14	28	30	18	38	23	90	270
1956	320	436	26	6	13	26	30	18	32	19	90	290
1957	320	436	26	8	11	22	30	18	39	24	90	270
1958	320	426	24	8	11	22	30	18	30	18	90	270
1959	320	426	24	8	11	22	40	28	32	19	100	300
1960	320	426	25	8	15	30	40	28	38	23	80	240
1961	320	426	25	8	13	26	40	28	40	24	85	260
1962	320	426	25	8	10	20	40	28	40	24	85	260
1963	320	426	27	9	10	20	40	28	40	24	80	240
1964	320	426	28	10	10	20	40	28	40	24	90	270
1965	300	390	25	7	10	20	40	20	40	20	81	243
1966	300	390	25	7	10	20	40	20	40	20	81	243
1967	290	375	25	7	10	20	40	20	40	20	81	243
1968	290	375	25	7	10	20	40	20	40	20	81	243
1969	280	365	5	3	10	20	40	20	40	22	81	243
1970	280	365	5	3	10	20	40	20	40	20	81	243
1971	234	313	3	1	8	16	30	15	20	10	99	164†
1972	244	336	7	4	12	24	40	20	30	18	108	324
1973	278	344	7	4	9	18	30	15	70	35	167	500
1974	412	807	74	39	21	54	34	14	21	11	165	500
1975	242	426	11	3	10	25	5	3	10	6	170	500
1976	256	426	11	3	10	25	5	3	10	6	170	500
1977	256	352	32	13	16	40	15	8	30	18	100	300
1978	240	286	26	3	10	4	36	20	40	28	100	300

*产出单位是中国的“担”，即50千克。

†这个数据很明显是不准确的。在大队台账记录中，这个数据前面有一个叉号，并且没有提供任何其他参考数据。

注释：从1961年起有了村民在自己私有土地上的烟草生产记录，也有1965年至1970年间的甘蔗生产记录。这些记录都未被列入上述表格中。

数据来源：《大队台账》，第27–30页。

表6　青林大队谷物产出表（1949–1978）

	产出（担）
1949	9,420
1950	17,920
1951	17,920
1952	18,920
1953	15,920
1954	6,420
1955	18,510
1956	17,010
1957	17,010
1958	15,510
1959	15,510
1960	15,507
1961	16,840
1962	16,840
1963	16,840
1964	16,840
1965	18,012
1966	18,757
1967	19,521
1968	20,306
1969	21,390
1970	20,979
1971	27,454
1972	30,812
1973	14,399
1974	17,746
1975	19,018
1976	24,375
1977	18,220
1978	20,635

注释：上表所述谷物包括水稻、小麦、红薯、大豆等，但是不包括如棉花、油菜籽和芝麻类的经济作物。

数据来源：《大队台账》，第11–14页。

表7　洪涝和干旱造成的青林大队谷物生产损失表（1949–1978）

	受影响土地面积合计（亩）	零产出土地面积（亩）	受乾旱影响土地面积（亩）	受洪涝影响土地面积（亩）
1949	2,427	2,100	14	2,413
1950	321	290	10	311
1951	379	261	12	311
1952	295	238	7	288
1953	437	390	33	404
1954	2,773	2,773	43	2,730
1955	728	718	16	712
1956	206	160	6	200
1957	347	308	47	300
1958	987	760	10	977
1959	289	243	23	276
1960	306	247	6	300
1961	257	186	71	186
1962	1,762	1,630	11	1,751
1963	1,252	1,081	129	1,123
1964	1,930	1,251	70	1,860
1965	875	527	70	805
1966	785	607	80	705
1967	685	505	80	605
1968	565	325	60	505
1969	415	425	60	355
1970	525	515	70	455
1971	648	415	140	504
1972	114	94	120	94
1973	3,525	3,021	220	3,305
1974	1,608	1,713	94	1,514
1975	1,561	1,445	116	1,445
1976	652	541	142	541
1977	1,995	1,995		1,995
1978	2,245	1,476	2,245	

数据来源：《大队台账》，第9–10页。

表8　青林大队经济作物产出（1949–1978）

	棉花 产出（担）	油菜籽 产出（担）	芝麻 产出（担）	花生 产出（担）
1949	36	210	75	50
1950	36	210	75	50
1951	36	210	75	50
1952	36	210	75	50
1953	36	210	75	50
1954	36	210	75	50
1955	36	210	75	50
1956	36	210	75	50
1957	36	210	75	50
1958	36	210	75	50
1959	36	210	75	50
1960	210	240	90	50
1961	210	240	1080	50
1962	210	240	1080	100
1963	210	280	126	50
1964	165	210	75	50
1964	268	259	100	50
1965	268	259	100	50
1966	268	259	100	50
1967	268	259	100	50
1968	268	259	100	50
1969	268	259	100	50
1970	331	284	140	71
1971	113	276	145	64
1972	451	397	66	157
1973	126	105	76	157
1974	211	95	63	358
1975	107	222	133	334
1976	116	162	117	211
1977	169	225	149	385
1978	98	231	52	111

数据来源：《大队台账》，第19–22页。

表9　青林地区主要生产作物产出表

	单位面积产量（斤/亩）		
	谷物	棉花	水稻
1962	196	15	420
1971	354	13	475
1972	420	52	552
1973	369	21	480
1974	320	36	428
1975	394	21	515
1976	333	20	413
1977	336	34	446
1978	349	16	433
1979	466	24	569
1982	482	36	691
1983	414	9.4	383
1985	549	95	658

注释：谷物包括水稻、小麦、红薯以及其他作物，如大豆和苦荞麦。水稻包括一季和二季作物，上表所列年份是可查询到的年份，但是上述数据与《大队台账》中的数据存在不一致，其中不一致的年份包括1949至1978年之间的数年。出现数据不一致的原因之一是在1967年之前，青林地区有三个大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三个生产队合并为了一个大队——青林大队。1978年以后，青林大队又重新被分为了三个大队。《大队台账》中的数据是1978年将许多不同来源的数据收集整合，并作为整个青林地区的数据记录放在一起的。而表8中的数据则来源于当地年报中每年的数据记录，因而表8中的数据是更具准确性的。

数据来源：《大队农业统计年鉴》，1962、1971、1972、1973、1974、1975、1976、1977、1978、1979、1982、1983、1985。

表10　青林地区年税率、生产队应缴税额以及总收入分配率数据表

	公积金	公共福利基金	农业税	当地政府官员的工资贡献	总收入分派率(%)
1961	4	3	10.8	*n.a.*	66.6
1962	4.5	3	2.6	*n.a.*	*n.a.*
1963	4	3	9.8	2	60
1964	4	3	10.5	2	*n.a.*
1965	4	3	7.2	2	67.6
1971	5	3	6.41	*n.a.*	*n.a.*
1978	3	2	16	2	*n.a.*
1979	6	4	7.8	*n.a.*	*n.a.*

数据来源：《大队年度分配表》，1961、1962、1963、1964、1965、1971、1978、1979。

译者后记

章少泉

1999年我到澳大利亚塔斯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Tasmania)学习，我的博士生导师是高默波先生，他送给了我一本他的新著 *Gao Village: A Portrait of Rural Life in Modern China*。或许是因为我曾经作为知青在农村生活劳动过三年，我一口气把书读完了，感触良多：难得有人这样记录、研究中国的农村和农民，然而用的语言却是英文！我对高老师说我希望有一天，但不知是哪一天，我要把它翻译成中文，让更多的人，包括许多在意自己如何被描述的农民读到它。他同意了。

这一天居然已经是2006年。我早已完成了学业，回到国内继续教英文。期间我看到过省里的一家主要报纸发文批评《高家村》——当然是那种自言自语的“批评”。那家报纸通常对书籍不感兴趣，他们的批评更使我觉得这本书重要。那天高老师来信问我是否还有兴趣翻译《高家村》，说是海外一家出版社有意出版，但时间要求比较紧。我当即一口答应，并在四个月之后如期交稿。怎奈好事多磨，今天我写“后记”已经是2013年的5月了。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并没有使用特别的技巧，而只是遵循了较为传统的“信、达、雅”的原则。限于篇幅，此处只谈谈对“信”的理解和运用。

求“信”意味着译者需要超越词语乃至篇章层面地去理解作者和原著。记住以下事实比勤查词典更加重要：作者具有中国农村实际生活与国际学术研究的双重背景，使用中、英文两种工作语言；原著呈现的是学术视野下的乡村生活。需要说明的是，作为译者，我这次翻译遇到的条件十分幸运：我不仅有着和原作者相近的农村背景、求学经历和学术兴趣，而且作为他的学生，我在他身边学习、生活了四年。我不仅熟悉他的“文”，即大部分英文和中文的著作和论文，也熟悉他的“人”，即他的行文和演讲风格。我甚至能想象如果他选择用中文来口述书中某一部分内容会是什么神态。此外，“农村生活”对我来说是一个不陌生，甚至很亲切的主题，毕竟我当过三年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这些有利条件在我以往翻译文学作品和学术论著时都不曾有过。列举上述有利条件当然不是为了说明《高家村》的翻译只是一个难以复制的特例，而是想说明“信”作为翻译标准和美学追求，永远在译者的前方招手。有时眼看要追上了，可它依然在前方。

为了对书中表现的高家村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有更加真切的了解，我本人或独自，或陪同外国访问学者，前后三次去过高家村。第一次去记得是2000年，我们按照书中那张作者自绘的地图，没费周折便找到了现实中的高家村。那时作者家的老屋还在。看着老屋，我不仅能够体会作者书中描写的情形，我还能感受他的心境：冬夜的寒风，掠过鄱阳湖，钻进那屋子，袭扰那灯下苦读的少年。类似的片段带有散文的抒情，这是学术性著作中不多见的。我们面对的“高家村”不只是普通意义上学者笔下的高家村，而且还是一个作者生于斯，长于斯的高家村。

现在的中译本实际上是一个团队合作的成果。我当时比较忙，除了担负一名教师的全部职责外还任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担负了较重的行政工作。于是找了我的几位“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帮忙。团队翻译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保持全书整体的翻译水准和风格一

致。我的办法一是带领大家阅读讨论英文本并解释疑点和难点，以求在理解层面达成共识；二是将我先行翻译的部分章节分发给大家参考或参照，以求风格和一些特定措辞尽可能一致；三是批改各人译稿，并请我的同事喻锋平博士负责校订。

如前所述，我的几位硕士研究生参与了本书的部分翻译，她们是：夏海娟、汪婷、陈露、李婕丽、罗倩、雷婧、陈晓梅、黄维。我的同事喻锋平博士参与翻译并负责译稿的后期校编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013年5月1日